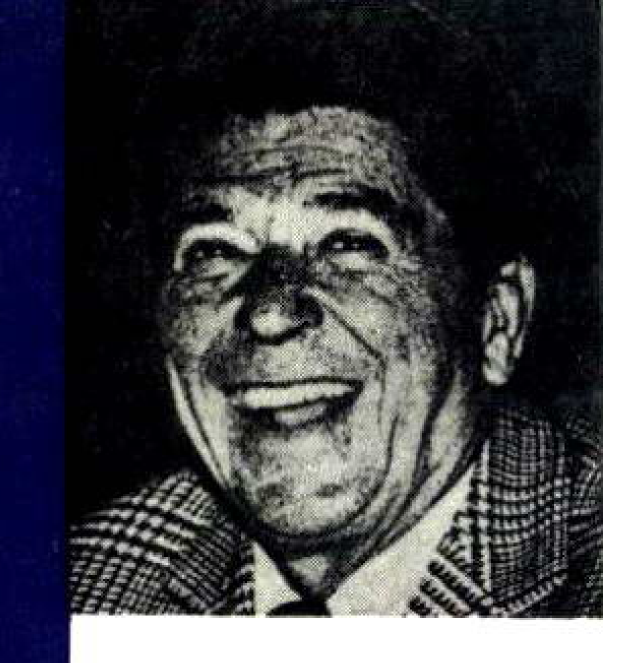


美 鲍勃·伍德沃德 著

帷幕：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1981—1987）

帷幕：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1981—1987）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梁于华 节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Bob Woodward

VEIL: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1981—1987

Simon & Schuster Inc. 1987

据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87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陈　宇

封面设计：孙　敏

帷幕：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1981--1987）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梁于华　等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9.5　字数：208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7-5012-0124-2/D·12　**定价：2.85元**

译者的话

美国名记者、现任《华盛顿邮报》助理总编辑鲍勃·伍德沃德这一新作，以丰富的资料和生动的文笔，叙述和揭露了1981—198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威廉·凯西任局长时期的内幕。

伍德沃德以擅长挖掘和报道内幕新闻著名。70年代初，他是最早报道和揭露后来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丑闻的两名记者之一。1984年，他开始撰写本书，花了三年时间，采访了250余人，查阅了大量文件资料，揭开了中央情报局设置的重重帷幕，才于1987年10月写成问世。

30多年来，写中央情报局的书很多，但轰动全国、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成为畅销读物的，当以本书为代表。其原因不仅在于作者的知名度高，也不仅在于他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政府其他机构的重重内幕，而且还在于这本书的出版正值伊朗门丑闻在美国闹得满城风雨之际，它使美国人知道，里根政府口口声声说要"重整美国实力"，而且主张"恢复传统道德"，"坚持美国信仰的原则"，原来却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货色。它背着美国人民，偷偷和恐怖主义者做交易，并用出售武器给伊朗赚得的一部分钱，去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多方插手中美洲事务，干涉他国内政。这种丑恶行径，激发了爱好和平、主张正义的美国善良人民的义愤，在野的民主党也乘机攻击里根政府，使国内不

得不开始对伊朗门事件进行调查。

书中对中央情报局如何策划伊朗门事件，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在世界各地收买间谍，搜集情报，进行渗透颠覆，甚至暗杀政治人物，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报道。世人由此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不择手段地到处伸手。中央情报局所作所为之令人触目惊心，美国国内外舆论一再为之哗然和强烈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此书还从美国外交与情报如何相互配合的角度，大量披露了七年来里根政府外交的内幕。可以看到：美国在表面公开的外交之外，还有讳莫如深的秘密外交；后者的领域涉及世界各地，特别是有关热点地区的所有重大决策和对外行动；在推行秘密外交的过程中，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之间，共和党各派和民主党各派之间，以及白宫和国会、国务院和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其他部门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尖锐矛盾，其表现形态从政见分歧到争权夺利，可谓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正如原出版说明所介绍的："这是对拥有世界最尖端技术的谍报机构与制订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透彻研究的一本著作。"因此，读者可以从中大开眼界。

作者还花了不少篇幅描写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其人。这个靠做投机生意发了财的律师，和许多同辈一样，在得到了优裕的经济生活后，就想涉足政坛，到政府里做一任大官以名留后世。凯西来自东部，本来并不是里根的亲信，只因1980年帮助里根竞选总统有功，获得了总统青睐。他本想当国务卿或国防部长，却未能如愿，只好退而求其次，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对里根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终因操劳过度，患了癌症而辞世。难怪里根夫妇对凯西的去世悲痛不

已，亲往参加葬礼。凯西身后，美国论坛有些人把他誉为中央情报局四十年历史上能够放手干而成为最强有力的局长，堪与英国作家勒卡雷的反间谍小说中的主人公、英国特务机关头子、老谋深算的乔治·斯迈莱相媲美。通过本书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的描述，了解凯西其人其事，透视80年代的中央情报局，这自然也是耐人寻味的。

本书出版后，评论界对其中的某些内容资料曾有争论和存疑。尽管如此，本书仍然很值得一读。鉴于原书卷帙浩繁，正文长达500余页，因而摘其精华，以节译本问世，以飨各界读者。

目 录

序 幕

1980年11月20日清晨7点，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被闹钟吵醒了。说实话，他真不愿这么早就起床。但今天他得向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汇报情报工作。伊朗人质危机已经到第383天了，吉米·卡特的总统宝座就是因为52个美国人被扣留在德黑兰而丢掉的。

特纳56岁，正处在事业的巅峰，他是一位退休的四星海军上将。当过系统分析家、海军的“智囊”和罗兹奖学金进修学者，他一直想摆脱眼前俗务，高瞻远瞩，思考重大问题。但此刻他被夹在新旧老板之间，自己又容易感情激动，因此对过渡阶段充满一系列矛盾情绪。

首先，他得决定何时和如何把真正的机密告诉里根——就是说，新总统需要知道的那些具有潜在爆炸性和危险的行动和间谍技术。这些情况隐藏得很深，从未泄露给新闻界，也没有被苏联间谍偷去。特纳只能向里根本人透露这些事，不能让那些政客知道，因为情况十分机密，涉及100多人的生命危险。

特纳还需要使里根注意到与此有关的宏观大局问题——间谍活动和秘密行动带来的机会和危险。身为总统的人可以在这种事上作出真正的抉择，而里根正好信誓旦旦地说过，他要重振美国昔日雄风。

特纳还想加深自己对里根的了解。过去几次汇报时，里

根表面上很开朗，但最终还是很难接近。里根挥手示意特纳往下讲的时候，显得轻松、超然、随和，似乎要用笑声、好莱坞故事和一句保守主义的教条把天下大事一笔勾销。这同特纳所经历的卡特的严肃、几乎是无情的盘问相比，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特纳见里根的次数越多，他越怀疑这位大总统的基本思考力。他曾在私下里把里根说成是个"笨蛋"。

特纳要考虑的最后一件事是他自己的前途。他想告诉里根，自己很想留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里根和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曾攻击说，卡特把中央情报局限制得太死，使它几乎完全无法进行有效的间谍工作。他们说，中央情报局是"虚弱无能的"。特纳认为，如果当选总统愿意倾听，他可以就此进行反驳。

特纳冲了个淋浴，穿好衣服，下楼吃早餐。他喝果子汁、白开水加柠檬。特纳信奉基督教科学，不喜欢刺激品，不喝咖啡，甚至讨厌咖啡冰淇淋。

只见这天的《华盛顿邮报》登载着："据悉凯西准备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赶忙抓住报纸细看。他可压根儿没听说过有此可能。"凯西"是指威廉·丁·凯西，里根的竞选经理，67岁了。特纳感到这个选择简直是开倒车，绝对错误。尼克松曾任命他的1968年竞选经理约翰·米切尔当司法部长。难道今年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也要成为政治斗争的战利品了吗？

报上还说，"凯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工作。"特纳认为，这倒无关重要，就好象找个二次大战时的老海军上将来领导海军一样。中央情报局里还留着一些战略情报局的遗老遗少，他们的旧作风给特纳带来不少麻烦。现在又有一个兄弟要从门里钻出来了。《华盛顿邮报》说，在二次大战的最后六个月中，凯西曾负

责往德国防线后面空降间谍 那可是35年前的事情了。

特纳原本期望，他们在告诉报界之前，为礼貌起见总会事先通知他要另请别人来接替他了。也许，这消息只是一个试探气球，或者根本就弄错了。在总统竞选前，他甚至连凯西的大名也不曾听到过。两周前，里根当选总统后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曾宣布，凯西将回去重操律师旧业。

被撤换的前景只是加深了特纳的信念：是他指导中央情报局走出了70年代中期那段黑暗、动乱的时期。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美国天翻地覆，国会搞了许多调查，深挖中央情报局过去的秘密：暗杀外国领袖的阴谋，对无辜的人使用危险的幻觉剂做试验，违反总统命令贮存小量毒剂和毒液，偷拆信件，对反越战的美国人进行特务监视活动。

特纳曾几次建议采取一些新的秘密行动，遭到行动处的反对。有一次，特纳未同白宫商量就自己下条子询问行动处副处长，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扰乱美国利益的三位外国领导人搞掉——古巴的卡斯特罗、伊朗的霍梅尼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副处长回答说，不行，这三个国家里都没有能够生存的政治反对派，中央情报局也不知道该支持那里的什么运动、政党或领导人。

特纳还建议行动处制订一项有限的秘密行动计划，在危地马拉寻找一位中间派的政治家，给予援助，甚至招募一些人为中央情报局服务，付给津贴。危地马拉的情况是典型的中美洲平局：右派军政府与左派马克思主义游击队对峙。特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支持温和派才能对美国有利。但是行动处又反对，他们认为，政府的政策还不明确，中央情报局不能走在前头。

有一项十分机密的行动称为“海军特别控制计划”。按

照这项计划，美国潜艇跟踪苏联潜艇，并在苏联周围进行侦察和收集情报工作，有时甚至进入苏联领水和港湾，危险性很大。其活动包括在海底安设尖端的电子录音设备，窃听苏联海底电缆的通讯讯号。每次行动都必须经总统批准。取回来的录音带交给国家安全局，情报内容只有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白宫的少数人知道。有时候，特纳也认为由于风险太大，得到的情报只具有边缘价值。

但是他也承认，有时候潜艇能弄回关于苏联军事情况的丰富资料。只有少数几种行动能从苏联得到如此大量的高质量直接情报。有时，“捕捞结果”包括苏联官员之间的对话，透露了他们的心神不定、说谎和弱点。苏联人认为海底电缆无法窃听，因此通讯联络使用不先进的密码系统，有时甚至根本不用密码。

另一项计划叫“靛蓝”。这是一项新的高度机密的卫星系统，尚在研制之中，将来可能成为核查与苏联签订的裁军协议的重要工具。“靛蓝”使用雷达造影，可以看透云层，并在夜晚工作，而那时摄影卫星都是盲然不辨而无法施展身手的。对东欧上空进行核查来说，这种工具特别重要，因为那里的所谓“魔鬼云层掩护”可以存在几天至几星期不散。

有些最好的情报收集活动是由“特别收集小组”在国外进行的。这些小组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精英组成小组，使用最新式的设备在许多外国首都进行窃听活动。他们能够创造间谍工作的奇迹，竟然可以搞到欧洲、中东和亚洲外国政府高级会议的逐字逐句记录，以及重要政治家之间的电话谈话。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中央情报局的正规官员在掩护下从美国使馆进行间谍活动。

特纳还主张加强对盟国和友邦的刺探情报工作。伊朗国

王本是美国和中央情报局的好朋友，他的情报机关曾是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主要情报来源。但中央情报局错把霍梅尼看作善良的、年老体衰的教士，现在他却扣留了美国人质。真是一大错误！

自伊朗爆发革命后，特纳就设法加强了他在外国政府和外国情报机关里的间谍网。埃及就是一个例子，中央情报局在那里布满了电子窃听设备和人员。特纳还从情报中得知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法赫德嗜酒如命，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健康欠佳，以及苏联导弹试验的某些情况。只是苏联政治局的工作情况搞不清楚。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但特纳始终无法提供多少情况。

今后两个月中，特纳的任务是向新总统介绍实际情况。里根需要了解情报工作的全面情况，他们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局限性是什么。

例如，有一项代号为“磨擦颈部”的行动，中央情报局造了一根假树枝，表面上用真树皮裹好，里面却安放着一具尖端的电子探测器，准备安装到东欧某处苏联空军基地外面的树上，用来收集关于先进的苏联“米格”式雷达的资料。那个空军基地在一座公园旁边，人们常到公园野餐，只需派一名间谍在某个星期日去那里，翻过篱笆，爬到树上把假树枝装上就行。但“磨擦颈部”行动迟迟未能实现，因为中央情报局能够在那里找到的唯一间谍人员不是欧洲人，如果派他假扮星期日赴野餐的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特纳的“奥斯摩比尔”牌轿车来到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转了个弯，驶向杰克逊街，在716号门前停住。这是一幢政府所有的砖砌住宅，里根就住在这里。特纳下车后，快步

跑上六级台阶。

特纳进屋不久，里根就从楼上下来，热情地欢迎他。当选总统无忧无虑，不慌不忙，一付天生的慈祥神情。在座的还有当选副总统布什（特纳的前任）、里根的首席助手米斯、另外三名助手和凯西。

特纳向他们汇报欧洲军事均势和中美洲问题。他谈到波兰的最新情况，看来苏联准备入侵，以粉碎独立的团结工会。空中卫星侦察照片和从柏林等处搞到的电讯窃听提供了充分的材料——柏林是全世界收集情报的中心。

特纳意味深长地补充说，还有活人提供的情报。凯西翘首注视，但特纳没有透露这人是谁。原来中央情报局有一个渗透很深的间谍，他是波兰总参谋部的上校，经常把波兰和苏联的意图这类情报从华沙送出来。上校的绝密情报只传阅到绝对有必要知道的少数美国高级官员。白宫里，只有卡特、蒙代尔副总统和布热津斯基三人能看到这些情报。上校的姓名叫库克林斯基，只有中央情报局的几个人知道，从来不在情报上出现。

特纳汇报世界各处热点的情况时，不时地瞥一眼凯西。只见他虽然外表象个心不在焉的老教授，口齿也不清楚，实际上却是在很细心地倾听。汇报结束后，凯西走过来，伸出大手握住特纳的手说，"斯坦，你好，关于我要接替你的传说是不真实的，目前什么都还没有决定。我不会夺掉你的位子。"

特纳走后，对自己的前途和中央情报局的未来深感不安。看来有迹象表明他要滚蛋，但又不能肯定。

当天下午，米斯通过卡特的白宫给特纳传了一个口信，表示报上登载的关于凯西的消息不是他传出去的。但是米斯也暗示，凯西被任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

第一章

实际上，凯西想当国务卿或国防部长。这两个职务才有份量，可以为里根制订的新外交国防政策效犬马之劳。但凯西也明白，他可能只好接受更低的职务，或者什么也得不到。他并不是里根从加利福尼亚带来的亲信，而只有那帮人才会飞黄腾达。他参加里根的竞选活动较晚，最后当上竞选班子经理，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偶然，何况不过是名义上的晋升而已。

1979年的早些时候，凯西曾接到里根打来的电话，要求给予支持。凯西一生拥护共和党，自己在纽约当律师，因为搞股票投机、投资和写书而发了大财。40年代起开始涉猎政治，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任职。凯西告诉里根，"现在加入你的竞选活动还太早。"但他解释说，这并非意味着不同情，恰恰相反。凯西随即寄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给里根，这是法律所允许的个人捐助的最高额了。他对别的有希望当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也捐了这样的数目。

后来，里根又打电话给凯西，说是不光要1000美元而已。他要到东部来，出席纽约长岛的一次募捐会，想见见凯西。凯西同意了，两人在凯西家附近的旅馆里共进早餐，就共和党竞选前途问题谈了一个半小时，双方都轻松愉快。凯西原来听说里根很肤浅，交谈时却发现他对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有足够的知识。里根钻研得并不深，但他对这些事情的

直觉看来不错，而且符合凯西的信念：自由竞争、强大国防和积极反共。里根只比凯西大两岁，两人具有同代人的共同看法。两人童年时代都是穷孩子。凯西欣赏里根生涯的多样性——当过体育新闻广播员、演员、工会干部、州长和保守主义代言人，战斗力顽强。凯西自己的生涯也具有多样性——律师、作家、战略情报局高级间谍、业余历史学家（正在写一本关于战略情报局的书）和前政府官员。两人都亲身经历过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见过四次战争。两人都喜欢听那讲得有声有色的故事，也喜欢放声大笑。然而更重要的是，两人都看不起吉米·卡特，看不起他的优柔寡断和不健康的、悲观失望的焦虑，认为这是他的弱点。

不久，凯西就被邀请去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里根竞选班子研究问题小组的执行委员会。他知道这是个没有什么油水的差事，但总算是参加了里根班子啊。他飞往加州，阅览问题资料，认识了米斯和迪弗，后者是里根夫妇最亲密的朋友，一个矮个子、讨人喜欢的家伙。

不久，凯西就邀请他的共和党阔朋友们去参加募捐午餐会。他对他们说，"我请你进城来和里根夫妇一起吃午餐。"如果他们犹豫不决，他就会补充说，"听着，你不想置身事外，对吗？这家伙要得胜的，这家伙要当总统的。"凯西知道如何从纽约那帮共和党人身上挤出油水来。他坚持不懈地打电话，在1979年底为里根竞选募集到50万美元。1980年初，里根的竞选经理约翰·西尔斯被撤职，于是里根就请凯西接任。这正是凯西一辈子所追求的目标。政治是他的第一爱好。

凯西当上里根的竞选经理后，就去研究里根周围的权力

中心何在。从外表、声音、目光和微妙的敬意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南希。大明星詹姆斯·斯图尔特有一次评论道，“如果里根第一次结婚时就娶了南希，她可以帮助他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凯西看出，在摸清楚里根的兴趣方面，南希是首席研究员。

大选前一个月，凯西料到里根会得胜，于是成立了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临时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他挑选了17位高级专家，包括前总统福特和其他共和党及民主党的高级人物。凯西自任委员会主席，分配名人写文章和进行研究。有人认为他把自己放在舞台中心，似乎要当国务卿似的。的确，1973—74年间，他曾短暂地当过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后来被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撵走。在基辛格的2690页的两卷回忆录里，只有一处草草提到凯西。但凯西不计较，仍请基辛格参加里根的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

特纳11月20日汇报会后的第二天，里根就飞回加州。他的保守主义朋友们安排他会见一位重要外宾，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亚历山大·马伦奇斯上校。此人在欧洲保守派圈子里是位著名人物，担任局长已10年了。他的情报局在法国国内政治上也作用很大。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幅世界地图，上面把共产主义的蔓延用红色勾画出来。有要客来访，便赠送一幅同样内容的小图。若干年前，特纳也得到过这样一幅小图。

这次到加州来，马伦奇斯可有比小地图更重要的东西奉赠。这位法国官员认为，干间谍这一行是十分严肃的事，风险很大，但也有希望得到巨大的收获。他很看不起中央情报局派人到驻外使馆去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的习惯做法。他认

为这简直是开玩笑，因为这样很容易被人家识破。他认为，派个人出去伪装成航空公司的职员或干脆在社会上混混，倒比较有效，当然也许比较困难。欧洲国家的情报机关有时利用新闻记者作为掩护搞间谍活动，但美国不用这种作法，美国认为言论自由比国家安全更重要。

里根让马伦奇斯提出具体建议，马说，“我只能告诉你哪些人该见，哪些人不该见。”里根问，“我该见哪些人？”马说，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他了解苏联邪恶的本质。还应见安哥拉抵抗运动领袖萨文比，他正在为反对共产主义而战斗。美国曾经通过中央情报局给予萨文比秘密支持，但1976年国会通过“克拉克修正案”后，就不许再在安哥拉搞秘密活动了。

里根又问，“我不该见哪些人？”

马说，“很多，但我想举出一个他们的代表——阿曼德·哈默。”哈默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许多苏联领导人的老朋友。他是缓和的象征。

里根说，“这倒有趣了，我经常见到他，每次我去理发店，他都在那儿。”

据说，哈默最近和洛杉矶贝弗利山（好莱坞许多大明星的住宅区——译注）的著名理发师德鲁克讲妥，每逢里根预订位子理发，就给哈默在里根旁边留个位子。但德鲁克说，哈默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他和里根都是常客。

马伦奇斯还说，“不要信任中央情报局，他们都不是严肃的人。”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央情报局里有内奸或安全措施松弛，或泄露机密给报界。他指的是中央情报局缺乏目的性。

在里根挑选内阁成员过程中，凯西在一旁观察，有些沮丧。名单上，每个内阁职务都有三名候选人，凯西的名字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项下都赫然列着。但没有人全盘考虑协调如何定局。里根最后决定请乔治·舒尔茨出任国务卿。他以为事先已经透露给舒尔茨了，于是打电话给对方。里根却不知道，原来通知舒尔茨的是准备请他当财政部长。

里根在电话里对舒尔茨说，“我要请你参加我的内阁。”

舒尔茨以为是请他当财政部长，于是拒绝了。里根打电话时，迪弗是在场的，但他只是几个月后才知道事情真相。如果不发生这场误会，舒尔茨当时会同意当国务卿的。

结果，里根的第二选择亚历山大·黑格一跃而成为国务卿一职的首选人物。南希赞成用他，她认为黑格具有明星的气质——他仪表堂堂，强悍有力，军人气慨，有魅力和热情，是个头挑人物。里根在外交政策方面有缺陷，凯西的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显然不能弥补这种缺陷，黑格却具有一切条件去做到这点。他是四星上将，曾任欧洲北约部队总司令，又有在白宫工作的经验，先是当基辛格的副手，后来又任尼克松的办公厅主任。

凯西对朋友说，“我不会当国务卿，我们大家都支持黑格，我们需要有威望的人。”

里根的加州老朋友温伯格则当上了国防部长。

凯西一气之下，回到纽约老家安度晚年，但仍与米斯保持联系。凯西说明白，他想在内阁任职，但剩下的职位不多了。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倒是很适合凯西，可惜不是内阁成员。米斯知道凯西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于是告诉他说，把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改变成内阁级是轻而易举的事。

米斯又去对迪弗说，“凯西想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迪弗回答说，“我想那是不对的，我认为我们不能让一个政治老朽干这项工作。”

米斯挑明说，这项交易快要成交了，凯西是个好人，懂得情报业务，如果他想要一个高级职务，应当给他。于是，迪弗不再吭声了。米斯跑到里根那里，建议让凯西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并把这一职务变成内阁成员。

里根说，“我认为很好。”于是就打电话给凯西。

凯西的反应很冷淡。他对里根说，他要考虑一下，并且要同妻子索菲娅商量商量。

里根耐心地说，好啊。但他事后向别人表示吃惊：发生了什么事？他原来以为全都讲好了。凯西不是想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吗？

凯西还在考虑里根的邀请。他在纽约的街上游来荡去，欣赏真正的都市生活。凯西平常对作出决定并不烦恼，这次却要花上一两天功夫了。1975年他辞去进出口银行行长职务时，并没有想要回华盛顿工作和居住。1971年到1975年，他在政府工作时，正是充满丑闻的年代。

他们回纽约后，把在华盛顿使馆区马萨诸塞大街2501号的房子以55万美元的代价卖给了孟加拉国大使馆。如果他们现在又要回华盛顿，那么索菲娅肯定要埋怨他当初不该把那所好房子卖掉了。

在他参加里根竞选班子前的两年中，凯西又写了另一本书。书名暂定为《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长达600多页，叙述战略情报局在二次大战中的间谍工作。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凯西自己，一个是凯西的老师和义父威廉·多诺万将

军。这位将军是战略情报局的创办人，凯西曾给他画过一幅肖像：矮矮胖胖，一对柔和的蓝眼睛，表情中充满无限的好奇心和干劲。多诺万比凯西的岁数大一倍，1943年他们在华盛顿认识时，凯西才30岁，是个少尉。但多诺万打破了年龄、军衔、教育程度和社会背景上的差距，和凯西成了忘年交。多诺万总想考察别人的能力，注重实效。他经常说，“要更上一层楼，精益求精。”凯西简直愿意为多诺万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多诺万总是喜欢亲临行动现场，盟国发动入侵，他几乎每次必到，好象是去观看纽约百老汇剧院的首演一样。

大战的最后六个月中，多诺万交给凯西一项重任。凯西曾写过一项条陈，建议战略情报局加紧准备，把间谍派到德国内部去。多诺万欣赏这个建议，要在德国后方马上建立一个间谍网，他任命凯西为“欧洲战区秘密情报站长”。凯西当时只是个31岁的少尉，却指挥着一些上校、中校，并且和英美两国的将军们打交道，平起平坐。多诺万叫他脱掉军服，到伦敦牛津街的高级服装店买了一套深灰色西装，以冲淡级别上的差异。

凯西全心全意地去布置间谍派遣工作的细节。挑选可靠的间谍是件困难的事。派美国人去根本不行，他们一到柏林，盖世太保总部便会把他们认出来。于是挑选了40来个反对纳粹的战俘，这种作法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凯西可不管这套，工作需要嘛。

为间谍们准备好掩护办法是一门艺术。凯西在伦敦一座阁楼里储藏了许多德国报刊剪报供间谍们阅读，让他们知道最近德国国内的情况。还为他们搞了假证件和德国衣服。为了使间谍们能够把情报发回，便为他们配备了低电压的发报

机，它可以向一架在空中盘旋的飞机发报。凯西联系好了空降这批间谍的飞机，核对了空降时间、地图和月亮出来的时间表。收集情报的第一项重点是德国军队出入主要火车站的流动情况，从中可以分析出希特勒的计划和困难是什么。第二项重点是轰炸目标。每批间谍出发，凯西都去送行。

1945年2月时，在柏林只有两名间谍。到了3月，凯西已派了30个小组。到了4月，他有58个小组在德国。有一个组代号叫“司机”，竟使用妓女当间谍。这是战争嘛。

凯西回顾往事，不禁感到他真想东山再起，重操情报旧业。接受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一职务，可以使他有机会了解机密世界。他的前任特纳不过是个外来的入侵者，凯西进去，可是自家兄弟。他和索菲娅的商量只谈了10分钟，索菲娅对别人说，凯西简直是“爱上了”这项工作。于是，凯西告诉里根，他愿就职。

第 二 章

正式宣布任命之前几个星期，凯西搬到华盛顿市热闹地区的杰斐逊旅馆的一个套间去住。他可以在这里躲在幕后静悄悄地进行准备。旅馆的老板爱德华·威廉斯过来看他，威廉斯是华盛顿著名的刑事案件律师，还是《华盛顿邮报》的法律顾问，很有实力。过去曾和凯西一起担任“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威廉斯是民主党人，他气鼓鼓地对凯西说，美国情报工作被糟蹋得只剩下破砖碎瓦，这不光是卡特搞的，早在福特时代就开始了。福特执政时期，苏联人竟然能从华盛顿四、五处地方窃听电话。美国情报机关曾截获苏联从这些电话窃听中搞到的“录音”，包括一些报回了莫斯科的。但福特政府的司法部竟制订一条规定，禁止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继续截听下去，说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威廉斯认为这真是荒唐透顶——苏联人可以窃听电话，美国情报机关倒不能。

威廉斯说，“他们在偷东西，而我们却不能看看他们从我们的口袋里偷走了什么东西。”

凯西接着打电话给他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时的老朋友理查德·赫尔姆斯，对他说他接替特纳的事已经定了。

赫尔姆斯认为好极了。他们约定12月1日一起吃午餐。到了那天中午，赫尔姆斯来到凯西住的套间，双方热烈握手。

凯西还沉浸在大选胜利的喜悦中。他问赫尔姆斯，请现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博比·英曼当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是否合适。赫尔姆斯不置可否，却提出应当找一个能够真正协助凯西的人——约翰·布罗斯。

凯西从前在战略情报局时就认识布罗斯。赫尔姆斯说，布罗斯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过20年，曾在行动处当过组长，既不右倾，也不左倾，现在当律师，相当富有，住在波托马克河边。凯西把布罗斯的名字记了下来，说准备马上找他谈谈。

布罗斯正在自己家中，接到凯西打来的电话，要他来帮忙。布罗斯已经69岁了，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机会，因此马上就同意了。

布罗斯到凯西的接管班子里转了一下，发现那个负责人米登多夫实在是个饭桶。还有三名助手，是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来的，正在写建议报告。他们主张中央情报局改组，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搞秘密行动，找一批精明强干的人来充实，发动秘密战斗威胁苏联，增加间谍人数，把中央情报局的人从驻外使馆调出来，改派到企业和咨询公司等处。第二部分专搞分析研究。第三部分搞反间谍工作，把原来归联邦调查局的那部分工作也合并过来。布罗斯认为，第三部分不能搞，那样就把中央情报局卷进国内情报工作了。

凯西又去请教威廉·柯尔比，此公曾于1973—75年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柯尔比答应来谈谈。

柯尔比对凯西说，当这个局长是给总统当顾问，“你得参加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你得独自一人前去应付一切，你得熟悉每天发生的情况，准备随时答复问题和当场作

出估计。”遇有危机时提出好的建议，紧要关头作出分析。

柯尔比说，“你需要一个能够正确提出问题的分析中心。”他说，目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工作完全组织错了，按什么政治、经济、军事、核战略等问题分工，简直象个大学一样。他说，应当按地区、国家分工，这样那些专家才能分析和衡量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全面情况。有一次，他和16位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一起开会，各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和地区，但只有他一个人能纵观全局。这就不对了，应该鼓励这些专家开动他们的聪明头脑，从狭隘的领域中走出来。

柯尔比说，对总统提出建议的质量好坏，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分析。许多情况都是公开的，报刊上都登了，如果和情报结合起来研究，可以分析出大量问题。但这种分析必须是最精确的，需要由头脑最好的人来做，越多越好。良好的情报和准确的分析可以帮助制订政策的人采取避免发生问题和灾难的步骤。有人说，前途难以预料，但中央情报局天天干的正是预卜未来。

柯尔比说，中央情报局的力量来自行动处设在国外的那些情报站。站长往往是30多岁的年青人，他们负责行政管理、安全保卫、秘密行动、外交活动以及承担风险。他说，秘密行动是必要的，也可能是有帮助的。但他不太赞成多搞秘密行动。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时，秘密行动已成为一个肮脏的名词。50年代时，秘密行动经费占中央情报局预算开支的一半，到柯尔比离职时，已下降到只占4%。凯西和柯尔比都认为，近一两年中，卡特政府对搞秘密行动相当积极。

最重要的问题是苏联，它是情报工作的“硬”目标。柯尔比说，苏联人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把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关闭得紧紧的了。莫斯科虽然没有一份象美国的《航空周刊》

（经常刊登重要的技术和军事机密）那样的杂志，但在俄国搞情报的机会还是在不断增加。

柯尔比说，“别忘了，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很高超的技术，但还得努力真正渗透进去，那可是很艰苦的事。”要设法接近苏联领导层，过去还没有谁做到这点，但你凯西有可能做到，“就是有点牺牲也是值得的。”他知道，凯西在做生意上是有名的不怕风险的人。

柯尔比说，中央情报局不管派谁去打入苏联内部，都有可能被对方变成双重间谍。他说，“如果你偶尔碰到一个坏蛋，你会同时得到五个好样的，引火烧身有时会发生，但不要紧，要继续前进。”这样的情报才是重要的，与众不同的。你凯西正是这种人材，时机也好。

凯西想，他应当给特纳也挂个电话。

他说，“斯坦，几个星期前流传的关于我要接替你的谣言是不真实的，现在可是真实的了，我要当中央情报局新局长了。”

12月11日，特纳又来向里根和凯西汇报。这时里根已经搬到总统接待外宾的宾馆布莱尔别墅，就在白宫斜对面。第一个题目是苏联经济。特纳说，苏联经济遇到了麻烦。苏联有人口稀少问题，新工人数量不够，效率不高，经济年增长率预计将从5%下降到2%。其次，他谈到了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这时他仍然在想美苏战略武器均势问题，于是就趁机转入这个问题。

他说，最重要的不是导弹或弹头的数目，而是它们的威力如何，双方互相发射导弹后结果又会如何。他说，在苏联发动第一次打击后，美国仍能有足够的核武器去摧毁人口在10万以上的所有苏联城市。这就是说，苏联的优势不是真实

的。这个判断的唯一缺点是分析家们是否低估了苏联第一次打击的破坏程度。但特纳认为，他们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问题是：不要担心我们的战略核武器的数量，而要担心它们被摧毁的程度如何。

这番话在里根看来简直是异端邪说。他在竞选中攻击说，美国落后的情况十分危险，必须增加军费开支和增加新的武器系统。因此，里根、米斯和艾伦都一言不发。

凯西也沉默不语。他认为，减少核武器一半的主张完全是胡说八道。即使削减一半，也仍然有足够的核武器摧毁全世界。

特纳转而提到民防问题。里根喜欢这个题目，他曾在竞选中说，苏联正在隐蔽他们的人口，准备核战争。里根对特纳说，"是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民防设施。"但特纳却说，"先生，我不同意。"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苏联城市人口能够得到隐蔽的还不到10%。而且所谓苏联计划疏散人口的说法也是没有得到验证的。在严寒的冬天把八百万人疏散出莫斯科，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啊！

汇报结束后，特纳又挨紧里根私语说，在卡特任职期间，中央情报局最机密的情报只许白宫里的两三个人知道，现在他想另找时间单独向里根和布什汇报中央情报局正在干的八件最机密的事。里根表示同意，于是特纳就告辞了。但凯西却跟上来说，他的任命在三小时内就要宣布了。特纳又惊又怒，匆匆离去，回到局里，马上召集14名高级副手和助手，向他们宣布凯西要来接替他了。特纳说罢，满脸忧郁，悲伤不已。

当天下午，凯西来到五月花旅馆舞厅的乐台上，和里根任命的另外七名内阁级官员并排站在蓝色的帷幕面前。里根接管班子的发言人詹姆斯·布雷迪代表总统宣布了任命。

第 三 章

凯西去看国家安全局局长博比·英曼。该局负责截听通讯和破译密码的工作。英曼说，该局共有四万人，包括在马里兰州米德堡总部的和散布世界各地监听站的人员。关键部分是行动处及其下属的苏联科，约有1000人，多数会讲或阅读俄语。截听通讯提供了不少关于苏联的好情报。总的来说，国家安全局应当能够知道苏联是否在准备重大军事行动。另外一个科负责截听亚洲的通讯。第三个科负责所有其他国家。每位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都想知道更多的情报，要了解对方在干什么。

英曼最大的心事是如何设法筹款进行大量投资。世界上还有不少地区没有为监听网所覆盖。另外，还面临着苏联以及其他国家使用新的先进密码的问题。苏联发出的通讯也日益增多。国家安全局得注意使工作更加及时，把情报更快地送到有关人士手中。现在一切都靠机器，但最好还是由人戴着耳机昼夜不停地监听外国的通讯。

凯西听罢，不禁担忧什么时候又会出现珍珠港事件，那时美国虽已在事前破译了日本密码电讯，却未能及时送到有关负责人手中。

12月中，凯西还在考虑请谁来当副局长最合适。特纳、卡卢奇（特纳的副局长）和布罗斯都推荐英曼。凯西仍然拿不定主意。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助手们向他介绍情

况，说过去四年中该局搞的秘密行动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传，主要是偷运大量书籍到共产主义国家里去，布热津斯基对这件事十分感兴趣，今后还要继续进行。

第二阶段是搞一些目的主要在于加强与友好国家（主要是英国和沙特阿拉伯）关系的秘密活动。最大的一次活动是破坏苏联支持的南也门，包括训练一些也门人去炸毁桥梁等。

第三阶段是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在布热津斯基的极力主张下，对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提供了大量援助。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中国也提供了援助。总数约达一亿美元。

1981年1月13日，凯西应召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审议对他任命的会议。这种审议会，凯西过去出席过四次，有一次是1971年，弄得他很不高兴。因此，这次凯西事先作了充分准备，亲自起草了他的长达40段的发言稿，力求避免出现麻烦。中共情报局局长毕竟是个重要职务啊。他的策略是尽量少作承诺，假装许多事还不清楚，还未决定，少说为妙，因为参议员们喜欢自己夸夸其谈。

那天早上，凯西准时到达，穿着一身价钱昂贵的宽条纹银行家派头的深色西装。10点正，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宣布开会。他要副主席、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莫伊尼汉介绍凯西。莫伊尼汉一付学者气派，操着浓厚的东部口音把凯西吹捧了一通，说他“气质优异”，二次大战中打过仗，在自罗斯福以来的历届总统手下担任过公职。接着，戈德华特发言，把卡特政府的情报工作骂了一通。然后又有三位参议员发言，才轮到凯西陈述。

他说，他的目标是“重建、尽职和安全”。中央情报局存在着“制度上的自我怀疑”。“许多最能干的官员都退休了或将要退休。许多人士气低落。许多人在那里工作，只是降低情报官员的价值。”

他说，他的药方是加强“信心、信任和荣誉感”。他认为，不必进行人事上的大换班，过去几年的所谓“失败”，其实是分析上的错误和政策不对头，而不是没有搞到事实情况。他保证今后要把一切有关的情报和看法报告总统，并且和国会密切合作。

轮到莫伊尼汉问时，他说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充分和及时地把一切情报活动告知情报委员会，包括任何准备采取的重要情报活动”。他还说，当然，有些时候，总统有权指示只能让参院和众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知道某些情报。

戈德华特问凯西准备请谁当副局长，凯西说正在考虑。戈德华特于是提出，参院情报委员会认为英曼海军上将最合适，他懂行；不希望看到找个政客去当副局长。特拉华州年轻的民主党参议员比登支持戈德华特说，他认为英曼是最好的人选，他懂得如何同国会打交道。

凯西还用书面向参院情报委员会报告了他的财产情况，包括股票、地产、公债、保险和现金等，共计拥有9647089美元；1980年他的收入达317000美元。

1月15日，特纳最后一次来向里根、布什和凯西汇报。

特纳说，最重要的秘密行动是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支持。另外，如果霍梅尼下台或者美国人质被杀害，中央情报局也作好了对策。但是，最有意思和最危险的行动是敏感情

报的收集，共分三类。第一类是活人提供的情报，例如在印度和苏联。在印度的是一个政府高级官员，他是专门搞防空工作的。他提供的情报是关于苏联供给印度武器的情况。

在苏联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是一个叫托卡契夫的人，他在莫斯科航空研究所工作。他提供苏联现役武器和研制中的新武器的计划、特性和试验数据等情报。他的情报可谓宝中之宝，“盖了帽”。他不仅讲了苏联武器的性能，而且还讲了他们的弱点。他介绍了正在研制中的未来武器，特别是“偷越”雷达探测的技术。据估计，他提供的情报价值数十亿美元。

第二类是对美国的友邦和盟国搞间谍活动，这从来是一项棘手的工作。他认为这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应当扩大。大量的是采用技术手段——卫星照片、截听通讯、安装窃听器等。暴露的风险最可能来自美国情报机关内部泄密或暗藏的间谍。美国驻几十个国家的特别情报人员专门负责收集这种情报，有时内容很惊人。但是，如果事先泄密，那就会引起严重的外交问题和国家关系问题。凯西对这类情报已有所闻，他算了一下，好象一共只有30多起行动。特纳举例说，美国在埃及的情报十分厉害，整个埃及政府从上到下都有美国情报人员，而且装了许多窃听设备。

第三类是特别行动，其来源和方法十分重要，如果丢失了，将严重削弱国家安全。特纳详细解释了海军使用潜水艇窃听海底电缆通讯的行动。布什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潜艇得直接呆在电缆上面，一次要呆上几星期，风险很大。现在海军有一种高技术的架子，可以放在海底电缆上面几星期至几个月，记录通讯内容，然后由潜艇去取回来。这种架子只是放在电缆外面，并不接触到里面的电线。因此，如果苏联

把电缆从海底捞起来检查或维修，也无法发现曾经被窃听的痕迹。每次行动都必须经总统批准，但风险仍然很大，曾经发生与苏联潜艇相撞的事件以及其他事故。如果有一艘潜艇在干这种行动时被苏方抓住，那后果不堪设想，如同过去的U-2间谍飞机那样。另外，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还窃听埋在陆地下的通讯电缆和架在空中的电话线。

破译密码也是一个敏感领域。特纳说，作为主要目标的国家约有20个，概括来说有时候可能破译一些密码，但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破译人家的密码，也不可能破译所有的密码。有十几个国家不是主要目标，但国家安全局也能破译它们的密码。关键是要窃听外国的通讯，因为有些国家特别是苏联，并没有预料到美国能够窃听到它们的通讯，例如苏联就没有预料到美国能窃听到它的海底电缆通讯。因此，它们常常在这些线路上使用不是最高级的密码，有时甚至根本不用密码。有时候，仅仅注意到通讯量的增加或新线路的开辟，也可以得到“提示”，例如感到对方要开始进行导弹试验了，从而帮助美国情报收集单位，例如RC—135空中侦察监听站，开始投入工作收集更多的材料。

还有一些自动化的遥控转播站，可以在某些国家安装或空投，用它们来把窃听到的通讯发回美国。有时候，国家安全局曾发现外国的微波通讯线路有“漏声”，于是进行窃听。总之，机会很多，有许多已利用了，有许多还待发掘。

第 四 章

1月20日是伊朗人质危机的第444天，也是里根的就职典礼日。中午12点30分，即里根就职后半小时，载着人质的两架飞机从德黑兰起飞了。

第二天，凯西请总统打电话给英曼，要他出任副局长。里根的声调很轻松，几乎是开玩笑似的。他说，凯西和情报界所有的人都要求英曼当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然后里根就抛出了杀手锏，他诚恳地说，“我需要你”。这可是三军总司令的要求啊！

在政府任职有好处，在军队服役有晋升的前途和威仪，但总统亲自要求你为他服务，却有举世无双的神秘性。英曼不觉回答道，“我深感荣幸”。同时又补充说，他希望顶多只干18个月到两年，请原谅。

同一天，凯西自己也办了一件人事工作。他任命马克斯·休格尔为他的特别助理。组织建设需要多样性，既然英曼是情报内行，那就需要找一个外行来平衡。休格尔正是这样的人。他56岁，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出生的商人。凯西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和凯西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是个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1980年总统竞选中，凯西就带着休格尔一起工作。休格尔拉拢了许多人支持里根，并把他们组织在30个大利益集团周围，包括宗教界、自由职业者、少数民族，甚至老年人。休格尔在二次大战后曾在美国军事情报机关工作

过，还会讲日语，曾在一家日本公司做过20年的国际生意。休格尔很顺利地通过了政治审查。

英曼同意当副局长后，凯西就放心了，这下他可以开始统治美国的情报王国了。新政府的一些重要人事安排对凯西也很有利。国家安全顾问艾伦得向新任白宫顾问米斯汇报，不能径自去找总统。这就史无前例地削弱了他的权力和关系，加强了凯西的地位。更妙的是，在凯西的坚决支持下，贝克当了白宫办公厅主任，而贝克在总统竞选期间是凯西的副手。凯西和迪弗也已在竞选中混得很熟。掌管白宫的就是米斯、贝克和迪弗这三架马车，凯西深信他同这三个人的关系都很好，他们也需要和他保持联系。最重要的是，凯西认为他可以随时拿起电话同总统讲话，或者要求直接晋见总统。

凯西同黑格和温伯格的关系看来也不错。他对这两位内阁高级官员保持一种没有竞争的姿态。黑格管外交，温伯格管军事，如果发现这两样都还不够，那么里根政府积极反共的外交政策目标还可以通过“情报工作”来实现。

凯西把英曼找来商量计划。他说，我自己直接掌管分析处和行动处，这两方面都需要改进。英曼吃了一惊，重要工作都被你抓走了。凯西又说，如果英曼愿意，可以掌管科技方面，另外还可以管管行政人事工作，凯西对这些不感兴趣。

在正常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局长负责对外抓总。现在凯西却要对内抓总，让英曼去同其他部门打交道。但白宫方面却由凯西自己联系，他认为他是总统的情报官，最新和最重要的情报都要由他亲自报告总统。

英曼感到有些失望。

1月26日，内阁在白宫开会，讨论恐怖主义问题。黑格国务卿说，恐怖分子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伊朗就是证明。他认为，新政府面临不稳定的时期，要接受考验，要拿出决心。他叫国务院的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安东尼·昆顿汇报情况。昆顿说，恐怖分子有可能在美国本土搞袭击。米斯仍然重复竞选时的词藻，说都怪卡特和特纳把情报部门搞糟了。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不同意米斯的说法，认为问题在于情报部门缺钱缺人。英曼支持韦伯斯特的意见。凯西没有说什么，他知道韦伯斯特和英曼都不是空谈家。会议决定让凯西去研究卡特颁布的情报工作指令，如果需要修改，里根将乐于颁布修改指令。

第二天，参院情报委员会未经辩论就以95票对0票批准凯西任中央情报局局长。28日，凯西宣誓就职。但这天大出风头的却是黑格。他在国务院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责苏联"训练、资助和装备"国际恐怖分子。这可是大新闻，黑格的高级助手们都不相信。国务院情报司司长罗纳德·施皮尔斯偷偷地对黑格说，你今天这番话可同我们收到的最新情报对不上号啊。黑格却说，他看到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恐怖主义网》的清样，里面讲到苏联所起的作用，这本书是美国驻意大利记者克莱尔·斯特林写的。

施皮尔斯认为可能有新情况，于是请凯西送一份《全国情报估计特刊》给他看看。这份特刊集中了美国各情报机构的看法，供决策者参考。凯西准备把特刊定期送给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阁的重要成员们看。

最近一期特刊的标题是"利比亚的目标和弱点"，内容是讲卡扎菲近几个月会干些什么，长达12页。"主要判断"

部分说：

一、“卡扎菲最近在乍得的成功（派兵入侵）决定了他的侵略政策将对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构成日益增长的挑战。”还说，卡扎菲不会就此罢休，今后会“更富于冒险性。”

二、“国内和流亡在外的反对力量组织得很差，没有效率。”这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搞秘密行动，还不能只提供金钱和武器。

三、“卡扎菲的反西方政策有利于苏联的目标……苏联大量卖武器给利比亚，赚得很多硬通货，估计每年达10亿美元。卡扎菲虽然不是苏联的走卒，但同苏联关系确很亲密。”

特刊还说，最近卡扎菲搞政治阴谋、外交活动、恐怖主义、暗杀，现在又在乍得搞军事占领。

中央情报局雇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他们对卡扎菲进行分析，说他因为小时候是牧羊人之子，备受城市里的利比亚人和外国人的歧视，因此神经不正常，仇恨社会权贵，充满天真的理想和宗教狂热，骄傲自大，严峻简朴，害怕被人轻视。因此他反叛权威，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全世界的叛逆事业。

卡扎菲多年来声称，领海宽度可以超过国际上承认的12海里限度，竟认为275英里宽的锡德拉湾完全属于利比亚。特刊估计，卡扎菲是否会真正冒险尚是疑问，但“他确已命令部队袭击侵入此线的美国船舰和飞机。”因此，“美国卷入利比亚近海的事件的可能性很大。”

特刊第51段说，乍得的前国防部长哈布雷仍率领军队在乍得与卡扎菲作战，摩洛哥、埃及、苏丹和法国都向哈布雷提供日益增多的援助。特刊最后一段说，阿拉伯国家的“微

妙之处在于卡扎菲的某些敌人，包括萨达特总统，正在集中力量，准备静悄悄地袭击卡扎菲最脆弱之点——乍得。”

凯西读到这里，不禁大感兴趣。在乍得搞卡扎菲一下，很符合凯西的战略意图。他决定不放过这个机会。

不久，黑格的新国务院和凯西的新中央情报局就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对哈布雷提供秘密援助。黑格说，目的是要“把卡扎菲的鼻子打出血”，“增加运回利比亚的棺材的数目”。凯西支持这个政策。

后来召开了一些部门之间的会议，最后到白宫和总统一起开会。一致认为，不仅要恢复秘密行动，而且要重振美国的国际声誉。不久，总统正式签署命令，拨款几百万美元秘密支持哈布雷。凯西的第一个秘密行动上马了。

2月初，凯西到国防部去和国防情报局局长泰伊空军中将共进午餐，讨论情报工作。

泰伊说，我们在南太平洋的情报工作太薄弱。苏联从新西兰购买羊毛，利用新西兰的经济困难插进一条腿。在北太平洋，朝鲜局势不好，北朝鲜增加了兵力，美国却减少了情报人员。苏联企图增强它的影响，美国却后退，特别是在东南亚、越南。

泰伊说，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虽然打开了大门，但并没有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的政策可以一夜之间就改变180度。中国有战略核力量，有潜水艇，有进入轨道的卫星，有洲际导弹，是个世界强国。我们对中国的看法有严重错误，把它只看作某种第三世界大国，认为它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重大威胁。

泰伊说，墨西哥是一大忧患。农村里有叛乱，地方警察而不是中央政府控制某些地区。首都贫穷现象十分严重，很

可能出现另一个霍梅尼式的领袖。中美洲一片不稳定，是左派分子的温床。古巴正在得到更多和更好的飞机，可以使它有力量向更多的地方扩张。

中东局势还会更恶化。伊朗在霍梅尼统治下还没有发生内战，但将来内战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在中东搞斡旋，但似乎结果总是给我们自找麻烦。

印度是个关键国家，但权力分散，甘地政府和军方各掌握一半，军方几乎完全受苏联操纵。这种两重政权使美国更为难，因为常常搞不清楚究竟谁说了算数。

泰伊说，美国需要清醒过来。白宫常常听不进下面的意见。老实说，几乎简直没有办法让卡特总统看到关于苏联准备入侵阿富汗的确凿情报。入侵前六个月，就发现一位专搞军事扩张并曾在北越积极活动的苏联将军到了阿富汗。泰伊亲自打电话给卡特的白宫，警告他们。结果好象根本没有人在家，更没有人听得进去。从卫星拍下的照片和通讯上窃听到的情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的意图。但白宫陷在伊朗问题里，似乎不想再发生另一个问题。现在，过了一年多，苏联仍然在阿富汗认真地干下去。

凯西插话说，好，如果今后你有什么信息要往上传，你直接来找我，我们有办法传上去的。

泰伊说，在苏联，军方控制的程度只有少数人能认识到。美国的情报分析，特别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总不愿意承认苏联军方有那么大的权力。其实苏联将军们决定许多大事已有几十年了，他们的手段是实行改革。军队越现代化，他们就权力越大。情报表明，苏联军方有许多人是反对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的。因此，泰伊认为苏联会欺骗我们。

凯西同意，苏联人都是骗子，不能信任。

泰伊说，他认为更糟的是苏联领导阶层越来越站稳了。俄国正在变成一个阶级社会。约有3000个家庭构成了社会的精华，而且他们想保持下去。他们的别墅和财产都传给了下一代，这说明他们不会放弃既得利益。

苏联一点儿也不信任东欧的军队。可能除了保加利亚外，所有东欧国家都讨厌苏联。苏联强迫他们购买陈旧的破烂武器，东欧的领导人对此反感透了。但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存在仍在增长，威胁很大。

泰伊还记得1978年12月他曾访问德黑兰，那是伊朗国王被推翻之前六星期。中央情报局驻德黑兰的站长要求派更多的讲当地语言的间谍去，却没有得到，结果伊朗发生的情况几乎无人知道，这是情报工作上的一次失败。

凯西坐上自己的汽车离开时，心里想，他妈的，要做的事真多：朝鲜、越南、中国、墨西哥、中美洲、中东、印度、苏联，还有伊朗。他想，只有一个办法，挑选几个重要国家，自己去看一趟。

凯西和布罗斯商量，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当他的行政助理，最后选中了罗伯特·盖茨，刚就任主管苏联的情报官员。凯西更欣赏的是盖茨曾在白宫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从1974年到1979年，历经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届总统。盖茨还有三件事使凯西喜欢他。

一件是盖茨懂得如何利用私人关系打通上层。他在刚加入中央情报局时便找过同事约翰·史密斯诉苦，史密斯的父亲是尼克松的裁军谈判首席代表杰拉尔德·史密斯。结果老史密斯便把盖茨找去当他的谈判代表团的分析员。

第二件是盖茨认为中央情报局书生气太浓，许多人不敢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应当有点争论，才会引起决策者们注意下面的意见。

第三件事是盖茨虽然长期搞分析调研，却也机灵大胆，能参加实际行动。有一次，布热津斯基派他的助手戴维·艾伦到纽约去秘密会见卡斯特罗派来的两名高级情报官员。艾伦把盖茨带去。盖茨偷偷穿了一件从联邦调查局得来的窃听背心（里面装有窃听器），结果艾伦同那两个古巴人的谈话全都录下来了。

接着，凯西又任命休格尔为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局长，任命过去的老部下斯坦利·斯波金为法律总顾问。

凯西每天看许多材料。一种是行动情况汇报，讲头一天发生的事。一种是驻外使馆和分站发回的电报。一种是“总统每日简报”，10页左右，只供里根、黑格、温伯格和凯西参阅的情报汇编。一种是“全国情报日刊”，虽不及前一种敏感，但也很机密，政府里有几万人能看到。一种是秘密情报人员提供的绝密情报，由专人送来。一种是卫星和其他侦察手段拍摄的照片。如果他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只要表示一下，马上有人送更多的材料来。所有这些情报材料都很有内容，但凯西总觉得有些脱节，疑问越来越多，总的感觉是驻外国的那么多分站究竟每天在干些什么？从报回来的材料看，有些分站提供了有关驻在国政府和当地苏联使馆的不少重要情报，但也有许多分站报回来的材料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常常胡说八道。因此，凯西决定亲自出去看看。

3月初，凯西飞往远东巡视。他所到之处的中央情报局分站已经建立了种种制度和业务工作，从各方面监视苏联在

这些国家影响日益增长的情况。这些分站利用当地的警察、驻在国的情报、移民和海关部门，相当好地跟踪了苏联公民的到达和离境。他们一般还能得到苏联公民护照上的照片的复制品。他们的侦察组坐上配有摄影机和录音设备的面包车，就可以去跟踪和监视选定的目标。他们的观察和摄影站对重要苏联人的来去提供了良好的资料。他们的特别情报人员可以窃听电话和房间里的谈话。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能截取邮件。这些分站有一些“有路子”的情报员，他们认识苏联目标，能提供人物材料。有些分站还在驻在国政府里有高级耳目，但得到的真正有用的情报不多。

凯西发现，行动官员们有的水平很高，有的还可以，但似乎没有谁有点雄心壮志。气氛不是开拓性的，没有谁花足够的时间去开动脑筋，列出真正的目标，然后作最大努力去招募间谍或安装重要的窃听设备。这些分站只是等候机会，而不是主动出击，捕捉机会。人们犹豫不决，疑虑重重。

凯西所到之处，他的部下都殷勤侍候，分站站长、保卫人员、通讯渠道，全体出动。凯西想作出榜样，而他过去曾任总统竞选经理的地位，也使人们暗暗感到他是里根在一系列外交国防政策上的代表。

凯西回国时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美国的盟国和友邦都期望美国出来领导，而他的分站则期望着他。

第 五 章

由于卡特和特纳在伊朗撞上了冰山，凯西极力想搞清楚中央情报局在这件事上是如何失败的。

特纳下台前，中央情报局曾请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专家罗伯特·杰维斯到局里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杰维斯看了许多绝密材料，写了一份100页的分析报告，题为“伊朗事后调查分析”，供特纳等少数人参阅。报告归纳情报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如下：

- 中央情报局的体制本身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形势，分析员们只习惯于按步就班写日常汇报。
- 中央情报局主管伊朗的高级分析员欧内斯特·奥尼说，上面有五六个人写条子给他，说他的报告写得不错，但从来没有人找他去询问一番。情报变成了一大堆事实的罗列，送给别人看就完事大吉。如果要使情报能回答“明天”的问题，就得作出一些假设，而假设会被认为是猜测，不好。
- 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收到的电报，内容比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的多不了多少。法国的《世界报》和英国的《经济学家》倒有较多的推测和评论，但都用平邮寄来，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们收到时已过了一个星期，认为过时了，也就懒得去看。外界也没有什么来源帮助分析员们思考，提醒他们恐怕分析错了。
- 中央情报局驻德黑兰分站对伊朗局势的看法有分歧，但发回的电报和报告中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分歧。

驻德黑兰分站的工作重点，第一项是苏联，第二项是伊朗想得到核武器，国内政治形势差不多放到最后。伊朗发生暴乱前几个月，分站才把重点次序改变了一下，但只是初步感到存在政治斗争。

- 没有在伊朗国王的办公室或电话上安装窃听器；没有利用尖端技术设备从伊朗发回任何重要情报。国家安全局曾建议在美国大使馆里建立一个最先进的电子监听站，三分之一的覆盖面用于监听伊朗政府，结果却被美国大使威廉·沙利文拒绝，他认为他可以直接见到伊朗国王，而且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在我们手心里，因此已经有足够的好情报了。中央情报局在国王周围没有安插拿津贴的间谍，显然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中央情报局在温和的中产阶级反对派组织“民族阵线”里有间谍，但在宗教界却没有间谍，殊不知“民族阵线”力量很小，真正有力量的反对势力是宗教界。
- 中央情报局内部、国家安全局内部和军事情报部门内部倒是很通气，但各部门之间通气却很少。
- 没有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反面的考虑。
- 分站人员似乎认为，在现代，宗教界的反对派不会成为政治反对派。中央情报局和美国使馆都没有考虑到伊朗民族主义会发展到反对美国。其实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从宗教人士处得知，因为他们认为国王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工具，受华盛顿和中央情报局指挥。
- 分析常常采用循环论证逻辑。其出发点是：国王拥有军队和保安部队，然后假定说如果必要时他会动用部队。分析又说，既然国王没有动用部队，那说明反对力量显然尚未构成威胁。这简直是一个无法攻破的循环。没有人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阻止国王动用部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部分问题在于，中央情报局没有了解到国王得了癌症，正在服药，这也许促成了他的优柔寡断。
- 发回的报告里使用了一些可以作不同解释的词句。例如有一句话说，“国王将采取决定性行动”，许多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国王将动用部队镇压群众叛乱，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指国王将实行改革，修改他的专制统治。
- 1978年8月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材料说，“伊朗并不处在革命形势中，

甚至不处在革命前夕的形势中。”1978年11月22日的一份材料竟然作具体结论说，国王“没有瘫痪，没有优柔寡断”，而是总的来说“和现实保持密切联系”。特纳甚至在一份文件上批注道，“如果俄国人侵伊朗，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提出要伊朗国王动用武力平息叛乱，但万斯国务卿反对。卡特总统犹豫不决。而要害是，美国总统不说话，伊朗国王什么行动都不敢采取。卡特犹豫不决，国王犹豫不决，这正是革命群众所需要的，结果他们终于日益壮大，取得胜利。

凯西决定改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处。行动处处长约翰·麦克马洪太胆小谨慎，白宫对他不满，也该撤换。于是凯西决定把麦克马洪调去当分析处处长。

白宫开会时，经常谈到霍梅尼，有人主张把他搞掉。讨论结果，要求凯西研究可以采取什么秘密行动搞掉霍梅尼，扶植已故国王之子小巴列维上台。凯西把这个主张拿到中央情报局讨论时，人人脸都吓白了。伊朗是谁都怕去沾手的地方，巴列维家族更糟糕。行动处谁都不愿去沾边。国务院也反对。但凯西善于体会总统的意思，还是要干。结果是建议找一些流亡在外的反霍梅尼分子谈谈，看他们是否能够组织起反对力量。报告送上去后，里根批准了这个作法。

凯西阅读各种情报和旧档案时，不断注意到中美洲一个很穷的农业小国萨尔瓦多的情况。这个地方的共产主义叛乱正在日益增长。凯西发现，卡特离职前两天，下面曾送了一份报告给他，建议美国停止对尼加拉瓜的援助，因为有确凿证据表明尼加拉瓜支援萨尔瓦多的叛乱者。凯西还发现，桑

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后六个月，卡特总统曾签署一项绝密文件，授权中央情报局支持反桑力量，花了好几十万美元。但是，中央情报局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中连一个间谍也没有安插，过去是依靠右派独裁者索摩查提供情报。索摩查的情报局从前倒是安插了间谍在解放阵线里的，但当他被推翻后，情报档案没有带走，都被解放阵线弄去，结果把这些间谍全部消灭了。这种情况使凯西想起伊朗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决心要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由中央情报局自己控制和付津贴的间谍。

情报表明，古巴在尼加拉瓜政府里渗透得很深。约有500名古巴人在尼加拉瓜的军队、情报部门和重要通讯机构里。苏联、北朝鲜、东欧各国也有不少人在那里活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尼加拉瓜也很积极。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后开了三天的会议，在内部散发了一个“72小时文件”，大讲“阶级斗争”、“革命的国际主义”、“先锋队的政党”、“美帝国主义是一切争取解放的人民的疯狂敌人”等。

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劳伦斯·佩苏略认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他的办法是一方面极力替尼加拉瓜争取美援（1980年批准拨给7500万美元），一方面威胁尼方说，如果不停止支持萨尔瓦多叛军，美援就将中断。尼方对此不予理睬。

2月中，黑格国务卿叫佩苏略回华盛顿磋商。对尼加拉瓜的援助已中断了，还剩下1500万美元未用。佩苏略向黑格提了好几种选择方案，其中一种叫“零点方案”，内容是援助仍暂停，加大外交压力。黑格说，“我采纳零点方案。”然后，黑格带佩苏略去见总统。里根说，美国不能过多地卷

入，否则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他引用一位墨西哥朋友的话说，“不要犯把中美洲问题美国化的错误。”事后，佩苏略又私下对黑格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那些人都是硬汉子，不是用中断1500万美援的办法就能吓倒的，要干就得干点大事情。黑格说，放心，美国能处理尼加拉瓜的问题。

黑格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训练出来的，他知道干事要有决心。他还在朝鲜和越南打过仗，认为这两处的失败都是由于没有坚持到底。对尼加拉瓜，他认为问题不在此，而在古巴，那才是根源。他在白宫的会议上提出，对古巴进行封锁，切断古巴对尼加拉瓜等地的武器出口。他对总统说，“在这件事上你能赢的。”

凯西反对，其他人也都反对。米斯、贝克和迪弗都担心，黑格这样干会引起战争狂热和舆论恐慌，认为美国要在军事上卷入中美洲，而他们希望总统集中精力注意国内问题——经济改革和税收改革。同外国搞军事冲突会破坏内政。凯西提出，采取中间道路，搞秘密行动——缓进、稳健、目的明确、秘密进行。他叫人起草了一份报告，对象不是古巴，不是尼加拉瓜，而是萨尔瓦多。办法是进行宣传和对萨尔瓦多的温和派——基督教民主党和军队给予政治和经济支持。3月4日，总统批准了这个绝密报告。3月底，美国决定完全停止对尼加拉瓜的援助。佩苏略大使得悉后大为不快，这下他没有什么牌好打了。

1981年3月30日，里根被刺客约翰·欣克利开枪打伤，子弹射进距心脏只有一英寸的地方，经手术后取出。他对南希说，“亲爱的，我忘了蹲下来躲避。”他还和医生们开玩笑说，“请告诉我，你们都是共和党人。”他所显示的勇气

和乐观精神赢得了普遍的赞扬。

里根在医院里住了两星期，4月11日出院时，竟允许摄影记者贴近他拍照，以显示这位70岁的总统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他走出来时，虽然脸上稍稍瘦削，但兴高采烈，穿着一件红色羊毛衫。他和南希一只手互相扶持，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就象九个月前一个晚上那样，那时里根站在高台上，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那著名的微笑一如往昔，他的总统宝座也安然无恙。

里根最亲密的助手们不久就发现，原来那天总统又在演戏。第二天早上，总统一瘸一拐地从楼上住宅的卧室走向毗邻的另一个房间。他缓缓出现，拖着一个老年人的步履，踌躇不前。他脸色苍白，不辨方向。那些目睹这幅情景的人们都吓坏了。里根摇摇晃晃，走向黄色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把椅子，刚想坐下，便瘫倒在椅子里了。

他用沙哑的低语说了几个字，便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喘气。他看上去要一命呜呼了。喘气还是无济于事，于是便把放在椅子旁边的氧气罩拿过来戴上。他吸氧气时，屋子里充满了呼哧呼哧的声音。

里根每次只能打起精神支持几分钟，然后精神和体力便都逐渐不行了，他那受伤的肺得依靠氧气罩才能好好呼吸。那几天里，他每天只能工作或集中注意力倾听别人讲话一小时左右。

米斯、贝克、迪弗和得到允许见总统的其他少数几个人都忧心重重。本来嘛，里根的总统任期才刚刚开始，但有时却好象里根的末日已到。他始终感到不舒服，有时很痛苦。他那本来热情轻松、充满信心的声音，这时听起来似乎永远受伤了，嗓音粗哑，含混不清。他的助手们开始考虑，他这一

任恐怕要变成一个残废人总统了，就象从前威尔逊总统后期那样，由夫人代为主持一切。

所有的高级助手们都力图保守这个可怕的机密，也不让人们看出他们心里的恐慌。那些身负情报或执法重任的官员，如凯西，都已得到通知，告诉他们总统尚未脱离危险，有必要采取额外的保安措施，保卫国家及其制度。而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更是十分明显的。那些大官们都意识到这比总统受伤更为重要。

总统被刺那天，许多事情都乱套了，暴露了人和制度的弱点。电视记者在现场问白宫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眼下谁掌管政府？”斯皮克斯不知所措，竟然回答说，“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黑格当时正坐在白宫研讨形势的小会议室，看到这幅惊惶失措的情景，自告奋勇走到那许多摄影机前，说道，“就目前来说，我在白宫掌管一切。”他这句话是不对的，违反宪法规定。①

里根进医院后，他的一位军事助理在同联邦调查局的一场争吵中输给了后者。遇有紧急情况时，这位军事助理是替总统下达战争命令的军官，他随身携带着总统用来下达发射核武器的密码和命令。联邦调查局为了收集证据，供将来审讯凶手时备用，拿走了里根的衣服和随身物品，其中包括里根的皮夹，里面放着一张绝密的个人密码卡。如果总统要使用不保密的通讯渠道和军方说话，这张密码卡可以在紧急情况时提供用来下达发射核武器命令的密码。官员们坚持说，尽

---

①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副总统亦缺位时，由众院议长继任；众院议长亦缺位时，由参院临时主席继任；参院临时主席亦缺位时，由国务卿继任。里根遇刺时，副总统布什在外地，按宪法可由众院议长代理，还轮不到黑格国务卿。——译者

管联邦调查局拿走了那张密码卡，美国核力量并没有失去控制。但这场混乱表明，对核武器的管理是存在着缺点的。

总统当时的情况加剧了政府里的慌乱情绪。但不久里根的嗓音渐渐恢复，有些情况表明他正走上康复的道路。他回白宫后休息了10天，大有好转。4月21日，他居然能发表广播演说，鼓吹他的开支和减税计划。22日，他允许一批高级广播记者对他进行采访，看上去精神很好。但他不能坚持较长时间，助手们仍然焦虑不安。

4月25日，星期六，里根夫妇到马里兰州的戴维营去度周末。这座山间别墅的春天似乎创造了一次奇迹。总统回到华盛顿时，竟恢复过来了，危机缓解了。但曾经目睹或知道险象的人，仍然惊悸未定。

危险感始终笼罩着政府，影响到它的政策。大家都担忧，任何人都可能趁机进攻——恐怖分子、苏联、别的敌人。中央情报局局长对这一点感受更深，更真实。

凯西知道，肯尼迪总统被刺近20年后，美国还有人怀疑凶手奥斯瓦尔德是否同苏联克格勃有关系。因此，这次他也下令中央情报局彻底调查欣克利同苏联有什么关系。结果查不出什么联系。但里根遇刺前个把月，有位女记者克莱尔·斯特林曾在《纽约时报杂志》周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寻找恐怖主义的国际网”。文章的结论说，“大量证据表明，过去10年来，苏联及其代理人向世界各地的恐怖网提供了武器、训练和庇护所，目的在于破坏西方民主社会的安定。”她断定存在一个“游击队国际”，古巴人、克格勃教官、巴勒斯坦人和“红色旅”成员都参加在内，商量阴谋，举行会议。斯特林的文章是她写的一本书《恐怖主义网》的节录，黑格国务卿很欣赏这本书。

凯西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他说报界倒走到中央情报局前面去了。他要求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提出答复。他们研究了一阵，翻阅了好些档案，查不出斯特林说的那种证据。他们认为，斯特林使用的是50年代麦卡锡的胡乱联系方法，站不住脚。中央情报局的苏联问题专家也写了一份报告，强烈反对斯特林的说法，基本上否定了苏联参与恐怖主义的论断。可是凯西大不以为然，他说，“好好看看斯特林写的那本书，别看这份报告。”他还骂道，“我只付了13.95美元就买了那本书，里面讲的事情比你们这些每年挣五万美元的混蛋讲的多得多。”英曼同意凯西的看法。泰伊中将也写来信说，他认为苏联介入了恐怖主义，只是还没有找到证据而已。凯西看信后很高兴，请泰伊的国防情报局也写一份报告讲他们的看法。结果，国防情报局的报告同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观点截然相反。

5月13日，教皇保罗二世在罗马的圣彼得广场遇刺受伤。凯西是天主教徒，对此大为愤怒，认为竟然有人胆敢谋害圣父的性命，真是狂妄之至。次日早上，凯西就在全国外国情报委员会的总部召开会议，讨论对苏联和恐怖主义的看法。里根和教皇先后遇刺，时间相距不到六个星期，苏联究竟想干什么？

凯西事前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前任校长、现任中央情报局高级审议委员会委员林肯·戈登写了一篇有关的材料，题为“苏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长约20页，已散发给各有关方面。戈登被邀参加这天上午的会议。他说，他的看法介乎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和国防情报局的报告这两个极端之间。一部分问题是因为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有分歧。显然，苏联支持第三世界反对专制政权和其他倾向西方政府的

解放战争。苏联愿意向他们提供购武器的款项、训练和其他援助，鼓励解放意味着将有暴力和恐怖主义。当然，如果苏联不输出革命，恐怖主义会减少。但是，得到的情报不能证明苏联在搞恐怖主义。倒是有些例子说明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恐怖主义的。苏联曾事先提醒美国驻尼泊尔大使，说是有四个阿拉伯人阴谋绑架他。保加利亚也曾在1978年让西德警察逮捕一个恐怖主义集团的成员。看来，有时候苏联认为制止恐怖主义有利于他们的目的，有时候则又认为恐怖主义可以促进他们的目的。但是，总的来说，苏联并没有利用恐怖主义来作为使第三世界和西方国家不安定的主要工具。所以，黑格那次公开说的话显然缺乏证据。

泰伊中将很不满意，他带着好多电报，证明苏联有十几次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有些还是最近的。

结果，凯西叫戈登回去重新研究。戈登召集各单位派来的代表，一起开了个工作会议，5月27日又完成了一个新的秘密估计报告。报告说，苏联不是隐藏在国际恐怖主义后面的黑手。报告在结论中建议加强活人提供的情报，并设法派人打入恐怖主义组织，以取得及时的情报。

戈登同时还发现一件令人感到讽刺的事。原来，斯特林的一小部分材料来自意大利报纸上关于"红色旅"的报道。而这篇报道又是中央情报局过去的宣传材料里的一部分。斯特林不知底细，引用了美国自己的宣传，这正是中央情报局和新闻记者都害怕发生的"自食其果"的那种情况。

第六章

凯西离开华盛顿，飞往中东巡视中央情报局各分站。他到了沙特阿拉伯，发现那里的情报部门什么事都愿意干，愿意花大量的钱财去收集情报和采取行动。他到了以色列，那里的情报部门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安插了许多间谍，打入有关部门。整个中东地区都很重视用人去搞情报工作，24小时昼夜不停地监视，以便及早提供预警警报。他们有大量人力，因此用不着依靠窃听通讯和发射间谍卫星。而且，人多还可以更好地分析情报。

凯西回华盛顿后，决定集中精力挑选好负责行动的副局长，派在外国的间谍都归这个副局长管。他觉得现在行动处的那些人太温文尔雅，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类东部名牌大学毕业的人太多，他们作风太斯文，衣着太讲究，讲话却不够明确。他们为人的确很好，也忠心耿耿，但不够粗犷，不够有魄力。似乎没有谁象凯西这一代人那样具有丰富的经验，那样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和事物。

凯西还没有想到谁当负责行动的副局长比较合适，但休格尔自己提出不愿当负责行政的副局长，要当负责行动的副局长。凯西找布罗斯商量，布罗斯断然反对，他说他在行动处干过，那可不是一般工作，外行干不了，更不用说当领导了。凯西又去问前局长赫尔姆斯，赫尔姆斯也说，让休格尔先当两年负责行政的副局长再说，急什么？负责行动的副局

长得是内行，或者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过多年的，至少要懂得保密、少讲话，休格尔缺乏这方面的经历。

凯西不听他们两人的意见，就在5月11日的局务会议上宣布，他已任命休格尔为负责行动的副局长。与会的人全都保持缄默，一声不吭。会后，议论就传开了，说是凯西任命了一个卖打字机和缝纫机的推销员为负责行动的副局长。

5月15日，《华盛顿明星报》登了该报专栏作家科德·迈耶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凯西挑选外行担任中央情报局最敏感的职务"。文章说，凯西不听情报界老手们的一致劝告，竟象赌博一样任用休格尔这个外行来当中央情报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而这个职务据过去的著名专栏作家艾尔索普描述，乃是仅次于总统的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岗位，历来都是由情报老手如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和威廉·科尔比等担任的。

5月16日，《华盛顿邮报》头版也登了一条消息，说这就是象任命一个从来没有出过海的人当海军司令一样，或者象任命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人当大医院的心脏科主任一样。《纽约时报》也在社论里批评凯西把中央情报局当作他私人的公司，随便任用外行担任要职。

凯西不但不听，反而亲自写信给报馆，大事吹捧休格尔如何能干。白宫的米斯、贝克和迪弗三人对凯西干的这件事也很不安，深怕影响里根的声誉，但凯西自己又写了一封私人信给总统，称赞休格尔善于协调专门利益集团，能够团结少数民族，因此做情报工作也一定会干得很好。米斯等人看到这封信，知道无法干预，也就不吭声了。

凯西又看了许多档案，找了一些重要情报官员咨询。他

发现，过去六年来的世界历史上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突出的：苏联在九个国家赢得了新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占统治地位的影响。这九个国家是：

东南亚的南越、柬埔寨和老挝。

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

中东和南亚的南也门和阿富汗。

尼加拉瓜。

凯西心想，这是怎么搞的？显然是苏联趁美国从越南撤出之机，利用一批代理人发动革命，进行接管。美国有什么办法整一整那些共产党呢？不是只搞点零敲碎打的行动，例如支援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或者促进萨尔瓦多的民主那样。凯西要的是一种看得见的、干脆的胜利，要从苏联那里夺回点东西来。黑格问，“我们能在什么地方反败为胜？”总统也说，“我想赢一次。”

凯西明白，这得打一场游击战争。他看过许多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书，感到当初美国革命人民能够打败头号强国英国，靠的是非正规的游击战争。那么，18世纪的老祖宗们能干的事，我们20世纪的后代为什么不能继承传统，象他们那样干一通呢？也许，中央情报局应当走出去，看看可以在什么地方打这样一场游击战。

七月初，休格尔忽然遇到了麻烦。他偷偷地告诉法律总顾问斯波金说，有两个过去做生意时的伙伴要控告他，说他六、七年前曾向他们透露他的“兄弟国际公司”的内部情况，他们有当时偷录的录音带为证。这两个人是兄弟俩，一个叫托马斯·麦克内尔，一个叫塞缪尔·麦克内尔，都是做证券交易的。这兄弟俩于6月间把16盘休格尔讲话的录音带

副制品交给了我和《华盛顿邮报》的另一位记者帕特里克·泰勒，我们正准备写文章揭露这件事。

斯波金在7月10日打电话给我们，要求听录音内容。我们说，时机尚不成熟。斯波金说，如果中央情报局有人犯了错误，他和凯西应当知道。后来，我们同意让他听，条件是得把休格尔带来，让我们采访他。几小时后，斯波金、休格尔和他的几位私人律师都来了。起先，休格尔什么都不承认。但是，放录音带的结果，证明他的确把该公司的销售预计数额告诉了麦克内尔兄弟，还借钱给其中之一，这笔钱又转到了兄弟俩开的证券公司，而该公司是替休格尔的公司推销股票的。休格尔还在电话里威胁说，他要杀死麦克内尔的律师，因为这人扬言他要提出诉讼控告休格尔。

闹了几天，凯西、英曼、戈德华特参议员，甚至总统都知道这件事了。休格尔只好接受斯波金的意见，写信给凯西请求辞职。凯西"怀着深切的遗憾"接受了他的辞呈。休格尔就此离开了只干了两个多月的中央情报局。但事后，麦克内尔兄弟也因自己不干净，把他们控制的一家小公司的300多万美元取走，双双携款逃往国外。休格尔于是向法院起诉，控告麦克内尔兄弟诽谤他，因这兄弟俩远在国外，拒不出庭，法院作出缺席判决，判令麦克内尔兄弟赔偿休格尔931000美元。

第七章

麦克内尔兄弟逼得休格尔辞职之事才结束，《纽约时报》又登出消息说，凯西也被联邦法院认为过去做生意时有欺骗行为。戈德华特、莫伊尼汉、史蒂文斯、罗思等参议员纷纷责难，要求凯西辞职。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凯西镇定自若，他过去在战略情报局的一批老战友以及另外一些参议员极力替他辩护，说他是诚实人，做生意时冒点风险，谁都如此。参院经过开会详细调查，确认凯西没有问题，凯西也承认，任命休格尔当副局长是个错误。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此时，中央情报局在乍得搞的秘密行动正在缓慢地进行。目的是要支持前国防部长哈布雷夺取政权，清除卡扎菲在乍得的影响。美国给的支援包括金钱、武器、政治支持和技术援助。凯西发现，中央情报局这架机器运转不灵，行动处对国际武器买卖市场的情况不熟悉，不知道买什么步枪最好，什么价钱最便宜，还有运输路线问题、银行划帐等。中央情报局因为举棋不定，反而要求哈布雷保证不把援助的金钱和武器用来对付他的政敌。这在国会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报界也作了一系列报道，有些文章使人看了感到中央情报局很愚蠢。

关于乍得的报告送给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后，有些众议员怀疑哈布雷这个人是否合适。左派议员询问他过去是否参与屠杀无辜。右派议员提出他曾说过欣赏毛泽东、卡斯特罗和

胡志明。他还喊过"要在整个非洲激发革命"。此外，哈布雷早些年曾和卡扎菲关系密切，从卡扎菲那里得到过武器。如今中央情报局却要挑选哈布雷去反对卡扎菲，这合适吗？结果，众院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们写了一封绝密信给里根总统，反对用哈布雷在乍得抗击卡扎菲。

事后，情报委员会委员克莱门特·扎布洛基(当时还兼任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竟把此事泄露给《新闻周刊》。该周刊马上登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题为"一个推翻卡扎菲的计划"，说什么中央情报局将要实施"一个大规模多阶段的计划，以推翻利比亚政府，该计划耗资甚巨……参与审议这个计划的众院情报委员会委员们认为，这似乎暗示要谋杀卡扎菲。"

凯西大怒，认为必须公开否认。于是白宫对《新闻周刊》的消息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公开否认，但证实众院情报委员会的确写过一封信反对某项行动。

人们于是纷纷打听美国想在哪个国家搞这次行动。白宫一些官员认为，干脆编造一个国家的名称，透露出去，让人们相信不是要搞利比亚，这样事情不就圆满了吗？

正巧，这时里根刚批准了另一个绝密的秘密行动报告。这个报告是国务院提出的，建议拨款资助毛里求斯的亲西方领袖拉姆古拉姆总理，以表示支持。这位总理80岁了，原来是位医生，当政已13年，现正面临着一场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斗争，如果没有外援，肯定会失败。毛里求斯是印度洋中的一个小岛，离马达加斯加的海岸不远，靠近对美国十分重要的海上石油运输线。由于这种战略地位，如果总理斗败了，毛里求斯就有可能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美国如果采取秘密行动，给予政治支持和金钱，可以帮助一位友好的领袖继续执政。风险小，费用低，潜在的好处大。对这种低水平

的政治支持，国会里面没有谁真正反对。这是一个标准的国务院计划：送一点钱给一个小国的友好领袖，因为那里只要花几块钱就可以赢得或者说收买选票。因此，白宫想向报界透露，目标不是利比亚，而是毛里求斯。

但白宫的一些助手不熟悉国际事务，竟把毛里求斯搞错成毛里塔尼亚，因为这两个国家英文名称的前五个字母是一样的。他们向报界透露说，美国想援助的是毛里塔尼亚。于是，第二天报上就登载消息说，中央情报局的目标是西北非的大国毛里塔尼亚。含义是，美国打算推翻毛里塔尼亚政府。

凯西怀疑白宫不只是无知，而是存心搞恶作剧。从表面上看就说不通，稍为研究一下就会知道，美国和毛里塔尼亚的穆斯林军政府关系友好，怎么会想推翻它？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央情报局的材料表明，1月初利比亚倒是参与了毛里塔尼亚的一次未遂政变。

毛里塔尼亚政府十分不悦，向美国提出了抗议。国务院无法，只好对毛里塔尼亚方面解释说，报纸上的消息弄错了。为了要使对方相信，后来又向报界澄清，说真正的目标是毛里求斯，但不是要推翻该国政府，而是要给予支援。

后来，在白宫的会议上，凯西就此事向总统提了意见，说以后关于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一定要严加保密。《新闻周刊》的记者又去找扎布洛基众议员，扎布洛基知道事情不妙，便去找众议院的工作人员，叫他们替他应付一番。因为国会常发生泄密之事，情报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博兰也未对扎布洛基采取纪律措施。倒霉的是《新闻周刊》，它的竞争者《时代》杂志登了一篇短文攻击说，《时代》本来也听到这消息，但认为不确实，所以没有登，现在白宫不是断然否认《新闻周刊》登载的谣言了吗？

第 八 章

8月间，凯西仍然对卡扎菲不放心。《新闻周刊》又登了一条不准确的消息，说中央情报局计划推翻或暗杀卡扎菲。结果使气氛非常紧张。凯西想对利比亚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利比亚的外交密码和情报密码都已被美国破译，卡扎菲经常在不保密的电话线路上讲话，使美国得以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他想颠覆他国政府的阴谋。

卡扎菲的一个工具是联合非洲航空公司，表面上它是一家不定期的客货航空公司。实际上，据中央情报局得悉，它是利比亚军队的空中运输部门，而且更重要的，是利比亚情报局的一个部门。它的管理人员和飞行人员中充满了卡扎菲的情报人员，利比亚情报局还拨款资助这家航空公司。

1981年8月底的一项报告说，卡扎菲命令联合非洲航空公司花3000万美元在非洲开设18个新办事处。一些有名有姓的利比亚情报人员被安插到这些办事处去作为“学员”；飞机被用来运输地雷、大炮、弹药、吉普车和各种武器到乍得去；利比亚训练出来的津巴布韦部队被空运到索尔兹伯里；运输武器到利比亚驻布隆迪大使馆；还运输苏联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到叙利亚。

卡扎菲还加紧计划制造核武器。1980年12月，苏联运送了11公斤高浓缩铀到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外面的研究中心。这虽然还不够造一枚原子弹（据中央情报局估计，按他们目

前的进度，要到1990年才有足够造一枚原子弹的高浓缩铀），但一次就运11公斤，可是超出了中央情报局的估计。

另有报告说，联合非洲航空公司还从南边的尼日尔运铀到利比亚。国务院1981年7月5日的一项秘密级情报说，“尼日尔是利比亚的下一个目标”，并令人信服地叙述了卡扎菲对尼日尔的野心。

还有一项报告说，一家西德公司在利比亚试验了一枚火箭。

美国政府决定在利比亚海岸的锡德拉湾进行海军演习，表示不同意卡扎菲宣布该湾是利比亚领水的说法。8月19日清晨7时，两架美国海军F-14战斗机深入锡德拉湾上空30多英里进行黎明巡逻，遭到利比亚空军的喷气战斗机袭击。美国飞机按照事先接到的自卫指示，进行还击，击落卡扎菲的战斗机两架。

那天早上，总统闻讯后高兴之至，竟在高级助手们面前大显当年身手，象演西部电影似地表演了这场空战的情景，从美机上发射导弹，然后飞走。

虽然如此，美方也只是虚张声势，后来就不再打空战了。三天后，卡扎菲到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会晤该国领袖门格斯图中校，此人也是一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埃方高级官员（中央情报局的秘密间谍）向美国报告，卡扎菲在会上说，他要派人杀死里根总统。不久，国家安全局也窃听到卡扎菲的一次谈话，重复了同样的话。这两条情报都上报了总统。

这可是十分严重的事，凯西和许多人商量对策，说总得采取点措施。但什么措施呢？总不能先派人去把卡扎菲打死。过了一个星期，并没有发现有谁要谋害总统，大家也就比较

轻松了。凯西可不放心，他命令所有情报机构一听到风吹草动就马上直接报告他。但白宫仍然不肯采取直接行动对付卡扎菲。

10月6日，凯西接到特急报告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检阅游行时被枪击。开罗电台象鹦鹉学舌似地重复官方口径三小时，说萨达特伤势不重，但美国电视新闻说，这位埃及领袖已经遇刺身亡。

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一直向萨达特的政府提供秘密的保安援助和情报，他们把协助萨达特继续执政看作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任务。自从1978年戴维营协议和1979年埃以和约后，萨达特在中东就陷入孤立了。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的确是美国制造的产物，在国内并无多少实力。他的妻子杰汉喜欢穿西方服装，崇尚西方习惯，鼓吹妇女独立，这也受到许多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谴责。

中央情报局曾向萨达特提供情报，讲到他的危险处境和反对他的各种力量。上个月，中央情报局曾专门派人向他个人汇报，详谈了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和伊朗对他的威胁。

10月6日开罗电台第一次广播后三小时，才证实萨达特已逝世。其实，他是因多处中弹当场死亡的。

凯西感到屈辱。里根上午一直守在椭圆形办公室，助手们告诉他说，电视新闻的报道不确实。凯西和英曼都担忧，萨达特一手扶植的亲信穆巴拉克副总统领导的政府会提出强烈抗议，因为训练萨达特的警卫的中央情报局事先没有警告埃及。但穆巴拉克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后来发现，这些凶手是埃及内部原教旨主义者集团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只顾花很大精力去窃听和渗透萨达特的政

府，警告萨达特注意外来的威胁，却没有注意到埃及内部的势力。这很象上次在伊朗的失败一样，使凯西大为生气。他想，中央情报局真需要在埃及得到更多和更广泛的独立情报渠道。他下命令说，“派点人到街上去看看是不是有人想把穆巴拉克也暗杀掉。”

凯西仍然想对中美洲制订一个全面的行动计划，但政府内部达不成一致意见。总统喜好高级顾问之间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做不到他就不作决定。黑格想整古巴，温伯格提出过去越南的教训，他不愿意让美国士兵再陷入另一次不受欢迎的丛林战争。贝克和其他白宫助手要里根专心注意国内问题，不要分心，到国外去搞什么冒险行动，特别是黑格提出的冒险活动。他们对黑格越来越不放心，有时甚至是感到震惊。黑格未能学会适应总统的那种随便作风。他一会儿奉承里根，一会儿又傲慢自大，给里根上课，说什么里根的外交政策全仗他黑格提出的某项行动路线。结果他往往最后又推翻自己原来的建议。

在政府高级官员中，大概只有凯西同黑格合得来。他们俩每星期二早上一起吃早餐，常常还有助手陪同，一个星期在中央情报局，一个星期在国务院。凯西认为，黑格懂外交，而且相当熟悉世界各地情况，黑格也赞成凯西的强硬路线主张。

凯西知道，如果想做点有份量的事去拯救萨尔瓦多的话，必须要点花招，迎合黑格、温伯格和白宫的兴趣和要求。诚然，要促进萨尔瓦多的民主是件好事，但光讲这个还不够。

黑格和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恩德斯同意扩大秘密

行动。理想的办法是资助别国已经在搞的行动，如同上次支持法国在乍得的行动一样。

凯西手下负责拉美行动的杜威·克拉里奇找到一条通过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萨尔瓦多去的路线。中央情报局驻那里的分站和统治阿根廷的将军们关系非常密切。阿根廷军事情报局把反对共产主义提高为民族精神，大事灌输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些将军们对躲在尼加拉瓜反对他们独裁统治的游击队很不放心。阿根廷支持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抵抗力量，并在尼加拉瓜北边的洪都拉斯训练了约1000名士兵。

克拉里奇把这个设想提交给恩德斯和策划这个行动的核心小组。另一个办法是通过智利进行，但那里的独裁政权更坏，而且那样干更显眼。

恩德斯又制订了一个方案送呈黑格。黑格看了后说，不够。他想找一处比较脆弱的地方下手。既然白宫不同意直接打击古巴，那么是否可以突然袭击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古巴兵营？但这个设想连黑格自己的国务院都不支持。黑格担心的是，在尼加拉瓜搞行动的结果会是“银样蜡枪头”，表面上好象厉害，实际上并非如此，搞不成时美国会半途而废。但他也看到，这是唯一可望得到白宫、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三方面支持的方案。

11月16日下午4时，里根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由恩德斯报告方案。

恩德斯说，萨尔瓦多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在那里和中美洲其他地方建立民主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和我们取得合法性。”

他说，必须增加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也许整个中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共需要三亿美元以上。共产主义的根源虽然在古巴，但直接打击古巴这样的行动太大，美国尚未作好准备。因此采取秘密行动，到尼加拉瓜打仗去。行动的目的是支持抵抗力量，并不想推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只是想捣乱，弄得那个政府一筹莫展。

只有黑格一个人表示有些怀疑。总统原则上同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不同意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持阿根廷的计划。

黑格还想作最后的外交努力。六天后，他秘密飞往墨西哥城，在那里会晤古巴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12月1日下午，大家又在白宫开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这是为讨论重大外交政策问题而举行的非正式高级会议。参加者包括总统、副总统、米斯、贝克、迪弗、黑格、温伯格和凯西。国家安全顾问艾伦因被控受贿事正休假，未参加。

凯西概述了他的秘密行动计划。他要求拨款1900万美元，帮助阿根廷发展一支500人的队伍，由他们形成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核心力量。他们的基地将设在洪都拉斯境内。他说，将来大概需要更多的钱，500人的队伍肯定会扩大。

白宫三巨头都同意。黑格仍然认为这只是"半瓶醋"的玩意儿，但他还是同意了。温伯格很高兴，因为这计划用不着国防部参加。布什看到中央情报局的辅助军事力量有所恢复，也感到满意。没有再作多少讨论就决定了。同一天，里根批准了这个计划。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将军对白宫批准尼加拉瓜计划有些惊愕。他认为，不能肯定中美洲所有的麻烦都是古巴或

苏联煽动的，这和凯西的看法相反。琼斯认为，更重要的是由于中美洲社会经济问题成堆，才使那些国家成为马克思主义叛乱的温床。

但最坏的事是选中阿根廷来帮忙。琼斯了解阿根廷人，他们的确很反共，但他们不可能起多少作用。尼加拉瓜离阿根廷2500英里以上，他们为什么要担忧那么远的一点游击队会组织起反对阿根廷政府的革命？除了阿根廷听美国的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外，想不出还有什么道理。

琼斯和其他将军们认为，要干的话，就得增加美国在萨尔瓦多的军事顾问，现在规定不得超过55人，太少了。但白宫方面不同意，一讨论到增加军事顾问人数，便会有人提出，当初美国就是这样逐步升级陷入越南战争的，可不能再重复了。

凯西的副手英曼也认为凯西的尼加拉瓜计划有许多问题，但他无法干预。问题拿到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去讨论时，许多议员都表示反对，但外交、国防、情报政策按宪法归总统决定，国会无权干预，因此他们除了提问和叫嚷一通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凯西在会上对有些具体问题干脆不回答。议员们对他的作证不满意，连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保守派众议员罗宾逊也说，“你根本没有好好考虑后果影响。”

与此同时，凯西让英曼起草了一个情报工作五年（1985—1990）计划，主要内容是加强人力物力，更新设备，窃听和通讯器材微型化，加快发报速度（以防窃听），等等。这需要大大增加情报经费，从1980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200亿美元。里根看过这计划后，很表同意，说“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这样做”。

第 九 章

白宫再次焦虑不安，情报不断传来，报告卡扎菲确要谋杀里根，或者对美国发动恐怖主义惊险行动，而不只是说说而已。

8月底，这类情报就开始增多。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一个间谍报告说，一位重要的巴勒斯坦人同利比亚总参谋部会商，同意联合对里根采取行动。另一位高级巴勒斯坦人说，隐蔽的“黑9月”团体已经复活，将对美国和以色列目标采取行动。另外就是前面讲过的埃塞俄比亚的情报，说卡扎菲曾在该国首都威胁要干掉里根。

9月初，利比亚驻印度新德里的一位外交官的亲戚写了一封匿名信给美国驻印使馆，说利比亚计划暗杀里根。这种突如其来、未经验证的只言片语，应当认真看待吗？凯西认为，尽管是不大对头的来源传出的情报，也应给予重视，直到被否定为止。

随后，一个同利比亚高级军官有来往的间谍报告了两条情报：一、利比亚准备袭击美国在地中海的设施；二、在罗马的利比亚人准备绑架或暗杀美国驻意大使马克斯韦尔·拉布。

9月9日，欧洲某国的情报局报告说，意大利当局逮捕了一些据信与暗杀拉布的计划有关的利比亚人，然后把他们驱逐出境。一星期后，同一个情报局证实说，一个巴勒斯坦团

体同意协助利比亚袭击里根和其他美国目标。

9月19日，有报告说，利比亚将用自杀飞机攻击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该舰当时正在地中海的利比亚近海。

10月17日，一个同利比亚高级情报官员有来往的间谍报告说，利比亚已派人赴欧洲，准备袭击美国驻法使馆和驻意使馆。

11月12日，一个持枪的人在巴黎向美国驻法使馆临时代办克里斯琴·查普曼开了六枪，查普曼躲闪及时，幸未被击中。据说这是利比亚干的。

11月16日，一个自称脱离了卡扎非的训练营的人来到美国某驻外使馆，对该馆里的中央情报局分站说，如果无法对里根总统下手的话，利比亚准备对布什副总统、黑格国务卿或温伯格国防部长进行袭击。

诸如此类的情报很多。凯西认为不能掉以轻心，还是多加防备为好。于是白宫命令加强保安措施，包括布置一些迷惑人的高级轿车车队在华盛顿的路上转来转去，而里根自己则乘坐没有标志的轿车。白宫附近架设了地对空导弹。

12月4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个五人的利比亚突击队已进入美国。三天后，又有报道说是10人突击队。移民局赶快发了特急通知给各地关卡和飞机场，电视上还播放了这五个人的画像。

在这种慌乱中，里根的高级助手米斯、贝克和迪弗认为他们也可能是目标，于是派了警卫保护他们。连迪弗的小女儿坐校车上学时，也有一辆特工人员的汽车紧跟在校车后面。算是草木皆兵啊！

黑格曾交给国务院顾问麦克法兰协调对付利比亚政策的

任务。麦克法兰召集各单位开了五天的会，写了一个10页的绝密行动报告交给黑格。黑格在第9页上批示同意如下方案："与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合作研究还击利比亚挑衅的办法，需动用美国和埃及部队，采取秘密的战术空军行动及突击队行动，但不拟采取大规模陆上部队行动。"这就是说，美国不打算入侵利比亚，但黑格想探讨别的方案。

探讨结果，建议先加强SR-71和U-2飞机的侦察行动，每次5小时，耗资20万美元。

11月30日，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召开绝密会议。总统在会上要求研究还击利比亚的军事办法。12月5日，黑格、卡卢奇（代表温伯格）和凯西为里根制订了一项绝密报告，其中建议总统立即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做一切准备，如利比亚再次挑衅，即进行自卫还击。

建议采取的还击办法共为五项，逐步升级。一、出动飞机轰炸利比亚境内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二、轰炸利比亚的机场。三、轰炸海军设施。四、轰炸军火库。五、轰炸港口内的海军船舰。

12月6日，卡扎菲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露面，声称利比亚根本不想暗杀任何人，里根说谎骗人，应该下台。次日，里根也公开讲话，劝大家不要相信卡扎菲的话，美方有证据。

政府认为，双方首脑在电视上交锋无济于事，于是以里根名义通过比利时（美国和利比亚无外交关系）向卡扎菲发出电报，声称如果利比亚或其代理人对美国国内外的官员采取暴力行动，美政府将视为对美国的武装进攻，并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自卫还击。

12月10日，里根号召住在利比亚的1500名美国侨民回

国，并停止签发赴利比亚的护照。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减少或中断从利比亚进口石油（价值100万美元）。

美方的警告似乎起了作用。一星期后，利比亚派了一位高级情报人员作为代表来到美国，说卡扎菲急于开辟一条渠道同美国联系，并保证不会搞什么恐怖主义或暗杀行动。

12月18日，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处发表一个秘密级的报告，说关于利比亚要暗杀里根的第一个情报来自“很可靠的来源”，但以后关于要暗杀美国高级官员的情报则来自“间接来源”，不大可信。国务院情报司也跟着发表分析说，关于利比亚要袭击美国第六舰队的情报，来自一个与苏联外交官有来往的来源，关于要暗杀美国高级官员的情报“后来被否定了”，关于突击队已进入美国的情报可能是“传闻失实”。

追根寻源的结果，最后发现这条情报来自一个神秘人物马努彻·戈尔巴尼法尔。他是一个富有的伊朗人，以军火生意为业，兼任中央情报局的秘密间谍。他认为制造突击队已进入美国的假情报可以使利比亚陷入麻烦，所以匹马单枪地使这条消息流传了好几个月。事破后，中央情报局正式在内部宣布他是一个“捏造者”。但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记者问里根时，里根仍然坚持说，美国得到的情报是正确的。

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迈克尔·巴恩斯在1981年冬天听到谣言说，美国在制订关于中美洲的秘密行动计划。他是众院外交委员会拉美小组委员会主席，但不是情报委员会委员，因此他不知道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他认识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恩德斯，于是打电话约恩德斯到一家饭馆吃早餐。两人见面后，巴恩斯对恩德斯说，“我听说中央情报局雇佣人在尼加拉瓜炸桥。”恩德斯不肯评论，叫他按

规定办事，去问众院情报委员会。

巴恩斯去问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博兰。这位70岁的老众议员认为应该让巴恩斯了解他主管地区的事情，于是对他说，中央情报局计划利用阿根廷训练500名游击队员，拦截尼加拉瓜运武器到萨尔瓦多。

巴恩斯听了大吃一惊，他了解拉美情况，知道阿根廷人桀骜不驯，就是中央情报局也控制不了他们。他认为，应当利用智利强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博兰说，不会搞恐怖行动，不会烧村庄等等，行动是有限的，不是什么大买卖。

巴恩斯又找恩德斯吃了一顿午餐，表示反对这样干。恩德斯叫他放心，不会搞暗杀，不会侵犯人权。巴恩斯知道多说也无益，参院外交委员会才真正有点权力，可以批准条约，批准高级政府官员的任命，众院外委会就差远了，顶多是个辩论会而已，而这次关于这个秘密行动的材料都没有，连辩论也无法举行。

参院外委会委员克里斯托弗·多德也听到了这个谣言，但他同样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他是民主党自由派人士，认为中央情报局这样干是倒退到老早的帝国主义大棒政策，干涉别国内政，和奴隶主穿一条裤子。他想起，12月10日参院外委会召开秘密会议，请中央情报局负责拉美事务的官员康斯坦丁·门杰斯来汇报情况，结果门杰斯态度很坏，讲了一大通反共大道理，什么情况也没说。多德很生气，于是联合另外两位参议员一起写了封信给凯西，提出抗议。结果也未得要领。

1982年2月14日，凯西看到当天《华盛顿邮报》头版消息说，中央情报局准备花1900万美元在尼加拉瓜搞点行动，但"无法打听到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建议是否已获批准和付诸

实施。”

第二天下午，凯西花了一个多小时在白宫向总统汇报特别绝密情况。他说，在洪都拉斯组织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的工作进展顺利，越境进入尼加拉瓜的行动不久即可开始。这种行动可望削弱尼加拉瓜输出革命和制造麻烦的安排。

2月底，知道内情的一位政府官员私下对《华盛顿邮报》说，有报告说，苏联正在训练尼加拉瓜人驾驶先进的米格战斗机。他说，这消息很令人震惊，因为这表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可能要把解放战争扩大到中美洲别的国家，特别是萨尔瓦多。黑格、凯西等人想了很多广泛的战略问题。据他们盘算，这种先进的米格飞机可以使尼加拉瓜人对加勒比海和巴拿马运河附近的海上运输线拥有潜在的影响，这可是美国不能允许发生的情况。

他说，苏联现在控制尼加拉瓜政府，就好比当年美国控制南越政权一样。如果真的把这些新式米格飞机运进尼加拉瓜，美国就要采取某种秘密行动把它们搞掉。但是，美国不会派兵到中美洲去。

3月8日，《华盛顿邮报》编辑主任布拉德利和我一起吃早餐。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从三个来源得知总统批准了尼加拉瓜行动，但我们对是否报道这事要谨慎，因为现在的政治气候和70年代大不相同，现在是里根当政，在报上透露中央情报局的机密不一定是好事情。后来，他又去问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戈德华特，戈德华特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

第二天，布拉德利和凯西一起吃午饭，到下午两点半才回来。他说，凯西含含胡胡，吞吞吐吐，只讲在搞一个500

人的队伍，没说是什么人搞的。凯西既未说不要登这条消息，也未说可以登。布拉德利因此不知如何是好。

同一天，英曼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说过去两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建造了36个新军事基地；1979年他们只有5000名游击队员，现在增加到70000人了。有人问到传说中的1900万美元的秘密行动，英曼不肯回答这个计划是否已被批准，反说1900万也好，2900万也好，按现在的市场价格，买不了多少武器。

布拉德利还是拿不定主意。国内版编辑格雷德认为，共和党早在1980年竞选纲领中公开说过要支持尼加拉瓜人民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政府”，并保证要让中央情报局奋发有为。如今凯西没有禁止布拉德利发表关于这事的消息，大概是想让我们透露出去。到了下午六点，布拉德利决定明天早上把这条消息登出来。

3月10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登了一小段消息，标题是：“美国批准在尼加拉瓜进行秘密行动的计划”。3月11日，各通讯社清早7点的消息发了这条报道。政府没有反驳。黑格说，让他评论秘密活动是不合适的。温伯格说，他就是不准备评论。凯西什么也没说。当晚，三大电视网都报道了这条消息。显然，白宫就是要让人们知道，里根要对尼加拉瓜采取强硬态度。格雷德分析对了。

第十章

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是参院情报委员会委员。他始终感到有许多情报方面的事搞不清楚。他有个助手特德·罗尔斯顿，是莱希的前任留下来的。罗尔斯顿同英曼关系密切，英曼教会罗尔斯顿用技术收集情报的诀窍，罗尔斯顿则把参院情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及时报告给英曼。因此，当英曼会见参议员时，他对每个参议员的喜好都很清楚。

罗尔斯顿向莱希建议说，你要了解情报工作，就得出去看看，最好到国外去一趟。莱希同意罗尔斯顿的意见，于是两人前往欧洲参观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海外设施。别忘了，英曼曾是该局局长。

一路上，罗尔斯顿处处卖弄他的丰富知识，并且抢在莱希前面提出许多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在伦敦北面200英里的哈罗盖特一处国家安全局的监听站，莱希问他们能否收听到俄国人集结在波兰边境的坦克车上发出的通讯讯号？监听站的人还来不及回答这个问题，罗尔斯顿就插嘴问道，你们这套奇妙设备是多少兆瓦的呀？接着又问，你们同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境内的国家安全局监听站有联系吗？

莱希再也忍耐不住，他凶狠地说，“闭嘴，让我问问题。”

到了西德，莱希真想把罗尔斯顿从飞机上扔出去。到了

土耳其，罗尔斯顿竟然从美国驻土使馆的雪茄烟盒里拿走了许多根大使抽的雪茄。后来莱希对他的行政助理说，"我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婊子养的。"

回国后，莱希想出了处理的办法。他把罗尔斯顿开除了。罗尔斯顿到市内情报工作人员班子申请找个工作，可是一审查，发现他曾拿过一份机密文件回家看。本来，政府工作人员拿机密文件回家看这种事也常有，但如果查出来就是违反规定的行为。罗尔斯顿因此未能找到工作。

谁知祸不单行，参院情报委员会新任办公室主任罗布·西蒙斯那边又查出罗尔斯顿一共拿过500多页的机密文件回家用，有些是绝密的。西蒙斯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情报局，要他们研究这事造成了什么损失。中央情报局却答复说，没有发现造成任何损失。

西蒙斯不同意中央情报局的结论，他追查之下，发现这个结论来自罗尔斯顿的朋友和教父英曼，心想准是英曼袒护罗尔斯顿。于是又叫手下清查罗尔斯顿究竟看过多少机密文件。偏巧罗尔斯顿有个习惯，爱在看过的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一算，这些年来，罗尔斯顿看过的机密文件之多，真可使他成为美国情报工作方面的活百科全书了。

西蒙斯认定罗尔斯顿是英曼安插在参院情报委员会的坐探。但这也算不上是违法的事。拉帮结派，打听对方消息的事多哩。因此西蒙斯把这事报告他的老板情报委员会主席戈德华特参议员。戈德华特一想，这事涉及英曼，而英曼是他的好朋友，是由他极力推荐当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何况，如果真报到司法部请求起诉，那对情报委员会的名声也不好。因此，老参议员决定，只让西蒙斯把罗尔斯顿的政审合格单抽掉算了，别的不予追究。

罗尔斯顿滚蛋，英曼感到了解参院情报委员会情况的内线断了，真是一大打击。偏偏他也是流年不利，灾祸迭来。《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素来与英曼不和，曾在报上骂英曼是个“缓和迷”，反对搞秘密行动。最近，萨菲尔又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指控英曼“向记者编造故事，说以色列故意宣传利比亚派突击队到美国搞暗杀活动，以便找到借口轰炸利比亚的核反应堆。”

英曼感到这是个人攻击。他没有编造过什么故事，萨菲尔写的那句话，显然是亲以色列的人说给他听的，因为英曼一向反对向以色列提供卫星照片。另外，英曼怀疑萨菲尔这样攻击他，莫非是凯西在背后捣鬼。凯西和萨菲尔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从前凯西竞选议员时（未成功），萨菲尔是他的竞选经理。两人至今关系仍很密切。有一次，《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苏兹贝格打电话问英曼，凯西家里的电话为何没有人接，是不是号码不对？英曼说，号码没错，但你怎么知道的？苏兹贝格说，号码是萨菲尔告诉他的。凯西家里的电话号码，只有极少数亲友知道，没有登在电话簿上，萨菲尔知道，说明他与凯西的关系确非一般。

英曼和凯西之间也有分歧。一是英曼感到凯西总喜欢同世界上一些名声狼藉的人搞在一起。例如黎巴嫩长枪党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这个人率领一帮打手，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简直是个残忍的军阀，野蛮的杀人犯。可是中央情报局70年代就同他发生关系了，那时他刚从黎巴嫩的法学院毕业，到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中央情报局便在这时看中了他，把他发展成为特务，按月给津贴，还取了个代号。后来杰马耶勒回国，地位不断上升，中央情报局给他的津贴也就大大增加了，他也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不少重要情

报。最近他又提出，要中央情报局提供1000万美元，援助他的民兵队伍。英曼反对，中央情报局驻贝鲁特分站也反对，他们对巴希尔的看法同英曼一样，但驻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分站则认为巴希尔晋升很快，是个有用的人。巴希尔还通过别人走黑格的后门。凯西考虑了一下，决定建议拨款支持巴希尔，不久总统便批准了巴希尔要求的1000万美元。英曼又输了。

二是英曼对凯西搞的尼加拉瓜计划始终反对。凯西选中了一个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里背叛的人，名叫艾登·帕斯托拉，过去绰号“零号司令”，准备给钱援助他，叫他率领一些人从哥斯达黎加去萨尔瓦多捣乱。这个人和巴希尔一样声名狼藉，而且哥斯达黎加离萨尔瓦多有300多英里，这么远的路程，后勤如何跟得上？英曼向凯西提了许多问题，凯西根本不理他。

另外，英曼也已50出头了，干了多年情报工作，仍是两袖清风，两个孩子马上要进大学，也想早点脱离情报部门，到大企业去多挣点钱。

于是，1982年3月22日，英曼写了封信给总统，请求准予辞职。不久就得到批准。英曼离职后，到得克萨斯州一家研制电子技术的公司当了负责人。公司的几百名职员中有一人就是前参院情报委员会工作人员罗尔斯顿。从此以后，英曼再也不和凯西说话了。

白宫给凯西48小时的时间去挑选一个能为参院情报委员会接受的副局长，选来选去，只有约翰·麦克马洪合适。麦克马洪过去当行动处处长虽然不出色，但他懂得要在独立见解和忠于上级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他会闹一点麻烦，但

他也懂得如何服从命令，而且没有怨言。他不象休格尔那样只是一条走狗，也不象英曼那样是个外来者。他虽然对秘密行动抱有疑虑，却并不完全反对。

麦克马洪在不断晋升的过程中逐渐相信，除了奇妙的技术情报和派人打入内部获取情报外，中央情报局还得去寻找所谓“扎实的真实情况”。这就是说，不只是找死材料，而且要到铁幕后面的教堂和排队买面包的队伍中去收集活情报。

到国会去跑跑，也可以收集到“扎实的真实情况”。由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也需经参院批准，因此麦克马洪去拜访情报委员会的一些参议员。结果发现，他们主要谈论的总是凯西这个人，谁都不信任他。有些参议员希望麦克马洪保证随时前来回答问题，有些参议员（如莱希）希望麦克马洪保证及时向他们通风报信。

麦克马洪当然一一作出保证，同时发现许多参议员非常反对凯西，不免大吃一惊。后来他见到凯西，感到副局长应当对局长忠诚老实，于是对凯西说，15位参议员中，竟有一半以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要对凯西进攻了。他劝凯西说，“比尔，你还是到国会去做做工作吧。”凯西说，好吧。

5月26日上午10点30分，麦克马洪出席参院情报委员会的秘密听证会，听证会是为审议他的任命而召开的。他说能够得到委员会的监督，深感荣幸，而且多年来出席国会的各种会议，和美国人民的代表们分享情报知识，感到这是一种保护。

莫伊尼汉毫不客气，他说本委员会也需要保护，“我们想知道的事，希望你会都告诉我们。”而且，“如果得悉有

人向本委员会提供错误的情报，你应感到有责任告诉本委员会。”有的参议员说得更坦率，他们说，凯西有可能提供错误的情报欺骗本委员会。麦克马洪说，我的上级不可能那样做。莫伊尼汉马上又抓住他，要他承认可能出现不好的情况。麦克马洪只好低头认错，表示愿意改正。

第二天，召开公开听证会继续审议。莫伊尼汉在会上把麦克马洪表扬了一番，说他从事职业情报官员多年，竟然没有什么财产，真是楷模。麦克马洪的财产的确很少：1981年年薪52749美元，存款利息658美元，住宅价值约17万美元，还得减去需付给岳父的抵押借款3万美元。

怀俄明州共和党极端保守派参议员马尔科姆·沃洛普把中央情报局大骂了一通，说他们工作不力，跟不上时代需要，小官僚作风严重，等等。麦克马洪静悄悄地坐着让他骂够。大家明白，他既不代表左派，也不代表右派。

戈德华特参议员事先就派人查过麦克马洪的档案，知道他没有什么问题，因此会上对他比较客气，讲了几句笑话挖苦凯西就完了。委员会一致同意麦克马洪任副局长，接着参院全会也一致通过。

1982年3月底，凯西感到行动部门生锈的问题真是在实践中得到生动的验证了。中央情报局曾组织了一支13个也门人的小分队，到阿拉伯半岛上苏联控制的南也门去进行破坏工作，结果被对方俘虏了。这些也门人被拷打后承认他们是受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凯西心想，这下中央情报局怎么否认呢？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派进南也门的第二支小分队也只好撤退，在南也门进行捣乱的行动就此结束了。几星期后，南

也门司法部门宣布说，第一小分队的13个人全都认罪了，招供他们的任务是偷运炸药去爆炸石油设施和其他重要目标。他们还承认是中央情报局组织的。三名队员被判处徒刑15年，其余全部枪决。

相比之下，在乍得支援哈布雷的行动倒是有收获的。到1982年6月7日，哈布雷2000多人的队伍控制了乍得的首都，成立了临时政府。卡扎菲在乍得的影响至少是暂时削弱了，如同黑格和凯西所要求的，卡扎菲的鼻子被打出血了。现在，在他南面长达600英里边界的那边，存在一个得到法国和美国支持的敌对政府。

这样，气氛正好，可以要求白宫支持柬埔寨抵抗力量的有限行动。中央情报局内部对支援柬埔寨抵抗力量一事意见有分歧。有些人认为，抵抗力量的主力是红色高棉，也是共产党，而且名声狼藉，他们1975—1979年统治柬埔寨时屠杀了100万至300万人。

但是，抵抗力量中还有两支队伍，都不是共产党。因此，凯西争辩说，可以资助他们。中央情报局在泰国军队里存有不少钱，可以指定从中拨款给柬埔寨这两支非共产党的抵抗队伍，不要给红色高棉。

国务院也有些人反对，他们说，红色高棉同那两支非共产党力量组成联合阵线，而且在其中占居优势，支持非共产党力量也就等于支持红色高棉。

凯西只好妥协，改为要求给予非军事援助。1982年秋，里根总统批准拨款500万美元援助柬埔寨两支非共产党队伍。这笔钱虽然不能用来买武器，但柬方可以因此腾出别的钱来买军火。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宣称要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赶出黎巴嫩南部。以方说，他们进攻是因为三天前恐怖分子企图在伦敦暗杀以色列驻英大使，他们的行动是“为了和平”。

中央情报局和英国都知道，以色列说的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袭击以色列大使的人是从巴解分裂出来的阿布·尼德尔那一派的，同藏匿在黎巴嫩的巴解主流派正在打仗。所以，以色列进攻的对象错了，但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几天内，他的部队就打到了贝鲁特郊区。

凯西在办公室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之一是，以色列是否在使用美国供应的武器，与会的许多人都担忧美国会被世人看作是帮凶，国会也会提出问题。

凯西却说，“我才不管他妈的这些哩，形势动荡，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何使这件事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才是我要你们回答的问题。”

中央情报局的人、长枪党民兵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在黎巴嫩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几年来，杰马耶勒同沙龙和以色列情报局关系搞得很密切。中央情报局担任中间人，推动基督教徒和以色列人联系，使巴希尔成为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局的共同工具。

中央情报局里有人主张支持黎巴嫩的基督教徒而不要支持穆斯林。但是，曾在黎巴嫩工作过的情报老手都知道，那些基督教徒特别是巴希尔和他的长枪党，比谁都野蛮凶狠。因此，这些老手认为，同巴希尔这帮人保持关系是有害的。

迹象表明，巴希尔想当总统。他已经把他在基督教徒中的竞争对手都清除了。他和入侵的以色列人关系很好，这也是有利条件。黎巴嫩国内的亲以色列分子把巴希尔看作是新

的光明。反以色列分子也认为，只有巴希尔才可能有办法叫以色列人撤退。巴希尔成了团结各派的关键人物。

凯西批准中央情报局断绝和巴希尔的正式关系。他现在显然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不能再为中央情报局服务了。自从1977年公开揭露约旦国王侯赛因是一个领了20年津贴的中央情报局间谍后，该局就不大愿意再请外国元首当拿津贴的间谍了。如今巴希尔日益崭露头角，一旦暴露他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不丢掉性命，也会断送事业前程。因此作出了一切努力来保住这个秘密，但这种事从来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8月23日，巴希尔当选为黎巴嫩总统，预定9月就职。那些知道他最近和中央情报局断绝了关系的少数人感到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黎巴嫩这个国家，既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那些使巴希尔成为未来领袖的因素，也使他树立了许多敌人。穆斯林因伊朗霍梅尼的兴起而力量增强，资金雄厚的巴解组织在黎巴嫩仍有实力，尽管他们已开始撤出。

巴希尔一旦上台，使黎巴嫩在战略上同以色列和美国联合起来，必将破坏这个地区的均势。自1976年以来，西北面的叙利亚已占领了黎巴嫩的贝卡谷地，而且实际上认为整个黎巴嫩都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叙利亚周围亲苏联的国家对此也不高兴。

巴希尔面临着一系列国内和国外的敌人，深感忧虑，于是托人带口信给中央情报局，要求向他提供秘密的保安和情报援助。

凯西认为，中央情报局有义务帮助巴希尔，但不能公开这样干。有必要搞一个大规模的行动。为有效起见，中央情

报局得加强与黎巴嫩情报部门的合作，向他们提供先进武器和设备，以便进行电子侦察和通讯。初步开支约需60万美元，已经里根批准。将来要增加到每年200万美元，甚至400万美元。

1982年9月14日下午，即就职前九天，巴希尔在贝鲁特东区长枪党当地办事处讲话。他还准备在下午五点会见一批来贝鲁特参观访问的以色列情报官员。但四点十分时，一枚炸弹引爆了，炸毁了建筑，巴希尔也死在里面。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援助计划还来不及实施，也没有证据表明巴希尔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暴露了。但是，过去的一个宝贝被暗杀，对中央情报局来说总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原来拨给这次保安行动用的几百万美元，只好转存到总统紧急基金项下。

这次暗杀只是一系列灾难中的头一个。两天中，以色列部队允许长枪党队伍进入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让他们进行报复。这两座难民营的名字——萨布拉和夏蒂拉，将永远列入世界大屠杀历史。据以色列情报机关统计，被杀害的人约有700到800人，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屠杀的报道震惊了文明世界——婴儿和老人的尸体成堆，甚至马、狗、猫也被屠宰；妇女的乳房和男人的阴茎被割下来；一些死者的肉里钉进了十字架；怀孕妇女的子宫被剖开。

两周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机场附近的兵营占据了战略位置。他们的任务是维持和平，除了协助黎巴嫩和监督外国军队撤出外，没有别的目的。

以色列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开始调查是谁杀害了巴希尔。追查之下，发现炸弹是哈比卜·乔杜里安放的。他26

岁，家庭是叙利亚人民党的成员，该党和长枪党是敌对的。进一步调查发现，乔杜里为炸弹安装了一个遥控引爆器。

乔杜里的指挥者是叙利亚情报局的一名上尉，名叫纳西夫。他哄骗乔杜里说，炸弹只是设计来吓一吓巴希尔的，不是要炸死他。后来从以色列派在叙利亚的间谍和电子窃听等来源又了解到，纳西夫直接归穆罕默德·加伦中校领导，加伦是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情报活动负责人。叙利亚陆军和空军的情报部门和叙利亚总统哈费兹·阿萨德的兄弟里法特·阿萨德事前都知道这个爆炸计划，里法特是叙利亚保安部队司令。

以色列认为，阿萨德总统牢牢掌管着他的国家，因此他事前也必然知道这个计划。但是没有证据，而且情报表明，叙利亚情报官员的阴谋活动都是高度保密的。

凯西看了以色列情报局提供的这些报告，他认为很能令人信服。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谁从巴希尔之死得到了最大好处。谁希望黎巴嫩衰弱？谁最害怕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结成坚强的联合？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都是叙利亚。但是，白宫和国务院都不愿意宣传叙利亚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如果指控叙利亚干了这件事，就会影响今后美叙关系。

第十一章

凯西当了18个月的局长，学到了一些技术知识，特别是在人造卫星方面，它们可以从空中摄影和窃听通讯，保密程度是超级的。卫星摄影可以数出苏联有多少坦克，可以看出一辆坦克是否处于可以作战的状态。预警系统还可以侦察到苏军调动情况，以及苏联在研制什么重要的新式武器。

现在凯西又面临着美国情报界研制卫星系统的一项重大决定了，据说是80年代最重要的情报技术发明。这项新的卫星系统代号原称"靛蓝"，现已改称"长曲棍球"。它使用电脑把雷达讯号提高，变成雷达造影，相当于摄影机拍出来的照片。妙处是可以穿透云雾和黑暗，具有全天候能力，白天黑夜都可工作。将来还可能发展成具有穿透建筑物的能力。

但"长曲棍球"耗资巨大，恐要超过10亿美元。马丁·玛丽埃塔公司是主要的承造商，通用电气公司则负责地面加工系统——地面站收到讯号后进行处理的工作。要让"长曲棍球"在1983年继续研制下去，需要约两亿美元。马丁·玛丽埃塔公司要求现在就付款。

有些人批评凯西什么秘密行动都想干，其实大谬。他很会打算盘。现在要这两亿美元，等于他全部秘密行动的经费。这笔钱只是这个卫星系统的初步开支，何况这项计划机密性太强，恐怕不便公开讨论。

苏联虽然也有雷达造影，但情报表明他们没有先进的电脑和加工处理技术，因此无法制成好质量、高分辨能力的照片。因此，美国如果把“长曲棍球”研制成功，就可以遥遥领先。

凯西也听人汇报过美国卫星系统的发展史。从1971年开始搞“大鸟”，到现在12年了，成绩很可观：“大鸟”卫星有55英尺长，拍出来的照片质量很好。可惜要把底片从卫星里取出，然后在地面洗印。还要用金子做的罐子保护底片在高空时不被各种射线毁坏，因此价值昂贵。

1976年12月，发射了第一枚KH-11型卫星。这是70年代的重大突破，因为KH-11送回地面的是高质量的电传电视照片讯号，几乎马上就可制成照片，可以让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当时就看到苏联在干什么。

苏联人粗心大意，不知道KH-11发回的讯号是照片，因此他们没有把军事设施隐蔽起来，导弹发射井井口也没有掩盖。美国因为苏联人马虎而捞到了便宜。

但KH-11的秘密也只保持了一年左右。不久，中央情报局一名心怀不满的监听站低级职员威廉·坎派尔斯，竟以3000美元的低廉代价，把一份绝密的KH-11操作手册卖给了苏联。于是，每当KH-11卫星在上空飞过时，苏联人便把导弹发射井井口关上。中央情报局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不久，坎派尔斯便被逮捕，以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40年，亡羊补牢虽是好事，羊总是丢失了。

凯西想了一阵，决定提请国会批准拨款两亿美元，用于研制“长曲棍球”。

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博兰不同意拨款搞“长曲棍球”计划。但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戈德华特赞成搞，参院军委会主席托尔也支持。两亿美元在军委会考虑的庞大

国防预算里算什么，只是个零头而已。戈德华特和托尔两人势力强大，博兰比他们资历差得多，只好让步。消息传到马丁·玛丽埃塔公司，人们一片欢欣鼓舞。

但是，有一件事博兰不肯让步，那就是在尼加拉瓜的秘密行动。他不喜欢搞这个行动，他的好朋友众院议长奥尼尔也讨厌这个行动。

奥尼尔反对尼加拉瓜行动，还有宗教上的原因。他的姨妈是天主教玛丽诺尔教会的修女，因此这个教会对奥尼尔影响很深。玛丽诺尔教会有位修女佩吉·希利在尼加拉瓜传教。她写信给奥尼尔说，尼加拉瓜因内战而支离破碎，而内战是中央情报局鼓励、支持和导演的。奥尼尔认为，政治圈子里朝秦暮楚，尔虞我诈，但修女和牧师诚实可信，不讲假话。因此，他找希利谈了两小时，认为她讲的全是实话。奥尼尔还想起过去的“联合水果公司”，那是美国扮演新殖民主义者的产物。如今中央情报局又要在尼加拉瓜搞秘密行动，未免令人想起过去的阴影。

博兰的情报委员会代表着众院的战略中心，其成员都是经过奥尼尔和博兰仔细挑选的。他们的行动肯定会得到众院全会的批准。博兰想把给尼加拉瓜行动的拨款全部取消，他的委员们全都支持他。戈德华特则企图在博兰的主张和中央情报局的要求之间找到一个折中办法。

结果，1982年8月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在同意拨款的决议中加写一段话，禁止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为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目的”而向任何人提供军事装备、训练或支持。这段文字是保密的，经参众两院通过。

但11月1日，博兰却看到《新闻周刊》报道，说“美国秘密战

争的目标是尼加拉瓜",原来的秘密行动已经扩大为"破坏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的更大计划。"博兰看后十分气愤，感到事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决心把原来保密的文字公开。

12月8日，博兰在众院全会上把他那段禁止使用美国拨款去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文字念了出来。很快，这段文字就变成了"博兰修正案"，获得众院一致通过，原来的秘密行动也公开暴露了。

参院那边，莫伊尼汉也很生气，他找凯西去情报委员会汇报。凯西仍一口咬定，不想推翻尼加拉瓜政府，只想让它变得"民主"一些。莫伊尼汉不信这一套，他也在参院提出了博兰修正案，获得通过。

凯西毫不在乎，他知道这句话无非是律师的咬文嚼字，突出"目的"一词，无非是一种思想意识，可以滑过去，甚至可以作出模棱两可的解释。因此他对白宫说，没有问题。于是，里根于12月21日签署博兰修正案，使之成为法律。

凯西的法律总顾问斯波金感到很不安，他认为博兰修正案可能成为"特洛伊木马"，国会会监视，等待中央情报局做出违反这条修正案的事，好进行惩罚。有的律师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不做"目的在于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事，就不会被抓住。斯波金还是不放心，于是起草了一份指示，列出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凯西审阅时，觉得不够严格，又亲自修改了一遍，这才发往洪都拉斯分站执行。

莱希参议员决定访问中美洲，以获取第一手材料。对这位雄心勃勃的情报委员会委员来说，整个世界都是他可以染指的地方。对凯西指挥的战争，莱希也别有用心，想插上一手。为了避免共和党方面不快，莱希还邀请戈德华特的办公

室主任西蒙斯陪同他出访。西蒙斯为了表示这次出访并不是为了吃喝玩乐，特意找麦克马洪副局长谈了一次。他说，他们想找四个重要国家的中央情报局分站站长了解详细情况：（一）洪都拉斯，那里是中央情报局搞秘密行动的主要基地；（二）萨尔瓦多，那里左派反政府武装十分猖獗；（三）危地马拉，那里中央情报局也想拦截武器运输；（四）巴拿马，那里中央情报局有一个非常保密的训练营地。

他们一行七人，先到危地马拉草草看了一下拦截武器运输的地点，然后就飞往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在那里，他们住在大使的豪华官邸。莱希渐渐喜欢上分站站长，因为这家伙看来相当严肃认真，而且情况熟悉。

中央情报局另外有一个基地负责秘密行动计划，主持人叫雷·多蒂，前陆军特种部队中校，曾在老挝搞过类似的训练工作。他向莱希汇报说，基地共有七个分队，其中五个已越境进入尼加拉瓜，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推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而只是要切断尼加拉瓜东西两部分的交通联系，这样古巴和苏联就无法从海上运输武器到东部，而只能经由巴拿马运河从太平洋运武器到尼加拉瓜西部。

莱希心想，从技术上说，这也未尝没有道理，但问题是中央情报局如何能够牢牢控制这些招募来的外国乌合之众。万一他们在尼加拉瓜胡来，真去推翻政府，那怎么办？多蒂胸有成竹地对莱希说，不要紧，他也防着这一点，因此已经布置了一些特务在队伍里面，叫他们随时来报告队伍内部情况。莱希还不大满意，又想到万一这些特务被队伍里的士兵们发现，岂不要把他们干掉？美国驻洪都拉斯使馆的外交官也担心小战会变成大战。

莱希一行又飞到巴拿马。凯西手下负责拉美事务的处长

克拉里奇头一天刚离开这里。莱希找到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分站站长，要他汇报尼加拉瓜秘密行动的情况．没有料到这位站长却说，“处长”即克拉里奇吩咐过，这个行动务必保密，不得向任何人谈。莱希盛怒之下，要求打长途电话给中央情报局质问。站长却又说那也不行，电话不保密，不能在电话上谈这事。莱希威胁说，我来是同你们副局长麦克马洪讲好了的，你不汇报情况，我就不走。僵持到夜里11点，站长只好发了个绝密电报回国请示。

第二天清早6点，克拉里奇自己来了。他对莱希解释说，不让站长透露秘密行动情况，是因为巴拿马领导人玛努埃·诺列加将军脚踩两条船，一方面同中央情报局合作，一方面又和古巴关系暧昧。谈了好久，他才终于同意让中央情报局在巴拿马设立训练营地，但要求严格保密，如果张扬出去，诺列加就要取消协议。

莱希问道，巴拿马离开萨尔瓦多这么远，中间还隔着两个国家，为什么要在这里设训练营地？克拉里奇不慌不忙，回答说，准备从南面通过哥斯达黎加进入尼加拉瓜进行袭击。莱希看着地图一算，哥斯达黎加离开萨尔瓦多有300英里之远，这样干显然不是为了拦截武器运输。

莱希一行的最后一站本来是萨尔瓦多，但国家安全局这时打电报到巴拿马说，据悉萨尔瓦多的右翼分子准备击落美国国会议员的专机。目标显然是美国自由派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他也正要飞往萨尔瓦多。西蒙斯开玩笑说，我们在专机外面挂上大幅标语，上写“请别射击，美国右派参议员的助理在此机上”。话虽如此，萨尔瓦多之行还是取消了。

莱希一行返回华盛顿后，便起草了一份冗长的绝密报告。结论是：秘密行动几乎在每方面都比中央情报局原来说

的要大。队伍人数已接近5500人。美国军方还花费几百万美元从事收集情报的工作。美国在整个中美洲搞支援、训练和拦截武器运输等活动。整个中美洲——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巴拿马——都正在联成一片，结成反对尼加拉瓜的联盟。

这个计划准备在夏天时把尼加拉瓜的东西两部切断，兵分两路，一路从洪都拉斯南下，一路从哥斯达黎加北上，然后在圣诞节时抵达马那瓜。这是一个四面围剿的战争。这个行动同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汇报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准备的是一场地区性战争，许多事情都是偷偷干的。

参院情报委员会开会时，莱希要求给他15分钟讲个大概。戈德华特一边听，一边小声说，“啊，狗屁，这家伙讲得太多了。”

国务院那边，恩德斯正企图把尼加拉瓜秘密行动埋藏在更大范围的中美洲战略里面。他要防止秘密行动在公众、国会和政府面前太显眼。他认为，凯西并不是一个古板的冷战专家，他们一起制订了一套广泛的概念——民主、经济援助、秘密行动。恩德斯仔细设计了这套混合物，以免那些对越战记忆犹新的人又感到震惊。如此梳妆打扮，才好把政府的政策向国会推销。但是白宫的想法已经改变，主要是因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另有主张。他认为国会里支持这个秘密行动的人太少，政府的动作又太迟缓，已经来不及得到多数议员支持了。

恩德斯却不以为然。他争辩说，国会里完全反对这个秘密行动的人只是少数；当然，完全支持它的也是少数。因此，要去争取那10—15%的中间派，而要让他们支持这个行动，唯一的办

法是向大家表明，政府的政策是走向和平和解决的道路，决不放弃谈判。为了讲求实际，政府的政策需要顺应国会的主张。

克拉克说，如果中间派和民主党人把这件事搞成全国辩论的问题，和政府对立，他倒要领教领教，让国会懂点纪律。他要提醒议员老爷们，总统可以直接去对选民谈话，公众舆论是可以动员的嘛。

恩德斯闻到了味道：有麻烦。他于是开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维持区域性“双轨道”的战略。这就是说，在尼加拉瓜继续秘密支持反政府武装，但试图迫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反政府武装谈判。在萨尔瓦多，继续支持政府，同时迫使政府和左派游击队谈判。目标是实现广泛的解决，让苏联、古巴和美国的力量全都撤出这个地区。

克拉克得到了恩德斯写的报告副本，看后怒气冲天。他感到，恩德斯竟想牺牲政府政策的一致性，谋求实现某种突破，使自己在事业上得到成就。这家伙要美国撤出中美洲，抛弃美国的朋友，真是痴心妄想！那不等于是重蹈卡特总统的覆辙，言行不一吗？他把恩德斯的报告送呈总统，附带说，恩德斯背离政府的政策。

1983年2月10日，恩德斯的报告泄露出去，被新闻界得知。白宫里面，人们指责他唱的是早期失败主义。克拉克明确说，不只是他自己讨厌谈判，而且他不相信白宫想得到国会中间派的支持。对总统来说，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进行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

凯西对恩德斯说，他仍然怀疑谈判战略，但他并不反对尝试一下，而且认为这样可以在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里为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提供很好的掩护。3月间，凯西打电话给恩德斯说，知道你有困难，但除了克拉克外，你又多了一个反

对者——迪弗。恩德斯说，“朋友，感谢你关照。”他知道凯西说的其实是指里根夫人南希。

1983年3月8日下午，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谢拉顿饭店桔子皇冠舞厅对全国福音派教会联合会讲话。他在讲话中称苏联为“邪恶的帝国”，一时大为轰动。

之后，总统又宣布了他的“星球大战”计划，要在空间部署武器迎击苏联导弹。苏联马上称里根是“疯子”。

在这种狂热的反共气氛下，凯西可以生存，甚至飞黄腾达，恩德斯却不能。战场是尼加拉瓜。里根、克拉克和凯西打的是硬仗，谁想搞对话，他们就会质问你还有点爱国主义没有。恩德斯认为，正确的政策是让苏联和古巴都撤出尼加拉瓜。但现在美国政策却是要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也撤出去。

恩德斯被撤职了，派他到西班牙当大使。他拖拖拉拉，磨蹭了好几个月才走。欢送宴会倒也不少，凡是重要的，凯西都去参加。他似乎认为光是出席还不足以表明态度，于是有次宴会上，他站起来致了祝酒辞。他赞扬恩德斯工作做得很好，还强调说老恩历任要职，暗示彼此久有来往，一起干过许多大事。他发音不大清晰，但感情丰富，热情洋溢，让人明白他和恩德斯将永远是朋友。

苏里南过去是荷兰殖民地，位于南美洲北端，正好在巴西的上面。苏里南独立后，有些荷兰殖民者流亡在外，这时他们来找中央情报局寻求支持。他们想推翻德西·鲍特瑟中校领导的专制政府。鲍特瑟有亲共倾向，他处决了15人，包括他的主要政敌、一些新闻记者和工会领袖。

凯西赞成这个想法，他认为鲍特瑟这位左派是个麻烦，除掉为好，荷兰流亡者说的话可信。但凯西和麦克马洪认为

先得作点调查研究。行动处于是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进行一次秘密调查，看看中央情报局支持那些流亡者是否有道理，他们能否推翻鲍特瑟。里根批准了这个报告，拨款几十万美元，派一小队中央情报局人员去苏里南收集情报，并研究有没有可能搞政变。

麦克马洪向参院情报委员会汇报了这件事。参议员们的反应是，“你是在开玩笑吧？”好几位参议员说，里根政府为什么想在一个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国家搞政变？苏里南人民既原始又温和，很像南太平洋中的塔希提人。人口只有35万，等于亚利桑那州塔克逊市。戈德华特参议员特别恼火，他说，“这是我生平所听到过的最幼稚可笑的想法。”

麦克马洪回答说，鲍特瑟政府正在同古巴和格林纳达政府谈判，格林纳达这个小岛当时也是由左派执政。中央情报局有一批荷兰流亡者，他们愿意干这件事。

参议员们问，美国支持的这种政变过去在什么地方成功过？

麦克马洪回忆说，1954年中央情报局曾支持危地马拉的政变，获得成功。他又说，这次的报告只是建议进行调查研究，如果真要干，还得另写报告，那时会通知情报委员会。

会后，情报委员会决定写一封信给里根总统抗议，反对在苏里南搞秘密行动。戈德华特亲自传话给里根，问他，“你真需要这样干吗？”

众院情报委员会更是两党一致反对。中央情报局派去的调查人员回来后报告说，政变不大可能搞得成。

颠覆苏里南政府的计划终于放弃了。麦克马洪大为懊悔，他决定今后要尽力阻止中央情报局再搞连环漫画似的行动了。

第十二章

众院是民主党占优势，凯西想向众院推销他的尼加拉瓜秘密行动，他得抓住那些从南部和西部选出的民主党保守派众议员。其中一个典型人物是戴夫·麦克迪，新参加众院情报委员会的俄克拉何马州众议员，才33岁。他非常支持里根的外交政策和国防计划。

有一次开听证会时，麦克迪问凯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教育、公路和医药卫生方面花多少钱。凯西答不上来，感到这有什么关系，于是反问麦克迪用意何在。麦克迪说，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乡下长大，那里的老乡们都是民主党人，因为当初是罗斯福的“新政”和农村电气化计划使俄克拉何马也实现了现代化，进入20世纪的。因此，他想知道，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是否也在走这条道路，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

凯西这下有点明白了。他说，天主教教会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如果尼加拉瓜举行真正自由的选举，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不会胜利的。

麦克迪问，那么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怎样呢？他们给乡下老百姓的印象是什么呢？据悉，他们炸毁桥梁，袭击粮仓，攻打牧场，炮轰发电厂，这就是走向农村电气化的反面了，这是破坏，不是建设。一席话，说得凯西狼狈不堪。

参院那边，也不放过凯西。复活节休假一结束，莫伊尼汉和莱希就到全会上发言，对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行动

表示忧虑。莫伊尼汉还谈到国会和情报部门之间已出现“信任危机”。私下里，莫伊尼汉说，他认为美国搞这种恐怖活动，恰恰会适得其反，当地的民主只会因此而更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取消了民主权利，严格检查新闻，实行初步的警察国家统治。

戈德华特也不满意，他认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至少有四万人，是中美洲最大的，中央情报局派几千人去，有什么用处？他威胁说，如果政府方面不听参院的意见，那么参院自有办法，它可以不给拨款。

凯西仍对黎巴嫩疑虑重重。自巴希尔·杰马耶勒遇刺身亡后，中央情报局的影响削弱了，得到的情报也减少了。巴希尔的哥哥阿明当选为总统，已经就职。阿明同以色列和美国都拉开了距离，企图和阿拉伯国家加强关系。但阿明仍要美国这顶保护伞。为了保持美国的影响，白宫建议阿明任用沃迪·哈达德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获得了阿明的同意。哈达德时年42岁，曾在世界银行任职，长得干净利落，办事精明准确，有知识分子味儿，因与美国关系密切，人们称他为“美国佬”。

凯西在1983年初见过哈达德。两人都担忧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影响会增长，也担忧阿明能否站得住。哈达德说，阿明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人们认为他软弱。最近黎巴嫩国内一片混乱，阿明却居然有闲情逸致跑到巴黎，在豪华的“克里斯琴·狄娥”商店买了24套新西装和正式礼服。阿明和哈达德之间的关系也紧张，凯西心想，哈达德任职时间长不了。

凯西对政府的中东政策还有另一条施加影响的渠道，那就是通过罗伯特·艾姆斯，中央情报局中东问题首席分析

员，凯西的要员之一。艾姆斯主意特别多，有时新点子一下就出来了。他还善于发展间谍和情报员，曾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发展了两个重要间谍。其中一个竟是巴解的安全和情报头目阿里·哈桑·萨拉梅，代号“红色王子”，此人不幸于1979年以色列人搞的汽车被炸事件中送命。艾姆斯认为，以色列的哲学是一方得益，一方必然受损，任何国家或个人如果从美国得到什么好处，必然导致以色列受到损失。

凯西很高兴看到艾姆斯当上了舒尔茨国务卿的中东问题非正式顾问。前一年，国防部副部长卡卢奇（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曾向舒尔茨推荐说，要了解中东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听艾姆斯的。卡卢奇说，“请你听他的意见，他之所以出色，是因为看问题不偏不倚，也不狂妄自大。”几个月后，舒尔茨偷偷对卡卢奇说，“你叫我听艾姆斯的意见，果真是一条好主意。”

艾姆斯以冷静著名，对这点舒尔茨十分欣赏。不久，他就成为国务卿在中东问题上的情报分析家和实际处理者。艾姆斯最近提出的意见很简单：因为有叙利亚和以色列这两个占领者，黎巴嫩的局势日益严重了，得采取点措施。但是，如同中东的每件事一样，要采取措施可不简单，也许甚至根本不可能。

1983年4月，艾姆斯去中东执行任务。4月18日，他正在贝鲁特海边美国大使馆里，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冲进使馆，引爆炸药。这座七层大楼的中间部分马上坍塌，死亡63人，其中17人是美国人，包括艾姆斯、中央情报局分站站长、副站长和六名中央情报局官员。

出事前，国家安全局曾破译了伊朗外交部发给伊朗驻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两处使馆的电报，内容相当清楚地表示正准

备对美国采取某种行动。一份电报说，已批准拨款25000美元去进行某项行动。但这些电报没有讲具体日期和目标，也没有讲使馆是目标。

出事后，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美国情报机关事前截获和破译了伊朗电报的事捅了出来。凯西气得不敢相信竟会发生这种泄密事件。美国人对这两条新闻没有留神，伊朗倒显然注意到了。不久他们就停发电报了。这使凯西更为恼火，因为他原来希望从继续窃听伊朗电报通讯中可以发现爆炸事件是谁干的。

凯西下令调查是谁泄密的，但毫无结果。看到这条情报的人有200多，包括国会情报委员会的人。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更是广泛知道的。后来发现，竟然有人复印了载有这条情报的"全国情报日刊"，仅某单位就复印了75份。

美国驻黎巴嫩使馆挨炸四天后，里根总统宣布他将派国务卿访问中东。

5月17日，黎巴嫩和以色列签订了协议，以军撤出黎巴嫩，黎方则保证不侵犯以色列的北部边界。阿明·杰马耶勒总统在会谈中向舒尔茨提到叙利亚有20次。舒尔茨深信叙利亚不会反对这个解决办法，而且认为美国对叙利亚的影响是一般人没有认识到的。

杰马耶勒的主题是：如果要他迁就叙利亚，那要等他强大的时候才能这么做。同以色列达成协议可以把国内原来反对他的派系团结到他周围。他要求美国作出支持他的保证。

因此，黎以达成协议那天，里根总统写了一封密信给杰马耶勒总统。信中保证说，美国不会允许黎巴嫩因为签订黎以协议的结果而受到进攻或损失。巴希尔·杰马耶勒曾得到中

央情报局提供支持和保护的保证，现在他的哥哥阿明又得到美国总统的秘密保证，美国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给予支持，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驻守贝鲁特。

但中央情报局接二连三地收到情报，说是叙利亚不肯附和。国务院情报研究司也同意这种看法。这些情报还谈到以下三点：（一）黎巴嫩国内问题很大，美国无法用外交手段加以解决，除非投入五万士兵。（二）阿明·杰马耶勒是个天生软弱的领导人。（三）美国驻黎巴嫩的维持和平部队终将拉一派、打一派，杀戮阿拉伯人，其他派别不会同意这种作法。

另外，这些情报说，尽管美国有些制订政策的人认为叙利亚是苏联的走卒，但叙利亚有自己的主张，阿萨德总统坚决、有力，是个杰出的战略家，比杰马耶勒强多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和南亚问题专家杰弗里·肯普博士认为，情报部门的主要缺点之一是未能准确生动地描绘外国领袖的心理状态、个人情况和政治主张。例如对阿萨德、杰马耶勒和贝京的描绘就很不充分，因此美国领导人对他们的了解也很不够，没有抓住对方的主要特点。对卡扎菲的描绘更成问题，中央情报局说他患有“边缘人格失调症”。这种描述对美国领导人有什么帮助？肯普建议白宫找一位小说家来帮助描写外国领导人。

但里根不大爱看小说，却喜欢看电影。于是，中央情报局录制了一些关于外国领袖形象的录相片，拿到白宫和戴维营，放给总统看。有一部是介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彩色片，配有音乐，从穆巴拉克诞生的小村庄介绍起。还有一部是介绍以色列总理贝京的，很出色，从回溯德国纳粹集中营迫害犹太人讲起，然后引入贝京叫喊“再也不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声音。

里根对这些录相片很感兴趣。肯普认为，米斯、贝克和迪弗也受到了教育，他们对外交事务都不大懂。迪弗十分高兴，还专门传话告诉中央情报局说，总统很欣赏。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提出了一张建议里根出访的国家名单。

前局长特纳退休后，呆在弗吉尼亚州家里的地下室写文章，一年内就写了16篇。同时，还在写一部关于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时的回忆录。最近，他又坐在那台“无线电情人”牌电脑面前打字，写出他对尼加拉瓜问题看法的文章，边写边修饰。

中央情报局职员写文章，按规定人人必须在发表前送审，特纳也不例外。这次，中央情报局的审查员对特纳十分严格，说他作为一个过去的内部人士，不该说中央情报局在秘密地帮助反政府武装。他们还说，特纳当局长的时候，也搞过一个小型的秘密行动，对某国给予政治支持。

特纳认为，这可毫无道理。里根政府搞的准军事秘密行动，与他过去搞的行动完全不同，何况众院还公开辩论过博兰修正案，情况都抖出来了。中央情报局方面不肯让步，特纳于是认为这是存心不让他公开反对尼加拉瓜行动。扯皮好久。总算达成了妥协：特纳得参照报刊消息和国会辩论情况，不能自己下断言；他在文章中发表看法和批评，都得冠上“如果”字样。

结果，特纳经过审查的定稿一开始就是这样写的：“如果中央情报局真是象报上所说的那样，深深地卷入了对尼加拉瓜游击队提供‘秘密’援助的话，那么该局可是犯了一个糟糕的错误。”

特纳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83年4月24日星期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标题是“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呼吁，停止在尼加

拉瓜的秘密行动”。凯西倒是愿意倾听批评的，即使是特纳的批评也行，但他认为这篇文章只是“英曼主义”复活而已，特纳是在开倒车。反对意见总会有的，就象太阳天天出来那样自然。但凯西对这次的反对意见可是十分坚决，绝不会受它的影响。不能把中美洲交给共产党，凯西执行的可是里根总统的措施。

到了白宫，凯西解释说，尼加拉瓜行动处在危险之中，他需要帮助。总统同意去进行游说，以保证国会不中断拨款。在达拉斯，舒尔茨说，尼加拉瓜已经成为“一种新形式的独裁政权”的基地，目标是要扩展到“整个中美洲”。里根邀请了一些重要国会议员到白宫来，私下施加压力，还亲自打电话给许多人打招呼。

4月26日晚，里根出席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34分钟的讲话，全国电视转播。晚饭后的电视节目是黄金时间。里根当总统后，这还是第一次出席两院联席会议就外交政策问题发表讲话。他呼吁国会批准他的请求，拨款六亿美元公开援助中美洲。他遵守礼仪，没有提到对反政府武装的秘密支持。但人人都没有忽略总统的一句隐语，他说，“我们不应当，我们也不会，保护尼加拉瓜政府不受本国人民愤怒的冲击。”

多德参议员代表民主党方面在电视上回答问题。他采取典型的里根式策略，扮出一付生动鲜明的形象。他选择的题目是萨尔瓦多，说道：“我到过那个国家，我认识那里的一些殡葬工作人员，他们每天早晨到街上巡查，去收集头天晚上被萨尔瓦多保安部队就地处决的死者的尸体。那些死者跪在地上，双手绑在背后，一颗子弹穿透了脑袋。看到这种景象，想到我们竟和罪犯搞在一起，我们真感到不寒而栗……”

几分钟内，爆发了一场重大外交政策辩论，不是对总统

或他的讲话进行辩论，而是对多德和他的讲话。连民主党人也责骂多德，认为他走得太远，侮辱了总统和美国。

几个月前，多德访问尼加拉瓜时，国家安全局曾截获一份电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在这份电报里讨论如何接待多德，并且说他是一个好人，如果不说同情的话，也是了解他们的。国家安全局把这份截获的电报副本送给参院情报委员会，这是符合习惯的。多德却认为这是故意诽谤他，于是私下向白宫抗议。他有国务院收到的使馆电报副本，表明他在会见桑地诺分子时是强硬的。

凯西对事态发生这种变化，感到十分高兴。从目前来看，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多德参议员，讨论他的“双手绑在背后”的讲话和他在尼加拉瓜被当作“好人”接待。人们暂时不注意中央情报局了。

5月3日，凯西出席众院情报委员会会议。委员会以九票对五票决定停止秘密行动拨款。

5月6日，凯西出席参院情报委员会会议，这是他的最后机会了。莫伊尼汉、莱希等人主张立即停止拨款。委员会主席戈德华特事先同里根和凯西商量过，他提议搞个妥协方案，既不完全停止，也不完全继续。具体办法是：继续拨款资助秘密行动五个月，然后俟总统提出新的报告明确行动的目的并经委员会多数同意后，再在下个财政年度拨款1900万美元。这个妥协方案以13票对2票通过。凯西大为高兴，国会暂时赢得了字面上的胜利，但中央情报局得到了钱。

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小组每次在白宫开会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琼·柯克帕特里克总是坐在凯西旁边。从一个方面来说，柯克帕特里克喜欢参加这个计划小组的会议。这些会

议是核心人物在内部讨论外交政策的场合，内容丰富，通过长时间讨论后决定公开政策和秘密政策。参加这种会议，可以使这位过去的政治学教授有难得的机会参与制订外交政策。凯西来参加会议时，总是事先作好了准备，他手里拿着一份打字稿，常常是经过自己用铅笔大事修改过的。他发言时口齿不清，而且既不会滔滔雄辩，也不能激动人心。但他能回答问题，满腹知识，其深度远超过他的概述。柯克帕特里克感到可悲的是，她发现凯西在知识深度方面几乎是孤立无援的。

某次，一位中层的政府智囊建议大家一起制订一些长期的外交政策目标和战略。柯克帕特里克当即回答说，“那会是白费劲，因为也许除了比尔（对凯西的爱称——译注）之外，大部分人都并不懂行。”

柯克帕特里克得到里根注意并最终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是因为她1980年在《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独裁政权和双重标准”。她写道，“伊朗国王和索摩查不仅反共，而且他们对美国非常友好。”她这番话是指责卡特没有认识到这些右派政权比霍梅尼和桑地诺分子要好。

在里根政府的头两年中，她一再发现，里根、凯西、克拉克和她自己的保守主张并没有成为政府的政策，得胜的往往是那些官僚和实用主义者。她对此感到很惊异。一般来说，只有凯西的情报工作比较例外，在这方面倒有某种一致的战略。

这两年来，她和凯西之间沆瀣一气，互相尊重。柯克帕特里克在私下说，里根政府的真正“丑事”是高级政策制订人包括总统自己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凯西同意她的看法。总统太善良了，他还不知道大家——包括柯克帕特里克和凯

西——都不愿意在外交政策上反对他。柯、凯二人认为，结果是外交政策重点不集中，不够有力。

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务卿舒尔茨一天到晚争吵不休，这种官僚之间的争斗往往为所有的辨论定下了调子。温伯格一心只想维护国防部的集体利益，力图避免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外国事务。舒尔茨为人精明，但由于现实原因，他的手被捆住，无法向苏联开展外交攻势，因为那样做会意味着在谈判中作出某种让步，而这是右派最害怕做的事。舒尔茨和温伯格两人僵持不下，结果造成真空，需要有人去填补。里根既无知识，也不想作出决定挑选一个合适的人去填补这个真空。布什副总统没有权力去做这事。克拉克身为国家安全顾问，却没有外交国防经验，也没有决心去过问实质问题。

由于现实的原因，结果是由办公厅主任贝克和总统助理达曼去填补真空。他们和迪弗一起，控制总统的日程和公文运转。他们安排里根做这做那，会见什么客人，审阅什么文件。在需要总统做出决定之前，贝克和达曼先进行各种审议，寻找舒尔茨和温伯格都能接受的方案，同国会领袖以及其他人士进行磋商。然后把达成一致意见的建议送呈总统审批。

柯克帕特里克和凯西认为，作出一点决定如此困难，权力如此分散，结果往往把总统真正的意图扼杀了。他们私下埋怨说，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着思想相同的人们的最小公分母。

柯克帕特里克渐渐真的欣赏起凯西来了。他生活有规律，工作繁忙，娱乐也不马虎，总有时间和朋友一起喝上一杯酒，聊聊天。她认为，他有很好的鉴赏力，从音乐到地毯都懂行。他见解高超，私财富有，受过广泛教育，文明脱

俗。她在当教授的年代里，就见过聪明杰出的人物，吃饭时却大声咀嚼，或者连如何好好地打领带也不懂得。她老早就明白，这些习惯是无关紧要的。在她看来，在所有参加国家安全计划小组的人当中，只有凯西对政策十分严肃认真和热情关注。她和凯西在城里什么招待会上碰到时，两人总是马上躲到角落里，谈论政策。但是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两人意见有分歧。

柯克帕特里克认为，如果没有公众支持和国会辩论，里根政府不可能有效地进行秘密行动。

凯西说，这是麦克马洪的主张。凯西说，在这届政府中，外交和直接的军事行动都不是总统要采取的方案。总统既不想和苏联人谈判，也不想和他们打仗。因此，既要完成任务，又要限制美国在国外的行动，只有采取秘密行动。而且他想尽量保密。

尽管有这种意见分歧，柯克帕特里克和凯西仍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她认为，他多听听各种意见对自己是很有好处的。显然，这就是他要留着麦克马洪的原因。凯西并不怕自己的判断受到考验。

恩德斯调职后，凯西和柯克帕特里克想推荐康斯坦丁·门杰斯接替恩德斯的职务，而助理国务卿则是秘密行动有关部门协调小组的当然主持人。但舒尔茨不愿意用一个右派狂热分子。

结果找了一位妥协人物，美国驻巴西大使安东尼·莫特利。此人俗里俗气，嘻嘻哈哈，现年44岁，曾在阿拉斯加当过地产商，为共和党募集经费。他出生在巴西，能讲流利的葡萄牙语。里根和迪弗访问巴西时，对他的反官僚主义作风印象很深。

凯西也认为莫特利有胆识。那年春天，中央情报局得到报告说，有几架利比亚飞机运载武器飞往尼加拉瓜，对外则谎称运载的是医药用品。这些飞机中途要在巴西停留。莫特利打电话给凯西说，他将采取行动，去找巴西外长，要求搜查飞机，阻止前往尼加拉瓜。但他想先搞清楚机上确有武器，而不是人们的猜想。凯西提供了在利比亚的间谍送来的情报。于是，飞机被截住，搜查出了70吨武器和炸药。结果在宣传上大获胜利，既打击了利比亚，又打击了尼加拉瓜。

凯西对莫特利在巴西收集情报的工作也很欣赏。他经常和巴西总统一起吃牛排，喝啤酒。他发回的电报十分精彩，大大超过中央情报局驻巴西分站的报告和国家安全局从窃听中得到的情报。

最重要的是，莫特利愿意干粗野、肮脏的勾当。中央情报局打算推翻苏里南领袖的计划破产后，巴西情报局却开始了它的第一个秘密行动。巴西和苏里南之间有一条约100英里长的共同边界。中央情报局并没有给多少援助，但在莫特利的鼓励下，巴西情报局派遣了一些情报人员去苏里南，假扮作教师，任务是促使苏里南政府断绝与古巴的关系。后来，苏里南领袖鲍特瑟的确不再和古巴来往。巴西情报局告诉莫特利说，有关这次敏感行动的一切材料都已经被销毁了。

国务院把莫特利召回华盛顿，舒尔茨告诉他说，要提升他为助理国务卿。舒尔茨并指示说，“不要把反政府武装行动搞成竞选时争论的政治问题，同时也不能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放松压力。”

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贝克也向莫特利发出了同样的指示。贝克说，总统的政策是对尼加拉瓜加温到最大限度，但

要避免公众反对。

凯西知道这是迪弗的主意。迪弗负责总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这才是白宫里的推动力量。尼加拉瓜是个负数，白宫从来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赢得公众舆论支持，尽管总统坚定不移并一再向公众作出解释。

另一方面，克拉克决定采取支持反政府武装、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政策。他受过基督教的教育，相信耶稣基督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他认为，在外交政策上，总统就是耶稣基督，克拉克自己是副手。但是，就目前来说，迪弗和公众舆论占居上风。结果，克拉克和迪弗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凯西想把门杰斯推荐给舒尔茨没有成功，但仍然想把他赶出中央情报局，因为他在那里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们一致认为，世界上存在苏联共产主义威胁，他们的任务是了解这种威胁有多大，在什么地方。门杰斯却认为苏联共产主义威胁很大，到处都是。中央情报局里许多反对他的人称他为“经常的威胁”。他还在凯西和麦克马洪之间制造矛盾。凯西不能再容忍门杰斯的意识形态狂热，而门杰斯的用处也完了。于是，由克拉克出面请门杰斯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工作。凯西也告诉门杰斯，他去那里可以发挥更大影响，克拉克是关键人物，他得到里根的信任，对苏联的看法和里根完全一样。

凯西要挑选一个人接替门杰斯，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事。凯西已经加强了“国家情报官员们”（他的一批私人情报分析员，兼管联络和秘书）的地位，提高了对他们的要求。第一，国家情报官员要和其他分析员打交道并赢得他们的尊重。第二，优秀的国家情报官员要和行动处处长搞好关系，

要默默地知道在进行什么行动，知道美国政策的目的，知道总统和凯西想实现什么目标。第三，国家情报官员是和别的情报部门联系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联系。第四，作为他所主管地区的监督，国家情报官员应具有影响政策的能力。一份理由充足、文字通顺的分析报告，和优秀的情报一样可以对制订政策有帮助。这一阵，关于拉美地区的分析报告比别的报告更重要。

凯西想找一个优秀的老家伙，在第二次大战中打过仗的。困难是大部分老家伙都不在了，不是退休就是死了。一代人已经逝去。凯西上台后把一些已退休的行动人员又找了回来，现在他决定再找一个。

约翰·霍顿似乎正合适。他过去也是行动人员，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中央情报局干了27年，于八年前退休。霍顿的资历真太理想了：第二次大战时当海军军官，后在中央情报局远东分站服务，1965—68年任乌拉圭分站站长，70年代初期任墨西哥分站站长，中央情报局拉美处副处长，最后是苏联处处长。霍顿不是讲意识形态的书呆子。更重要的是，老人马提起霍顿都满怀敬意，甚至是友爱。他既有对苏工作的经验，又有拉美工作经验，这可好极了。如果要找个人在拉美追踪苏联行动，霍顿当然是理想人选了。

霍顿已62岁，住在附近马里兰州乡下，种植葡萄。他接到凯西的召唤，受宠若惊，想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回来。显然，凯西在重建中央情报局，而拉美是关键。霍顿和一些人作了例行谈话之后，就去晋见凯西。

凯西发现他有点拘谨，但很有头脑，表达清楚，他懂得情报工作，知道如何想出解决问题核心的答案。双方谈话融洽而有礼貌，凯西很快便雇用了他。

1983年5月，霍顿就任主管拉美事务的国家情报官员。他马上找行动处负责拉美的官员克拉里奇长谈。克拉里奇明确对霍顿说，他知道他们两人都是为总统和凯西工作。这两位大人物想搞个支持反政府武装的计划，所以克拉里奇就为他们制订一个，其他插在中间的人都无关紧要。他们开车去国务院参加莫特利主持的部门协调会议，路上克拉里奇向霍顿讲述了八年来国会和报界如何追查中央情报局的种种情况。

克拉里奇说，"现在情况不同了，凯西来了，他神通广大，因此国务院现在也听咱们的了。"是的，凯西代表里根、白宫和政府的真正声音。他咕噜说，"国务院那帮混蛋总是喜欢采取守势，不按政府的要求办事。如果哪一天中央情报局也象他们那样，那我们就不必再存在了。"

克拉里奇还说，尼加拉瓜问题上的主要障碍是麦克马洪，他反对支援反政府武装，从来没有为这个计划做过什么事。克拉里奇补充说，麦克马洪在国会里有朋友，他们互相鼓励不要对这事积极。

霍顿听了，立刻感到太阳出来了，照耀在尼加拉瓜行动计划上。这回，它可是得到真正重视了。

这年初夏，凯西决定到中美洲秘密访问两天。他还决定带麦克马洪同去。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二把手同时出访，这可是极不寻常的事。但凯西想让他的副手更多地参与尼加拉瓜行动。人们开玩笑说，凯西想把麦克马洪拖下水，让他的手也沾染上秘密战争的烙印。当然，还得带上克拉里奇，以及新上任的霍顿。第五个人是罗伯特·马吉，他是国际活动处处长，该处负责与外界联系订合同事宜，人们称为"物色

人才处”。因为秘密行动需要后勤支持，特别是飞机、船艇、海运、宣传、心理战等等。这些大部分都包给外面去办。

他们乘坐一架只有12个座位的专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第一站是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凯西把行李扔在美国大使的官邸，就马上象一阵旋风似地跑了。他想见许多人，安排了一些背靠背的个别谈话，和分站的每个人至少谈上几句话。他们一行乘上汽车，就到雷·多蒂的训练营地去了。

克拉里奇专门问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你们有多少武器？使用武器的人够不够？武器够不够？弹药够不够？让我们试试这个办法，让我们试试那个办法，等等。

凯西和麦克马洪则想注意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他们在盘算如何向国会解释这个行动。当年早些时候，莱希参议员访问中美洲地区，暴露了美国在尼加拉瓜的行动有更大野心，另外经常有人泄密，透露反政府武装人数不断增加。中央情报局内部还有人批评说，反政府武装的政治水平不高，只是一帮武装起来的不满分子，在山区东游西窜，有如山林草寇。凯西说，他有个广大目标，反政府武装得从山上下来，进入城市，宣传他们的主张，同民间日益增长的反桑地诺情绪相结合，成为一支政治力量。

克拉里奇可不喜欢这种论调，他组织的是一支军队，不是政党。而且这种想法近似违反博兰修正案，那里面可是禁止搞“目的在于推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尝试或行动。一支高水平的政治力量可以推翻一个政府，那自然是他们的目标；一支非正规军却没有什么看得见或者可识别的政治目的。

凯西想发表一个政治主张，他想使反政府武装成为尼加拉瓜内部的一支政治力量。他认为，如果有一支新的力量鼓吹民主和资本主义，尼加拉瓜人民会起来拥护这支力量。只要有形象，有主张，人民自会作出响应。

这位局长说，“看看萨文比吧。”他指的是安哥拉抵抗力量的领袖，自70年代中期就成为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楷模。中央情报局虽因1976年克拉克修正案禁止援助他，萨文比却已成为武装抵抗的一支永久力量，牵制着好几万古巴军队，使苏联不得不提供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

同行数人认为，凯西未免是上了南非情报局的当了。他们把萨文比描绘成一朵鲜花似的。当然啰，萨文比是他们的人，南非的白人政府几年来给了他好几亿美元。

然后，凯西一行又飞往萨尔瓦多，举行一系列政治和情报会议。他亲自向萨尔瓦多政府、军方、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发出警告，因为右派敢死队还在继续活动。这些臭名昭著的敢死队是在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原来说是为了同武装的左派进行战斗，但后来竟随便杀人，据说四年中杀害了三万人之多，包括一位大主教和四名美国修女。也许被他们杀死的人数有点夸大，但敢死队确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多德参议员所谓“双手绑在背后”的情景就是指敢死队干的事。

当天晚上，代理总统马加纳设宴招待凯西一行。凯西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敢死队真是个问题，你们得管管这事。否则，我们怎么好帮助你们？

霍顿观察到凯西在这个问题上很能得到萨尔瓦多当局的信任。他们知道他也是个右派，和他们一样讨厌左派。他也不是从道德角度来提出这事，而是从实际出发。他说，敢死队没有用处，他们给你们造成的麻烦会比他们给左派造成的

麻烦更大。凯西表示，这样搞下去，不但上千万美援成问题，而且里根政府恐怕也不便再支持你们了。

凯西还个别会见所有的头面人物。有一次会见特别微妙，对方是财政部警察队的头头尼古拉·卡伦萨上校。此人1979—80年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与右派关系密切，去年曾是萨尔瓦多的总统竞选人。他给中央情报局当情报员已至少有五年之久，每年拿九万美元的津贴。就是他的警察队的情报处专门干蹂躏人权的事。凯西对他这位领中央情报局津贴的情报员说话可一点也不客气。他说，别干那些事了，因为你们这些右派胡来一气，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关系恐怕要吹了。凯西还暗示说，那样的话，你们这些人的津贴就拿不成了。

第十三章

凯西决定竭尽一切可能去保护尼加拉瓜行动，即他要改善同两个潜在的破坏者——国会和新闻界——的关系。

他开始明白了，他用错了一个人，就是那个掌管与国会及新闻界关系的对外事务处处长威廉·多斯韦尔。多斯韦尔现年53岁，一辈子都拥护民主党，但1980年却投了里根的票。他当过报纸发行人，还当过游说弗吉尼亚州议会的院外活动家，十分成功。但多斯韦尔对尼加拉瓜行动不象凯西那么热情，他认为凯西看不起国会，神气活现，结果适得其反。

多斯韦尔对他的工作感到厌倦，辞职不干了。凯西决定进行改组，专门设立了两个处，一个负责同国会联络，一个负责同新闻界来往。两个处的处长都是干过秘密行动的内行，让他们去向人们吹嘘秘密行动的好处十分合适。

凯西挑选克莱尔·乔治担任国会关系处处长。乔治在行动处干过27年，历经沧桑。他幽默感很强，业务非常熟悉。他在中央情报局好象一匹老战马，是该局全盛时期的代表。

1975年，中央情报局驻雅典分站站长理查德·韦尔奇在家门口被伏击身亡。韦尔奇的住宅在雅典是有名的，甚至游览车经过时导游员也要指着这幢住宅讲解一番。他的死引起了公众对中央情报局的同情。他成了烈士，遗体运回美国时电视实况转播。葬礼按正式军仪举行，福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亲自出席。运载他的灵柩的就是当年运

载肯尼迪总统灵柩的那架炮车。

尽管雅典分站面临危险的环境，中央情报局仍派人前去接替韦尔奇的遗缺。这个人就是克莱尔·乔治。因此，现在让他去游说国会，可以使人们想起他的英勇。乔治接受了这个职务，到国会各有关委员会去转了一圈，保证一切重新开始，双方要加强合作，互相信任。

与此同时，督察处副处长乔治·劳德接到通知说，凯西请他去谈话。

劳德也是秘密行动老手，50年代就开始干了。他有法学学位，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2年。他身材高大，满脸皱纹，穿的衣服相当破旧，好象还是上大学时剩下的。他真诚地相信中央情报局的使命重大，成绩辉煌。他举动笨拙，讲话声音太响，声调和语句都有些夸张，不象严肃谨慎的人，但他仍是一个久经锻炼、忠心耿耿的谍报人员。

劳德感到凯西来到中央情报局,真好似“久旱逢甘露”。凯西懂得中央情报局就是要干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事,这点正和特纳相反。特纳当局长时,劳德是拉美处副处长。那时中央情报局在牙买加搞一个秘密行动，而特纳身为局长竟不知道。劳德还想继续每年付1500美元的津贴给一个帮助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外国报纸编辑，但特纳坚决不同意，因为国会方面对此感到不安。凯西上台后，把内部的互不信任一扫而光。

劳德走进凯西的办公室时，他知道大概要调动工作了，但不能肯定凯西心里想些什么。

凯西对劳德说，“恭喜，恭喜。”

劳德满腹狐疑，问道，“喜从何来？”

凯西说，“我已经挑选你当新成立的公共事务处处长。”

劳德说，“我怎么有资格当呢？”

凯西说，需要有个人同新闻界打交道，阻止他们发表有害的报道。其实把大门完全关上是错误的，因为新闻界可以从国会、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得到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消息。

劳德说，他一辈子都在躲避新闻界，甚至不让他的一个当新闻记者的亲戚知道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

凯西坚定地说，你已经被选中了。

劳德只好立正敬礼，接受任命。

一个搞情报行动的官员对于局领导的召唤，总会本能地珍惜这种宝贵的时刻。服从命令，接受任命，使人感到欣慰，甚至有些兴奋，因为认识到自己成为重要工作的一部分。劳德在外面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多次冒过生命的危险，新闻事务办公室总不会比那些风风雨雨更危险吧。

凯西知道劳德会接受的。这也是他喜欢这些搞行动工作的人的原因之一。根据人事档案，劳德是一个坚定的忠诚分子。但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作为督察处副处长，他曾参与检查尼加拉瓜行动截获了什么武器。他曾经相当老实地说过，尽管发现了若干箱武器，这个行动对古巴到尼加拉瓜之间的武器运输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他仍支持这个行动。

他想，就职后首先得让大家知道，凯西现在有了一位积极的新闻官员，然后他得去认识那些记者，了解他们是如何活动的。他得准备随时接见记者，同他们建立关系，设法搞清楚谁是可以信任的，而且至少要让凯西事先知道记者正在酝酿什么有害的新闻。他还得收集情报，看看能不能发展谁当坐探。也许对付记者与他原来的工作并无多大差别。

盛夏将逝，凯西又秘密出访非洲和中东，去视察当地的分站。他仍然感到几乎有切肤的需要亲自去看看。就象肯尼

迪在达拉斯遇刺的那个广场一样，当你真正身临其境时，一切都不同了，意义更深刻了。各驻外分站仍然需要他去亲自推动那些站长，叫他们收集更多的情报，走出使馆，和当地人士发展关系，以伪装身份参加政党会议。

凯西在六名助手陪同下，乘坐空军喷气式专机，准备在18天内访问11个国家。飞越大西洋后，他们首先在塞内加尔停留，然后到达西非的象牙海岸。凯西在这些国家会见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情报局长或副局长、美国大使，并叫分站站长开车陪他外出参观，一路上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例如，从皇宫到兵营的距离多远，到大学的距离多远，主要的反对党领袖是谁？苏联克格勃的情报人员如何？

西非之后，又飞了500英里到尼日利亚。从飞机场到首都拉各斯的路上，车水马龙，店铺林立，花了好几个钟头才到达。前面还有尼日利亚情报局副局长率领几辆车在那里开道，也无济于事。有个村民敲敲凯西座车的玻璃，想卖一条在花园里浇水用的胶管给局长。凯西说，此刻不需要。

在扎伊尔，凯西会见了蒙博托总统。中央情报局和蒙博托在1960年就有关系了，那年中央情报局曾策划暗杀刚果民族主义领袖卢蒙巴。1960年8月25日，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打电报给该局驻刚果分站站长说，“除掉卢蒙巴必须作为迫切的首要任务去完成，在目前情况下，这应当是我们秘密行动的第一重点。”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计划还没有执行，卢蒙巴就先被另一帮支持蒙博托的人暗杀了。凯西和蒙博托有重要的私人关系，这次见面，他们交换了情报。

凯西一行然后飞往赞比亚，稍事停留，又赴南非。为了观赏维多利亚大爆布的壮观景象，凯西要求机长低飞，盘旋两圈，让他靠在窗旁饱览下面的景色。他在南非联邦首都比

勒陀利亚会见政府要员，与使馆和分站人员谈话，并出席了南非商人的野宴。有个南非商人不知凯西的底细，竟说凯西如果做生意的话，一定能赚很多钱。

凯西一直欣赏南非的情报部门，和他们保持着密切关系。南非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威胁，提供了约两亿美元的援助给萨文比的反政府武装活动，支持他们同安哥拉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作战。凯西仍然希望取消禁止中央情报局秘密援助萨文比的克拉克修正案。

从南非又飞往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然后飞了2200英里到埃及。凯西在开罗会晤了穆巴拉克总统，然后和分站站长谈了几小时。中央情报局在埃及有很大的设施，供给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武器和物资，大部分是从埃及空运去的。从埃及又飞往土耳其，凯西认为这个国家十分重要，但世界各国都忽视了土耳其的战略价值。最后一站是摩洛哥，在那里见到了哈桑国王。

凯西认为，这些国家都很重要，中央情报局不但对它们提供情报和安全，而且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种种优惠，包括提供最新医药用品和政府使用的飞机，并为其国民安排到美国受教育的机会。回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随行助手们都感到精疲力尽，一个个回家休息，但凯西精神很好，从机场就直接去局里办公了。

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科恩愿意在尼加拉瓜问题上支持政府，总统亲自打电话和他谈过这事，凯西也和他面谈过。但科恩有些顾虑，于是凯西建议他亲自到中美洲看看，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分子谈谈。

科恩过去当过检察官，对于去现场调查事实、盘问证人很感兴趣。他参加参院情报委员会只有九个月，很想多了解

点实际情况。科恩和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哈特非常要好。他们两人曾花了几年时间，合写一部小说，题为《两面人》。主人公是一位参议员，主持调查世界性恐怖主义问题，坏蛋中有一人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向参议员领导的委员会隐瞒了不少事情，并且安插了一个女特务在委员会里当奸细，向中央情报局报回情报。

1983年夏天，科恩向哈特建议，到国外去转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哈特正开始竞选总统，但得到的支持很微弱。哈特过去当过情报委员会委员，也当过调查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丘奇委员会委员，他始终怀疑肯尼迪兄弟先后被暗杀，同中央情报局阴谋暗杀卡斯特罗有关。中央情报局当时连准备使用的毒剂和有毒的圆珠笔都已在1963年11月22日交给了行动人员，而那天正好是肯尼迪总统遇刺之日。

9月8日清晨，科恩和哈特二人乘坐空军专机飞往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途中，机长从无线电通讯中得悉，首都机场因遭空袭停止开放。专机在空中盘旋了45分钟，只好改飞洪都拉斯首都。他们到达之后，立即打电话问华盛顿发生了什么事。对方说，是一架来袭的敌机被击落，满载炸弹坠到机场上，炸毁了控制塔和候机楼。此时，马那瓜方面却又传话说，机场已稍加整顿，可以接纳他们的专机了。

当天下午，他们终于抵达马那瓜机场。哈特看到被破坏的景象，十分吃惊。到处都被烟熏黑了，候机楼中央被炸坍了，碎玻璃和油渍到处都是。被击落的敌机的油箱裂成两半，正副驾驶员都死了。在候机楼等待搭机的40名旅客遇难。贵宾休息室也被炸，两位参议员本来要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科恩心想，如果他们那天上午早一点到达，那么恐怕也要为国牺牲了。

一位记者问道，这次空袭显然是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搞的吧？

科恩说，“中央情报局不会那么胡涂。”

尼加拉瓜官员拿出一只公文箱，是从那架飞机上找到的。科恩和哈特都往里面看，只见有一纸命令，指示驾驶员到哥斯达黎加的某餐厅去会晤一个人，还有美国迈阿密市的一张提货单，以及驾驶员在佛罗里达州的汽车驾驶执照、社会保险卡和美国信用卡。另外，还有一些用密码写的关于这次行动的指示和合同。科恩和哈特都认出这是真的中央情报局文件。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官员们说，平常机场只有两门高射炮，但这天早上突然增加到17门。上级预料到这次空袭。显然他们从某方面得到了有关反政府武装内部情况的情报。

两位参议员听取了桑解阵军方的汇报，然后会见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他当着记者的面，讲了一大通强硬的反美言论。科恩也不示弱，他问为什么批评政府的报纸被勒令停刊。这时，记者们就赶紧把摄影机、电视机都关掉了。

当天晚上，哈特、科恩两人和诺娜·阿斯托加共进晚餐。阿斯托加原来是尼加拉瓜的交际花，后来参加了桑解阵的游击队。她这年已34岁了，是个传奇式人物。1978年时，她曾引诱索摩查方面的一位将军，国民警卫队副司令雷纳多·维加，到她的卧室里去。维加一进门，就被埋伏在里面的三名桑解阵敢死队员杀死了。几个月前，尼加拉瓜政府曾提出要派阿斯托加到华盛顿当大使，被里根政府拒绝。

饭后，科恩和哈特去找中央情报局分站站长谈话。他说，反政府武装内部的情况泄密，被桑解阵知道了。他支支吾吾地说，这天的空袭可能是反政府武装有了空军力量后的一次初步尝试。

哈特感到很难容忍，他生气地说，这些愚蠢可笑的行动会断送中央情报局的前程。驾驶员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个美国驻哥斯达黎加使馆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想想看，这怎么能抵赖干净？

科恩说，换炸的是民用机场，根本不是军事目标。他们这样干，能得到什么好处？只会使尼加拉瓜人民起来反对反政府武装，这可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啊！如果有人想轰炸美国的民用机场，那该引起什么后果？

分站站长说，目的是要表明反政府武装不含胡，有能力袭击首都。

哈特喊道，你认为这是在干什么，象杜利特尔①当年第一次轰炸东京那样吗？

分站站长说，那些反政府武装人员是自由行动的代理人中央情报局控制不了他们。炸什么目标由他们自己选择。

哈特问道，搞秘密空袭时，在皮包里带着中央情报局的文件，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啊，只有白痴才会干出这种事来。你们都是笨蛋，饭桶！哈特气得脸红脖子粗，他喊道，“这是蹩脚的政治，蹩脚的外交，蹩脚的行动！”

然而，分站站长竟打了一个特急电报给中央情报局总部说，两位参议员在此非常高兴，不久就回华盛顿了。

同一天，莫特利正在洪都拉斯访问，他听到轰炸失败的消息，马上打电话给克拉里奇。

他说，“老弟，你发疯了吧？本助理国务卿正在访问洪都拉斯，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听着，在我出访期间，我不想再听到发生这类丑事了。”

---

① 杜利特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空军英雄，曾率机轰炸东京。
——译者

克拉里奇回答说，“我们没有对这件事进行实际指挥。没有办法规定行动必须在哪一天进行，只能规定个大致日期，譬如几天之内。”克拉里奇还说，凯西要求制造点轰动的新闻。他还要求反政府武装下山来，这回不是下来了吗？

第二天，科恩和哈特去萨尔瓦多。他们参观了一个叫圣洛伦佐的村庄。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曾进攻这个村庄，切断了电源，摧毁了一座教堂，破坏了织布厂的机器，布正是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他们乘坐一架曾在越南用过的直升飞机，机上没有门。科恩戴上耳机，聆听驾驶员同地面的谈话。直升飞机升到1200英尺高度时，突然开始下坠。驾驶员喊道，“他娘的，我这飞机漏油很厉害。我得赶快降落！”

科恩心想，这下我们都得摔死了，下面就是首都圣萨尔瓦多。倒很好，不是被反政府武装打死，也不是作为两个超级大国的代理人之间战争的牺牲品，而是由于直升飞机漏油！

驾驶员翻看维修手册。突然，直升飞机又升上去了，一直升到10000英尺。真是吓死人，心都要跳出来了。

科恩问道，“升这么高干吗？下面有什么事？”

军方派的警卫说，“得躲开反政府武装的机关枪炮火的射程。”

科恩认为，要掉下去的话，还不如从一千英尺的上空掉下去，这总比从一万英尺掉下去好哇。他不禁想起了从前自己出版的诗集中一首“自由下降”的小诗，诗中写道，“我不怕飞行，也不怕摔死。”

不过，直升飞机并没有坠落。

科恩回到华盛顿后，凯西专门到他在参院的办公室来看望。凯西强调说，中央情报局并没有批准搞那次轰炸。

科恩说，那事真胡涂，胡涂透顶。那架飞机上连释放炸弹的先进装置都没有。

凯西不置可否。他看得出，科恩不高兴。凯西懂得，一个经历过死亡边缘的人，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不同了。他用友好的口吻问科恩此行印象如何。

科恩说，你得明白，你搞的行动被对方打进来的奸细知道了。任何军队领导人或情报领导人最害怕的就是内部有奸细，看来这次真有奸细。机场的高射炮那天忽然从两门增加到17门，这不说明问题吗？凯西答允去调查一下。

后来科恩打听到，去进行轰炸的那架飞机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而且据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说，这次空袭是经中央情报局相当高级的领导批准的。反政府武装首领也在幕后指挥。但那个官员没有告诉他，搞这次空袭是因为凯西要求制造一件轰动消息。

尽管如此，科恩仍感到没有必要就此大做文章，否则人们会认为他只是为了个人安全而大发牢骚。他决定继续支持秘密行动，只要它有助于压桑地诺分子进行谈判。不过，他再也不会毫无保留地支持秘密行动了。他对凯西的看法也变了，他认为凯西太滑头，显然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他。

凯西也请哈特到中央情报局去坐坐，喝杯咖啡。

凯西对哈特说，我想向你保证，没有人想谋害你。哈特说，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竟然有人采取了如此愚蠢的行动，管他是中央情报局也好，反政府武装自己干的也好。对平民搞这种袭击，只会播下无限仇恨的种子。

凯西说，我知道你和科恩都十分不快。

哈特说，你还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对个人安危毫不在乎。问题是这件蠢事背后的政策、想法和人。怎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

凯西说，“我们的政策是支持民主力量，如果我们不能迫使桑地诺分子变温和点，那我们就要反政府武装把这个国家拿回来。”

哈特看不出“拿回来”和“推翻”之间有什么区别，而“推翻”是美国法律禁止的。

凯西说，“我们在那里有零号司令。”他指的是反政府武装首领帕斯托拉。“我们得允许他们自己决定该做什么。”凯西还说，轰炸的目的是要表明反政府武装的行动不只是边境冲突，而是反对桑解阵政府的民族行动。

哈特仍想缠住局长讨论这种行动的结果适得其反。

凯西回答说，他认为哈特在国防问题上有些好的想法，他很想同哈特和佐治亚州的萨姆·纳恩参议员一起谈谈国防问题，纳恩也是国防问题专家。

哈特告辞了，心里一清二楚，中央情报局失控了，有一天总要爆炸的。凯西也根本没有再打电话约他谈什么国防问题，或者别的问题。

里根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关于尼加拉瓜的新报告，授权给予尼加拉瓜抵抗力量“物质支援和指导。”目标是：（一）敦促尼加拉瓜的桑解阵政府与邻国进行谈判；（二）对桑解阵及其盟友施加压力，要他们停止向萨尔瓦多的左派游击队提供武器、训练、指挥设备和庇护所。

9月20日，参院情报委员会讨论此事，请舒尔茨和凯西出席作证。两天后，委员会以13票对2票通过了新的报告，反对的两个人是莱希和比登。

这年夏天，里根的内圈人物之间第一次发生了严重的公

开分歧。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说，1980年总统竞选中，卡特为准备全国转播的电视辩论，曾搞了一份简明扼要的材料，但凯西事先搞到了这份材料，并拿给贝克看过。事情一公开，国会和联邦调查局都开始进行调查。

凯西说，他不记得拿到过、听到过或打听到过这份材料。为了统一口径，平息争论，凯西和贝克找了一个星期天，坐在一起商量，哪怕是能够解决分歧也好。贝克劝凯西承认看到过这份材料，并且说承认了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凯西的态度反而更硬了，他坚持说没有看见过，更没有拿过这份材料给贝克或任何人。

这时发现了一些关于那次竞选的备忘录，一份是休格尔写的，他在竞选中是凯西的助手。他写道，里根这边安插了一个坐探在卡特的阵营里。这项差不多的情况材料表明，休格尔第一次为凯西干间谍工作，在他们两人还没有参加中央情报局时就开始了。

凯西在白宫旁边的行政大楼里有一套办公室。我为了弄清楚总统竞选中是否搞了有组织的间谍行动，在9月28日到行政大楼凯西的办公室去访问他。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凯西，也没有和他谈过话。他这间在角落上的办公室面积很大，仿维多利亚式的陈设，富丽堂皇，很适合举行仪式用。他热情地欢迎我，但没有盯着我看。他长得比我想象的高大，走路摇摇晃晃，好象要摔倒似的。他的脑袋和脸都不但显老，而且憔悴枯槁。

局长大人身穿一套藏青西装，裁剪得很好，但式样保守。衬衫熨得很平，领子挺硬，领带显然是很昂贵的高档货。我的目光扫向办公桌，只见上面堆着许多档案夹和公文，差不多有一英尺高。封皮上标着“绝密”红色大字，说

明里面是截听到的通讯。他从办公桌后面走过来坐下。好象有点不耐烦，意思是，言归正传吧。

我急忙概述了所听到的消息。

凯西几乎是用嘘声说，“道听途说。”

我正准备记录，他却呵斥道，“这次谈话不得外传。”然后又说，要引用他的话，请明天再来一趟，但今天讲的只是让我了解情况，他想让我知道，贝克的指控是多么荒谬。凯西的声调和举止似乎是表示，如果我不顺从，那就要下逐客令了。我每提出一个问题，他就拿出一份文件支持他的具体立场。有一次是一份六页长的备忘录，另一次是一份五英寸厚的蓝色档案夹，那是休格尔为竞选整理的。他把这档案夹递给我，我开始翻看。这份材料可是标准的“每日电讯”，里面无非是些新闻公报、支持里根的人的名单等，完全是唬人的东西。

凯西走过来，几乎是从我手中一把抢走了这个档案夹。同时说，看到了吧，里面没有什么秘密。

我表示还想再看看，研究研究。

凯西说，不行。

我说，那么休格尔写的那份备忘录呢？

凯西说，联邦调查局从1980年竞选档案里把那份备忘录拿走了。

我问，里面写了些什么？

凯西耸耸肩，不肯说什么。

我问，确有这份备忘录吧？

他点头说，有。但不再多说什么。一阵沉默。

我又问，托尼·多兰写的备忘录呢？多兰是凯西带来帮助里根竞选的一位新闻记者，现在在白宫专门撰写讲话稿。

凯西又耸耸肩。然后拿出一份备忘录给我看，讲的是卡特的白宫如何用人不当，是多兰写的，里面提到他从某个部的一个来源打听到这些情况。

我说，给我一份副本好吗？

他说，不行。说着又抢回去了。

这会儿，凯西飞快地拿出一件又一件的档案，说都是屁话，标准的竞选消息。还说，“多兰有一份备忘录，休格尔也有一份备忘录，都讲到什么‘来源’。但我们没有搞什么情报行动，这事毫无意义。”

我问，你肯宣誓作证吗？

他说，当然，何乐而不为。

我还想问一件我们已经报道过的事情，但凯西站起来说，“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了。”然后就把那些“绝密”的档案夹装在公文包里，下楼走了。

联邦调查局和国会都从来没有认真调查这件事。参院那边，戈德华特和凯西的老朋友威廉·奎因注视着这场戏，不免感到有趣和好笑。他们是心里有数的。奎因过去当过情报人员，他感到凯西确实干了这件事，但找不到证据。凯西象任何精明的情报人员一样，按照规则行事。干间谍工作，第一条就是要保护情报来源。调虎离山，声东击西，都是常用的手法。说谎更是家常便饭，只要能保住情报来源，就是公开说谎或宣誓都是无关紧要的。而提供情报的人在紧急关头去见和他接头的情报官员一面，既可以加深相互信任，也有共同的危险。在上面说的这件案子中，那个秘密提供情报的人，也许感到心安理得，高枕无忧。他知道，如果暴露出去，就会使接头人身败名裂，而本案的接头人不是别人，也许正是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自己。

第十四章

幸好，关于马那瓜机场被炸的事，国会后来也不再追查。凯西、莫特利和克拉里奇都感到这下又得到了自由，可以继续战斗了。凯西认为，应当加紧经济战。他对莫特利和克拉里奇说，“让我们整得他们出汗。”

克拉里奇问，搞什么行动才能产生经济影响呢？凯西说，石油。于是，制订了一个袭击尼加拉瓜沿岸油库的计划，打算雇佣一批拉美人去干，由中央情报局自己指挥和协调。白宫那边，由凯西去说，他把计划送给了总统和克拉克，告诉他们这是合理的步骤。

10月11日，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快艇队载着拉美指战员，在拂晓前袭击了太平洋岸边柯林托港，摧毁了五座油库，据说尼加拉瓜大部分的油都储在里面。因为大火，柯林托港约有二万居民疏散撤离。

凯西十分高兴。这可是大喜事，不是什么越境的小行动。他立即带着侦察人员拍的照片去报告里根。白宫助手们发现他象小学生得了好分数似的，赶紧报告家长。

中央情报局里，有人询问这次行动的范围和强度。有人指出这是战争行为。克拉里奇一一作答，并说，“这正是总统的要求，他知道这个行动而且很高兴。”

三天后，这批人又去袭击波多桑地诺，它是尼加拉瓜的另一个大港。

莫特利请一些美国石油公司估计尼方这次损失如何。他们回答说，一时还算不出来。但尼方请他们去修理，他们则说，要先付一笔钱才能开始修。

凯西和克拉里奇相当高兴，尼加拉瓜人一向要好久才付钱，这下修理工作可要拖延了。

令人吃惊的是，有一家石油公司马上收到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尼方要求立即进行修理。

凯西等人更加高兴，这次袭击使尼加拉瓜受到损失了。

尼加拉瓜的一条输油管被炸坏，不能使用。同时，埃克森石油公司通知尼方说，它不能再为运输石油提供油船了。

但凯西还不满足。有一天，负责拉美事务的国家情报官员约翰·霍顿来到凯西的办公室，凯西问他，“我们还能干些什么破坏他们的经济？”

霍顿说，“能做的事不多。”他提到还有博兰修正案的限制。

凯西又找莫特利领导的工作小组，要他们想点新主意，要干点大事。莫特利为了保密起见，把工作小组的名称改变了好几次。现在叫作“部际机密小组”，核心人员是莫特利自己、克拉里奇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利弗·诺思中校。诺思说，白宫会同意的，但舒尔茨可能要反对。诺思用脏话骂了舒尔茨一通。

懂得行动技术的是克拉里奇，不是莫特利。克拉里奇提了三条主意，两条被莫特利否定了。但克拉里奇的创造性好象没有止境似的，总能不断提出新点子，尽管他这人不好对付，而且有时也不大精确。

一次，在白宫形势会议室开会，克拉里奇提出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研究1904—1905

年日俄战争时，就懂得了水雷的用处。那次战争中，一枚水雷爆炸，炸沉了俄军旗舰，俄方海军司令阵亡。克拉里奇建议采取一项不那么厉害的布雷计划。由于墨西哥等国继续用船只向尼加拉瓜供应石油，布雷的目的只是要吓唬这些国家，没有必要炸沉什么船。布雷之后，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会对进入尼加拉瓜港口的船只提高保险费，甚至取消保险，从而使去尼加拉瓜港口的船只大大减少。

莫特利说，需要做的只是在港口布放一种造成危险感的水雷。于是，工作小组制订了使用低爆炸力炸药的计划，爆炸后只会发出响声，掀起水花。为此，莫特利专门把克拉里奇请到国务院六楼办公室，向他提了20个问题。莫特利一一作了回答。

凯西又把计划送给总统和克拉克审阅，这只是例行手续。里根批准了。

舒尔茨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事后莫特利报告了他。舒尔茨说，很好。

后来发现美国军火库里的水雷全是爆炸力很强的水雷，用来炸沉船舰的。于是，中央情报局在北卡罗来纳州找到一家马丁·玛丽埃塔公司，请他们制造了一批“爆竹”式的水雷。然后租了一艘大型驳船，把这些水雷装在上面，运到目的地后用快艇和直升飞机把水雷布在水下。

白宫里面又出现新的纷争，凯西的一个重要盟友克拉克要垮台了。克拉克对白宫内部的斗争感到厌烦，要败下阵来了。他和迪弗连话都不说了。贝克和达曼则不断明里暗里地对他提出猛烈批评。他常常因为内部扯皮，弄到很晚才能回家，实在头痛。

凯西劝克拉克呆下去，他说白宫反正是有斗争的。但是10月13日，总统忽然提名克拉克为内政部长，接替因被攻击而辞职的詹姆斯·瓦特。凯西对白宫里的那些加州人没有好感，认为他们工作不认真，一到周末就想着回加州。克拉克一走，凯西在白宫的熟人就只剩下米斯了，但米斯这个人组织能力太差，他的助手多兰则地位太低。于是，凯西开始进行游说，想把柯克帕特里克大使搞去接替克拉克，当国家安全顾问。他想，他需要有个保守派朋友担任这个职务。如果贝克、迪弗、达曼这一帮安插他们的人去干，那么中央情报局就更难做成什么事了。

几天后，凯西到白宫参加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讨论中东问题。克拉克递了一张纸条给他，这种动作可是很不寻常，真好象拉开了手榴弹的保险栓，准备扔出去了。打开一看，不胜迷惑。纸条上写道，总统决定利用克拉克调离之机，改组白宫人事；贝克将任国家安全顾问，达曼将任贝克的副手，迪弗接替贝克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关于改组的新闻公报正在草拟中。

会后，凯西和克拉克、米斯及温伯格一起，去见总统。克拉克和米斯讲得最长，也最有力。温伯格和凯西从旁助阵。他们几个人都说，这样的改组等于是向苏联人发出错误的信号。贝克是个温和派，不是真正的保守派。达曼是自由派，是尼克松政府时期任过部长的理查逊的心腹。他们说，这样安排的话，没有办法和这几个人合作共事。

凯西特别讨厌看到贝克出任国家安全顾问。他对总统说，这是"无法容忍的，"说时声音都几乎颤抖了。从某些方面来说，国家安全顾问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向白宫报告的渠道。如果任命贝克担任这个职务，那么两年半来在政府内部

和全世界面前贯彻里根外交路线的努力全都要付之东流了。他提出还是用柯克帕特里克为好。

总统看到他的四员大将都威胁要辞职，只好表示暂不宣布，让他再考虑一番。

贝克看到右派团结起来反对他，心想就是这次打败了他们，这几位大将也还会掌权，真当了国家安全顾问，也得在每个问题上过保守派这一关。于是，贝克跑到总统办公室建议说，请总统还是忘掉原来的想法吧，他接替克拉克会有诸多不便。

总统求之不得，连说谢谢。下次大选快要来了，还是让贝克继续当办公厅主任吧。

凯西还在继续为柯克帕特里克游说。他跑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她的家里，见她因患重感冒正在休息。看样子，她当不成国家安全顾问了。凯西劝她，如果当不上国家安全顾问，那就到白宫当高级顾问，象米斯那样。我们这些保守派需要象你这么个人在白宫任职。如果不当心，实用主义者的人数就会超过保守派。

柯克帕特里克埋怨说，她从来没有得到良好的待遇，不能同总统直接联系。小道消息满天飞，其中一条说她连驻联合国大使都当不成了。

凯西叫她别听那些小道消息，如果要说受害的话，那么他凯西才是小道消息的头一名受害者哩。

与此同时，两派的头头克拉克和贝克达成了一项妥协，提议由克拉克的副手麦克法兰继任国家安全顾问。总统批准了这个妥协方案。

凯西感到这下机会失去了，无法再在总统身边安插个保守派的外交政策代言人了。麦克法兰比较迟钝，是个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的人，不敢兴风作浪。他的经历表明，他只是个办事人员出身，在海军陆战队当过中校，升不上去了，于是到基辛格手下当军事助理，干了两年，还在参院军委会当过两年的工作人员。他上台会加强贝克的地位，而贝克又喜欢制订适合国会胃口的外交政策。

10月17日，里根宣布任命麦克法兰为国家安全顾问，随即又花了一个小时，去对柯克帕特里克做安抚工作。柯克帕特里克不久就宣布，她仍将继续任驻联合国大使。

头一天，又有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黎巴嫩被枪击身亡，这已是第六名了。记者问里根，为什么有1200人的海军陆战队还要留在贝鲁特。

里根大声回答说，“因为我认为那样做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安全十分重要。”

10月23日，星期日，贝鲁特时间清晨6点22分，一辆黄色“奔驰”大卡车开进黎巴嫩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营地，引爆了相当于12000磅的烈性炸药，炸死美国士兵241人。

一年多前，1982年7月23日，有人估计在黎巴嫩的维持和平部队将遇到“难对付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凯西了解到，自上次美国大使馆挨炸以来的六个月中，情报部门提出了约100次关于对方可能用汽车冲进来进行爆炸的警告。更糟糕的是，大使馆挨炸后，凯西派了一些中央情报局的人去贝鲁特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一直追查到叙利亚情报机关。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对嫌疑犯使用电休克设备，以迫使他们赶快交代，结果死了一名嫌疑犯。局领导只好把那个官员开除，调查毫无结果。

这么多美国军人死亡，对政府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上和情

绪上的打击。凯西要求以色列情报局和军情局进行调查。以方的40号秘密部门——专门协调反恐怖主义情报的机构——集中精力对这个案件进行调查。

几年来，以色列情报部门一直很注意在叙利亚内部发展情报人员。这种工作非常微妙和危险，要使用假面具来操纵和欺骗别人：以色列情报局的人假扮成黎巴嫩、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的商人，有时甚至扮作东欧和苏联人。这些情报人员花钱如水，以获取情报。因为涉及以色列自己的存亡问题，所以尽管投入精力和钱财很多，也认为值得，有时得到的情报相当有价值。

不久，以色列就把搞到的情报告诉了中央情报局，他们追查到贝鲁特爆炸案的主谋是伊朗和叙利亚。情报中包括以下两项：

- 伊朗驻叙利亚使馆——常常被人称为“伊朗驻外神经中枢”曾付5万美元给一个神秘的黎巴嫩使者。
- 据信，有一个叙利亚情报部门的中校参与策划这次袭击，还在大马士革的苏联—巴勒斯坦友好协会发现一个身穿褐色长袍、头戴黑色头巾的老头，三天前在那里和人讨论袭击之事。这个人是激烈分子组织的重要成员。

以色列情报部门共发现有13个人与美国海军陆战队挨炸事有牵连，而且与同一天法国驻贝鲁特的军队总部挨炸有关，后一事件中死亡士兵58人。

凯西对这些证据很感兴趣，但行动处的专家们认为不能肯定，难以作为结论的根据。里根曾同意进行报复，派飞机轰炸贝卡谷地恐怖分子的基地。但最后一分钟他又退缩了，说还是让法国和以色列去干吧。

莫特利主管美国和拉美30多个国家的关系。近10天来，他一直花不少时间注视加勒比海中的小岛格林纳达的形势。这个岛面积不过133平方英里，人口11万人，但世界上每年三分之一的豆蔻消费量是这个小岛生产的。格林纳达的领导人莫里斯·毕晓普是一个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修建一条9000英尺长的喷气机跑道，由古巴给予协助，允许苏联使用这条跑道。里根总统对此感到是个小小的麻烦。

里根公开谴责"苏古使格林纳达军事化"，并发表了保密的侦察照片，从上面可以看到正在修建中的跑道和一座古巴兵营。里根政府担忧在加勒比地区出现一个红色三角：古巴在东，尼加拉瓜在西，格林纳达在离南美大陆90英里处的东面。

不久，一股与古巴关系更密切的极端分子发动了政变。10月19日，毕晓普被处决。新左派宣布了24小时戒严令，整个国家的人几乎无法出户。莫特利赶紧召集国务院危机小组开会，主要担忧的是住在格林纳达的1000名美国公民，大部分是学生。国务院找不到有谁是格林纳达现政府的代表。莫特利主动找英国和加拿大联系，讨论撤出三国侨民的问题。中央情报局一点情报也搞不到。

门杰斯花了好几个月才脱离中央情报局，两周前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拉美科。他深感失望。他来时还是克拉克任国家安全顾问，感到克拉克无非是总统的应声虫；现在又来了个麦克法兰，他认为麦克法兰只是国务院那批妥协主义者的代理人。门杰斯感到，麦克法兰不是里根的亲信，也缺少当真正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勇气和魄力。门杰斯刚上班，便抓紧注意格林纳达危机。他起草了一个保护美国侨民的计划，麦克法兰看了后有些怀疑，但同意考虑一下。

门杰斯把他的计划讲给国防部的一些强硬派朋友听。一位朋友劝他小心点，麦克法兰可能以此为借口把他撤职。门杰斯又去告诉诺思中校，诺思也疑虑颇多，认为国务院还是主张谈判。门杰斯还把他的计划讲给凯西听，局长只是说，听起来有点意思。

门杰斯深信，苏联很想利用格林纳达，它有深水港，加上新建的跑道，携带核导弹的苏联潜艇和飞机可以利用这个岛屿作为停泊地。

麦克法兰同意召开"危机预先计划小组"会议，来讨论格林纳达问题。这种小组会议是政府里处理危机的最机密会议。当晚6点30分，门杰斯在保密电话上同凯西讲话，因为凯西不久又要出国访问。门杰斯本想把麦克法兰同意召开会议之事告诉凯西，但一想麦克法兰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没有向凯西提起开会之事。

第二天早上，10月20日，麦克法兰的副手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召开小组会议，参加者有莫特利、门杰斯、诺思、克拉里奇和国防部的主管官员。为了尽量避免受注意，会议在行政大楼208号房间举行，那里是最现代化的行动指挥中心，装有先进电脑、视听设备和保密的通讯系统。

情报表明，古巴运输船"英雄的越南"正停在格林纳达的港口里。门杰斯说，卡斯特罗的军队差不多有30万人，可以在短时间内空运几千人到格林纳达来。他建议采取"打进去再出来"的救援办法。他说，利用这个机会，可以乘此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主义，恢复民主制度。他还说，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共产党人就会得到一个核武器基地。

下午6点，布什副总统召开特别形势小组会议，这种会议是里根政府里处理危机的最高级会议。

有人提出伊朗的先例，害怕格林纳达新的左派政府把美国人抓起来作为人质。还讨论了“强行夺出侨民”和“外科手术式袭击”等方案。

麦克法兰想搞一条21艘军舰组成的小舰队，包括“独立号”航空母舰，在开赴黎巴嫩途中顺道驶经加勒比海，以备万一之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老总们不干，说要有总统的命令才行。麦克法兰说，这真荒唐，要求小舰队走某一方向还得要总统下令！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维西上将插进来了，他说，得要总统下令。

麦克法兰只好起草命令，请总统签署。海军小舰队奉令启程，驶向加勒比海。

维西将军起初反对采取军事行动，但后来明显看出，很可能要分几处把美国侨民救出来，于是这位老总说，那就有必要干脆把整个岛拿下来。门杰斯拉拢了达曼支持，提出全面恢复民主制度的主张。他还希望软化贝克。门杰斯在中央情报局呆过两年，能够一口气说出一串理由，丝毫不差。他说，70年代时，古巴的侵略没有受到阻止，卡斯特罗派遣成千上万的军队去非洲——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自1979年尼加拉瓜发生革命后，拉美显然成为新的目标，成千上万的古巴顾问到达那里，支持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此岛很小，行动好控制。

凯西和舒尔茨也看到机会很好。格林纳达既然没有政府，那就有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引用美国与加勒比其他小岛国之间的共同安全协定为依据。

凯西喊道，“嗨，管他的，把这些王八蛋干掉。”

舒尔茨起初倾向于比较温和的步骤，但赞成作好准备，以便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其他的高级顾问和内阁阁员平日

往往意见分歧，这次都全部同意了。

但政府还需要更扎实的理由，更站得住脚的合法依据。9000英尺的跑道，1000名美国侨民的安全，不存在合法政府，等等，都还不足以构成全面入侵的充分理由。总统的顾问们不想说，政府刚才这个决定违反了国际公法。

第二天就找到了解决办法。这天是10月21日，星期五。多米尼加总理尤金妮娅·查尔斯是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这天在巴巴多斯开会，美国传话给他们说，如果他们提出请求，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决定提出这个请求，措词是请求美国协助恢复格林纳达的秩序和民主。口头的请求传给了白宫，后者又要求对方发表一个正式的书面请求。

查尔斯年已64岁，是位热情的亲美领导人。莫特利认为，和她相比之下，英国首相撒切尔只不过象一头小猫。门杰斯则认为，她好比是加勒比的柯克帕特里克。1982年，美国开始向多米尼加提供资金，在那里修建一条30英里长的公路，价值1000万美元。

中央情报局的记录表明，有一次曾送给查尔斯的政府10万美元，作为秘密支援行动之用。查尔斯坚决否认得到过这笔钱，她说她请求美国干预，完全是根据自己和其他岛国领导人的判断提出的。

当天晚上，门杰斯和诺思花了三个小时起草一份“国家安全决定指示”，以便总统下令入侵。指示草稿送到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城，请里根、舒尔茨和麦克法兰审阅。他们正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度周末。里根看后没有签字。

门杰斯催促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如何对付苏联的反应。他说，苏联可能鼓励利比亚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也可能在柏

林或朝鲜采取行动。他用保密电话告诉莫特利，这次入侵可能阻止苏里南更接近古巴。

10月22日，星期六，上午9点，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布什.波因德克斯特、麦克马洪、莫特利、门杰斯和诺思在208号房间开会。佐治亚州那边，总统、舒尔茨和麦克法兰用保密扩音电话线联接，也参加进来了。到11点30分，达成完全一致意见。

10月23日，即驻贝鲁特的美海军陆战队挨炸那天，查尔斯总理领导下的组织送来请求美国干预的八点书面文件。美国军人在贝鲁特的死亡，对里根个人也是个打击，因为他是三军总司令。自从越南停战后，美国还没有损失过这么多军人。他感到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共产党在格林纳达，都是邪恶力量在行动啊。当天，他签署了入侵格林纳达的命令。

凯西手下有个办案的女情报官员，几星期前她曾奉派化装到格林纳达进行观察。入侵前，又派她去第二次收集情报。自1965年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以来，这是美国近年来第一次在拉美发动大规模军事干涉。美国海陆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四个兵种全都出动了。

次日，查尔斯总理乘美国政府专机秘密飞抵华盛顿。

诺思担心贝鲁特的爆炸事件会吸引各方面的注意，使入侵格林纳达之事取消。他整夜都睡在办公室里。

10月25日，美军和请求干预的那几个国家的几百名象征性士兵开始行动，强行登陆。他们遇到顽强的抵抗，而所带的地图却不行，比汽车加油站买的那种地图好不了多少。收集到的情报并没有讲到要警惕防空武器，结果三架美国直升飞机被击落。总计，美军死19人，伤115人。

当天早晨7点30分，白宫总统办公室的壁炉升火供暖，这么早就升火可是不寻常的。里根、舒尔茨、麦克法兰和门

杰斯在这里会见查尔斯总理，约一个半小时，边谈边喝果子汁和咖啡。总统请她一起出席稍晚一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她同意了。门杰斯陪她到白宫餐厅，对她解释说，美国新闻界凶神恶煞，爱提反面意见，很难对付。因此，他帮助她事先准备好答复口径，以便应付那些喜好怀疑的人。

到最后一分钟时，国务院把总统讲话里“恢复民主制度”一词删掉，这本来是作为入侵理由之一的。但门杰斯反对，他说删掉这几个字后，会使人认为美国政府希望右派政府在格林纳达上台。于是，又把这个词语恢复了。

上午9点7分，总统在新闻发布室出现，宣布入侵。他说，“今天清晨，加勒比六个民主国家和美国的军队开始了登陆行动”搞这个行动的头一个原因是因为“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的五个国家提出紧急和正式的请求。”然后，里根向大家介绍查尔斯总理，她站在里根旁边说，“这不是入侵，而是为了防止马克思主义蔓延到所有的岛国。”

10月27日，凯西请我到他家去吃晚饭。他住在华盛顿西北区福克斯霍尔路，一所新造的咖啡色砖房。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年青警卫员给我开门，局长很快就来到门厅迎接我。他引我穿过三间摆设得很漂亮的客厅，来到第四个房间，象是个小书房。从房间的陈设可以看出他的富有和高雅。沙发和椅子上罩着精致的套子，地上铺着厚实讲究的东方地毯，到处摆着东方艺术品。他倒了两杯威士忌酒加苏打。我们坐在靠墙的一对椅子上，边喝酒，边开始谈话。

寒暄过后，他说在里根上台之前，俄国人已经拿走了七、八个国家；格林纳达才是第二次大战后俄国人唯一的失败，当然，1973年阿连德在智利被赶下台除外。他忘了提埃及。

他说，我们在格林纳达第一次走进去看到共产主义国家内部是怎样的，也是第一个把共产党政权赶跑的国家。尽管现在还在我们进去的初期阶段，却已经看到情况比我们想的还要坏。可是军方的先进设备比我们想象的多。机密文件都存放在埋设有饵雷的地方，要拿到文件得先把地雷的引爆栓去掉。我们拿到了大量文件，等弄回来看了便可知道不少情况。

他说，我们原来认为岛上约有600名古巴人，古巴自己说有700人，但现在我们从入侵部队的报告得知，可能有1000人之多。这些古巴人都是工兵，但他们也是战斗员。他们的床头都挂着AK-47式自动步枪。还发现了恐怖分子的通讯设备。

凯西说，岛上有一个古巴办的训练学校。苏联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出来三位苏联外交官，他们说连同家属他们使馆里共有49个俄国人。北朝鲜有20个外交官，包括一位高级官员。还有一些东德人。现在他们全都到了苏联大使馆里面。这么多苏联集团的人在那里是很典型的，凡是苏联想建立代理人政权的国家都是这样。岛上还有一些克格勃间谍。

他说，苏联象1979年在阿富汗干过的一样，不喜欢他们的傀儡时，就把他暗杀掉，另换别人上台。莫里斯·毕晓普就是被苏联派来的暗杀队干掉的。

我们上楼吃饭，桌子上放着三付餐具。一位穿着讲究的妇女走了进来，她看上去约30多岁。

凯西介绍说，“这是我女儿伯纳德特。”伯纳德特长得相当迷人。她是纽约市电视商业广告的女演员，非常洋气，头发很美，化装入时。

凯西解释说，他的妻子索菲娅在佛罗里达州别墅监督修理房屋，因为几个孩子破门进入汽车库，放了一把火。

伯纳德特烧的菜，主菜是煎羊排。饭菜简单，并不出

奇，和其他美食[illegible]

[illegible]，他吃起东西来[illegible]，特别喜欢那块羊排。我几次偷眼观视伯纳德特，发现她也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但当我们视时，她却转过头去，眼睛望着别处，[illegible]我认为我不该如此冒犯。

凯西继续说，格林纳达真是难得的一次好机会，使事态转而对我们有利。[illegible]的领导人都很年青，除了代表他们自己以外，根本不代表任何人。

凯西说，中央情报局派了五个人去格林纳达，询问那些古巴人，已经知道古巴原来打算和我们在那里打下去的，他们准备[illegible]在格林纳达。也许需要半年才能建立起[illegible]政府。

伯纳德特没有插话。凯西又说，你得从整个加勒比的角度来看格林纳达。苏联每年花40亿美元在这个地区，30亿给古巴，10亿给别的地方。对苏联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了。他们有6000到7000人的军队在古巴。因此古巴将能为派相等数目的人去尼加拉瓜。现在我们知道，在格林纳达的古巴人比我们预料的更多。因此，苏联和古巴卷入尼加拉瓜的程度也比过去我们低估了。苏联和古巴在拉美约有12000人，分布各地。与此形成对照，美国在萨尔瓦多只花四亿美元，约有100名顾问。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必须纠正。

他说，我们入侵格林纳达，也是对苏联和古巴发出信号：那就是我们也可能在尼加拉瓜进行打击。同时，苏联也会很小心谨慎。他们在拉美的意图只是牵制我们，让我们把注意力从真正的战场中东转移过来。中东战略地位重要，还有大片油田，那里是心腹之患。

吃完晚餐，伯纳德特收拾桌子，端来咖啡。凯西起身，建议我们去收看电视里总统的讲话，马上就要开始了。

里根首先提到南朝鲜民航机被苏联击落之事，他说这是"野蛮的屠杀"。然后，总统说美军进行了一次"英勇的战斗"，他说在格林纳达发现古巴军人和武器，证明该岛已成为"苏联和古巴的殖民地"，准备从这里"输出恐怖和破坏民主政体"。他说，黎巴嫩和格林纳达的事件是密切相联的，莫斯科帮助这两国的暴力行动，并通过代理人和恐怖分子提供直接支援。

接着，总统生动地描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利亲自去贝鲁特医院探望受伤陆战队员的情景，说他们如何英勇和忠诚，连素来以铁石心肠闻名的凯利司令也感动得禁不住泪下。最后，里根号召国人信守美国的理想，热爱祖国，不怕牺牲，信仰上帝，祈求我主保佑，自由必胜。讲话共27分钟，相当动人，某些地方激动人心。

凯西问我："你知道谁写的讲话稿吗？"

我说…… 他纠正说："你们不对，是里根自己写的，他最大的技巧就是用讲话稿。"

就在这之前，国防部公开宣布说，约有1100名古巴人在格林纳达，只有600人被俘，还有500人在山里。凯西要求赶紧彻底调查估算在山里的古巴人有多少。总统不是说，格林纳达已变成准备输出恐怖的堡垒要塞了吗？10月30日星期日清早，各有关部门的分析人员去国防部，到傍晚时分他们完成了一份秘密评估报告，长约10页，立即付印散发。凯西星期一早上收到一份。这份报告完全否定了总统、凯西和国防部公开宣布的情况。报告说，山里没有古巴

人，他们全都被6000美军杀死或俘虏了。早先的估计数字过高，因为一来是根据第一批古巴俘虏的口供，二来是美军没有经验，夸大了敌军力量。其次，报告说格林纳达储存的武器和军火，只是供军队和民兵使用的，既不打算也不够用于推翻邻近几个岛国的政府。第三，古巴营建工人不是伪装的战斗部队，只拥有一些供训练使用的武器。

凯西说这份报告“缺乏想象力”。反正是内部参阅，从未公布。

政府里面，一些保守派官员大发雷霆。凯西的助手赫布·迈耶说，“我认为这是份臭报告。”门杰斯建议不要释放古巴俘虏，要让他们吃点苦头。但莫特利说，我们已经赢了，何必呢。结果，古巴人都被释放了。

多米尼加的查尔斯总理打电话给莫特利，提出一些要求，莫特利用笔记了下来。后来，美国给多米尼加的援助增加了：700万美元用于教育，15万美元用于渡河设施。

凯西深信有必要在加勒比地区加强宣传活动。他于是提出绝密报告，建议拨款700万美元购置无线电广播发射机、扩音机等，供中央情报局使用。里根很赞成，马上予以批准。

但格林纳达的政治前途仍不稳定。岛上唯一的政治组织是毕晓普的左派“新宝石运动”的残余。凯西和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认定，用武力夺得的东西，决不能在选举中失掉。因此，根据另一项经总统批准的报告，从中央情报局的政治行动基金里拨款675000美元，用来资助即将举行的格林纳达的选举。中央情报局甚至进行民意测验和分析，以保证亲美的强硬领袖上台。入侵后13个月，美国支持的政界老前辈赫伯德·布莱兹取得压倒胜利，组成联合政府。他上台当总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美国保留250名军人在这个岛上。

第十五章

苏联袭击南朝鲜民航机（269人死亡），美国驻贝鲁特的海军陆战队兵营挨炸（241个美国人死亡），以及美国等入侵格林纳达（19个美国士兵死亡），帮助造成了一种有利的气氛，使凯西得以最后推动国会批准拨款2400万美元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行动。众院要求停止这个行动，但参院赞成拨款，两院会商结果，仍决定拨款，但规定一年内不得再请求追加。1983年12月9日，里根签署了国会的拨款授权决议，使之成为法律。凯西得胜了。

凯西从就职之初起，就强调要加强渗透工作。他要求多发展一些提供情报给美国的间谍，越多越好。有时，下面报告说，有位年青的政治领导人或聪明能干的部长有培养前途，值得发展，凯西就会在空处批示："我们能发展他吗？"然后签上一个"凯"字。发展间谍可要花大钱，冒风险，费时间。麦克马洪和行动处曾提醒他，"花的时间太长，不实惠。"他们说，苏联培养和安插他们的间谍，据说不惜花几十年的功夫。但凯西的探索和耐心取得了成果。

12月初，苏丹总统尼迈里访问华盛顿，和利比亚反对派领袖穆罕默德·尤索夫·马加里夫博士举行秘密会见。马加里夫过去当过卡扎菲的审计长，1979年逃亡到埃及，攻击卡扎菲是一个腐败的暴君，任意挥霍利比亚的石油收入。马加里夫成立了"拯救利比亚全国阵线"，决定暗杀卡扎菲，推翻

他的政府。

1983年12月5日，行动处印发了一份从秘密来源得悉的报告，完完全全地叙述了尼迈里和马加里夫会晤的情况，并表明卡扎菲今后还要制造更多的麻烦。报告中说，提供情况的人是一位苏丹高级官员。这个人也许是拿中央情报局津贴的，也许是志愿提供的。尼迈里本人是否知道，还不清楚。

尼迈里看不起卡扎菲是众所周知的。他是否支持反卡扎菲的流亡反对派，则许多人都怀疑。但是据这份秘密报告说，尼迈里在会见中保证“增加援助，包括训练设施、武器、弹药，并提供旅行方便，包括发给苏丹护照、其他文件等。”这种重要的掩护，正是反卡扎菲的力量在利比亚进行活动所需要的。

报告中说，“尼迈里对马加里夫博士说，博士有权从苏丹对利比亚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尼迈里还说，流亡运动应通过苏丹安全局（情报机构）继续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去找尼迈里。

马加里夫说，“他认为只有苏丹和美国是他的朋友。”他还说，再训练一个时期，他就将对利比亚发动行动，使朋友们对他的运动更信任。另一方面，利比亚已派人打进了摩洛哥的安全部门，因此马加里夫不能访问摩洛哥，也不能在摩洛哥活动。

在利比亚内部搞戏剧性的反卡扎菲军事行动，这种可能性使凯西很感兴趣。这可以表明马加里夫和他的阵线有点力量。凯西得看到这事搞成，才可能指望总统批准支持反卡扎菲的运动。

同时，凯西继续加强对卡扎菲和利比亚收集情报。中央情报局派人跟踪卡扎菲，拍照片，破译他的外交密码通讯，

窃听他的电话和谈话。由于美国在的黎波里没有大使馆，这一切都很困难。但凯西坚持要干，经常询问，“卡扎菲这个星期在干什么？”

凯西心里盘算的头等大事是在苏联内部发展间谍。三年前，凯西当局长前夕，比尔·科尔比就极力劝他这样做，另外一些人也一再强调有此必要。凯西自己是很想干的，这才是要夺取的真正战利品。中国和苏联都是“硬目标”，但苏联更硬，更不容易打进去。苏联社会一点个人自由都没有，情报人员到那里工作和找关系都非常困难。什么事情都会受到怀疑：打电话肯定会被窃听，会晤人会被盯梢，旅行会受到监视，没有一幢房子是真正安全的，甚至美国大使馆里面也不安全。

凯西知道收集苏联情报有局限性。搞到更多的情报是可能的，但仍然不能回答大问题，例如苏联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所以，并不只是个收集情报的问题。主管研究分析的盖茨和另外一些人对凯西说，苏联要弄清楚美国的意图也很困难。现在可能有一个克格勃的分析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没有预测到1976年会有一个种花生的农民（指卡特——译注）竟击败了在职总统（指福特——译注）。还可能有另一个克格勃分析员也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没有预测到那个农民后来又被一个好莱坞演员（指里根——译注）赶下台，从而引向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军备扩张。

改进发展间谍的工作在70年代就打下了基础。那时为情报人员的晋升规定了某些条件，一个条件是行动官员必须至少发展一名间谍，行话叫作“在墙上贴皮”。但是，怎样才算是贴上了“皮”常有争论，因为在国外发展间谍往往要靠运气。一个行动处的官员，以某种伪装身份呆在某驻外使

馆，可能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在驻在国培养到一位官员或军官。但业务技术的特殊需要，为了掩护自己的伪装，一般不能由这个行动官员去向这个对象最后摊牌。这样，他就得把这个对象介绍给他的“朋友”，即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如果对象拒绝充当间谍，那么原来和他接头的行动官员就可以否认此事与自己有关。如果对象同意当间谍，那么得到这张“皮”的就是出力最少的那第二个情报人员。

凯西感到从前特纳当局长时，对发展间谍这事注意得太少了。行动处似乎普遍感到，特纳承认在苏联发展间谍有许多障碍。凯西却强调多想办法解决困难。例如，现在苏联人出国旅行的增多了，因而可以在苏联以外的地方认识他们，进行联系。凯西有把握，知道苏联人讨厌他们的政府和制度。他认为，如果许诺某人到美国来工作，对方一定会认为是莫大的恩惠。

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国内有一个绝密的间谍，名叫A·G·托卡契夫，是在里根政府上台之前发展的。托卡契夫是莫斯科航空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通过一个非常高超的办法和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的一位行动官员保持联系，定期把重要机密送过来。

还有一种间谍是不招而来的。凯西对此疑志很大，中央情报局得非常小心，搞清楚他们不是对方派来的“钉子”或双重间谍。但他又认为，重要的是让人知道，每个单位的大门都是开着的，因而总是有机可乘的。“不招而来”有其优越之处：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和对方言归正传，认真谈起交易来，而不必花多年的时间进行培养和试探。尽管许多“不招而来”的对象结果没有什么用处，或甚至是双重间谍，凯西还是认为，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官员愿意帮助西方乃是世界上

最自然的事。

凯西努力推动发展间谍的事，多次向行动处的苏联科提出这个问题。他明确说，他愿意冒险。他说，是的，会犯错误的，他准备着出差错，他准备着某些苏联人会感到被冒犯了。他问，“那又怎样？”“只能证明我们工作积极。”如果没有任何错误，那说明我们努力不够。每条线索都得跟踪下去。于是，苏联科的人们仔细查阅材料和档案，任何暗示、线索、启发或隐语都不忽略，认真研究谁有可能上钩。对方是美国的主要敌人，要做长期深入的工作。凯西要求干好这任务，雄心勃勃地去干。

中央情报局加强了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后者负责美国国内的反间谍工作。中央情报局根据苏联人在国外时的表现，编制了一份可能发展为间谍的对象的名单。如果这些苏联人——克格勃人员也好，外交官也好，其他人也好——后来被派到美国任职，也许在商务处，也许在大使馆，中央情报局就把他们的姓名和档案材料副本送给联邦调查局。另一方面，联邦调查局则把曾在美国工作过但现已调往其他国家的苏联人的姓名和材料送给中央情报局，由后者的驻外分站进行跟踪。中央情报局认为，联邦调查局从这种交流中得到的好处最大，因为美国国内的物质和心理条件对发展间谍最为有利。联邦调查局根据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线索，发展了一些具有潜在重要性的间谍。

里根政府的头几年中，凯西在铁幕那边找到了可利用的机会，特别是在东欧国家。对波兰花了很多精力，但其他东欧国家的官员出国旅行的更多。东西方之间的来往日益增多，可以更容易地不花钱进行探索，看谁可以被收买或争取过来。

三年后，凯西在苏联和东欧集团内部已经有25个以上定期送情报来的间谍了，他们几乎全是在他当局长后发展的。这些间谍分布在军队、克格勃和东欧的情报部门，以及科学界和其他行业。

凯西对这些间谍中的某个人特别感到骄傲。那些能看到绝密情报的美国官员知道这个间谍的地位后，也都点头称是，十分赞赏。

凯西承认，中央情报局的任何一个间谍都不及苏联上校奥利格·潘考夫斯基。他是60年代初期的传奇式人物，原是苏联军事情报官员，在16个月的时间里，给中央情报局送了几千页的文件，后来被捕并处决。在1962年导弹危机中，他提供的材料对识别苏联在古巴的武器起了关键作用。

白宫方面对凯西打入苏联内部的成绩并不认为很重要，特别是先后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艾伦、克拉克和现在的麦克法兰，他们总是抱怨没有拿到直接从政治局传出来的情报。白宫想要的是对总统有用的政治情报，而凯西在这方面没有提供多少东西。部分来说，一个总统的领导才能如何，要看他对付俄国人的本领，如果他能胜过苏联人，那就好了。其次，总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白宫要搞点材料帮助他完成这方面的任务。如果能搞到一些内部机密以便美国采取行动对付苏联，那会得到很大好处。

但凯西认为他在早期预警和军事情报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情报，这对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来说是有用的。这些情报大部分是通过技术手段得到的，例如用卫星或截获电报得知军队在边境移动的情况。凯西在白宫炫耀他的成就，自负地说在里根政府时期，苏联并没有干出什么使他们意料不到而大吃一惊的事，只有击落南朝鲜民航班机的事除外，但那是一

个错误，并不是预谋。

世界上这些最动荡的地区，如中东、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政治最不稳定的地区。由于领导人心怀恐惧，因此有条件去做这项工作。在这些地区的政府往往需要别国帮助他们建立保护设施的国家，美国有条件为他们提供这种保护，而美国政府有关的部门中央情报局秘密帮助各国领导人。对外国提供情报援助和安全援助，都称为秘密行动，因为需要具体的情报分站的站长对外国的情报部门进行联络，已经超出收集情报的范围而成为“秘密行动”。

近年来，在向外国提供安全援助和情报训练计划方面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秘密行动。这种行动的目的不是要改变现政府，而是要维护现政府。这种特殊的秘密行动耗费约30万到100万美元。中央情报局会为此派出一个小组，往往只有三、四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特别国际活动科的主持下，以及技术服务处和后勤处的协助下，派去的小组实施训练计划和移交设备。接受训练的是外国领导人的私人警卫部队或精选的情报人员或地方警察。美方提供的设备包括最好的自动武器和手枪，高技术的夜间视力设备，对讲机，最先进的通讯设备，往往配有发密码的能力，一直到X光机、金属探测器，保护美国总统用的某些设备如轻质防弹背心，保护建筑物或住所周围的先进技术，监视恐怖分子和保证与情报部门和警察联络的先进技术，也都转让了。

得到这种秘密援助的一个国家是摩洛哥，多年来中央情报局对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提供技术援助、训练和联络设

备。美国和这位国王的关系开始于二次大战时期，那时国王才13岁，还是王储，美国军官弗农·沃尔特斯① 同王储结识后，建立了长期的友谊。1972至1976年间，沃尔特斯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多年来，中央情报局的援助对维持哈桑二世的统治是有帮助的。他在位22年，比任何非洲国家元首的在职时间都更长。哈桑为了报答美国，允许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几乎是自由自在地代管他的国家。美国在摩洛哥建立了大规模敏感的情报工作，使用十分先进的美国技术。美国之所以特别重视摩洛哥，是因为它处在直布罗陀海峡旁边，控制着地中海的西面入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但是，除了友好外，情报和安全援助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机会和怀疑；一要抓住机会，二要心存怀疑，好的情报工作必须具备这两条。朋友可以一夜之间就变成敌人。而且，友谊总是分为各种程度的。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断变化。哈桑国王可能在大部分问题上和美国一致，但总有不可避免的分歧。

在黑手党秘密帮会里，祖师爷总是教导徒子徒孙说，要团结朋友，但更要团结敌人。在情报机关里，由于朋友和敌人变幻不定，领导定下的信条是团结一切国家。

中央情报局派到外国的小组一旦应邀参加外国领导人的活动，到他们的办公室和皇宫里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日程、例行公事、真正有影响和真正了解情况的人的身份特征、领导人及其家属和顾问的怪癖和小毛病，等等。同时，也就有机会安装窃听设备，偷听电话，出入办公室和住宅。政府发给安全部门和情报部

---

① 弗农·沃尔特斯现任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译者

门的设备，其型号、性能、具体用途、频率以及密码等，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都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好处也许是有机会发展间谍。中央情报局派去的小组在东道国一住就是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他们住在重要安全情报官员的后院，能够接触工作人员、警卫和无线电机要员等。为了保护领导人，提高技术，掌握设备，分担风险，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小组人员得参加训练、讨论、会议、午餐、晚宴，等等。收获是得到了更多的外国情报，发展了更多的间谍，有的是拿高额津贴的正式间谍，有的只是熟人，愿今后保持联系，有特殊需要时可以找他们。

有些人将来特别有用处，于是定期发给他们津贴，有的是作为有影响的间谍，有些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平日不用他们，有特殊需要时才交任务给他们。这些人往往不会感到他们已是被发展的间谍，因为中央情报局的人来到他们的国家，是应他们领导人的邀请，所以他们和中央情报局发生关系是“官方”批准的。另外有些人则在不知不觉中帮了中央情报局的忙。

结果，在许多重要的友好国家，实现了有效的和多方面的渗透，发展了若干间谍，安装了一些电子窃听器。中央情报局有些人认为这种作法太危险，因为原本是去帮助外国领导人，结果却变成了主要是收集情报。在有些地方，这种行动使中央情报局在东道国得到了一头高级的“特洛伊木马”。但凯西认为，送上门来的好处不要，那才是犯罪哩。有好几次，他把这种行动称为“责任”和“工作”。他说，美国四面受敌，危机重重，在国外搞间谍工作，不能讲什么标准、规则、法律。他说，只有一条规则，那就是不要给人家抓住，如果抓住了，也不能承认。

中。看来，中央情报局在印度的一个间谍被抓住了，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勃然大怒，但后来美印两国经过磋商，决定对此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中央情报局有些人批评说，局方对此事的危险估计太不够，但凯西反对的正是防御有余，进攻不足，谨慎有余，大胆不足。

向外国领导人提供安全和情报援助还提高了中央情报局驻外分站站长的地位，扩大了他们的职权。这本来也是凯西的既定目标之一。分站站长手里都有一张清单，上列中央情报局可以提供的安全和情报援助项目，站长可以拿着这份清单，请外国领导人任意挑选他所需要的项目。后来，中央情报局派到外国去提供援助的小组数目大增，连凯西也说不清楚具体有多少。有些外国领导人对中央情报局派去的这种小组简直到了依赖的程度，拼命乞求美方多提供点最新式保安设备，来维持他的权力。由于小组的行动搞得成功，分站站长就可以坐在美国大使馆里，神气活现，权力大增。特别是有些地方，小组竟搞到了从总统府或皇宫里传来的重要政治情报。这正是美国政府、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和白宫所十分需要的东西。

因此，向外国提供安全和情报援助是有成效的。凯西共向12个国家提供了这种援助，其中包括下列七国领导人：

- 乍得总统侯赛因·哈布雷。里根政府上台初期，中央情报局向乍得提供了秘密援助，目的是要利用他“把卡扎菲的鼻子打出血”。1982年，哈布雷因美国的帮助而当了总统。美国为了打击卡扎菲，仍希望乍得的领导人是对美国友好的。
- 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巴基斯坦地理环境不利，四面全是不友好的国家：西面是伊朗，北面是苏联控制下的阿富汗，东

面和南面是宿敌印度。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齐亚允许中央情报局通过巴基斯坦运军火等援助物资给阿富汗的抵抗力量。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希望齐亚继续掌权，也需要知道他的政府内部情况。中央情报局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分站规模很大。

- 利比里亚领导人塞缪尔·K·多伊。他的私人警卫队副队长摩西·弗兰扎马顿被中央情报局发展为间谍，后来竟率领一帮人用机枪袭击多伊乘坐的吉普车，企图夺取政权。多伊未受伤，弗兰扎马顿则被捕，承认与中央情报局有关系，并捏造说他搞这次暗杀行动是中央情报局主使的。当时，中央情报局十分紧张，深恐被指控而牵连这桩谋杀案。弗兰扎马顿参加中央情报局，显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被捕后一周即被处决，对中央情报局的指控也就无声无息了。
-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他是美国的重要朋友，允许美国在菲保留海空军基地。而且马科斯正在对付共产党的叛乱。
- 苏丹总统尼迈里。他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是在非洲遏制卡扎非的又一支力量。
- 黎巴嫩总统阿明·杰马耶勒。中央情报局要尽力保护他，免得他被推翻或者象他弟弟巴希尔·杰马耶勒一样被暗杀。
- 萨尔瓦多总统杜阿尔特。美国已经花了很大气力去拦截运给萨尔瓦多左派反政府武装的武器，防止左派夺取政权，因此必须让杜阿尔特好好活着，继续掌权。

凯西知道，他得不断主张继续保持这些秘密行动和关系，即使好处不大，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这是一种使中央情报局能够插手外国事务的办法，而凯西认为中央情报局应当在世界各国都插上一手。为防止出现过头的事，凯西亲自进行控制。70年代发生贿赂外国领导人的几起丑闻后，国会规定美国企业在国外进行贿赂是非法的。但是，中

央情报局贿赂外国领导人和外国情报机关却是合法的。凯西每年要去巴基斯坦一两次，会晤齐亚·哈克总统，不久就和齐亚混得很熟。因此，每当齐亚要美援时，他就去找凯西。

另外，美国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的驻军和军事演习实际上也是一种秘密行动。例如，前几年国防部在洪都拉斯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完全是搞炮舰外交，用以吓唬毗邻的尼加拉瓜。演习完毕后，武器、基地、飞机场都留下了。这种秘密行动实际上也是为了援助现政府，因此有关具体情况都正式通报国会情报委员会。

向外国提供安全和情报援助，有好处也有坏处。一个例子就是过去向埃及总统萨达特提供的援助。萨达特是1970年上台的，两年后他就把俄国人赶出埃及。不久，中央情报局就向萨达特提供了规模很大的警卫和情报援助。第一，美国希望萨达特好好活着。第二，美国希望得到关于萨达特和埃及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情报。得到的大量情报，有许多是无用的，但因为有内部情报，中央情报局得以知道几十位部长、副部长的丑事、野心和政策主张。

萨达特把中央情报局局长看作只是个办案官员。前局长威廉·科尔比回忆，他曾于1975年专程到佛罗里达州去求见萨达特，等了半天一夜，始终没有见到。但这天萨达特却有时间接受了著名电视广播记者巴巴拉·沃尔特斯的采访。科尔比移樽就教，结果却一无所获，因此被福特总统撤职。

从广义来说，萨达特确是中央情报局的宝贵情报财产。尽管他没有直接领津贴，也不受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但他把自己和国家向中央情报局开放。他说，这是为了双方的相互利益，有来有往，但对双方来说都有很大的风险。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被刺身亡，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情报关系之

一就结束了

凯西认为，在收集敏感的情报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能够得到许多好材料，而且往往是政治情报。1978年时，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都在国外各自搞窃听通讯的工作。中央情报局干这项工作的是“四处”，人员不到100人。一般来说，国家安全局搞窃听无线电通讯的工作，而中央情报局四处则在电话机或房间里安装窃听设备。四处的人从这个国家跑到那个国家，从这个美国使馆跑到那个美国使馆，冒着风险闯进或偷入外国政府办公室，去安装窃听设备。

1978年，由于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工作重叠和相互竞争太严重，国会取消了给中央情报局在收集通讯情报方面的拨款。这样，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就在驻外使馆联合工作了。

到1983年底，美国三分之一的驻外使馆都有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联合小组在进行工作。这些小组往往只有两三个人，绝对机密，有时称为“特别收集人员”，有时称为“特别收集地点”。他们搞到非常好的情报，特别是如果美国使馆的馆址处在高地，方向良好，或者位于外交部、国防部或其他重要的办公室和住宅附近。在东欧国家的首都，这些小组的工作特别有效。

取得成就的关键是先进的技术。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研制了一些高级技术，是驻在国想象不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子窃听设备，比电影和间谍小说里描述的更先进得多。用不着派人进入或接线，就可以进行窃听。有时候，发射一道微弱的、看不见的光线，就可以用电子设备测量出窗子上玻璃的震动，从而分析出房间里的谈话内容。这种光线是从距窗子

几百英尺的一架发射机发出的，光线以锐角发射到窗上，然后在几百英尺外用接收机收下并放大。70年代末期，美国情报机关发现，一台挂好的电话里的话筒仍不断通过电话线发射出微弱的脉冲，可以隔断并转变成声音。所以，只要能够搭上对方的电话线，并使用先进的设备，普通电话里的话筒就会成为一具窃听器。

凯西认为，美国几十个驻外使馆里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联合小组正在提供越来越好的情报，不只是因为技术和微型化都提高了，而且是因为凯西催促他们拿到更多的情报。

凯西总想尽力改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他召集会议，要求各单位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结果共提出了800条意见。凯西乘生病在家休息之机，把800条意见逐条看后，作出了自己的结论。1984年2月，发表了一个包括九点的"信条"。"信条"要求大家办事要及时，高质量，客观和不带成见，勇于向传统思想挑战，品行良好，道德高尚，重视荣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和条文，维护美国的价值、安全和国家利益，严守机密，忠于同志，忠于共同目的，有创造性，力争上游，随时行动。

1984年初，克拉里奇提醒凯西说，国会批准的那2400万美元不够用，需要追加。是啊，凯西是明白的。真荒谬，2400万美元还不够买一架现代化的喷气式飞机。现在，凯西得跑去乞求国会追加年中补助拨款，大概要再给2100万美元。这当然是丢人的，也是困难的，特别是总统竞选即将开始。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美国人都害怕爆发中美洲战争。白宫的政治考虑很简单：不要让尼加拉瓜和中央情报局成为头条新闻。这事由贝克亲自监视。

凯西想在国会里走条捷径。他在纽约混了近半个世纪，早就懂得对付法律规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盲目服从，一种是灵活解释，如果选择后者，就要发挥想象力。现在，他要搞点有想象力的东西。他说，并不想触犯法律，只想绕过法律。过去几个月，他曾看到一位国会议员从内部操纵国会，手腕非常神妙，令人拍案叫绝。凯西感到真是上了很好的一课。

众议院有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查尔斯·威尔逊，此人是海军学院毕业生，十分反苏，是个敢讲话的鹰派。他在1982年一年中去过巴基斯坦三次，曾越过边境，进入苏联控制下的阿富汗，和抵抗力量战士见面。他认为他们的抗苏战争打得对，打得是时候。不久，中央情报局向国会提出，要求拨款3000万美元支援阿富汗的抵抗力量。威尔逊听了，感到3000万太少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听齐亚总统说，阿抵抗力量最头痛的是苏军的直升飞机。威尔逊决定要为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们争取到一些优良的瑞士制防空高射炮，"奥尼孔"牌的。

国会拨款手续分两步，第一步是主管委员会提出"授权"，第二步是由拨款委员会批准拨款。按规定，申请拨款须先由主管委员会"授权"，但真正给钱的是拨款委员会。威尔逊是众院拨款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讨论国防部提出的预算时，威尔逊说他没有什么意见，只有一项要求，那就是再拨一笔钱支援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他说，尽管情报委员会没有要求在3000万以外再增拨款项援阿，他现在却要提出。其他委员问他要多少，他说再加4000万美元。拨款委员会讨论的是近28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上增加4000万美元，那等于只是增加七千分之一，委员们认为这算

什么，无非是一个零头，于是同意了威尔逊的意见。后来，威尔逊被派去参加参众两院拨款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他在那个会议上又赢了。

为了弥补手续上的缺陷，政府预算局局长斯托克曼写了一封绝密信给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要求“授权”拨款4000万美元支援阿富汗自由战士。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戈德华特大怒，认为政府先斩后奏，颠倒了请求拨款的立法程序，这可是职权问题。

威尔逊继续进行游说，他跑到众院情报委员会去活动。他的办法是利用有争议的尼加拉瓜秘密行动，许多众议员反对这个行动，但为了表示他们对苏联扩张主义并不手软，他们要支持阿富汗的反苏战斗。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麦克马洪也写了一封绝密信给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说明有必要增加对阿富汗的援助。结果，两院情报委员会便顺水推舟，同意了这笔增加的拨款。

凯西感到这真是一笔横财，他同时联想到，在尼加拉瓜问题上是否也可以搞这么一手呢？无论如何，他从威尔逊的活动中学到了经验教训，威尔逊把中央情报局、政府参众两院都动员起来了。

第十六章

助理国务卿莫特利也想为尼加拉瓜行动搞到追加拨款。他的恩师特德·史蒂文斯是参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莫特利建议，政府何不效法威尔逊的办法，直接找拨款委员会要钱，不必去理睬情报委员会。于是莫特利亲自去找史蒂文斯，请求追加拨款2100万美元供尼加拉瓜行动之用。史蒂文斯答应试试。

但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被戈德华特知道了。他认为这是违反参院规则和习惯的举动，于是在1984年3月12日和莫伊尼汉联名写了一封密信给里根总统，强烈抗议国务院违反参院规则。舒尔茨国务卿只好向戈德华特道歉。

政府既已认错，戈德华特便又回过头来支持政府，在4月5日晚上到参院大会上发言，为凯西争取那2100万美元。在座的比登参议员正在自己座位上看一份材料，里面说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了在尼加拉瓜的三个邻国的港口布雷的事。他大为惊奇，于是站起身来把材料拿给情报委员会的同事科恩参议员去看。

科恩仔细一看，上面写得一清二楚，说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指挥和进行在港口布雷。这是中央情报局的直接行动，不是支援或供应问题。布雷不是什么秘密行动，而是战争行为。科恩于是拿着材料走到正在发言的戈德华特面前，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是否真实。

戈德华特一看之下，气得失去理智，竟当众把这份机密材料念了出来。戈德华特的办公室主任西蒙斯急忙跑到科恩面前，要他阻止戈德华特念下去。科恩动作迟缓，西蒙斯便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从戈德华特手中把那份机密材料抢了过来。戈德华特这才明白过来，叫西蒙斯快找凯西这个王八蛋，问他是怎么搞的。

西蒙斯又急忙吩咐秘书处把戈德华特刚才念的那一小段机密材料上的话从国会记录里删去。但是，《华尔街日报》记者戴维·罗杰斯已经打听到这事，在第二天的报上登了出来，但隐瞒了一半，只说"美国在尼加拉瓜布雷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比原来想象的更大。"

西蒙斯第二天打电话给麦克马洪，问他是否知道此事。麦克马洪躲躲闪闪，竟然说凯西曾经告诉过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们。西蒙斯一查，根本没有这回事。

不久，情报委员会才逐渐知道事情真相。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三个港口布下了约75枚所谓"爆竹式"的水雷。但许多水雷装有300磅C-4炸药，足以造成大爆炸。有些商船的海员和一些渔民触雷受伤，据说有一人死亡。布雷前，尼加拉瓜进口的石油大部分来自墨西哥和欧洲，现在苏联却成为主要供应者，约80%的石油来自苏联。因此，布雷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是使尼加拉瓜进一步投向苏联的怀抱。

戈德华特说，布雷危害了中立国船只，一艘英国船也触了雷。请设想一下，如果一艘美国船触了英国水雷，美国会作何反应？戈德华特不住摇头叹息，对西蒙斯说，"你去告诉凯西，他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可不再为他火中取栗了。"

周末，戈德华特住到奎因的乡间农场休息，那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在那里用录音机口授了一封信给凯西，对总统居

然批准布雷之事表示十分反感。凯西接到信后打电话问奎因，表示不能理解戈老为何如此激动。奎因对他说，不要紧，戈老激动得快，冷静下来也快。凯西心想，他讨厌这事，我也讨厌哩，我也被夹在白宫、国务院和国会之间，前两处要求在尼加拉瓜多干点事，后者却要求少干点，真令人为难。

凯西感到迷惑不解，他查了记录，上面明明写着3月8日和3月13日两次到参院情报委员会作证，对参议员讲过在三个港口布雷之事，参议员们当时并没有提问题。如果说，他们当时没有听懂，那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他跑到白宫，把这事告诉了麦克法兰，麦克法兰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参院里面还在大吵大闹。参议员们纷纷发言，攻击政府布雷之事。最后，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提出一个表示国会意见但无约束力的决议案，声称今后不得再花钱在尼加拉瓜领水布雷或支持布雷。参院以84票对12票的多数通过了这个决议。几小时后，众院也以281票对111票通过了同样的决议。

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私下说，布雷的事全是凯西一个人搞出来的，正如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一样。他还说，副局长麦克马洪一直反对干这些事，许多高级官员也是这样。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反政府武装至多只有15000人，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想把他们扩大到18000人，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有75000名军队和警察，双方力量对比是五比一，太悬殊了。

我把这个情况写出来，登在1984年4月13日的《华盛顿邮报》上。麦克马洪看到后，叫他的助手打电话来说他不同意报上所说的，他要发表声明更正。他的声明说，凯西虽然

鼓励大家各抒己见，但在尼加拉瓜问题上，中央情报局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只好在次日关于布雷的消息末尾，把麦克马洪的声明塞进去。

莫特利看到麦克马洪的声明后，感到很好笑。莫特利参加搞尼加拉瓜行动快一年了，谁都知道麦克马洪不仅反对搞尼加拉瓜行动，而且别的这类行动也反对，阿富汗除外。他多次强调，中央情报局的职责是窃取机密，进行分析，搞敢死队活动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4月13日，凯西和麦克马洪去会见莫伊尼汉，因为戈德华特出访远东，莫伊尼汉以副主席身份代理情报委员会主席职务。本来，中央情报局道歉后，莫伊尼汉也准备原谅他们了。但这天他又看到《华盛顿时报》登的一条消息，引述麦克法兰的话，说什么关于布雷的事，政府方面按照法律把"每个详细情况都完全告诉"情报委员会了。莫伊尼汉看后很生气，中央情报局只是在两小时零18分钟的发言中花了10秒钟提了一下布雷的事，而且只有一句话，共27个字，埋在长达84页的发言稿里。人们稍不注意，就会漏听这句话。因此，许多参议员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事，也是实情。

莫伊尼汉认为麦克法兰这样说话，根本不符合事实，而且是看不起国会，因此他对电视记者说，他准备辞职，以表示抗议。杜伦伯格参议员也说，对凯西根本不能信任，如果要打分，凯西在信任问题上只能得二分（十分制）。他说，整个情报委员会的人都不信任凯西，不愿意再见到他了。

凯西还要解释和宣传他的主张。他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说，"我想从长远来看，人们终究会不再那么关心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的报道，而会更关心如果中美洲或其一部分落入苏联和古巴的统治之下，会有多少移民流入美

圈，造成危险。”

同时，中央情报局发表调查数字说，在古巴有一万名苏联人，在尼加拉瓜有100名苏联人和一万名古巴人，可见苏古对中美洲的威胁程度。还说，在尼加拉瓜布雷的事，“同情报委员会的委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议员讨论过11次之多”。

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们担心凯西得罪了国会，使将来政府再在情报和外交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更加困难。白宫仍然要执行咄咄逼人的中美洲政策，但想避免人们再讨论凯西的直率鲁莽以及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

另一方面，凯西仍认为尼加拉瓜的秘密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神经战。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不要放手不管，听任桑地诺分子为所欲为。应当施加压力，进行骚扰，转移视线，从各方面打击他们。

凯西害怕的是白宫犹豫不决。他知道，白宫才是真正的权力所在。他一直注视着白宫的一举一动。问题是白宫里意见纷纭，很不一致。总统的思想倒不难了解，他要求的是美国不派战斗部队前去，但可采取一切可能的秘密行动。白宫工作人员的想法可就复杂了。一方面，办公厅主任贝克提醒说，今年是选举年，小心为好。另一方面，麦克法兰手下的人总要提出一些新的行动计划。一个是要求对尼加拉瓜实行封锁，极而言之，几乎要出动美国的一半舰只。凯西从来不重视这种意见，但他认为也不能忽视。总统什么时候会突然采取行动，谁也吃不准。格林纳达就是例子，事先谁也没有料到。

里根的思想和主张，凯西是清楚的。但里根会采取什么行动，凯西却拿不准。他总是一会儿说“好”，一会儿又说“不”。真正替里根作决定的常常是贝克。凯西也有资格单

独去见总统，他每年都要这么干两次。总统对他很客气，但谈到要作什么决定时，总统又哼哼哈哈，模棱两可了。事后，可能会通过贝克或麦克法兰传话说，得问问舒尔茨和温伯格，他们两位什么意见啊？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开会时，里根都不主持会议，通常是由麦克法兰主持。里根面前放着一页日程表，上写今天每个人准备讲什么，多长时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听形势汇报上。决定常常是在会后才作出，由麦克法兰代总统签署。

里根的往来电话记录由贝克和达曼保管。普通电话和保密电话各有一本记录，里根因为听觉不好，不喜欢用保密电话。里根的一切活动由特工人员记录，白宫招待员也作记录。还有一本是周末活动记录，连南希的社交活动也记在里面。贝克和达曼跟踪一切，丝毫不放过。总统对这个制度很满意，所以没有谁敢破坏。

现在发生了布雷事件泄密，需要白宫作出决定。凯西有大量材料证明，运进萨尔瓦多的物资堆积如山，有些是从尼加拉瓜运去的。他向白宫报告说，有情报表明左派很可能要在秋天发动一次大攻势，好象1968年越南发动的大攻势一样。这个情报在大选之年可是值得注意的事。

莫特利相信这个情报是真的，但是不能证明。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凯西从总统那里得到一个明确的决定。里根说，中央情报局应暂时停止在尼加拉瓜的一切秘密行动，等到11月初大选揭晓后再说。如果他重新当选，那么政府就将全力以赴，要求拨给更多款项，争取占居上风，赢得胜利。

对凯西来说，暂时停止一切秘密行动意味着他得亲自登门负荆请罪，改善与议员们的关系。他先去拜访印地安纳州

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卢加尔，此公也是情报委员会委员，兼共和党参院竞选委员会主席①。卢加尔说，他们处境不妙。凯西说，他曾试图让每个人都知道布雷的事，但承认提得太简单，因此有些人不满意。

凯西还想劝莫伊尼汉不要辞职。莫伊尼汉在外交政策方面基本上是强硬派，对政府是有用的。如果他真辞职，让更反对中央情报局的自由派如莱希这样的民主党人接替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那真是大难临头了。

凯西跑到参院莫伊尼汉的办公室，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他的职责是要经常向情报委员会报告情况，做到使参议员们满意的程度，如果他们不满意，那么不管他的努力是如何真诚或负责，也对不起各位参议员。但他没有说，他的报告不周详违反了法律规定。他说，“我深深道歉。”然后，他以个人身份呼吁，恳请莫伊尼汉继续担任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莫伊尼汉大为感动。看来凯西相当诚恳，这个人多么复杂，性格如此多变。对这样的道歉，实在没有办法拒绝。莫伊尼汉决定收回辞职的话。

凯西最后的一个忏悔行动是亲笔写一封信给戈德华特道歉，措词谦卑之至，几乎是屈膝下跪了。

4月26日，凯西硬着头皮，去出席情报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气氛很紧张，因为有些委员认为直到此刻，凯西也只是说原来没有发生的事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凯西急忙改变态度，承认过去的汇报不充分。他说，真希望当初多讲一些的，但并没有打算隐瞒什么，有些参议员

---

① 卢加尔自1985年初起，担任参院外委会主席，直至1986年底。——译者

知道布雷的事，众院那边也知道。

有人问，布雷这件事本身是否非法？

凯西说，不是非法的。

这句话使积蓄已久的愤懑爆发出来了。几乎每个人都起来攻击凯西，提出法律、理智、判断、可行性、能力等方面的许多问题。还问，我们的友邦英国和法国的船不是也被炸了吗？政府为什么要事先宣布不受国际法院关于禁止在他国港口布雷的判决的约束，从而在全世界面前暴露美国不遵守国际法？这岂不是等于让美国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凯西只是说，“我深深道歉。”

这时，犹他洲共和党参议员杰克·加恩再也按捺不住，发火了。他认为，凯西3月间汇报布雷的那句话是清楚的，是令人满意的通知，为什么还要老揪住不放？他提什么问题，中央情报局总是回答的，尽管有时候是他亲自上门去问他们。

加恩尖声叫喊道，“你们都是屁眼，整个国会充满了屁眼，所有535个议员都是屁眼。”

在座的议员全体起身，退出会场。莫伊尼汉也站起来说，“好吧，你骂我是屁眼，我报你以微笑。”

事后，加恩感到不对，写了一封信给戈德华特，对破坏会议表示道歉。

这次会后，情报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说凯西局长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关于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和用快艇进行袭击的事，“没有充分和及时地通知参院情报委员会。”委员会和凯西达成协议，要研制新的程序，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差错。

第十七章

这年春天，凯西在中美洲还有另一件头痛的事。那就是人口7700万的墨西哥已经成为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门杰斯曾经对凯西说过，他认为墨西哥很可能成为第二个伊朗，而且是处在美国边界旁边。他说，墨西哥爆发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政府非常反美，反对资本主义，而且有债务危机，很可能导致把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墨西哥的社会状况很糟，正是培养极左派的温床。

凯西知道，墨西哥总统德拉马德里是里根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德拉马德里曾在哈佛大学学习，他追求的第一个理想是发动一个反贪污腐败运动，名为“重整道德运动”。凯西认为，这虽是有价值的事业，但墨西哥的真正问题是经济问题，套在墨西哥脖子上的锁链是那高达800亿美元的外债。德拉马德里追求的第二个理想是企图劝说美国和尼加拉瓜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这就意味着要美国放弃那些反政府武装了，凯西反对这点，而且讨厌墨西哥多管闲事。同共产党谈判基本上是无用的。德拉马德里倒很象左派思想库里的教授，在那里宣扬不干涉主义，并声称美国的行动使桑地诺分子更激进。凯西感到，这是标准的左倾废话，难以容忍，而从一个近邻和按理说是盟友的口中说出这种废话，更令人无法接受。于是凯西下令加紧对墨西哥和德拉马德里收

集情报，结果获得不少材料。

凯西说过，在尼加拉瓜采取行动，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墨西哥。如果听任尼加拉瓜作为一个典型的左派国家存在，革命的火焰就会蔓延到北面。就目前来说，左派的目标还只是萨尔瓦多，但他们如果在那里成功，那就只剩下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了。那时，移民来美的人会无法控制，那些群氓总是要逃避共产主义的。凯西认为，这些人无非是些“赤脚痞子”罢了。

凯西收到一份绝密报告，是总统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寄来的。这份五页长的报告指责说，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部门象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根本不知道墨西哥发生了什么事。支持写这份报告的人包括该委员会主席、前驻英大使安妮·阿姆斯特朗。她住在得克萨斯州阿姆斯特朗城的一个大牧场里，已经靠近墨西哥边界了。该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宣扬说，墨西哥允许苏联在其驻墨使馆搞大量的反美间谍工作，这对美国是很不友好的。该委员会雇了一个前中央情报局的墨西哥问题专家为顾问，他建议中央情报局驻墨西哥分站应大大加强。

这份报告预测左派要开展活动，特别是在阿卡普尔科一带。报告攻击德拉马德里总统，说他是个技术官僚。商人们提供的流言飞语，竟也被当成事实上报。墨西哥人还有不少原始风俗习惯。

凯西要霍顿赶快写个分析报告，专讲墨西哥现状。霍顿又吩咐他手下的分析员布赖恩·拉特尔去写初稿。拉特尔是历史学博士，凯西正喜欢这种专家。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卡斯特罗的情报材料，凯西看后十分高兴。他描写卡斯特罗是一个爬绳索的人，正经历着迟来的中年危机，无法继续他那尚

未实现的革命，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还没有把握。但古巴问题专家们反对拉特尔写的这份材料，说他写的是心理小说，是对情报工作的乱弹琴。

拉特尔专门到墨西哥去收集第一手材料。这种出差机会是凯西增加预算后分析员们新近得到的好处。

拉特尔写出他的初稿后，送给霍顿去看，标题叫“德拉马德里统治下的墨西哥”。他对霍顿说，“凯西看过了，认为可以。”

霍顿不禁心中怒火上升。按理说，凯西应当和其他情报部门的头头同时收到这份初稿，而不是在他们之前就先收到。拉特尔先送给他看，破坏了领导层次。凯西也不该随便表态，他的成见会影响分析。有时候，他激动得很，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就用手指顶着对方的胸膛，大喊，“错了！错了！”

霍顿要的可是真实情况，不要添油加醋的东西，他要掌握航向。霍顿把拉特尔那长篇大论的初稿看了一遍。里面说，墨西哥濒临革命边缘，城市里动荡不安，农村也动荡不安，投资者和商人纷纷离去，很可能要造成资金外逃。到处是贪污腐败现象。

总统也好，国务卿也好，任何人看了拉特尔的初稿，都会强烈地感到美国的南面存在不稳定的局面，情况很危险。初稿还暗示说，可能发生暴动，因而墨西哥政府需要出动军队来镇压。简直是第二个伊朗。

拉特尔不只绕过了霍顿，越级上报，而且霍顿发现他这初稿里的危言耸听，不符合中央情报局收到的情报所述的情况。霍顿同意墨西哥存在贪污腐败、动荡不安、失业严重，但拉特尔把墨西哥人看作和美国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会

起来革命，这可是外行的看法。没有证据表明墨西哥人会象美国人一样行事。

初稿里最令人吃惊的看法是认为苏联和古巴正在悄悄地在墨西哥进行组织工作，或者说不久就要这样做。

霍顿知道，凯西就是要搞一个耸人听闻的材料，抢在白宫和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的前面。他想表明墨西哥是虚弱的。凯西和紧跟他的那帮人不了解，墨西哥自古以来就主张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任何一位墨西哥总统都不会支持美国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霍顿把他的看法讲给凯西听。凯西不以为然，说道，“你只对传统的看法有兴趣，你说的全是传统的看法。”

霍顿回答说，初稿里的那些结论没有情报上的根据，应当删去。凯西却说，有些看法应当保留。霍顿说，那都是小道消息和谣言，不能相信。凯西却说，你扼杀证据，墨西哥就要变成第二个伊朗了。

双方争执不下，凯西事后又几次写条子给霍顿，提供材料证明初稿的观点正确。霍顿不加理会，径自动笔把初稿大改一通。后来，凯西终于同意把霍顿修改过的稿子散发给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然后开会讨论。

4月初，凯西召集各单位在老行政大楼旁边的情报总部开会，讨论霍顿修改的二稿，其基调是：墨西哥存在危机，但没有要崩溃的真实迹象。

凯西先在会上发言，他说这个二稿看法太乐观了，为什么不讲点今后的可能呢？我对此有意见。我要求搞一篇分析估计崩溃的最大可能性的文章。我认为墨西哥已处在崩溃的边缘。

国务院的代表说，他们认为应当也看看其他拉美国家，

例如阿根廷和巴西，这些国家也有很重的外债负担，也很值得我们担心。

联邦调查局的助理局长只强调苏联在墨西哥的活动。他说，克格勃在墨西哥的分站是苏联对美国搞间谍活动的主要基地，墨西哥几乎是放手让克格勃为所欲为、有新情报说，中央情报局发现有些苏联间谍在墨西哥外交部工作，墨西哥政府竟未注意。

商务部的代表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借调在商务部临时工作。他的发言对凯西大加吹捧，佩服得五体投地。霍顿感到真太肉麻。

财政部也持悲观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担忧债务危机。美国银行借给墨西哥的贷款很多。

军方的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各自的情报部门——对墨西哥都只表示一般的关注。墨西哥军队总共才12万人，战略上没有多少重要性。

因此，除联邦调查局、商务部和财政部外，凯西的观点几乎得不到什么人支持。于是，他竟想强加于人，要求举手表决。结果，仍然只有这三家支持他。尽管如此，凯西还是下令重写材料，非要把崩溃的可能性写进去不可。事后，他还不放心，于是亲自指定由赫布·迈耶去重写，不要霍顿干了。

但是，迈耶写出来的三稿也不是凯西的想法，里面说，各情报部门并不同意墨西哥有20%的可能发生革命。而且，这份三稿还把各军事情报部门的反对意见写在第一页的末尾。

霍顿虽然在保证如实反映情况方面取得了胜利，但为此付出了个人的代价。从此以后，他和凯西之间的关系就完了。凯西不再信任他，他也不信任凯西。

几天后，霍顿对盖茨说，他要辞职，等找到人接替就走。但过了一阵，并未派人来接替他，于是他又去找盖茨，说他的合同5月底到期，那时就离职，可否。盖茨同意了。

行动处近东科科长是查克·科根。他194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现年56岁，高个子，身材瘦削，留一撮修饰整齐的小胡子。他过去在印度、刚果、苏丹和摩洛哥的分站担任过行动官员，在摩洛哥是分站站长。

在总部当科长，并不只是看看电报，向驻外分站发号施令而已。还得同外国驻华盛顿的使馆来往，这可是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和政治材料的重要渠道。这些联系和驻外分站的活动同样重要。

科根的后门关系之一是沙特阿拉伯驻美大使班达尔亲王。亲王殿下现年35岁，是沙特国防大臣的儿子，长得英俊漂亮，但华而不实。他是新一代的沙特大使，灵活，有魅力，不信教，交游广阔。他过去当过空军飞行员，经常手里挥舞着古巴雪茄烟，纵声大笑，常在私人办公室用盛在真银盘子里的麦克唐纳大汉堡包招待客人。

卡特政府时期，班达尔还不是大使，但已通过总统助理汉密尔顿·乔丹与白宫建立和发展了关系。他经常能够通过乔丹代表沙特传话。现在是里根当总统，情况不同了。班达尔看出，权力分散在政府各部和白宫的几派之间。鉴于里根政府亲以色列的政策，特别是舒尔茨国务卿更倾向以方，班达尔认为和科根保持非官方关系很重要。

班达尔作为大使，具有很不寻常的活动本领。他能得到大量钱财。沙特这个君主国家，没有什么有实权的立法机构、法院、监督机构等。国务院深知此种情况，因此每当它

想得到国会不肯给的对外军事援助或经济援助时，就去找沙特要。如果要求符合沙特的外交政策，国务院往往能得到它所要的东西。这样一来，沙特既帮了受援国，又帮助了美国，真是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

在情报界，和沙特搞这种交易的机会真是多得撩人。例如，沙特正帮助埃塞俄比亚的抵抗力量反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这对沙特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它讨厌极左派和共产党，特别是在那些处在红海对面的地方。凯西和中央情报局很感谢沙特。

一般来说，中央情报局和沙特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好的。早在那位传奇式的大阔佬卡马尔·阿德汉姆当沙特情报头头时，双方关系就不错了。70年代时，沙特定期送给埃及的萨达特一笔钱，那时萨达特还只是副总统。在这些安排中，很难分清哪些事对沙特有利，哪些事对美国有利。

如今已是1984年春天，科根快离开近东科了。他去向班达尔话别，谈话中顺口提到凯西弄不到钱帮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科根回忆起《华盛顿邮报》上个月登过一篇文章，建议沙特送点钱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科根问班达尔，是你授意作者写的，还是沙特使馆提供的意思？

班达尔说，不是的。

科根说，那可能是有人放试探气球。如果沙特这样做的话，那当然会有帮助啰。反政府武装要的也不多，只要二三千万美元，“花生米而已。”他还说，钱不在乎多少，表示友情就行。

班达尔说，他除了看到《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外，没有听到别的消息。看来这篇文章肯定是中央情报局或美国政府授意写的，实际上文章里已经说凯西正考虑是否请另一

个国家如沙特拨款援助反政府武装，对吗？

科根说，中央情报局没有提出这个请求。

班达尔明白了，他说他要请示首都利雅得高级当局，看他们是否有兴趣。

几天后，班达尔得到了利雅得当局的答复，不同意干，理由是：

- 中央情报局不肯给交换条件，至少没有提出什么暗示。
- 沙特在中美洲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相矛盾。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基本上是亲阿拉伯国家的，而美国支持的两个政府——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却已在最近明显执行反阿拉伯的外交政策，并把他们驻以色列的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
- 沙特不相信里根政府能保守机密；沙特如提供援助给反政府武装，准会泄密，使大家都感到难堪。

班达尔传话给中央情报局说，这事办不成了。但中央情报局仍与班达尔达成协议说，由于这只是探讨性的，非正式的，因此情况是中央情报局从未提出请求，沙特也未说过不行。

班达尔还接见了替反政府武装说话的其他人。有两家美国大公司的负责人要求他捐钱援助反政府武装。班达尔说，不行。已退休的空军少将理查德·西科德的助手也来问班达尔，沙特可否给予援助。西科德过去曾在老挝搞过秘密战争，他现在经营运输武器的私人公司。班达尔说，你能直接传个话给西科德吗？那助手说，当然能传。班达尔认为西科德是个十分傲慢的家伙，于是说，“你去对他说，去他妈的。”

班达尔早就仔细准备好，万一风声走漏，便矢口否认此

事。他经常和麦克法兰在一起。早些时候，他们一起秘密访问中东。现在每隔几个月，他们便一起开会审议共同感兴趣的事。班达尔看出来，麦克法兰对自己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有自卑感，因为人们总要把他和基辛格比较。但麦克法兰过去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忠心耿耿，忠于里根，且要尽力去保护里根，因此这是一条接近总统的好渠道。

一天晚上，两人在班达尔官邸后院的玻璃花房里喝酒。班达尔的官邸很大，座落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区，那里富人极多。麦克法兰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遇到了麻烦，没有钱花了。这样，总统将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美国在中美洲地区的友邦，如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也会感到被抛弃了。拉丁美州有可能四分五裂。

班达尔同意他的意见。但他迷惑不解的是，美国外交政策为何不能前后一贯。既然不能坚持下去，当初又为何要对反政府武装给予支援呢？

两人谈话间，麦克法兰感到班达尔似乎愿意帮忙。班达尔也清楚，麦克法兰是在向他游说。双方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大好机会。两人几乎要互相拥抱了，双方很快就达成协议，沙特将捐助800万到1000万美元给反政府武装；每月给100万。但这事必须严守秘密，而且双方永远保密，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只字不吐。

班达尔知道，国家安全局有能力破译他的外交电报，因此他通过信使带了一封信给法赫德国王。

这时伊朗日益威胁到波斯湾的石油运输，班达尔为此去找舒尔茨谈话。不久，里根总统写了一封信给法赫德国王，重申如果沙特和伊朗发生对抗，美国将支持沙特。沙特还要

求美国卖几百枚“毒刺”式防空导弹，但美国在谈判中施加了一些限制。法赫德于是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密信给里根，叫班达尔亲自送交总统。班达尔把信送到白宫，里根看了马上表态说，“我们对朋友是不提条件的。”

然后，总统援引紧急条款，绕过国会卖武器给沙特，到5月底阵亡将士纪念日，便秘密地空运了400枚“毒刺”式导弹给沙特阿拉伯。

班达尔于是回国述职，经国王批准，拿到沙特政府的一张800万美元的支票，用于秘密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麦克法兰也为他的助手诺思中校在银行开了一个帐户，用来储存援助反政府武装的款项。这个帐户在凯曼岛BAC国际银行，帐号是541—48。6月22日，星期五，麦克法兰和班达尔在白宫会晤，麦克法兰当场交给班达尔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这个银行帐号。为了保密，班达尔说他将亲自去瑞士日内瓦，安排通过瑞士银行转帐事宜，他在日内瓦有一幢别墅，就住在那里。他们商量好，一俟这笔钱转帐完毕，班达尔就会捎话来。如果要在电话上谈到这件事，就用密语说，“运交香烟”。

班达尔于6月27日到达日内瓦。他随即要求瑞士银行派一名职员到他家来，把那张800万美元的沙特支票和凯曼岛BAC国际银行的帐号交给了这个职员，规定每月支付100万美元。他还指示把这800万美元存在瑞士银行的一般帐户上，今后从中支付，以免来源被查到。

这时，麦克法兰对迟迟未得到班达尔回音十分担心，于是打长途电话给班达尔说，“我的朋友还没有收到香烟，他烟瘾很大。”

瑞士银行花了一个多星期才把帐转过来，于7月6日支付

了第一笔100万美元。

麦克法兰写了一张小条给总统，告诉他沙特现正在秘密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总统表示非常感谢。此后七个月中，沙特逐月付款，付足了800万美元之数。反政府武装因此得以存活下去。

诺思同凯西和克拉里奇讨论了反政府武装急需行动和后勤上的支援，写了一个秘密报告给麦克法兰，请求批准他去中美洲一趟。麦克法兰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并批示："务须绝对保密。不搞公开会见，不让新闻界知悉你在该地区。"

凯西和以色列关系很好。他让以色列看到更多的美国卫星拍摄的侦察照片，以色列对此很感激。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一直在设法报答凯西和美国。以色列驻华盛顿使馆负责收集公众舆论和政治舆论，注意到新闻报道中关于尼加拉瓜的消息比关于苏联的还多。

以色列官方早已否认它在帮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但仍不断有这方面的报道。在保密方面来说，没有别的国家赶得上以色列。以色列想方设法，也许是通过南美某中间人，偷偷送几百万美元的武器或现金给反政府武装，使美国政府和国会都很高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确实干了这种事。

我到处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很有地位的以色列人，他承认确有其事。他还说，美国可以在每年给以色列的25亿美元军援和经援总数中增加一点，作为偿还以色列给反政府武装的支援。如果国会方面有具体困难，可以用其他形式给。譬如说，还可以让以色列得到先进的KH—11型卫星快速拍下的照片，以及在美国卫星上分配一点以色列需要的工

作任务。

他说，美国没有真正意识到及时的战术情报的重要性，以色列四面受敌，因此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对以色列来说，分享情报比以色列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正常外交往来更重要。

我打电话给凯西，告诉他我得到可靠消息说，中央情报局要求沙特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他听了后说，“完全没有根据。”我又问，那么是否要求以色列提供援助？他说，谈过好多次，但没有正式提出。我说，不是有位以色列将军叫萨盖的，过去当过以色列军情局局长吗，还有美国卫星拍的照片。他说，萨盖是个好人，我认识他，但不能对你谈我和他的关系。

第二天，5月19日，《华盛顿邮报》头版登了我写的一条消息，说沙特和以色列可能在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然后又说，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强烈否认以色列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还说以色列不是美国的代理人。

那位同我谈话的以色列官员打电话来，对我的报道表示很高兴。中央情报局发言人乔治·劳德也打电话来，说他很高兴，但又说，中央情报局确实没有向以色列或沙特提出请求。我问是谁告诉他的，他说是麦克马洪。

凯西仍然很烦恼，因为参院情报委员会还在施加压力，要他就尼加拉瓜港口布雷问题写一份书面保证。他们仍认为，这是一项大罪。情报委员会要求双方签署协议，由中央情报局局长承诺，今后再有任何重大秘密行动或敏感的行动，一定在事前报告参院情报委员会。莫伊尼汉是这个协议的主要推动者，其中要求中央情报局：

- 在总统批准一项报告后，即向情报委员会提供书面材料，包括秘密行动的背景细节、确切性质、目标和风险。
- 如果正在进行的秘密行动含有新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如公开为人所知在政治上不利，会引起新的反作用，或者改变了行动的范围，涉及投入新的美国人员，或者已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总统批准，则中央情报局应即通知参院情报委员会。
- 定期向情报委员会报告正在进行的一切秘密行动的情况，并且每年一次全面报告一切秘密行动的概况。
- 如情报委员会对某项问题表示特别有兴趣或反对，中央情报局应即向情报委员会报告。

6月6日，戈德华特和莫伊尼汉签署了这项协议，要求凯西马上也签字。两位参议员都想知道，凯西当天肯不肯签字。他们还派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加里·蔡斯下午4点亲自拿着协议，去中央情报局请凯西在上面签字。还说，蔡斯如能完成任务，就可回家喝酒，不必回来上班了。

蔡斯过去在中央情报局当过副总法律顾问，他到达楼下大厅后，就挂电话给凯西，但凯西不许他上去，反而对他说，“我头脑很清楚，所以要请你滚出去。”

蔡斯说，“你要不要我打电话把你这态度报告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他又解释说，协议文件事先已由双方工作人员达成一致意见，你签个字也无非是例行公事。

凯西说，那好，等我问问我的工作人员是否如此，你先在下面等着。蔡斯马上又打电话报告情报委员会，那边叫他等着好了。

凯西在楼上又气又急。这个协议实际上等于让情报委员会可以窥视他办公室里的一切。他们干脆窃听他的电话，派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一起旅行，记笔记，翻他的抽屉

和档案得了。这样的监视，比白宫的监督都还厉害。欺人太甚！但他询问手下工作人员后，发现他们的确已与对方达成一致意见。他想，如果我凯西不见蔡斯那小子，参院那些魔鬼又要杀出来，可不好对付。

凯西想了一个钟头，最后还是打电话请蔡斯上来。

他看到协议，问道，"这是什么？"

蔡斯解释说，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超出了立法部门进行监督的权力，也没有减少总统依宪法得到的权力。

凯西说，既然我的部下都已在口头上同意了，何必还要我签字？蔡斯说，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希望你签上大名，以明确此事。又磨蹭了20分钟，凯西终于拿过协议，把自己的名字画在上面，交给蔡斯。

蔡斯如获至宝，没有回家喝酒，而是回到情报委员会，好些工作人员围着他欢呼胜利，他则把协议高高举起。有个工作人员说，蔡斯使人想起了当年英国的张伯伦首相，实现了当代的和平。是的，蔡斯很象张伯伦，只是手里缺少一把雨伞。

第十八章

凯西知道，除了总统，国务卿舒尔茨就是政府里实权最大的人了。舒尔茨显然是温和派，说话也合情合理，有思想，又明确。1984年春天，凯西看到舒尔茨经历了一个十分需要的变化。在白宫开会时，舒尔茨双手合抱胸前，好象在做祷告似的。在动用武力对付恐怖主义的问题上，舒尔茨跨过了一道门槛，同意这样做，不管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既然在黎巴嫩采用外交手段已经失败，那就只好采取行动了。美国已经被恐怖主义赶出了黎巴嫩。外交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白宫里，讨论还在继续进行。舒尔茨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越来越激动，极力主张积极反应，只有一件事能叫那些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国家明白过来，那就是采取报复或先发制人。

凯西能理解舒尔茨。这位经济学家兼企业家有强硬的一面，现在他越来越强硬了。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开会时，舒尔茨面向里根，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总统先生……"这时，人人鸦雀无声，洗耳恭听。舒尔茨说，美国的信用和外交政策取决于显示我们能够适应并对付这些新屠夫，我们在中东的权威也取决于此。

按照里根1982年签署的国家安全决定指示第30号，规定由国务院主管反恐怖主义政策。舒尔茨表示，他希望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更多地参与此事，总得有人去做肮脏的事。

国务卿采取这种主动态度，使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工作人员行动起来，召开了一系列工作小组会议。诺思中校为总统起草了一个决定稿。按诺思的说法，现在是干掉那些恐怖分子“王八蛋”的时候了。他起草的那份国家安全决定指示，要求由中央情报局支持和训练的外国人小组行动起来，“中立”① 那些袭击过或准备袭击美国人的恐怖分子。

麦克马洪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一份诺思起草的这个指示稿的副本，到了午夜他才打通诺思家里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喊道，“狗娘养的！”你诺思70年代时干吗去了，当时是不是象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里，什么也不知道？难道你不知道里根有行政命令禁止参与暗杀行动吗？你想把中央情报局搞成什么样子？能找到扎实的情报以便采取先发制人的袭击吗？”

诺思只说，“是的，先生，”就挂上了。事后，诺思对他的朋友说，“麦克马洪疯了，也许从前他是好样的，但现在他对凯西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凯西想采取强烈行动，因此找他的法律总顾问斯波金来商量。如同往常一样，他要斯波金马上就答复。

斯波金的结论是，对付恐怖分子的行动不会构成暗杀。过去，因为曾有人策划暗杀卡斯特罗，美国禁止了政治暗杀。如果中央情报局掌握到准确事实，尽量减少对平民的危害，如果总统批准了正式报告，而且国会有关的委员会都通知到了，那么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有确凿情报表明恐怖分子要搞袭击，那么中央情报局就可以援引自卫权利，使自己放心行事。

凯西同国防部谈得不大顺利。温伯格不大赞成使用军舰

① 此处所谓“中立”，指暗杀之意。——译者

去打击恐怖分子，如同上次在黎巴嫩干的那样。国防部对中央情报局准备先发制人，去袭击恐怖分子，也充满矛盾心理。国防部对肮脏的事由中央情报局去干，失败了由它负责，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国防部的态度也很不好，专横跋扈，官僚主义。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搞什么准军事行动，以及这类训练，都是和国防部竞争。

麦克法兰知道，如果总统的顾问们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什么事也做不成。他于是建议进行全面研究。4月3日，里根总统签署关于反恐怖主义的国家安全决定指示第138号。这不是一个计划性文件，只要求联邦政府的26个部门建议如何制止恐怖主义。它原则上同意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报复性袭击的想法。

当天晚上，舒尔茨在华盛顿一次晚宴上讲话，要求采取“积极防御”，并建议有必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他讲话时间很长，神情忧郁，但信念坚定。第二个月的大部分时间，舒尔茨每次讲话时都要提到这点。

凯西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伊朗人和叙利亚人在黎巴嫩搞的那种恐怖主义是阴森的，难以制服的。他虽然深信伊朗和叙利亚是主要后台，但找不到美国法律上所需要的那种证据，甚至连符合常识的证据也找不到。

3月间，从破译电报通讯、卫星照片和间谍情报等来源发现，利比亚正在苏丹进行干涉。利比亚派了一架苏联制造的“图—22”型战斗机，去轰炸苏丹首都喀土穆郊外的无线电台。情报十分准确，因此舒尔茨敢于毫无保留地公开宣布，利比亚“确实”进行了这次空袭。他讲话时一副教授派头，毫无笑容。舒尔茨没有透露的是，那名利比亚飞行员已被抓住，承认是为将来轰炸开罗而作的练习行动。

情报还表明，利比亚和希腊签订了一个协议，在海军方面进行交流。由于希腊仍是北约的成员，这个协议自会威胁到北约内部的机密。美国联邦调查局有扎实的证据，表明华盛顿郊区的利比亚学生组织参与情报工作和恐怖活动。人们特别忧虑，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将于夏天在洛杉矶举行。这些场合都可能发生恐怖行动。

卡扎菲和他的邻国关系很不好，苏丹、埃及和伊拉克都在向他的反对派"拯救利比亚全国阵线"提供秘密支援。

凯西不断印发这类情报。"全国情报日刊"有一天说，"卫星照片表明，星期五卡扎菲住地周围活动正常。"5月8日，卡扎菲住地被人袭击，使美国感到有机可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恐怖事件工作小组"专门跟踪卡扎菲的动静，参加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重要部门的中层官员。凯西鼓励舒尔茨带头，因为没有国务院支持，政府不会做多少事情。舒尔茨的副手和老朋友肯尼思·达姆开始审议对利比亚的政策。

5月18日，达姆从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得到一份长达10页的秘密报告，标题是"反击利比亚的恐怖主义。"这份报告综合了政府内部的各种意见：（一）有必要搞反恐怖主义的行动，（二）反卡扎菲的情绪高涨，（三）有准确的情报，（四）有良好的时机。

对策有好多种，列在第5页和第6页上。一种是"什么也不干"。方案8是："打击经过仔细选择的利比亚目标，从而建立对利比亚恐怖主义进行直接反应的样板。"方案9是："采取秘密行动，先发制人，破坏和击败利比亚的计划。"最后，方案10是："争取在利比亚换一个新政府。"

第二天，星期六，达姆召集少数高级官员在他的办公室

开会。讨论了四种方案，第4方案要求“有力地扩大现有政策，重新研究采取其他军事行动或秘密行动的可行性。”

6月13日，盖茨收到国务院的一项秘密请求，说达姆正进行非常敏感的政策审议，要求各有关单位研究利比亚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国务院附了一张问题单，要大家考虑：卡扎菲对全世界造成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卡扎菲是不是头号恐怖分子，需要美国作出反应？卡扎菲是否仅仅是一个可以容忍的麻烦，如同欧洲人一般所认为的？国务院要求三星期内答复。

这时，中央情报局负责近东和南亚地区的国家情报官员已经在进行绝密的、细致的审议。他考虑的问题是卡扎菲的弱点，以及美国如何能有效地行动。

国务院的情报官员对利比亚国内是否有较大的动荡感到很怀疑。美国在利比亚没有外交人员，国务院对从通讯上窃听到的情报和间谍送来的情报，比中央情报局更怀疑其可靠性。

大家都同意，美国目前采取的限制贸易政策没有多少用处。但有情报说，卡扎菲搞的革命化运动引起人们反感，可能导致他被推翻。他的亲信族人都劝他放弃极权主义政策，否则自己会越来越孤立。

国家情报官员召集的小组认为，卡扎菲生性好疑是一个心理上的弱点，虽然这也是他的一种保护形式。情报说，卡扎菲经常穿着防弹背心，他的总部有一支优秀的警卫部队驻守，配备着特殊的武器。

各种情报表明，反卡扎菲的流亡运动从下列六个国家得到支援：

- 埃及，这是卡扎菲最头痛的国家。
- 伊拉克，部分是因为卡扎菲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

· 摩洛哥，尽管卡扎菲和摩洛哥的关系正在改善。
· 沙特阿拉伯，它给的支援高度保密。
· 苏丹，卡扎菲一直想收买或夺取这个国家。
· 突尼斯，尽管那里有一位高级部长和卡扎菲关系密切并得到卡扎菲的津贴。

从上表可看到，这六个国家中有三个是卡扎菲的邻国。另一个邻国乍得正在同他打仗。

如果要对卡扎菲施加军事和其他压力，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是最重要的国家。但他们不大愿意和美国合作推翻卡扎菲。

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人一致认为，利比亚军队中存在着严重不满。他们认为，卡扎菲的副手贾卢德少校和军队司令及副司令很可能起来反对卡扎菲；如果能够搞成内外夹攻，很可能促使军队内的不满分子起来反对卡扎菲。国务院反对这种看法。

6月18日，几家合写的研究材料出笼。材料认为，如果给予大量援助，流亡分子能够发动破坏和暴力行动；如果再加上别的手段如扩大宣传、恶化外交关系和经济压力等，军队中的不满分子可能暗杀卡扎菲，或者与流亡分子合作，但广泛的武装叛乱不大可能。材料最后呼吁美国团结有关国家，联合采取政治、经济和准军事行动，否则不可能有多少效用。国务院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要推翻卡扎菲是不可能的，材料对卡扎菲在国内受到的拥戴低估了。

这份材料长达29页，严格保密。上面用代号标明："绝密，含有破译电报得到的情报，外国人不得阅读，临时雇员不得阅读，含有企业界提供的情况，由编写小组控制散发范围，每份均加编号。"

7月4日独立节后，各单位的人员又在白宫合搞了一个建议采取秘密行动的方案。这时，凯西不在首都，麦克马洪代理局务，他看到这个方案后，感到这些人真是发疯了。早自1969年起，美国就有人主张推翻卡扎菲，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都反对。后来卡特当政，特纳当局长，又问起对卡扎菲有什么办法。麦克马洪当时就回答说，没有多少办法。麦克马洪认为，现在这批写材料的秀才，根本不了解那些流亡分子。他们顶什么用？在麦克马洪看来，这些人和童子军差不多，连弄几条橡皮艇在利比亚海口登陆都搞不成，还想推翻卡扎菲？于是，麦克马洪提出了一大堆具体难题，把这个方案否决了。

凯西回来后，同意麦克马洪的意见。他认为，第一，美国的盟邦，特别是西欧盟国，不会同意。第二，美国政府内部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支持这个方案。第三，尼加拉瓜行动已经在国会引起麻烦，不能再开辟新的战场。第四，总统大选快要开始了，不能搞冒险的事。

7月间，威尔逊众议员又搞到了另一笔5000万美元的拨款为支援阿富汗秘密行动之用。加上过去得到的以及中央情报局申请的，总数共达1.2亿美元，有人说1985年的拨款数字还会比这多一倍。沙特阿拉伯早就答应，美国出一块钱，沙特也出一块钱。这样，总数就会达到5亿美元。凯西感到这是好事。但是，他环顾全球，感到还有别的地方也需要支援。

有两处秘密行动也是重要的，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出于原则问题。凯西一直对这两处行动保密。一处是给柬埔寨抵抗力量的支援，5亿美元，凯西想在年底时再增加1200万美元，尽管这样做等于是间接帮助了红色高棉。另一处是给

埃塞俄比亚反对派的支援，每年约50万美元；沙特阿拉伯也给一点。埃塞俄比亚的反对派，原来也是左派。所以，对这两处，凯西都是心甘情愿地和左派一起跳舞，当然要小心。在他看来，各地的反共运动都是一家，包括尼加拉瓜、阿富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这些都是战场。这就是“里根主义”。

凯西大大增加宣传活动的经费。现在大约在24个国家里进行宣传活动，方式是秘密资助外国的报刊、思想库和研究所。50年代和60年代时，中央情报局在搞支持北约的宣传方面相当成功。现在，里根政府正在争取舆论界支持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型导弹的问题。1983年，凯西花了几百万美元，动员欧洲报界宣传部署这种导弹的好处。后来，国会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削减了这方面的经费。1984年，凯西又设法劝说这两个情报委员会给他几百万美元从事这项工作。在秘密会议上，民主党人争辩说，这种活动会被人们看作是干涉北约盟国内政。潘兴Ⅱ型导弹是英国、西德和意大利激烈辩论的问题。如果中央情报局资助盟国舆论界替美国宣传的事情走漏风声，那对双方关系和部署这种导弹的努力都将产生灾难性影响。还有人担忧这种宣传会“吹回”美国新闻界。

凯西争辩说，几百万美元只够用于使宣传网的那些作者和其他人继续活动。情报委员会抓住这句话反问道，既然几百万美元还不够做多少事，那何必搞这种名堂？于是，他们取消了这笔经费，告诉中央情报局使用自己的维持基金去津贴少数欧洲作者，叫他们作好准备。凯西又想，国会叫中央情报局“作好准备”，不必干什么，这就是他们对待国家大事的态度？！

威斯康星州的普罗克斯迈尔参议员专门喜欢挑剔情报部

门在花钱方面有什么浪费。美国在国外有一处军事设施，经常供苏联核查人员使用，里面有热水洗澡设备。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在里面安装了先进的窃听装置，并且准备提高窃听能力。这笔费用隐藏在军事预算里面，名义上称为改进洗澡设备费用。普罗克斯迈尔不明真相，又来挑剔，质问为何花这么多钱改善洗澡设备。结果，陆军情报头目威廉·奥多姆中将只好出来解释，说这是某项微妙的收集情报工作。

美国某情报部门在纽约某个房租昂贵的地区租有一些房子，这也引起了普罗克斯迈尔的注意。结果，情报部门只好在那里开了一家假的企业公司，使普罗克斯迈尔的部下无法调查到内中秘密。

这年夏天，还有另一件事使凯西感到忧虑。尼加拉瓜的天主教会已逐渐成为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最强大力量。布拉沃大主教正在组织天主教会警告人民提防马克思列宁主义。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机关报《街报》指责布拉沃参与“旨在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政治活动”。该报说他是索摩查的酒肉朋友，还有一幅画画着这位大主教把十字架弯曲成纳粹的卐字。

在对中美洲进行宣传的经费中，中央情报局有笔余钱。于是，行动处一个较低级的官员决定拨25000美元，通过美国一个私人基金会去援助尼加拉瓜的天主教会。这可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关系。

莫伊尼汉起先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后来他发现并非如此，于是把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高级官员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别干这事，那位大主教是尼加拉瓜的一个精神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损害他。”凯西同意莫伊尼汉的意见，取消了那25000美元的拨款。

但消息开始传开，凯西只好亲自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请他们务必不要登这条消息，否则就要置大主教于死地了。《华盛顿邮报》结果照办了。

凯西下令检查其他宣传费的用途，发现中央情报局有一条秘密小渠道，通过波兰天主教会转两三万美元给波兰团结工会。考虑到政治上的风险，凯西命令停止这样做。

凯西通常每天带三只公文包回家，里面装满各种报刊和剪报。他用情报分析家的眼光仔细阅读报刊。8月30日，《华盛顿时报》的一条消息引起了凯西的注意，标题是："正考虑五个人接替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的职务。"

他想，真是胡说八道。《华盛顿时报》是统一教会南朝鲜裔牧师申某创办的报纸，观点十分保守，其中好几个记者都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如果想了解白宫在搞些什么阴谋诡计，《华盛顿时报》可是必须阅读的材料。

这则消息说，凯西已经表示，大选后，不管里根是否连任，他都准备离开政府了。凯西看了又气又吃惊。是的，他确实一度考虑过请总统不要在下届政府里重新任命他，但麦克马洪等都劝他干下去，说只有他才能继续保持已有的势头，继续支持总统，继续得到拨款并与兄弟单位保持良好关系。他们的呼吁使凯西深受感动，因此后来同意干下去了。

消息说，凯西想下野的事，是"有地位的政府官员和白宫内圈人物"透露的。作者中一人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杰里迈亚·奥利里。消息还说，白宫已开始考虑继任人选，名单上第一位候选人是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

五天后，《纽约邮报》也登了一条消息，说"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准备丢盔卸甲。"消息说，凯西主动提出要回去

干私人事业。继任人名单上仍是贝克名列首位。

这倒微妙了。民意测验排出里根领先，比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多10分，而且还在上升。里根连任几乎是肯定的了。那么是谁在耍什么把戏？内阁任何主要阁员或白宫主要官员的变动，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关键人物是舒尔茨。温伯格、柯克帕特里克、贝克和凯西都想当国务卿。但看来舒尔茨想留任，这点相当清楚。这就是说，温伯格还会继续当国防部长。而凯西有兴趣当的另外两个职务仍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

而且，他比从前更喜欢中央情报局了。他想，里根第二任中，白宫的内部政治斗争对决策不会再起多少作用了，特别是有关外交政策和中央情报局行动的决策。里根会更加愿意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报上的消息登出后，有些人来问凯西。有一天，莫特利也来问凯西，"贝克要接替你了？"

凯西粗暴地说，"他是最后一个会得到这个职位的王八蛋。"

凯西也想不通，贝克想干的是外交方面的工作，也许将来布什当了总统，会任命贝克当国务卿。贝克的野心可不小，中央情报局局长似乎不配他的胃口。那么，到底是谁放的这个空气，有什么好处？他决定去问问自己的恩人，于是写了封信给里根，表示自己并未要求下野，也不知报上怎么会登这样的消息；还说情报部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里根很快就打电话来了。他说，我如果连任，当然希望你继续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只要我当总统，你总是我在中央情报局的人。"凯西大为满意，真想马上跑到白宫去亲吻总统。他真喜欢这个人。本来嘛，行政管理上的好经验是：选好了人，让他干下去。

第十九章

9月间，凯西在总部花了许多时间提醒大家警惕，在大选的最后几星期，恐怖分子有可能进行袭击。他明确说，整个情报界都在警惕恐怖行动。他怕的是如果疯狂的爆炸者再次袭击，会使人们认为美国软弱无能，其政治影响相当可观。里根总统主张强硬，但近几年的事件表明，它连恐怖行动也制止不了，还能说是不软弱吗？

最近17个月来，凯西花了不少本钱在这个问题上，训练人员，和别国交换情报，在100多个国家建立了情报网。中央情报局在40个国家的能力提高了，他们搞准军事训练，演习营救人质，保护重要人物。中央情报局刚训练了60名黎巴嫩人。情报局总部里有近50名人员专门负责对付恐怖主义，国家安全局和各兵种的情报部门还有好几十人。凯西要求出成绩，近来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表明，西班牙驻黎巴嫩大使被人跟踪，他被劝说赶快离开，可他不听，结果被绑架了。

因为号召大家警惕恐怖行动，情报越来越多了。有些秘密情报说，伊朗人在外交特权的掩护下，在他们驻大马士革使馆进行活动，运走了一些炸药和定时炸弹。8月间，有情报说，那些爆炸物已运进了黎巴嫩，但到此线索就断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撤离，只有美国大使官邸和大使馆办公楼是剩下的主要目标了。

9月20日，星期四，上午11点40分，一辆挂外交牌照的面包车开到位于贝鲁特东区的美国大使馆办公楼前，沿着为了迫使车辆慢行的一排混凝土路障，弯来拐去地行驶。一名警卫打响了他的M—16冲锋枪。来访的英国大使的警卫也开了火，他打了五发子弹，射进面包车里。但面包车仍往前开，冲向一辆停着的汽车，离通向使馆地下室车库的斜坡只有30英尺。这时，面包车里引爆了，炸开了一个直径26英尺的大洞。至少有24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美国警卫。另有90人受伤，包括美国大使雷金纳德·巴塞洛缪。他被压在砖砾堆里，但爬了出来，只受了点轻伤。

凯西很生气。后来得到的绝密空中照片表明，有一辆同样类型的面包车曾在贝卡谷地练习冲击模拟的美国使馆建筑。美国情报人员认为，这次爆炸的主谋和1983年炸美国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营地的一样，都是"真主党"和那个名叫希基·法德拉拉的老头。凯西看出，由于大选临近，白宫不想搞报复行动。

一位黎巴嫩情报部门的中校事后告诉美方出事前的经过，非常有意思，表明这次行动是经过周密策划的。那天早上，那辆面包车从西贝鲁特的穆斯林区出发，两名从犯穿着黎巴嫩警察的制服，乘坐一辆BMW牌桔黄色小轿车紧跟在后面。在驶往美国使馆的途中，面包车无意中撞着了一辆"奥普尔"牌小轿车。这辆小轿车的司机走了出来，找面包车的司机评理。面包车司机一言不发，似乎很紧张。他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头一点不转动。那辆"奥普尔"小轿车的司机无法引起他的注意。此时，后面那两个从犯走过来，给了"奥普尔"轿车的司机2000黎巴嫩镑、约合300美元，比修理那辆车的钱多许多倍。司机得了钱，就开走了。10分钟后，一名目睹这段插曲的黎巴嫩人听到美国使馆的爆炸声，

就去黎巴嫩情报局作了上述报告。他们到处找那“奥普尔”轿车的司机，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央情报局对这段经过不太相信，但可以看出面包车的司机在执行这项自杀任务前被迫服了某种药物。

9月20日的爆炸事件在情报问题上引发了一场戏。凯西去到白宫，对这个事件作了一番解释。他的答复很简单，他回溯到十年前丘奇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回溯到卡特政府时期。他说，这两件事摧毁了中央情报局的精神。那时，他们认为搞情报渗透发展间谍这种事很麻烦，有时造成的麻烦比好处多。因此，他接管了四年，还不能建立起间谍网。

例如，卡特总统在1977年停止了给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津贴，因为报界发现了这事，卡特也觉得这种作法不大光彩。凯西主持中央情报局后，又和约旦开始合搞秘密行动，交换关于恐怖分子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报。但是，因为曾经被卡特公开伤害过，侯赛因国王总是心有余悸，不敢再信任中央情报局。凯西说，中东人民对往事的教训总是记忆犹新。

里根支持凯西的论点。贝鲁特美国使馆挨炸后六天，总统在俄亥俄州进行竞选。一个学生问他美国驻外使馆的安全问题。总统回答说，“由于在我就职前，我国情报能力几乎完全被破坏，所以我们现在尝到后果了。”他还说，过去的态度是“间谍工作总不大光彩，还是不要那些情报间谍吧……因此大量取消间谍人员。”

如果说，这种攻击的目标还不太清楚的话，那么后来白宫助手们的话可更明确了。他们向记者表示，目标就是卡特和特纳。卡特第二天就反击了。他说，里根的指责“是对个人的侮辱，含义太恶劣，不能忽视。”卡特还说，里根的指责是

"完全错误的"，中东的灾难是"里根自己十分错误的政策和对已知危险缺乏足够的安全防范造成的结果"。

特纳也公开反击。他念声明时声音都几乎发抖了。他的声明说："里根先生的评论太不象话，有失总统身份。损害中央情报局的是里根，他把品格有问题的人放在中央情报局……他任用凯西，使中央情报局也政治化了。"他问道，"你们今天看到人家怎么描写中央情报局吗？你们看到的是，有这么一位局长，他搞见不得人的金融交易，参与尼加拉瓜的秘密战争，此事是否合法和妥当大成问题……怪不得他们没有在贝鲁特收集情报，因为他们忙于企图破坏尼加拉瓜政府。"

凯西对这些反击的言论仔细阅读，但不准备参加党派之间的互相攻击。他也拒绝作公开评论。但他知道里根讲话的意思。争论的问题不是数字、金钱或人事，真正的问题是特纳造成的气氛和不信任感。凯西认为，中央情报局的精神是敢说敢做，特纳却把它变成"可别这么做"。

10月12日，星期五，凯西为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举行了一个招待会。一来是表示双方和解，二来是为了庆祝通过了一项新法律，使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人员和重要档案不再受"信息自由法"① 的限制。总统将在星期一签署这项法律，这使中央情报局的人感到好象卸掉了一个包袱似的。另外，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已重新改组，1982年通过了"情报人员身份法"，禁止随便公布情报人员的姓名，反间谍工作得到了加强，四年来情报工作经费增加了50%。这些

① 该法保障人民有权得到各种信息，但情报人员为保守国家机密，常删去出版物及档案中的某些段落，同时又要保证这种删节不影响人民获得信息的权利。——译者

成就表明，1980年共和党竞选纲领关于情报工作的主要要求都已实现了。凯西感到，成绩不错。

第二天是星期六，凯西却早就起来了。他今天仍要去总部办公，以推动工作，鼓励士气。他还约好一位高级助手来家吃早餐，顺便回顾四年来的成就。妻子索菲娅穿着浴衣就把早餐准备好了，有苹果汁、煎鸡旦、火腿和一大堆烤面包。凯西坐在餐桌旁，感到轻松愉快，怡然自得。

索菲娅始终是他的贤内助，给他全面支持。在约翰·卡里著的小说里，英国间谍大师乔治·斯迈利的妻子安妮是个以自我为中心、水性杨花的人物。索菲娅可截然相反，她爱情专一，一头短发，不尚奢华，只喷点发乳。自从他俩在二次大战中华盛顿诞辰那天结婚以来，她始终厮守着他。他们的婚姻就象教会那样神圣坚贞。和斯迈利相比，在妻子问题上，凯西可比那位英国间谍大师幸福多了。

局长大人认为，他在中央情报局完成了一件任务，那就是传播了里根政府的明确信息：爱美国，讲实力。世界并没有比过去更安全，因为俄国人还在不断扩张，但美国已有更好的条件去对付。

有人说他热衷于搞秘密行动，他断然否认，说那是“胡说八道”。他说，他的主要工作仍是收集情报，加以分析，上报白宫。他说，“我是首席分析员。”

凯西认为，里根政府在扭转形势方面的最大收获之一是苏联的转变。苏联受到了挫折，它的经济一团混乱，贪污腐败盛行。苏联已基本上停止了他们叫嚷的“我们代表着未来”的宣传，因为他们确实也代表不了。凯西环顾世界，明显看到通过对叛乱者提供秘密行动支援，已经出现了一些可喜现象。归纳如下：

- 特别来说，阿富汗的行动有好消息。在陆地、山区和艰险地带，俄国人都狠狠地挨揍，中央情报局的支援正在增加。
- 在安哥拉，虽然美国已禁止提供秘密援助，但那里有一支25万人的反叛运动，领导人是若纳斯·萨文比。
- 在柬埔寨，约有五万人在抗击越军，双方几乎已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而越军是名列世界第四的军队。可惜中央情报局给的援助每年只有500万美元。
- 在埃塞俄比亚，抵抗马克思主义政府的形势也不错，但大部分实质性援助秘密地来自沙特阿拉伯，中央情报局只提供非军事援助。
- 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仍活跃，尽管美国已停止支援。总的来说，这个有争议的行动仍是一大成就。如果举行公正的选举，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会失败。由于天主教会的反对和反政府武装的压力，桑解阵得到的支持正在瓦解。
- 在萨尔瓦多，美国支持的军队与四支反政府队伍作战，咄咄逼人。情报表明，苏联和古巴已认识到他们在这里不能打赢，愿意撤出，以巩固他们在尼加拉瓜的地位。如果当初不坚持施加压力，美国可能已经丢失萨尔瓦多了。

凯西承认，有些行动比较混乱，有风险，甚至很危险。但如果不干，那只好重新采用卡特时代的办法，随波逐流，无所作为。中央情报局不能一天到晚只想到自己的名声如何。它是为总统服务的，如果总统的政策挨骂，那么中央情报局岂能逃脱？还有国务院和军方，他们也逃脱不了。这几个部门不是脆弱的，他们经得起挫折和批评。

凯西心想，自己事业心强，一直在推动工作。算算计分牌，还有下列几件重要成就：

- **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苏联支持一批人，开设了几百家贸易公司，绕过美国法律限制，购买美国尖端技术设备和计划。**

- 改进了对苏联的全面侦察。在监听苏联导弹潜水艇方面使用了更好的技术。
- 派情报人员打入国际银行界，从而不断得到许多外国银行秘密帐本上的真正数字，从中发现苏联在国外有秘密投资。
- 中央情报局改进反间谍工作后，实现了一些新的渗透。同时，也有不少高级克格勃人员叛逃到美国来，不能公布；中央情报局怀疑这些人是双重间谍。
- 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范围第一次接近于遍及全世界。努力的目标是在世界上每个国家，不管多么遥远，不管多小，都要有中央情报局的人或情报来源。在第三世界新招募了一批间谍，在中美洲增加了一倍。
- 集中注意一些长远的问题。中央情报局是系统地观察可能在五到十年或更长时间内发生的潜在问题的唯一机构。它研究第三世界到公元2000年时的情况，包括粮食来源、水、经济发展。考虑的问题包括：墨西哥市人口达到4000万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拉丁美洲供应毒品将来会产生什么影响；汽车越来越多地使用塑料制造，铝用得越来越少，这对拥有铝土矿的国家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苏里南就是一例，它的国民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二来自铝土矿收入）。早点认识到些问题，可以少花些钱。
- 关于裁军，凯西不想预测将来达成的协议是否可以核查，他反正不相信裁军。
- 每季度印发一份局势不稳定的国家的名单，名列第一的是菲律宾，既有叛乱，又有政治不稳定。

凯西的中央情报局只为六位真正的主顾服务——总统、副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既不为国会服务，也不为新闻界或公众服务。

国家安全局的窃听工作现已十分全面，有些能看到较多内部材料的高级官员，有时竟会看到他们自己说的话被报告回来。例如，某位内阁阁员无意中参加了外国使馆的招待会，

结果竟使自己感到难堪。因为第二天早上窃听到的情报上有那位外国大使发回本国首都的电报，里面引用某位美国官员在招待会上说的话。尽管按国家安全局的规定，美国人的姓名是删掉的，但报纸上的社交栏会登出哪些人参加了那次使馆招待会，稍作一点侦查工作就可判定是谁讲了那句话。

这些窃听还使美方得知驻华盛顿的外国大使有多少次歪曲报道了事实，有多少次夸大了他们和美国高级官员的亲密程度。其实，美国高级官员有时故意减少他们和使馆人员的来往，而且尽量避免参加使馆酒会。

有一次，窃听到的情报表明，日本人在美国国务院里发展了一个很有用的间谍，专门报告贸易谈判方面的情报。这份窃听到的情报把美方的立场一一列明，而与谈判有关的其他单位此时都还没有看到这些立场。美国官员看到这份情报后，无不大吃一惊。凯西却洋洋得意。他正在扭转趋势，使美国在一切战线上都恢复了胜利者的地位。间谍工作的根子非常理想，为美国而战斗是值得的，哪怕战斗很艰苦而且肮脏，也是值得的。凯西对本局的工作感到还满意，如果按十分制评分的话，可以评七分，也算好分数，但还不是最好的，应当做得更好。这就是他星期六也主动加班的原因。

第二天是星期日，凯西看到美联社电讯报道说，发现中央情报局有一本训练游击战的手册，教导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有选择地使用暴力”，来“中立经过仔细选择和计划的目标，例如法官、警察和国家安全官员等。”星期三，《纽约时报》在头版登了这条消息，标题是“中央情报局手册教导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如何杀人。”所谓“中立”，自然是指暗杀，这是无法回避的。这个有90页篇幅的手册还劝反政府

武装"绑架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的一切官员和代理人。"

凯西没有看过这本手册，但他知道这可是爆炸性的新闻。一年前，凯西访问中美洲后，中央情报局编印了一本手册，名为"游击战中的心理行动。"目的是要教育反政府武装懂得政治，下山来，进村庄，搞宣传，建立政治组织，争取群众支持。

现在报上登了这事，凯西赶紧找了这本手册来看。原来这本手册内容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而且多处自相矛盾，还充满革命口号，什么"自我批评"呀，"集体讨论"呀，都有。另一处则说，要搞"内含的恐怖"，不要搞"明显的恐怖。"

有一章的标题的确是"有选择地使用暴力以达到宣传效果。"下面就用了"中立"这个词。还说，选中了某个桑解阵的官员后，就有必要"把受害的群众集合起来，让他们参加控诉压迫者。"有的版本里还有这样一句话："如可能，可雇用职业杀手去执行有选择的任务。"这不免使人回忆起，60年代初期，中央情报局曾雇佣黑手党杀手约翰·罗塞利去暗杀卡斯特罗。那是多么令人难堪啊！

结果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暴。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兰说，"这本手册宣扬的是列宁主义，不是杰斐逊主义。它包含着共产党的革命策略，而这种策略是美国发誓要在全世界去击败它的。"戈德华特要求中央情报局负责人到参院情报委员会去向全体委员汇报。还有人要求政府指派特别检察官进行审查。民主党人则指控美国政府倡导恐怖主义。到了这天晚上，凯西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

第二天，白宫以总统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本政府从未主张或赞成政治暗杀或任何袭击平民之事，今后也不会。"白宫还指示凯西，命令中央情报局的督察长先在内部进行调查。总统的情报监督委员会也奉命调查此案。参众两

院的情报委员会则分别搞自己的调查。

10月21日，星期日，里根和蒙代尔举行第二次电视辩论。辩论时，由一批著名新闻记者提问。专栏作家乔治·盖耶首先尖锐地提出暗杀手册问题。他说，“实际上，这难道不是我们国家自己倡导的恐怖主义吗？”

里根说，不是，载有暗杀字眼的手册一共只印了12本，是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负责人监督印刷出版的。

盖耶马上抓住后一句话，接着追问道，“总统先生，你是在暗示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指挥反政府武装吗？”

里根赶忙分辩说，“我想我刚才说错了话，没有人在那里指挥反政府武装。”他又补充说，是中央情报局驻在中美洲另一处的人编印那本手册的。

蒙代尔乘机进攻，他问道，“总统宣誓就职时，他的职责是什么？”然后就政治恐怖和暗杀问题教训了里根一通。

里根在这场辩论中支支吾吾，结结巴巴，表现很糟。许多人问，总统是否衰老了。《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消息里公开直接地问道，“竞选中的新问题：最老的总统是不是显老了？”

凯西很忧虑，这件事隐伏着大灾难。参院情报委员会又要开会调查。凯西急忙去找戈德华特帮忙，但他不在，回亚利桑那老家去了。凯西又连忙派了两名高级官员使用化名坐飞机去亚利桑那面见戈德华特，恳求他回来帮忙。但这位老人无论如何不肯。两位官员只好空手回来。

尽管如此，里根还是重新当选了。11月6日，开票结果，里根赢得59%的选票，在49个州得胜，蒙代尔只在家乡明尼苏达州和首都所在地哥伦比亚特区得胜。

第二十章

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壁炉里的火焰闪烁着，使参加大选胜利后这个秋天下午会议的人们感到亲切，甚至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凯西带着文件和写在单页纸上的讲话口径稿，踱进了这间办公室。他早已成竹在胸，现在总统既已连任，是把计划拿出来的时候了。他想的是请总统批准一项计划，指示中央情报局在中东训练和支持几小队外国人，由他们去对恐怖分子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如果有情报表明，有人将要袭击美国设施，如大使馆或军事基地，这些小队就可以活动开来，干掉那些恐怖分子，或使他们无法活动。总统知道，那些亡命之徒和自杀爆炸手的行为，显然使人认为美国政府软弱无能，因此他同意采取对策。

温伯格拒绝出动军队。用战列舰“新泽西号”炮轰黎巴嫩的办法并不成功，太猛烈了，太漫无目标，没有具体的准确目标。用飞机进行空袭又会把无辜的老百姓和恐怖分子一起炸死。因此，国防部的信号是，谢谢，我们干不了。

凯西自己的中央情报局也是勉强被拖进来的。麦克马洪说，谢谢，我们干不了，中央情报局只搞情报工作，不会杀人。但凯西坚持要干，舒尔茨也支持他。

凯西向总统解释说，这个计划只是训练和把那些小队部署到适当地方去。如果要真正采取某项具体任务，还得另订计划，报告总统。以色列人对搞这种秘密的先发制人工作很

有经验，但美国政府不应同他们合作。美国如果采取任何行动，都要让人们看到是反恐怖主义，不是反阿拉伯人。

如果运气好，没有人会知道这些小队的存在。开始时，只须训练三个小队，每队五人，部署在黎巴嫩境内。搞任何先发制人的袭击，都会在伪装掩护下进行 不会让人追查到是中央情报局或美国干的，大家都可以矢口抵赖。

总统叫凯西通知国会两院的情报委员会，但援引法律规定，只允许他通知八个人——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以及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领袖。

凯西说，好，我亲自去办，这样可以强调事情的敏感性。不能让喜欢哇啦哇啦的工作人员知道。他看到这是个机会，中央情报局可以表现自己有能耐，会搞真正机密的行动。

里根签署了正式报告和附发的国家安全决定指示。在黎巴嫩建立这些小队的初步费用约为100万美元，若计划扩展到其他国家，费用将增至530万美元。

参加会议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少将后来对一个同事描绘这天下午的会议说，“凯西咕哝咕哝地讲，总统不住地点头。”当时波因德克斯特是麦克法兰的副手。

凯西决定要把此事办成。麦克马洪一直反对，提出许多疑问：那些外国人能信任吗？能控制住他们吗？如果能控制他们，那不等于说中央情报局也参与暗杀行动了？斯波金帮助凯西想了一通道理，他说先发制人无非好比有人拿枪对着警察，于是警察先开了枪。他说，这叫“先发制人的自卫”。

凯西的目标是贝鲁特。过去八个月发生的事，在中央情报局造成了感情上的危机。3月16日，威廉·巴克利在贝鲁特被绑架，报上说他是美国使馆的政治官员，但实际上他是凯西的驻贝鲁特分站站长。凯西肯定，那些绑架巴克利的穆斯

林极端分子知道巴克利是什么人。凯西想尽了一切方法要把巴克利救出来，还派了联邦调查局的一组专家去贝鲁特寻找巴克利的下落，花了一个月时间，结果一无所获。

凯西决定去找沙特阿拉伯的情报局和法赫德国王帮助。他们答允帮忙出300万美元资助。

1985年初的一天，沙特大使班达尔亲王收到国王交信使带来的一封信。信中秘密指示班达尔和凯西合作。班达尔立即去见凯西，但凯西提出改在周末到班达尔的官邸吃中饭时再谈。

凯西带了索菲娅一起去，她也记得过去和凯西一起去看过这幢房子，那时他们曾想买下它，凯西特别喜欢那间大书房。午餐后，凯西和班达尔到花园里去密谈。凯西拿出一张卡片，交给班达尔，那上面写着日内瓦一家银行的帐号。他说，沙特捐助的300万美元就存入那帐号好了。

班达尔和凯西商量好，对恐怖分子给予戏剧性的打击，符合美国和沙特的利益。他们知道，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持者是原教旨派穆斯林领袖法德拉拉，他也是“真主党”的党魁。他们商定，要干掉法德拉拉。

后来决定由沙特情报局去负责指挥实际行动。他们又找到一个英国人负责部署行动。他过去曾在英国空军特别服务部工作，该部其实是特种突击队。双方讲好，如果事败，中央情报局绝不承认与此有关。凯西也从来不把这种机密工作告诉国会人士。于是，那个英国人又去雇了几个人执行具体任务。

1985年3月8日，一辆满装炸药的汽车开到贝鲁特郊外，离法德拉拉的住宅只有50码远。汽车引爆后，炸死了80人，伤200人，大火燃烧，房屋倒塌。但法德拉拉却逃跑了，丝毫未伤。

现在法德拉拉更是一个麻烦了。于是沙特阿拉伯派人和

他联系，问他是否愿接受200万美元的现金，然后请他今后对恐怖分子袭击沙特和美国设施前，事先报个信息。法德拉拉居然接受了，但说他不要现金，而改用食品、医药用品和教育费等支付，给他手下的人用。沙特方面同意照办。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法德拉拉支持的以美国为目标的恐怖行动。班达尔说，“贿赂他倒比杀死他更容易。”凯西也感到惊奇，这么一小笔钱，居然能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但巴克利还是没有找到。

后来班达尔又应凯西的请求，帮他搞了两次秘密行动。一次是资助乍得的反卡扎菲力量，沙特捐助了800万美元。另一次是花200万美元帮助在意大利搞秘密行动，阻止意共取得政权。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两起都是沙特搞的。

3月8日美国使馆挨炸前后，凯西收到一项十分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是从苏联国内一个重要的、机密的消息灵通人士发来的。中央情报局一直在注意苏联领导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病情，那时他上台才刚刚一年多。情报说，他已经死了，但政治局还在考虑选谁当新的领导人，所以瞒着苏联人民和全世界，迟不发表。凯西把这条情报告诉了白宫。几天过去了，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但凯西很有信心。3月10日，星期日，一位正在美国访问的苏联高级官员忽然被召回国，第二天就传来了无庸置疑的讯号：莫斯科电台停播普通节目，只放送古典音乐，包括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清晨6点，宣布了契尔年科逝世的消息。四小时后，苏联又宣布说，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被选为新的总书记，他是苏共10名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个。继承问题解决得如此迅速，说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是正确的。凯西认为，契尔年科

的死讯被隐瞒了几天。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大成就，因为没有别的任务比观察苏联领导层动静更重要的了。但是，细节一点也没有打听到，讨论继任人选的情况丝毫不知道，却又说明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制度的内幕知道得很少。所以，离理想的情报工作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凯西看到报刊上称赞戈尔巴乔夫是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讲求实际，坦率开朗，感到很好笑。在凯西看来，戈尔巴乔夫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苏联制度的产物。说什么可以期望戈尔巴乔夫不同于他的三位前任——勃列日涅夫、安德罗彼夫和契尔年科，这只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凯西预料，戈尔巴乔夫只会更起劲地输出革命和制造麻烦。因此，凯西报告白宫说，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住了。

1985年1月20日，里根举行第二任的就职典礼后，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和财政部长里甘对换了职务。凯西对此感到很高兴。贝克当主任时，总是独断专行地排总统的日程，使总统忙得不亦乐乎，负担很重。而贝克、米斯和迪弗这三巨头一天到晚互相竞争，非要置对方于死地似的，使总统也很烦恼。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作任务都无法实现。与此相反，里甘是个百万富翁，过去是梅里尔—林奇股票公司的负责人，他的作风是要求白宫工作人员步调一致，听他指挥，大家一起贯彻总统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里根可以比从前轻松自在。他可以更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过去开会，按贝克的那套办法，里根总要考虑到国会、新闻界、“华盛顿内部”等各方面的利益。现在不同了，里甘先请总统发言，问他的要求是什么，首先尊重他的真正想法。凯西认为，又有机会团结一致，去找国会要钱支援反政府武

装了。但他跑到两院情报委员会去时，那些议员老爷却先问他，反政府武装什么时候才能取得点成就啊？他听了很生气，回答说，“没有什么他娘的水晶球。”①

第二任开始不久，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于2月11日应邀访问华盛顿。几天前，麦克法兰和班达尔曾举行会谈，商量如何保证让国王受到特殊的重视。最后协议是采用国王和里根总统举行秘密会谈这一形式。

麦克法兰和班达尔会谈时，又提起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问题。麦克法兰感到班达尔愿意主动帮忙。班达尔则感到麦克法兰显然是在试探他。不管怎样，后来班达尔还是表示，沙特愿意把秘密捐助的款项增加一倍，每月给200万美元。总计，沙特愿意至少再给1500万美元。

2月12日，里根和法赫德秘密会谈，时间不长。国王明确对总统说，沙特对反政府武装的捐助增加了。里根表示感谢。但麦克法兰仍感到忧虑，他认为这只是临时安排，真要有效，还得敦请国会拨款。

总统接受凯西的意见，公开讲话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他说，反政府武装是“我们的弟兄”，“我们不能在他们需要之际撒手不管”。他说，美国的目标是要叫那些桑地诺分子急得哭喊“叔叔救我”。后来里根又说，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从精神作用来说，好比当初美国的那些开国元勋。

凯西担心的是，白宫对国会即将讨论反政府武装问题没有制订什么战略。他个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是个反面形象，得保持低姿态。国会投票表决的那个星期，他飞到匹兹堡发表演说、会见报界。白宫这边，好象根本没有人在

---

① 美俚语，意思是天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译者

家似的。4月24日，众院那些反对反政府武装的民主党人提出把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有人提出拨款1400万美元用于非军事支援，也以215票对213票被击败了。凯西象中了雷击似的，十分震惊。只差两票，就可以获胜。他说，如果奥尼尔议长没有那位写信告状的天主教修女朋友，我们就会得到给反政府武装的援助了。

凯西经常到全国各地演讲。我第一次听他演讲，是1985年4月17日，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主办的一次会议上，题目是恐怖主义。他站在讲台后面讲了45分钟，声音模糊，弯腰驼背，很难听清楚，也听不完整。他的讲稿长达21页，他在开讲前给了我一份副本。其中有两句如下：

"在条件许可动武的地方，我们不能也不会放弃使用武力，去阻止、先发制人地打击或回答恐怖行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有我们需要的专门力量和能力，去采取对付恐怖集团的行动。"

凯西没有想到在他的讲话末尾作个结论或者结束语。他讲完时，干脆就突然停住，因此听众中没有谁意识到他已经讲完了。后来他才说，"非常感谢你们。"掌声零零落落，不大热烈。接着，他又站起来回答问题，约20分钟。然后就表示自己疲倦了。

听众大部分是保守派学者。有一个人显然与众不同，他提的问题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区别是什么？"凯西怒气冲冲地问道，"什么？"那人又把他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凯西踌躇了半天，最后才说，"反政府武装有国家，并且想把它夺回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没有国家。"

局长大人知道我正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央情报局的书，于是他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搭他的专机回华盛顿。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我赶紧退了旅馆的房间。他也从旅馆出来，穿着一件刚买的崭新大衣，看样子价钱很昂贵，但钮扣都来不及扣整齐，好象一个孩子，是妈妈替他穿上的衣服。

他在飞机上对我说，心里有点不安，因为没有带一个中央情报局的人来听，他不大愿意单独回答记者的提问。但他还是对我讲了好多事，包括当年的老局长多诺万将军、新研制的全天候卫星、尼加拉瓜行动、被绑架的贝鲁特分站站长巴克利、他自1940年以来参加过的历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里根总统、里根的内阁、麦克马洪和中央情报局。关于他的父亲，他只讲了一句话："按照纽约市的退休金制度，他一生都是一名公务员。"

两星期后，我又飞到纽约，听他在大都会俱乐部作午餐演说。

他说，通常他总是讲情报问题，那个问题他讲起来不大自由，因此今天他要讲世界形势，可以随心所欲地讲。听众哄堂大笑。他说，美国实际上已经在和苏联打仗，而且"不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他把当今的形势和战前各国没有认真注意希特勒的情况作了对比，认为很相似。他说，马列主义带来了《圣经·新约》中《启示录》所说的"四骑士"——饥荒、瘟疫、战争和死亡。

他一反常态，玩弄词藻，施放排炮，点名攻击，说道："在那些被占领的国家——阿富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尼加拉瓜，马克思主义政权或者是强加于人，或者是由外力维持……这些地方发生的大屠杀，可与40多年前纳粹德国在欧洲进行的大屠杀相媲美。"

他再次邀请我搭他的专机回首都。我们谈到里根、反政府武装、黎巴嫩、恐怖主义、他的朋友们、他的财富、他的目标。他谈到住在纽约昆斯区时的童年，那是一个单纯、大家保持永久关系的天地。他先后在第13和第89公立小学上学，来回路上常有打架斗殴之事。那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代，男孩们就爱围成一堆，大打出手。他说，“有时打赢，有时打输。”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些打败过他的孩子。他瞪着眼睛说，“当然，你认为我会忘掉谁？特别是那些打败过我的人。”

很快他又谈到反政府武装和国会表决未获通过问题。他说，“莫名其妙的处理办法，白宫不可能同时做两件事情……总统没有兴趣。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苏联扩张主义正在匍匐前进。”

凯西对总统的全面消极态度感到吃惊。总统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都是消极的。他从来不主持会议，也不规定每天的工作日程。星期一、二、四，总统从早上9点工作到下午5点，星期三从9点到下午1点，然后就去骑马或运动；星期五他下午1点到3点之间就离开白宫，到戴维营别墅去了。就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工作时，他也常常有很多空闲时间，每天总有两、三个钟点之多。这时他会叫人把崇拜者写来的信拿来，然后一一作复。晚上他多半是和南希一起在官邸里，他们喜爱边看电视，边捧着托盘吃晚饭。星期六晚上常是在戴维营，有时招待外国来客，或者连看两部电影，有老的也有新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一起看。凯西似乎认为，这样的生活是有权力而不去行使，有责任而不去完成。

凯西发现里根这人有点古怪。里根曾说，如果他当初演电影比较成功的话，他很可能会一辈子演下去的。他总是怡然

自得，喜笑颜开。但他除了南希外，大概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他生性懒惰，心不在焉，但记忆力倒特别好，比得上半架照相机，能够在若干分钟内便把一页讲话稿背得滚瓜烂熟。凯西早就一本正经地向里根学习，认真地对他进行研究，可直到如今还没有把他摸透。

飞机在安得鲁斯空军基地降落，凯西从那里坐另一架飞机前往远东作10天的访问。菲律宾正在闹事，他准备去那里会见马科斯总统。

众院拒绝援助反政府武装之后几天，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就飞往莫斯科，要求苏联给他200万美元。许多投票反对援助反政府武装的议员都大吃一惊，有些议员说，如果他们事先知道奥尔特加会这样做的话，他们倒是会投赞成票的。凯西可说不清楚，是谁把时间定错了，是美国政府呢，还是奥尔特加。

凯西知道，国会拒绝拨款并不一定就走投无路了。白宫那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诺思想出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他写了一份备忘录给麦克法兰，建议总统公开要求私人捐款支援反政府武装。麦克法兰叫他等一些时候再提此议，但同意先设立“尼加拉瓜自由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可以作为一个免税的法人团体，这样捐款人就可以在交所得税时扣除捐款部分。诺思计算，再得1500万到2000万美元，他们就可以把反政府武装力量扩充到35000人。

诺思还联系了南朝鲜和台湾方面也捐款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而且他还抬高了自己在行动方面的作用，有一次他建议击沉一条商船“莫尼波号”，因为它运载军火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第二十一章

5月14日，凯西看到一份备忘录，题为“对伊朗应有一项政策”。这是他的负责近东和南亚的国家情报官员格雷厄姆·富勒写的，共五页。

备忘录说，“美国面临着对伊朗研究一项新政策的严峻形势……霍梅尼政权摇摇欲坠，也许正在走向承认真理的时刻；不久我们就会看到一场争当接班人的斗争。美国几乎没有什么牌可打，苏联倒有许多牌可打。”

富勒提到美国政策的“两大支柱”——不卖武器给伊朗和准备反击伊朗主使的恐怖行动。他争辩说，这些政策已经完全走向反面了，“现在恐怖是更多地有助于苏联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他说，“但是，迫在眉睫的是，我们也许应当设想一套更大胆——也许是更危险——的政策，这种政策将至少保证美国在正发展中的形势面前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关于如何使我们回到德黑兰去，没有人提出任何英明的主意。”

凯西感到，是拿出点好主意的时候了。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催促富勒想点好主意。他已经下了决心，在第二任内，中央情报局每个月都要做成几件事，要做点有意义的事。他有这种自由，可以采取主动，可以把事情做成，可以抛出一些新的主意。他把富勒的备忘录寄了一份给舒尔茨。

三天后，凯西高兴地看到，国家安全委员会麦克法兰的

几个部下起草了一个国家安全决定指示，呈请总统签署。这个指示提议授权美国政府卖一些武器给伊朗。措词很微妙，说道，“这包括提供一些经过选择的军事装备，在逐案审查的基础上决定。”

凯西写信给麦克法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起草的关于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指示，特别是其中强调有必要采取具体和及时的步骤，增强美国的活动余地，以保证不使苏联在这个处于危急关头的国家发生变革和动乱时成为主要受益者。”

舒尔茨写信给麦克法兰说，他不同意，特别是“当与伊朗有联系的集团正在黎巴嫩扣押美国人质的时候。”温伯格在他得到的那份指示草稿副本上批注道，“荒谬”；他认为这和邀请卡扎菲来吃一顿舒服的午餐一样荒唐可笑。

但凯西认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不同意，并不一定等于这个主意就完蛋了。

在贝鲁特那边，美国人还在不断地被抓走。5月28日，美利坚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戴维·雅各布森被人绑架。中央情报局分站站长巴克利被囚禁则已超过一年。人们认为，得采取点措施，那怕是非常规的措施也可以。

白宫里面，诺思拟订了一个计划。美国毒品管理局的两名特工人员同他们雇用在中东侦查海洛因贩运情况的一名情报员联系；这个情报员说，花20万美元就可以把两名美国人质弄出来，其中一名是巴克利。中央情报局的人们十分怀疑，美国的政策是不付赎金给绑票者，而且谁敢肯定那个情报员靠得住？但是，经总统批准，麦克法兰搞了个筹措私人捐款的计划。任务落到诺思肩上，他去联系得克萨斯州的一个亿万富翁罗斯·佩罗特。此人曾在1979年雇用一个七人突

击队，把他在伊朗被扣押的两名职员营救出来。作家肯·福莱特的畅销书《鹰翼》和一部电视片曾叙述过这个惊险故事。佩罗特自1982年以来就担任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委员，一直愿意帮助白宫。他马上就把钱寄来了。

1985年6月7日，诺思写了一个四页长的备忘录给麦克法兰，注明“绝密，不得外传，敏感问题，行动问题。”诺思说，原来讲的20万美元，只是分期付款的第一期付款费，他已在华盛顿会见了那个情报员，对方说要释放人质，每个人要付100万美元，因为要分赃的人多，价钱不能再低了。麦克法兰在“批准”栏内签上了他的名字，20万美元也交给了情报员，但结果如同石沉大海。

1985年6月14日，两名黎巴嫩男子劫持了从雅典飞往罗马的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7航班机，强迫它先飞到贝鲁特着陆，然后又飞到阿尔及尔。从此就开始了长达17天的扣押人质过程，其间电视不断播送实况。电视记者们同驾驶员谈话，不断播放被劫持的情景。白宫的形势室、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中心，以及世界各国，都从电视上得到最新的消息。最后，乘客除美国海军水手罗伯特·斯特桑姆被杀害外，其余全部被释放，无人受伤。

凯西虽然不知道劫持847航班机的幕后主使者是谁，但中央情报局的全面分析仍认为卡扎菲和利比亚是恐怖主义的主谋。从窃听电报通讯看出，卡扎菲在这方面最积极，而且总是粗枝大叶，留下痕迹。相比之下，叙利亚和伊朗倒是比较隐蔽。情报表明，利比亚对30个集团——包括反叛者、激进派和恐怖分子——提供金钱、武器、行动基地、旅行便利和训练。

中央情报局还印发了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标明卡扎菲的

活动情况。得到卡扎菲支援搞叛乱或恐怖行动的国家都涂上红色，计有：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多米尼加、西班牙、土耳其、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尼日尔、乍得、苏丹、纳米比亚和另外八个非洲国家。

还有一些国家涂成黄色，以表示卡扎菲对这些地方的反对派或左派提供经济援助。计有：奥地利、英国、哥斯达黎加、圣卢西亚、多米尼加、安提瓜和澳大利亚。

另外一张地图上则画了一个大圆圈，以利比亚为中心，扩展到非洲北部、地中海和莫斯科。这个圆圈是卡扎菲可以动用他的苏制图22型轰炸机和F级潜水艇，施展其军事力量的范围。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认为，如果美国不进行报复，听任卡扎菲为所欲为，或者他认为美国要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命或企图积极推翻他的政权，那么卡扎菲很可能要直接袭击美国的人员或设施。

凯西对这些估计很赞赏，认为讲到了点子上。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却不太同意，他们认为卡扎菲的第一目标是打击他的反对者，第二目标是取得地区性霸权。与此同时，各有关单位不断收集情报，设想对策。

847航班机被劫持后，美国政府很想采取行动。7月中旬，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在白宫开会。里根和其他高级外交政策顾问都出席了。麦克法兰首先讲话，提出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都不足以约束卡扎菲，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凯西、舒尔茨、温伯格和其他人都同意。这种广泛的一致性是少见的，最后采纳了一个全面计划。

这个绝密的全面计划的代号叫“花”．包括各种反卡扎

菲的行动和计划。包括总统和凯西在内，只有二十几位官员知道这个计划。

“花”下面还有分计划。一个分计划代号叫“郁金香”，是由中央情报局执行的秘密行动，目的在于支持反卡扎菲的流亡运动，包括“拯救利比亚全国阵线”，并联合其他国家如埃及，以推翻卡扎菲。

另一个分计划代号叫“玫瑰”，准备联合美国的盟友特别是埃及对利比亚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将提供空中支援，一个目标是卡扎菲的兵营，据认为那里是军事或恐怖行动的协调中心。

有一次会议上，主要讨论的是几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这是不是搞暗杀？后来总统说，大家不必担忧法律禁止暗杀的问题，如果真把卡扎菲杀死了，总统愿意亲自承担压力。

这样，没有人再说话了，问题就此解决。

6月间847航班机劫持事件处于危机时，凯西的老朋友约翰·沙欣对他说，有一个人因为企图卖武器给伊朗而被控诉，此人对沙欣说，伊朗外交部很想用人质交换“陶”式反坦克导弹。后来，伊朗在帮助使847航班机乘客获释方面出了力。凯西认为这是一个讯号。

8月8日，凯西到白宫参加国家安全小组会议。总统、布什、舒尔茨、温伯格、里甘、麦克法兰和波因德克斯特都在座。麦克法兰提出一项计划，由以色列运送“陶”式反坦克导弹给伊朗，然后由美国如数补还以色列；伊朗则协助使美国在黎巴嫩的人质获释。

舒尔茨和温伯格都反对，但凯西喜欢这个建议。出这个

主意的是戴维·金奇，以色列外交部的第二号人物，过去是以色列情报局的第二号人物。早些时候，金奇把这个主意告诉麦克法兰时，曾要求他不要对美国政府里的任何人讲，但麦克法兰说他需要问问凯西个人的看法。于是，麦克法兰把这个主意讲给凯西听了。双方讲好，中央情报局不参加这个行动，免得还要通知国会的情报委员会。这种事可不能让国会知道。

诺思中校被指定为主管这次行动的官员。国务院发了一张护照给他，用的化名是"威廉·P·古德。"麦克法兰的副手波因德克斯特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电脑系统和诺思进行秘密联系，代号称为"私人空白支票"。

9月12日，诺思找查尔斯·艾伦联系，艾伦是凯西手下负责反恐怖主义的国家情报官员，是中央情报局里最熟悉伊朗情况的官员之一。诺思知道，伊朗是不能信任的，他要求得到一切有关情况。他还要求国家安全局跟踪在伊朗和黎巴嫩的某些人。其中一个是伊朗中间人马努彻·戈尔巴尼法尔。美方作好布置，对戈尔巴尼法尔的电话、电传和银行来往帐户都进行监视和窃听。在伊朗和以色列的武器交易中，戈尔巴尼法尔是关键的中间人。诺思指示，窃听到的情况，只送给凯西、麦克法兰、温伯格和他自己。舒尔茨和国务院的人全被排斥在外。

戈尔巴尼法尔在中央情报局是很有名的。自1974年起，他就是该局的一个秘密情报员。他一直冲劲十足，而且会乔装改扮，一半是政客，一半是生意人，同时还涉足情报界。但是，每当他送点所谓情报上门时，总不受欢迎。1981年，他对谣言火上加油，说什么利比亚敢死队来到美国要暗杀里根或他的高级助手。1983年，中央情报局断绝了和他的关

系。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也互不信任，从而使武器交易复杂化。伊朗说，要收到武器后才付钱，以色列则说要先付钱才能供应“陶”式导弹。为了打破僵局，戈尔巴尼法尔找到沙特阿拉伯商人阿德南·卡索吉，由他垫付500万美元，购买508枚“陶”式导弹。9月15日，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牧师被释放了。

这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仍在积极准备“玫瑰”计划，要搞美埃联合进攻利比亚。舒尔茨反对这样做。但麦克法兰仍派波因德克斯特继续主持，因为他自已忙于准备美苏首脑会晤。

波因德克斯特飞到开罗去见穆巴拉克总统。他对埃及总统说，里根保证美国出兵支援埃及进攻利比亚。但穆巴拉克说，什么时候干要由埃及决定。

10月间，意大利游船“阿基莱·劳罗号”被四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分子劫持，船上有乘客438人，其中一名69岁的美国老人利昂·克林霍弗坐在轮椅上被杀死，尸体扔到海里。游船停靠埃及港口，仍为恐怖分子控制。

10月10日清晨，美方窃听到穆巴拉克在电话里对他的外长说，那四名劫持者还在埃及。这与穆巴拉克公开说的这四人已离开埃及的说法完全不同。他还在电话里骂舒尔茨是“疯子”，居然以为埃及会把劫持者交给美国。他说，埃及是个阿拉伯国家，不能背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弟兄们。美方窃听到的内容都立即报告白宫。

上午11点，美方又窃听到穆巴拉克在电话里说，四名劫持者将在几小时内搭乘埃及的波音737民航机飞走。诺思知

道，这样准确的情报真是不可多得，而机会也不能错过。他向波因德克斯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用美国喷气战斗机拦截这架埃及飞机，强迫它降落在西西里岛的北约基地，然后生擒那四名劫持者。这个主意报告给当时在芝加哥的总统，他批准了。

下午，国家安全局又窃听到穆巴拉克的10次谈话，讨论的是运走劫持者的最后计划。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感到，他们两人就好象是坐在埃及总统办公室里一样，真是太棒了！穆巴拉克正在那里大骂手下的人，为什么不把美国老头克林霍弗被杀之事早点报告他。他知道，美国会为此进行报复的。

国家安全局又报告白宫，四名劫持者何时登机，航班号码，以及如何到达阿尔及尔的巴勒斯坦组织总部。下午晚些时候，四架F-14战斗机从美国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上起飞，拦截了那架埃及飞机，强迫它降落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军警抓走了那四名劫持者，准备交法庭审判。

第二天早晨，当波因德克斯特走进屋子时，里根总统站起来举手向他行军礼致敬说，“我向海军敬礼！”这天里根大出风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公开赞扬他。这是他第一次明确干脆地战胜了恐怖分子。里根也知道窃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见到凯西时几乎是向他鞠躬致谢。

与此同时，凯西惊奇地看到一项报告说，秋天在贝鲁特被绑架的三名苏联外交官，一个月后被释放了。原来绑架的是四个人，其中一人不久就被杀害了，这三名没有受伤害。不久，凯西就从以色列那里得到可靠的情报说，这是克格勃的胜利。苏联外交官被绑架后，驻黎巴嫩的克格勃人员抓走“真主党”一位领导人的一名亲戚，把他的睾丸割下，塞在

嘴里，然后对准脑袋开枪打死了他。事后，克格勃把他的尸体送给“真主党”，附上一信说，如果不释放这三名苏联人，“真主党”的其他成员也会以同样方式被处死。不久，这三名外交官——一名随员、一名商务代表、一名使馆医生——就在苏联使馆附近被释放了。有人打电话给报界说，释放这三人是一种“友好”的姿态。

凯西感到，苏联倒是很了解“真主党”。

舒尔茨非常赞成“郁金香”计划。中央情报局把计划送请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审议。结果参院情报委员会以八比七票赞成这个计划，众院情报委员会的赞成票数是九比七。但参院情报委员会的新主席戴维·杜伦伯格和新副主席帕特里克·莱希都不同意“郁金香”计划。他们问道，既然流亡分子的活动是要处死卡扎菲的，那么这样一个支援流亡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计划将如何回避暗杀的禁令？凯西说，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是不搞暗杀，但别人要暗杀卡扎菲的话，那是他们的事。反正，总统已经批准，国会不同意的话，不给钱好了。

两位参议员于是联名写了封信给总统，提出强烈抗议，并质问这怎么能说不是暗杀。白宫还是回答说，就是没有暗杀计划，并要求两位参议员把他们来信中的“暗杀”这个词删去。两位参议员没有同意。

我从某个来源得悉这些情况，准备写篇报道登在《华盛顿邮报》上。11月2日，我打电话给凯西，告诉他我的打算。他仍说，“我们不搞暗杀。”11月3日，星期天，《华盛顿邮报》把我的报道登了出来。总统看到这条消息，叫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是不能认为报上说的那些是事实，同时总

统已下令调查是谁泄露了情报机密，查出后要对泄密人采取措施。凯西跑到总统那里，说显然是国会方面泄露的。但杜伦伯格否认其事，说消息里引用的文件，国会方面根本没有见过。

国防部也不同意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说，如果美国出兵，最后会需要出动六个师，即九万人。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反对干。

11月21日傍晚，诺思忽然打电话给克拉里奇。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事件后，克拉里奇从拉美科科长调为欧洲科科长。诺思十分着急，他需要中央情报局帮助一架以色列飞机在葡萄牙取得着陆权，这架飞机执行的是人道主义任务。

克拉里奇用他的保密线路发了一个“特特急”电报给美国驻葡萄牙使馆，在清晨3点把中央情报局分站站长召唤到使馆来。接着，他又发了一系列电报，指示分站站长“全力以赴”，完成重要任务。

克拉里奇指示说，这件事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关系到美国政府最高利益，请转告葡萄牙政府，如蒙支援此事，美国政府不会不给予注意和感激。他还指示说，此事不能告诉大使，请分站站长即去会见西科德空军少将，西科德已用“理查德·库普”的化名飞抵葡萄牙。

葡萄牙政府竟然拒绝协助。于是诺思又叫中央情报局马上查询哪家包机航空公司可靠。中央情报局航空处建议说，圣卢西亚航空公司可靠，它经常为本局执行秘密任务。诺思于是要求圣卢西亚提供两架波音707飞机，装载“隼”式防空导弹运往以色列，然后改由以色列飞机运往伊朗。诺思做这笔交易，帐款方面通过瑞士银行，帐号386--430-22-1，户

名是“湖泊资源公司。”

但以色列方面等得不耐烦，把准备运这批军火去伊朗的飞机调走了，诺思只好慌忙把西科德少将用来运弹药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飞机抽调来运这批防空导弹，然后又向反政府武装方面道歉，说是给他们的弹药要推迟几天。

11月25日，星期一，麦克马洪得知克拉里奇曾要求葡萄牙协助之事。他大为恼火，认为法律禁止卖军火给伊朗，现在没有正式批准文件，怎么就偷偷干起违法的事来了。正巧，这时凯西在国外访问，麦克马洪怕承担责任，赶忙把法律总顾问斯波金找来商量。斯波金认为此事重大，得报请总统批准才好。于是他就找来几名高级律师，起草报告，请求批准这一行动，并建议总统下达指示不要让国会方面知道此事。等到凯西访问回来，麦克马洪便把报告交给他，凯西本来已经受够了国会的气，于是便把报告送到白宫。

这时麦克法兰已提出辞职，由他的副手波因德克斯特接任国家安全顾问。迪弗虽已脱离白宫，还分别打电话给南希和舒尔茨，反对用波因德克斯特，说军人不宜任此职。南希说，已经定了，没有办法。舒尔茨则说，他认为波因德克斯特很合适。凯西也是赞成的，他认为波因德克斯特比麦克法兰强硬。

12月5日，波因德克斯特把斯波金起草的报告呈送总统审阅。里根看了一遍，便在上面签了字。波因德克斯特把这个只有一份的报告放在他的保险柜里，然后叫诺思通知中央情报局说，总统已批准了。

12月7日，波因德克斯特又在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卖武器给伊朗的问题。麦克马洪代表凯西参加。舒尔茨反对用武器交换人质，他说这样会使伊朗感到绑票有利可图。

温伯格说，这样一来，伊朗和以色列都可以源源不断地对美国进行要挟讹诈了。麦克马洪说，伊朗根本已经没有什么美国可与之打交道的温和派了，霍梅尼上台后早把他们杀了或监禁起来了。可是总统坚持要干，他说为了营救人质，要想尽一切方法。会议决定派已卸任的麦克法兰带着诺思去伦敦会见中间人戈尔巴尼法尔。

12月10日，麦克法兰写了个报告给总统、温伯格和凯西。他认为戈尔巴尼法尔这个人很差劲，品格不好，不能信任。总统沉思片刻，还是主张要以色列多运一些武器到伊朗去。总统说，以后可以有理由说，美国这样做是为了设法影响伊朗的前途。

凯西指出，过去有过这种先例。几年来，以色列就是以此为理由，秘密卖了五亿多美元的武器给伊朗。许多国家都想影响伊朗的前途。

同一天下午，凯西写了个便条给麦克马洪说，“散会后，我感到总统并没有完全放弃鼓励以色列继续卖武器给伊朗。我想，如果这样做会导致他们释放人质，总统会愿意冒险去干，并准备挨骂。看来麦克法兰在搞这个行动。”

九天后，凯西会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迈克尔·莱丁，他同诺思和麦克法兰的关系很密切。莱丁对他说，戈尔巴尼法尔要到华盛顿来，他携有重要情报和行动方面的建议。凯西叫莱丁和诺思找中央情报局伊朗科科长商量。

戈尔巴尼法尔到达华盛顿后，住在麦迪逊旅馆，化名尼古拉斯 克拉利斯。戈尔巴尼法尔和中央情报局的人莱丁和诺思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建议对卡扎菲进行敲诈。办法是谎称利比亚流亡领袖马加里夫失踪了，要求卡扎菲为此交付1000万美元，等他付了钱，再让马加里夫重新露面，使卡扎

非十分难堪。戈尔巴尼法尔还说，他有情报得知，伊朗有一个三人小组在欧洲，专门暗杀伊朗流亡分子。戈尔巴尼法尔还说出了这个提供情报者的姓名，但这个人过去的表现证明他是靠不住的。

中央情报局伊朗科科长送了一份备忘录给凯西，说戈尔巴尼法尔关于伊朗三人小组的这个报告，“非常近似他过去提供的关于恐怖行动的报告，那个报告经过调查和测谎器检验，已经证实是捏造的……自我们认识他以来的四年中，这始终是个问题……从档案里很难找到有什么材料表明他的情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圣诞节前两天，凯西送了一份绝密备忘录给总统，讲营救人质的五个行动。他说，他要离开首都一阵，节日期间不能见到总统了。头四个行动涉及秘密协助中央情报局的其他国家，第五个行动涉及伊朗。关于戈尔巴尼法尔，凯西说他是个危险人物，但可能有用处。戈尔巴尼法尔说的三人小组的情报听了令人吃惊。凯西报告总统说，“我们核查了他们的活动，但还没有查到他们的目的。也可能是故意派来吓唬我们的。反正和戈尔巴尼法尔谈话时，必须谨慎小心。但是，我们的人星期六和他谈话时，问他是否愿意再做一次测谎试验，他说愿意。既然这样，我们认为做一次也是值得的，因为也可能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情况。”

1985年秋天还有别的麻烦。

首先是克格勃高级叛逃者维塔利·尤尔钦科又于11月初摆脱看守他的人，回到苏联去了。尤尔钦科是夏天投奔中央情报局的。他逃脱后，回到苏联驻美使馆，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称是中央情报局绑架了他，而且凯西还请他吃过

一顿晚饭，当时凯西裤子拉链也没拉好。结果引起哄堂大笑，轰动一时。

凯西承认中央情报局没有好好对待他，没有找几个俄文讲得好的人陪伴他，也没有充分了解他的心理。尤尔钦科毕竟是有25年资历的克格勃老手，本应好好招待他的。但参院情报委员会和杜伦伯格大骂凯西，说中央情报局工作太差劲了。报上几乎天天有这些参议员责怪中央情报局的消息。

事情更糟糕和复杂的是，尤尔钦科竟指名道姓地说美国情报部门有叛徒。尤尔钦科叛逃前不久，刚被提升为克格勃第一局的副局长，负责对美国和加拿大的间谍工作。他落入中央情报局手中后，美方自然要问他克格勃在美国情报部门里安插了间谍或内奸没有。尤尔钦科说只有一个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此人一度准备派到驻莫斯科分站但始终没有去成。他的代号是"罗伯特"，去年曾在奥地利会晤克格勃官员并出卖了重要机密给对方。

中央情报局苏联科没有费多少劲就查到了这个人。他们一听就去查爱德华·李·霍华德的档案。他1981年加入中央情报局，当时29岁。1972年，他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后来当和平队员，在哥伦比亚呆了两年。他还得过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他十分敏捷，外语流利，会耍手腕，机灵诡诈，正是凯西的新中央情报局搞秘密活动的理想人物。他会玩枪，喜欢喝酒。他对中央情报局说，他曾经吸毒，但在他这一代人来说，这是常见的，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任何毒品了。

霍华德加入中央情报局后，接受了有关侦察和反侦察技术的严格训练。他分配在苏联科工作，并准备派到驻莫斯科分站，到那里去管理间谍，上街侦察，收集情报。

1972年以前，驻莫斯科分站的情报工作由总部直接抓，分站的行动官员都不指挥什么人，只是收发员似的，对情报来源也不清楚。这固然比较安全，但不是搞间谍工作的真正办法。1972年后，驻莫斯科分站站长又得到了组织行动的权力。分站人数不多，因为任务虽然重要，莫斯科的环境气氛却对美国充满敌意，人多也无法施展身手。因此每个人都很忙，样样都干，不分什么级别。大家紧密团结，互相帮助。

霍华德在苏联科听了各种报告，看了所有的档案，学会了一切本领。1983年初，准备派他去莫斯科前夕，对他进行了一次测谎试验，结果发现他说假话，酗酒，继续吸毒，乱搞女人，甚至小偷小摸。于是把他开除出中央情报局，莫斯科自然去不成了。

凯西根本不认识霍华德这个人。现在听到尤尔钦科的揭发，情况倒是对上头了。一年前，凯西收到驻莫斯科分站站长来电，说情况大为不妙，间谍都躲起来了，建立多年的技术窃听设备也听不到什么东西了。简直象是间谍小说上说的那样，神乎其神，令人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当时认为，也许是什么偶然事故，何况，“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情报来源也不是永恒的。然后，这年夏天，以使馆“二秘”身份为掩护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保罗·斯托姆鲍忽然被捕，以间谍罪被驱逐出境。

斯托姆鲍是同苏联航空专家阿道夫·托卡契夫联系的办案官员。托卡契夫几年来提供了许多关于苏联偷越雷达监视的技术情报，很重要。不久，托卡契夫被捕，然后处决了。接着，中央情报局又有四个人被苏联驱逐出境，分站几乎无法进行工作。

尤尔钦科告发后，中央情报局才明白真相。联邦调查局、

在新墨西哥州找到了霍华德，对他进行严密监视。但霍华德受过专门训练，懂得如何逃脱跟踪者的监视。他甩掉联邦调查局的盯梢，逃跑不知去向。最后他在莫斯科出现，得到了政治庇护。

参院情报委员会为此对中央情报局猛烈抨击。有些参议员问，中央情报局里是否还有别的内奸？凯西等当然是把责任推给已卸任的苏联科科长。但情报工作上的损失和霍华德的叛逃却是严重的打击，抵销了好些年的工作。驻莫斯科分站本来是最重要的地方，结果却出了事。这表明有人或者许多人在睡大觉，没有认真对待收集苏联情报的工作。

凯西一会儿装出可怜的样子，一会儿又采取守势。他在局里骂部下，对外则竖起一道墙防守。他对参议员们说，"是的，花钱雇人也会有风险，我们这里是有坏蛋，别大喊大叫，让我们自己处理这事，我们知道这事的严重性，我们会处理好的。"

是的，谁都会碰到反间谍问题。戈德华特当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时，他的办公室每两星期就要清理一次，看有没有窃听器。有一次，他们在戈德华特的办公桌里面找到一个窃听器，还连着一根电线，但找不到这根电线通到什么地方。另一次，又发现一架小录音机，查不出是谁放在那里的，是克格勃还是别的外国机构也不知道。因此，情报委员会主席戈德华特的办公室就可能已经失密了。

第二十二章

凯西还在努力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争取美国援助拨款。麦克法兰辞职前，曾为诺思募集私人捐款之事承担责任；他断然对国会说，诺思并没有提出这种建议，也没有向私人募捐。凯西认为，他可以利用国会的吵闹为自已所用，因为只有极左派才想完全放弃反政府武装。结果确是如此，没有费多大劲，国会就在夏天批准拨款2700万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粮食和医药用品。凯西还说明，中央情报局不能眼看反政府武装被强大得多的桑解阵的军队消灭。中央情报局建议，给予反政府武装有限的运输器材、情报咨询和特殊通讯器材，也获通过。但议员们对于这些东西的含义有分歧，因此互相写信询问，想弄清楚在运输和后勤方面是否也可以提供“咨询”。

从实际意义上看，凯西赢得了打半个战争的授权，措词上的含胡不清更好，可以让中央情报局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他知道，打丛林战时，通讯和情报方面的“咨询”，比新式武器和弹药对游击队更重要。里根签署了报告，先拨1300万美元。

对凯西来说，这项新法律使他可以直接参与收集关于反政府武装的情报。诺思建议他同西科德少将谈谈，因为西科德正在搞他的私人运输业。圣诞节前夕，凯西打电话给西科德，请他马上到中央情报局总部来。因天气恶劣，西科德迟

到了。但凯西仍等待着，并立即会见了他。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彼此早已“久仰大名”。双方坐下后，凯西请西科德谈谈形势。

西科德是供应和后勤专家，他坐得笔直，充满信心，一双眼睛在飞行员戴的那种眼镜后面闪动着。他说，如果不进行现场空运，反政府武装不可能得逞。但是，即使做到这点，他也十分怀疑反政府武装有无能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还没有从哥斯达黎加方面开辟一条有效的南部战线。除了供应不足外，情报上也有缺陷。坦率地说，他看不出反政府武装领导上想打什么决定性的胜仗。

凯西同意西科德的看法。他对这位将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出了巨大努力表示非常赞赏。他问道，我们能帮助干点什么呢？

西科德说，提供情报呀。

凯西用笔记了下来，答应想想办法。

西科德又说，“局长先生，如果哪一天你重新得到去尼加拉瓜开展行动的许可，我们现在干的这点小买卖都归你所有。我向你保证，你拿过去就是。”

凯西回答说，“非常感谢你。”

圣诞节后两天，恐怖分子互相配合，袭击罗马和维也纳机场，杀死19人，包括五个美国人，内中有一女孩娜塔莎·辛普森，才11岁。从电视镜头上看到的这场大屠杀特别可憎，机场里乱七八糟地堆满尸体和毁坏了的东西，活象被匪帮洗劫过一样。总统在加州牧场休假，看到这幅情景也呆了。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都怀疑是利比亚干的。白宫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凯西派去参加这些对付危机的会议的是伯

特·邓恩和理查德·克尔。他们认为，目前在利比亚的阿布·尼达尔是幕后主使者，但也不能肯定。最过硬的一项证据也只是旁证：有报告说，卡扎菲的特工人员曾汇100万美元给保加利亚银行阿布·尼达尔的帐户，但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为了准备军事报复，寻找了一些目标，包括的黎波里过去一个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地和城里卡扎菲的情报总部。会议第二天，国防部提出了警告。他们说，苏联在利比亚有1500名顾问，其中600名是参加防空工作的。如果美国派飞机去空袭，会死掉多少苏联人？那会意味着什么？因此，一切都暂时停止，等总统回来再说。

与此同时，诺思请斯波金起草一个关于伊朗问题的新报告，建议的办法是同友好的外国联络机构（以色列）和个人（戈尔巴尼法尔和西科德）合作，进行秘密的情报活动。目的有两个：（一）在伊朗建立比较温和的政府，（二）取得重要情报。

报告没有提到人质或营救人质问题。斯波金打了个长途电话给在佛罗里达州打高尔夫球的凯西。因为不是保密线路，所以斯波金说，白宫要求他去“服务”，并参加一次会议。他问凯西是否知道首都这边在干什么。凯西说，不知道。他又问，你是否同意我去参加这次会议。凯西说，去吧，但有情况随时通知我。

这天晚上，1月3日，斯波金去会晤诺思，诺思说由他去通知凯西。

1月5日，星期天上午，诺思到斯波金家里去找他。两人准备在当天下午去凯西家里向局长大人汇报，他正从佛罗里达赶回首都。

下午，凯西看了斯波金写的关于伊朗问题的新报告，对斯波金和诺思说，很好。

他们正要告辞时，斯波金在门厅里问诺思，为什么不在报告里写上人质问题。诺思说，国务院反对，因为一写上就会使人看出是用武器换人质。

斯波金说，他认为不对头，还是回去再和局长商量一下。于是又进去对凯西说，这份报告反正是要永远保密的，还是老老实实地写上一切为好。因此增加了第三个目的："促进释放被扣押在贝鲁特的美国人质。"

第二个星期，利比亚和伊朗都成为白宫讨论的首要问题了。1月6日，星期一，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在白宫形势室开会，讨论利比亚问题。总统批准一项计划，加紧和扩大破坏卡扎菲的秘密行动，并继续秘密筹划美埃联合打击利比亚（即"玫瑰"行动）。但他说，美国直接轰炸利比亚的行动，今天不作决定。

第二天，国家安全计划小组继续开会，讨论军事行动问题。舒尔茨陈述国务院法律顾问的意见，说恐怖主义是"武装侵略"，美国进行军事报复是自卫，完全站得住脚。温伯格反对。他说，如果卡扎菲击落美国飞机，俘获美国飞行员，那时又会有"更多的人质"，怎么办？这句话的效力，大家听了都明白。

总统拒绝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案。温伯格很高兴，带着满脸微笑走出形势室。

总统、副总统、舒尔茨、温伯格、凯西、墨甘、米斯和波因德克斯特接着又移到椭圆形办公室去讨论伊朗问题。

波因德克斯特提出一项计划，继续出售武器。他冷静地说，伊朗要求美方表现诚意。交易要在30—60天内完成，

伊朗将使剩下的五名美国人质获释。由于这事十分敏感，对人质有潜在危险，在人质被释放并飞离黎巴嫩之前，将不告诉国会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至于对群众公布，那更是将来的事。同时，美国要否认在这里面起了任何作用。

舒尔茨很严峻，他说他反对这样做。他提醒大家说，这会破坏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整个政策，而政策是不同恐怖分子打交道，不卖武器给他们，不为人质付赎金。

温伯格也反对。他说，这个计划将使美国受到最粗暴的敲诈：伊朗任何时候得不到他们所要的东西，就会威胁“用中东方式”揭露这项安排。

波因德克斯特说，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是一种例外情况，与我们的全面政策并不冲突。

舒尔茨说，不会成功的。他讽刺说，想否认事实只是一种幻想，一种已经试验失败的治国理论，不久前就证明过不能成功，70年代尼克松政府就有过失败的先例。

凯西非常赞成。他说，这事要赶快进行，如果第一批武器运去后不产生结果，那就不再干了。伊朗在世界上有特殊的作用，它的地理位置特殊，正在俄国的下腹部。美国不能不理睬伊朗，任凭它落入苏联势力范围之内。

有人问，伊朗的中间人戈尔巴尼法尔，这个人怎么样？中央情报局自己不是在1984年内部通知里宣布他是个惯于造谣的人吗？美国能够用这样的人吗？更不要说依靠他了。

凯西回答说，但是戈尔巴尼法尔能救人出险，三个月前韦尔牧师被释放就是证明。他在伊朗有很多关系，虽然过去未通过测谎试验，但还可以再测验。

散会时，大家感到总统的意思是要干下去。

四天后，1月11日，戈尔巴尼法尔来到华盛顿。当天下午和晚上，中央情报局又在“四季旅馆”对他进行测谎试验。结果证明他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说谎，瞎编一气。他做的事情对美国有害。凯西没有理会测谎结果，又派查利·艾伦去和他谈话。1月13日，艾伦和他谈了五个小时，回来报告说，戈尔巴尼法尔仍愿继续为美国工作，他的确和伊朗总理、石油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很熟，但喜欢夸大和吹牛。

1月14日，凯西和诺思商量，他认为温伯格还会继续反对，所以要找波因德克斯特出面和他谈，就说总统要求马上进行这件事。1月16日，波因德克斯特把凯西、斯波金、温伯格和米斯请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开会商量。米斯这时已是司法部长，他说按现在这个报告，不通知国会也是合法的，等人质放出来后再通知国会。大家都同意，将来总统得向国会报告这事，说明他这样做的理由，哪怕被赶下台也得去报告。

1月17日，总统签署了这份报告，批准通过中央情报局向伊朗出售武器。波因德克斯特把这份报告锁在他的保险柜里。

行动处副处长乔治到白宫去看了这份报告，知道需要卖4508枚“陶”式导弹给伊朗。由于过去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的经验教训，而且他这次测谎试验又通不过，乔治不想用这个人。但凯西说，戈尔巴尼法尔虽是个流氓，但他这条渠道还是有用的，先试试看再说，如果他不能救出人质，那时我们再断掉好了。

麦克马洪也去白宫看这份报告，发现波因德克斯特竟打算向伊朗提供情报，在两伊战争中帮助伊朗。他认为这可不

好，一来这样伊朗会采取攻势，二来美国已经向伊拉克提供情报，现在再向伊朗提供情报，岂不是变成脚踩两条船，太玩世不恭了。

波因德克斯特不同意，他认为向伊朗提供情报可证明美国有诚意。而且，先运1000枚导弹也是试验对方是否会放人的一个办法。麦克马洪仍然反对。他跑回总部，打长途电话问在国外的凯西；凯西说，他知道这一切，而且是同意的。麦克马洪又去对诺思做工作，劝他不要把两伊前线的一切情报都给伊朗，只给一部分就行了。诺思同意了。

2月27日，凯西和乔治去会晤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讨论卖装器给伊朗的问题。凯西这次改变了主意，他极力主张尽量设法不要以色列和戈尔巴尼法尔参加今后的谈判。他说，不能再打电话谈这事了，否则苏联和别国会窃听到，美国和伊朗对话会使天下大事发生剧变，阿拉伯世界知道了会气得发狂。因此，凯西建议下一步由美国和伊朗的代表直接谈判。

诺思刚从西德回来，他在那里见到伊朗国会议长拉夫桑贾尼的部下，因此准备安排麦克法兰到欧洲去和议长见面。

麦克法兰在家里听到这消息后，打了个电传给诺思说，"干得好，如果大家知道你为忠实贯彻美国政策出了多少力，并且有创造性，他们会请你当国务卿的。但是他们不会知道，而且如果知道了，还会有人抗议。这就是20世纪末叶民主政治的现实，有什么办法呢。"

诺思当即答复说，"我认为我们方向走对了……但愿上帝会叫舒尔茨也同意这么干，明天波因德克斯特要告诉他。有上帝的保佑，加上自己努力，我们很快能把那五个美国公

质弄回来。而且今后美伊之间可望发展比卖导弹换人质更积极的关系。波老在这件事上受到的压力很大，这只有你能体会，他希望一切能按计划顺利进行才好。和他比较，我干的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我只是和敌人打交道，他可得同内阁打交道哩。”

凯西的近东科科长汤姆·特威坦的看法比较悲观。诺思在欧洲会见伊朗议长手下的人时，他也在座。他认为，这个伊朗人呆头呆脑，怕这怕那，把美国看作大魔王。戈尔巴尼法尔也在座，他和通常一样，对两边都讨好。他向美国保证说，所有的人质都会释放。对伊朗，他又说各种先进导弹和军事装备都会卖给他们。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双方拉来坐在一起谈判，然后看着他们斗争一场。

结果，又运了1000枚“陶”式导弹给伊朗，这是第一次直接从美国运去，但人质一个也没有放。戈尔巴尼法尔的意思是美国还没有卖足，后来他说，伊朗又认为他们并不需要“陶”式导弹，所以运去的导弹不算数。

波因德克斯特感到受够了，想取消这笔交易。他说，算了吧，对方两面三刀，动机复杂，搞不成什么名堂。

诺思却要继续干下去。他看透总统情绪激动，一心想把人质弄回来。谁都怕人质死亡，谁都害怕现任总统象前任总统一样在伊朗问题上失败而下台。

凯西同意继续干下去。他认为风险不大，卖的武器也不算重要，提供给伊朗的前线情报更不足以决定两伊战争的结局。

麦克马洪很担忧，中央情报局竟然没有考虑到它和伊拉克有交换绝密情报的协议，向后者提供卫星照片上的材料，同时又提供情报给伊朗。这样两面讨好，结果等于是制造僵局。这可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是流血的战争啊。伊朗用十几

岁的孩子去打仗，搞"人海战术"，他们根本不是正规士兵。双方伤亡和被俘人数差不多已达100万人。这不是行动指挥中心里的沙盘游戏，这是大屠杀。

麦克马洪敢肯定，这笔武器交易瞒着国会，等于是一枚定时炸弹，早晚要爆炸。他实在受不住了，跑去对凯西说，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4年，当了四年副局长，够了；自己的婚姻又破裂，这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他需要改变一下生活环境，他要求辞职。

凯西感到失望。麦克马洪是个好配角。尽管他在秘密行动问题上吵吵嚷嚷，但最后还是服从总统和局长的决定。麦克马洪说，他打算去当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加州分公司副总裁，负责情报工作。凯西对他说，你这么个人才，去当飞机公司的生意人太可惜了，你应当创办自己的事业，好好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给我们大家的机会，大干一番。

麦克马洪笑了，随即起草了给总统的辞职信，里面说，临别在即，忧喜交加，感慨万分，所幸凯西局长雄才过人，能支大厦。麦克马洪一走，凯西倒有机会把他喜欢的盖茨提升为第一副局长，接替麦克马洪。把一个分析家放在第二把手的位置上，可以向大家表明他凯某不是只关心秘密行动的人。

麦克马洪的辞职信虽然交上去了，但暂时还没有走。3月14日，他代表凯西去参加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讨论利比亚问题。所有的高级官员都在座。总统命令配有三艘航空母舰的作战力量集合在利比亚沿海待命，行动代号叫"燎原烈火"。总统签署了一项决定指示，规定作战步骤如下：

• 如果卡扎菲袭击美国飞机或船舰，则给予对等回击，而且只打击对

方袭击者——船舰、飞机或导弹基地。曾认真考虑过允许美军前敌指挥进行超出对等水平的回击，使卡扎菲付出的代价超过他对美军的打击。但这个考虑被拒绝了，主要是因为温伯格要求把军事行动保持在最低限度。

- 如果美方有一人受伤或死亡，经总统批准，可以轰炸五个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将大部分是停在地面的苏制飞机。
- 如果卡扎菲采取侵略行动，经总统批准，美国军用机将轰炸利比亚内地，袭击油田设备和其他经济目标。

对卡扎菲的性格作了大量讨论。总统对卡扎菲的个人生活细节特别感兴趣，材料都是中央情报局归纳的。卡扎菲去西班牙和马略尔卡时，曾化装并穿高跟鞋；他的助手们还为他带了个玩具熊在旅途中玩；而且他显然不放心旅馆里的床单，专门派助手到商店里买了些新的床单。里根好几次提到卡扎菲是个妖精，说“他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在我的卧室，偷看南希的壁橱”。

大家还谈到自己应当强硬起来，“粉碎”卡扎菲，“重创”卡扎菲，鼓足勇气，激励别人，特别是要鼓励欧洲盟国“向前看。”会上不只一次提到入侵格林纳达成功的例子。

有某一点上，里甘忽然问道，“要使用核武器吗？”众人都跳起来了，回答说，“不。”

里甘这位白宫办公厅主任说，其实他问这个问题只是要搞清楚不会使用核武器。

“燎原烈火”行动开始前，温伯格飞到伦敦去会晤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弗兰克·凯尔索海军中将。国防部长指示，如果美国不得不对敌人的袭击或挑衅还击的话，要尽量使用“干净漂亮”的武器。这种精确的武器能打中具体目标，比

炸弹造成的破坏小。温伯格命令说，尽量减少还击的分量，“打他们的轮胎就行了”①，不要搞不必要的轰炸或其他行动。

另一方面，波因德克斯特和他的副手福蒂埃则认为，如果重创利比亚军队，卡扎菲的军官们就会埋怨卡扎菲搞恐怖冒险行动的结果是造成麻烦。那样，他们可能采取行动推翻卡扎菲。

凯西感到不大有把握。美埃联合秘密策划打击利比亚，动刀动枪，采取军事行动或进行军事威胁，固然是件好事，他完全支持。但这类行动很惹人注意，会使中央情报局针对卡扎菲的秘密计划更加难以执行，而且会加强他在国内的地位和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地位。这类行动还会使他得到更多的同情，使人们相信他说的话，美国真是头号帝国主义。

利比亚的流亡分子看来干不成什么事。麦克马洪说得对，他们无非是一些童子军，软弱、外行。中央情报局曾找过以色列情报局，征求对推翻卡扎菲的意见，但他们说不行。法国托人传话说，要解决卡扎菲，只有彻底搞秘密行动；他们还提出了大胆的计划。但等到美国要求他们帮助时，法国却又躲闪了，说什么他们害怕美国军事行动或秘密行动只会使卡扎菲提高警惕，因为美国并不想真正干掉他。

凯西认为，唯一的办法是修改报告，允许中央情报局直接打击卡扎菲，不必通过流亡分子或与他们合作进行。但白宫注意的只是“燎原烈火”。

原来计划在3月22日星期六晚上开始行动，但因锡德拉湾风大而推迟了一天。3月23日，星期日，公海上的演习开始，海平线上出现了声势赫赫的美国舰队：45艘船舰，200

① 这是美国俚语，意思是打击敌人某一部分，使之不能动弹，好比打汽车只要打轮胎就够了。

架飞机，甚至包括先进的洛杉矶—688型核动力攻击潜艇。有三艘船越过了北纬32度。这是卡扎菲划的“死亡线”，离岸 120 海里之远，完全违反国际上公认的12海里领海限度。100多架美国飞机排成弧形编队，在上空掩护舰队。不到两小时，利比亚便从陆上基地发射了两枚苏制SA-5型导弹，目标是美国侦察机，但没有命中。后来又发射了四枚导弹，也未打着美机。

美国A-7型攻击机在离岸约40海里处发射哈姆型导弹还击，精确地摧毁了利比亚的雷达。这种导弹的弹头装有46磅烈性炸药，至少是暂时“打瞎了敌军的眼睛”，但造成的伤亡很小。此后两天中，至少有两艘利比亚巡逻艇被美军击沉。

里根总统看到战报，询问美方有无伤亡。下面报告说没有。据美国情报部门报告，利比亚死了72人。

3月26日，星期三，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30分左右，“燎原烈火”演习结束。当天上午，《华盛顿邮报》登了一篇报道，概述这次行动的事前策划情况，说六个月前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蒂埃曾秘密访问埃及，“去协调可能对利比亚采取联合行动之事。”

当天下午，我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他说是代表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蒂埃打来的。

他说，“你要知道，这里很不高兴。由于卡扎菲喜欢搞暗杀和恐怖主义，我们正在和他对峙。而贵报却指名道姓地提到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蒂埃秘密访问埃及。在双方对峙处于高潮时，透露这次秘密访问引起了社会上对他们的注意……人们已经在为他们两人的家庭安全担心了，你们这样搞未免太出格了。已经有人把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蒂埃当作目标了。”他还表示，对此是有情报证明的。

这位官员还说，“我从来没有看到福蒂埃这么沮丧过……

他本来想自己打电话给你的……你增加了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蒂埃受到的风险。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两天后，3月28日，星期五，下午4点左右，布雷德利接到波因德克斯特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说，“我抗议鲍勃·伍德沃德写的那篇报道。”他说，特别是不该提到他和福蒂埃的姓名，报上一登出来，就会引起对方注意。

布雷德利问，你的意思是说，提到你和福蒂埃的姓名，会使卡扎菲更要把你们当作袭击对象？波因德克斯特说，正是如此。

布雷德利说，他认为波因德克斯特说过头了。不管怎么说，首当其冲的是前线船舰上的那些人，而且卡扎菲肯定容易了解到谁对国家安全问题作出决定。

波因德克斯特说，我只是想请你记录下我们的抗议，如果什么时候发现他和福蒂埃被炸得粉身碎骨或者中弹累累，那得由《华盛顿邮报》负责。

美国驻埃及大使维利奥特斯发绝密电报回来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私下向他保证，埃及将继续和美国一起策划对付卡扎菲，美国报刊上透露的消息无关宏旨，影响不了埃及继续干。

锡德拉湾演习之前好几个星期，凯西的部下已经开始定期窃听的黎波里城里卡扎菲的情报总部的电报通讯。具体的窃听方法至今仍保密，但成绩十分可观。据一次统计，他们收听到并破译了388条电报。“燎原烈火”演习后，3月25日窃听到一条电报，是利比亚发往八个驻外“人民代表处”的，所谓“代表处”是利比亚对其驻外使馆的称呼。这条电报只有三行字，内容是指示这些驻外机构作好准备，利比亚

又要袭击美国目标，执行“计划”了。

10天后，4月4日，利比亚驻东柏林的“人民代表处”发给的黎波里总部的一条电报又被美国窃听到了，其中说，“你们明天看到报纸头条新闻时会高兴的。”

几小时后，即4月5日清晨，又窃听到东柏林代表处发回的黎波里的一条电报，说是“正在发生”一项行动，而且不会追查到在东柏林的利比亚人身上。不到10分钟，柏林时间凌晨1点49分，一颗炸弹在西柏林的“美女”迪斯科舞厅引爆，这是美国军人云集的娱乐场所。死了一个21岁的美国兵肯尼思·福特和一个年轻的土耳其妇女，伤了230人，包括约50名美国军人。

实际上，那条窃听到的电报已经提供了预警，如果早15分钟撤出在“美女”舞厅的人，就可避免这场灾祸了。

这一下，凯西抓到了证据。这些电报分开来看也许有点模棱两可，但合在一起看，就构成了情报分析家们认为重要的因素：有动机，有命令，有时间，有地点，有事后报告。诚然，没有发现的黎波里命令在“美女”舞厅搞爆炸事件，但不让的黎波里参与这样具体目标和时间，正是标准的作法。这些具体事情总是让现场执行者去决定的。这一来，连怀疑派的人也相信了。

于是开始秘密策划，准备立即进行军事报复。在此后10天中，政府发出的公开信号很混乱，有的实际上是保证进行打击，有的却又否认这种可能性。这反映政府里一片混乱，人们普遍怀疑里根会真的动武。一个主要的怀疑者就是诺思中校。他认为卡扎菲是高级恐怖分子，而自己是高级反恐怖分子。但是政府里总有人寻找理由推迟行动，或者劝说总统放弃这个行动。

由于窃听到的情报很具体，十分难得，有些高级官员就闭不住嘴了。美国驻西德大使理查德·伯特公开谈论“美女”舞厅炸弹事件。他说，“利比亚参与此事的证据非常明显。”4月9日，北约总司令伯纳德·罗杰斯将军在演说中说，利比亚在这件事上有责任，“证据无可争辩”。

国家安全局立即在内部提出意见，认为这些议论“严重妨害”该局收集情报的工作。于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更保密的机构，窃听到的情报的散发范围也进一步缩小了。

4月14日，星期一，利比亚时间傍晚7点到次日凌晨2点，30多架空军和海军的轰炸机袭击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距的黎波里450英里的港口城市）。八、九架F—111型轰炸机，每架携带四枚激光导向的2000磅炸弹，轰炸卡扎菲本人居住的兵营“辉煌门”。本来至少可以有32枚炸弹投向这座兵营，但至多只有四枚也许只有两枚真正击中了兵营。这些F—111型飞机要从英国飞行长达2800英里的距离，花14个小时之久，因此有些飞机在中途就折回了。路程较远是因为法国不许美机飞越法国上空。这是个技术上的重大失败，连国防情报局的分析员们也不知道其中细节。卡扎菲那天晚上睡在院子里的帐篷中，并未受伤。但他的两个儿子受了伤，一个15个月的养女死亡。

当晚9点，里根在电视上宣布了这次袭击。袭击持续的时间不过11分半。他说，利比亚参与柏林爆炸事件，“证据无可辩驳”。他还综合了拦截到的三条电报的内容，说这次行动是“自卫”。

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说，“今天，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必须做的事。如果必要，我们还将再做。”

第二十三章

六个多月来，凯西一直在处理另一件反间谍要案。

克格勃叛逃者尤尔钦科返回苏联之前，不但揭发了霍华德，而且还揭发了另一名间谍，这个人曾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尤尔钦科对掌管他的中央情报局人员说，1975年到1980年他在苏联驻华盛顿使馆担任克格勃分站站长期间，曾遇到一件离奇的事。国家安全局有个人主动打电话给苏联使馆，尤尔钦科曾在电话上同这人讲过话，但不知道他是谁。中央情报局把这情况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们居然找到了六年前窃听苏联使馆电话时的录音。从录音中听到那个不知姓名的人说，“我有情况要告诉你们……”联邦调查局根据这个录音和尤尔钦科说的这个人曾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线索，对国家安全局约1000名窃听苏联通讯的职员进行调查，并放录音给一些人听。他们听出这是过去的同事罗纳德·佩尔顿的声音。他曾于1965年到1979年间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年薪24500美元，也是搞对苏工作，后来就辞职了。经过科学分析，测定是佩尔顿的声音。

佩尔顿虽然是一名低级工作人员，但他能够广泛接触国家安全局窃听的60条苏联密码通讯线路的内容。他做过各种工作，包括制订预算，购买器材，编制计划，解决难题等。当时他38岁，工作努力，善于谈判，记性特别好。换句话说，苏联当时真是得到了一个送上门来的情报员。正是“踏

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们自己去找，恐怕还找不到这么好的哩。佩尔顿既有技术，又有广泛的知识。

联邦调查局一查，于1985年11月查到佩尔顿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当买卖游艇的推销员。两名特工人员到安纳波利斯的希尔顿饭店找他谈话，佩尔顿承认干了一些间谍活动。当他还在国家安全局工作时，曾宣告自己破产，但当时局里显然没有人知道。由于一系列的生意失败，他于1980年投奔苏联，然后跑到维也纳去和一名克格勃人员会晤，居然还在苏联大使的官邸里住了几天。他因为出卖价值几千万美元的技术情报，俄国人付给他一笔报酬，不过35000美元。

佩尔顿和联邦调查局的两名特工人员谈话后，马上就被捕了。联邦调查局在给法院的公文里说，佩尔顿向苏联特务提供了关于“美国针对苏联的收集情报计划”的情报。这就引起报界猜测，国家安全局的一项重要行动可能已经被出卖了。

有一次开庭审判时，佩尔顿的辩护律师提到代号为“常春铃”的计划。法官马上阻止询问，并禁止再提出这个问题。

“常春铃”是70年代末期的计划，那时还是特纳当中央情报局局长。1981年，这个计划被苏联破坏了。直到现在，佩尔顿被揭露后，国家安全局和凯西才把原因搞清楚。这个计划是美国海军和国家安全局合搞的，他们派了一个小组在一艘潜水艇里工作，在鄂霍次克海苏联海岸东边的海床上，安装了一个非常尖端、先进的微型防水窃听装置，它是一个大型的窃听架，跨在苏联海底通讯电缆上面，这根电缆又连接着苏联重要的军用和其他线路。这个窃听架有一个包围装置，可以不直接接触电缆里的电线，就通过电子功能窃听到

线路里的通讯。如果苏联要检查或修理电缆，把它提升起来，也看不出被窃听的痕迹，那时那架子会自动脱离电缆，仍然留在海床上，不会被苏方发现。架子里的录音带可以收录好多频道的通讯，达四至六星期之久。每年只装设这个架子窃听两次。

“常春铃”计划的一个最大麻烦是取回录音带。办法是：派一艘有专门设备的潜艇到鄂霍次克海去，由海军潜水员使用一艘微型潜艇或水下机器人，去找到这个架子，更换里面的录音带。然后把录音带送到国家安全局去译成电码记录，再设法破译。虽然收到的通讯都是几个月前的，但从中得到的材料很重要。

特别有兴趣的是涉及苏联弹道导弹试验的通讯。这种试验的许多导弹都落在鄂霍次克海附近堪察加半岛周围，苏联关于这些导弹试验的通讯都是通过海底电缆传送的。

苏联认为，他们的海底通讯电缆和地下电缆是美国无法窃听的。因此，鄂霍次克海底电缆上某些频道的通讯没有使用最先进的和绝密的密码，有些频道根本没有用密码。只有空中电波通讯，包括普通无线电通讯、微波通讯和卫星通讯，因为很容易被别人窃听，才使用最先进的密码。

“常春铃”计划一直进行到1981年。然后，从一张美国卫星照片上看到好几十艘苏联船舰集合在那个海底窃听架上面的海上。有一条苏联船是用来从事深海打捞工作的，也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地球调来参加工作。后来，美国派潜水艇再去更换录音带时，发现窃听架丢了。国家安全局领导人判断，这个窃听架被苏联拿走了，“常春铃”被破坏了。海军研究了各种情报，写了一份关于此事的报告，十分机密，只有几个人能看到。报告认为不可能是偶然事故，而显然是苏

联方面已经知道美国所干的事，并且知道安放窃听架的具体地点。美方必定有人泄密，几乎可以肯定是有间谍。报告的结论是，苏联有个间谍报告了这事，但不知道这个间谍是谁，以及怎样传递的情报。

因此，1981年丢失窃听架之事一直是个谜，直到1985年尤尔钦科提供线索，抓到佩尔顿，才搞清楚。

凯西希望审问佩尔顿时，不要透露有关“常春铃”的任何情况或其他秘密计划。

“常春铃”计划的主要缺点是苏联通讯发出几个月后，美国潜艇才去把录音带取回来，时间耽误太长。因此，在“常春铃”计划被破坏后，海军情报局局长约翰·巴茨海军上将和凯西手下情报界工作班子负责人爱德华·伯克哈尔特主张采取大胆办法，解决时间耽误太长的问题。

他们提出，美国可以秘密地从格陵兰敷设一根海底电缆，通到安装在苏联北部海岸重要海底电缆上的若干个窃听架上。这样，窃听到的电讯马上可以传到国家安全局。从格陵兰穿过北冰洋海底到苏联北部海岸的距离约1200英里。在海底敷设电缆的费用，每英里约100万美元，全部费用在10亿美元以上。这两位将军争辩说，费用虽然昂贵，却值得去做。

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气氛很有利。那些议员老爷因为对秘密行动疑虑重重，不断攻击，正需要干点事来证明他们对情报工作是积极认真的。还有人提出另一项计划，也是在海底安装窃听架，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底，费用也要10亿美元。

我是在1985年上半年就听说了“常春铃”计划的。但我们不清楚这个计划是否已被破坏，因此布雷德利决定暂时不发表这个消息。佩尔顿被捕后，我们得知他出卖的情报之一就是“常春铃”计划。由于苏联已经拿到这个窃听架，并且显然知道它是个窃听装置，布雷德利认为，应当在报上刊登细节，让人们知道一个掌握先进间谍技术的普通职员，技术员、翻译和情报加工员，可以对国家造成多么大的危害。

12月5日，布雷德利和《华盛顿邮报》总编辑伦纳德·唐尼去拜访国家安全局局长威廉·奥多姆中将。10年前，他还是个中校，被调到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奥多姆身体瘦削，工作勤奋，意志坚强，在对苏问题上是超鹰派，十分重视用技术方法收集情报。他说，报上刊登任何关于“常春铃”的消息，都会使俄国人知道一些他们本来不知道的事。但在30分钟的谈话中，他说不出哪些事情是苏联本来不知道的。他流露出十分震惊的情绪，认为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已经陷入危险。

事后，唐尼说，他认为奥多姆会设法打听我们从何处得知“常春铃”计划。布雷德利说，应当认为，我们报馆的电话很可能已被窃听了。

帕特·泰勒和我开始进行一些采访，都不再用电话。情报官员们不愿意让佩尔顿的审判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有一位官员说，国家安全局对待报界的策略往往是故意拖延时间。任何渗透进来的间谍和秘密活动都不可能永久存在，他们随时有被查获的危险；能够平安地多度过一个星期，就感激不尽了。这位官员还说，尽管佩尔顿已经向苏联出卖有关情报，但很可能有些事是苏联还不知道的。美国情报官员早已发现，过去有些间谍没有把所有的事都告诉苏联，有时则

是讲了而苏方并未理解。

结果发现，佩尔顿除出卖"常春铃"计划外，还暴露了另外七项有关密码的活动。其中，一项是美国驻苏使馆用过的密码，一项是美英联合行动，一项是窃听苏联微波通讯的新方法，一项是把窃听到的电讯发回美方电脑的设备。美国官员们担心，一旦报上刊登有关"常春铃"的消息，新闻界就会展开竞争，四出打听更多的情况。然后就会登出更多的消息，泄露更多的细节。细微的问题多得很，谁知道佩尔顿记得多少，对苏联人讲了多少，没有讲的是什么，苏联人是怎么理解的，是否相信他所说的。一项计划被对方破坏了，并不一定意味着永远失去了这种能力和技术。但是，如果报上刊登关于佩尔顿的消息，那就等于是打开了溢洪闸的闸门，让记者们看到本来是秘密技术的内幕，国家安全局的机密把戏也就暴露了。

我们查找旧的剪报材料，居然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报道。十多年前，《纽约时报》头版曾登载过西摩·赫什写的一篇报道，讲美国潜艇活动靠近苏联海岸引起争论的问题。报道中说，"有人说，美国潜艇能用一个插头，插进海底的苏联通讯电缆，从而窃听到高级军事通讯和其他通讯，这种通讯因为太重要才没有用无线电或其他不太安全的方法发出。"

我们还查到1976年派克委员会关于美国情报活动的报告，其中说，"过去10年中，美国海军的一个配有高级技术的潜艇侦察计划，常常在非友好国家的水域活动，搞了110次侦察活动，至少和敌方船舰发生了九次碰撞，报上至少也登过三次。"委员会说，海军自认为这个计划"风险很小"，这是不对的，海军对风险的分析是"形式主义的"。

泰勒和我把我们研究到的材料拿给布雷德利去看。奥多姆将军曾向他暗示，美国潜艇窃听通讯电缆的能力绝对是国家机密，报上如果提到这点就会造成灾难。布雷德利看到我们的材料后，马上打电话给奥多姆，把这个情况讲给他听。

奥多姆局长说，"你要是没有找到这些材料，那多好。"

布雷德利说，他手下的记者们要重新注意这件事了。他感到上了奥多姆的当，而且哈佛大学的一个刊物也提到了《纽约时报》十多年前的那条消息。①布雷德利更加不高兴，如果哈佛的刊物能登，《华盛顿邮报》为什么不能登？

1月27日，布雷德利、国内版编辑罗伯特·凯泽和我到情报界总部去会晤奥多姆和他的两名助手。我们已写了一个报道"常春铃"计划的初稿，希望他们指出哪些地方会对国家安全有害。这几位国家安全局的官员翻看着我们写的初稿。后来，奥多姆说，他们要把稿子拿回去好好研究，然后再答复布雷德利。

第二天，1月28日，奥多姆打电话给布雷德利。他说，国家安全局、美国政府和他本人都不希望我们发表这篇稿子。他也不能帮助修改或改出一份可发表的稿子来。刊登有关此事的文章只会引起注意，造成破坏，没有必要。即使苏联已经知道了，他们并不了解美国也知道他们弄到了这个计划。这是他要保护的。因此，这个问题不能公布。

2月7日，布雷德利、唐尼、凯泽和我请中央情报局一位已退休的老前辈吃午饭。他虽已退休，仍很关心国家安全部门和新闻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布雷德利把"常春铃"案件简要地讲了一遍，问他为什么政府反对刊登。

---

① 见哈佛大学出版的《国际安全》季刊，1985—86冬季本，德斯蒙德·鲍尔著"海上核战争"一文。——作者

这位老前辈说，母亲尚且要保护她的孩子，情报官员更要保护他们的行动了。

布雷德利说，可是苏联人已经知道了呀。

他说，啊，具体是哪些苏联人？搞不清楚的。听到的人可能认为是苏方的一个胜利，但军方和克格勃可能要感到难堪了。苏联内部也许只让少数人知道这事。你们得从苏联的角度看问题。四、五年前在某个海区悄悄地破坏了一个装置，事发后美方也只搞了个静悄悄的审判，没有透露任何细节，这事就此结束，岂不很好？但是，如果你们刊登了这条消息，苏联军方和克格勃内部会普遍感到震惊，然后要进行全面调查，苏联祖国居然被美国窃听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要弄清楚。然后还会要求调查更多的间谍案件，从而可能破坏美国的其他行动。情报官员的任务是要让对方睡大觉，让他们感到放心，安全，松懈警惕。因此，美国情报界当然不希望报上登什么消息了，否则会惊动对方。

他温和地给我们上课。他说，戈尔巴乔夫上台才11个月，《华盛顿邮报》登这事，戈尔巴乔夫会看到。他会感到这是一场火灾。克格勃未必告诉过他这件事。苏联内部掩盖失误事故和我们一样。我们窃听了他们的通讯，对他们来说自然也是一件失误，因为本来不应该发生这种事的。

我们后来称这种逻辑为“戈尔巴乔夫影响的说明”。啊，原来我们刊登什么消息之前，还应当先研究戈尔巴乔夫知道些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知道的。在实践上，这根本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顿午饭倒使我们清醒不少，了解到这个问题很不简单，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现在我们发现，得找一位掌握大权的人，如果他说可以登这条消息，那就行了。我于是拿着稿子到白宫去找一位有

相当地位的官员，请他给我们往上送审。我们还删去了几处细节，因为奥多姆说苏联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白宫这位官员答允替我们努力。

1986年2月20日，里根总统飞往格林纳达去庆祝1983年的胜利。我找的那位白宫官员在总统专机上把稿子拿给舒尔茨、温伯格、波因德克斯特和里甘看。他们一致认为，绝对不能发表这条消息。他们说，这个消息公布出去会对国家安全有害，不仅是因为揭露了一项机密，而且更多的是因为这会损害美苏政治关系。如果苏联认为这条消息是权威性的，那么他们就会知道美国对苏联了解了多少。此外，国家安全局的活动都是互相关联的，公众知道一项行动，就可能使别的行动也受到损害。但是，政府主要担心的还是美苏关系，这自然也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

那位白宫官员对我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请那几位大官考虑过这问题了。他建议布雷德利再去找波因德克斯特谈谈。

唐尼怕我们登载的东西，有些是俄国人不知道的。他说要搞清楚这点。

布雷德利说，我们已经修改过好多次了，每次都删掉了一些细节。但他认为，想不出登这条消息在社会上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佩尔顿是苏联得到的最大间谍之一。他出卖的不仅是“常春铃”，而且还有别的情报活动，简直是无价之宝。他在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使他知道美国针对苏联通讯的许多情报活动。几年来，他多次去维也纳，向苏联人吐露了许多事情。我们正设法打听他出卖了些什么，并且要登出来告诉读者。登这条消息还可以让大家看到，走进苏联大使

馆，出卖美国机密，是多么容易的事。

3月中旬，联邦调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对我们说，司法部几乎没有办法对佩尔顿提出控诉，因为有人害怕审判会泄露机密。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刊登苏联已经知道的东西？

他说，那是因为情报工作的气氛需要这样。报上一登载如何取得情报的细节，就会在全世界引起警惕。最好的情报成就往往是在对方有人犯错误、忽略了某件事或者忘了检查的情况下取得的。紧紧盯住对方，倒反而会泄露最大的机密。引起他们注意情报上的问题，很可能暴露我们需要掩盖的反间谍力量。

3月21日，星期五，《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苏兹贝格在华盛顿繁华地区国际俱乐部举行盛大招待会。我在这里见到凯西，那时招待会已快要结束，人已越来越少，凯西正和《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谈话。他驼着背，用手指搅拌杯子里的饮料。我走过去，问他可否和我握手。

他说，“我刚同你谈过话，你举行的这个招待会好极了。”说着，用手搂住我，拉我靠近他。

房间里好多人都和我一样感到惊奇。可是，凯西还在不住地说“你请来的这些客人”如何如何。

我感到很尴尬，他显然是把我当作苏兹贝格了。我连忙说，我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啊，怎么不认识我了？

凯西想了一下，忽然明白了，大笑起来。他为了让我知道，他刚才认错了人，就问我写的那本关于他和中央情报局的书现在进度如何了。他知道我在写这本书已有一年多了，我们两人谈过多次。他问我，是否可以先送给安全部门审查

一下，以防泄露一些不该说出来的情况。我说，我愿意听取意见，但很怀疑这是否行得通。他说，“那你就继续写吧，如果想批评我，就请便吧。反正你是这本书的作者嘛。”

过了一会，我和他走到角落里。我问他，为什么奥多姆将军等人在佩尔顿案件上和“常春铃”计划问题上对我们卡得这么紧。

他说，“如果你们要登这条消息，那是你们的事，公众舆论会增多，因此我们不能那么干。我让奥多姆处理这事，他知道得比我多。”

我问，“公众舆论？”

凯西没有回答，也没有解释清楚“这事”是指窃听电缆通讯还是指派潜艇在苏联海岸附近活动，还是两者都包括在内。

周末过后，我对布雷德利讲起凯西说的这问题涉及“公众舆论”。布雷德利明确说，目前他不愿意让我们再去追问可否刊登这条消息。当晚，我写了张纸条给他，说明我认为如果不继续追问下去，会是个大错误，因为迟早我们得解决这件事。

布雷德利请我吃午饭，又问我，登这条消息，在社会上有什么意义。他说，我们不能只是为揭露点机密和情况而登消息。

我说，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美国潜艇不仅是想进入苏联的领海，而且想进入苏联的内河。布雷德利听了大吃一惊。我又说，究竟去了没有，说法不一，搞不清楚。但是，请设想一下，如果有一艘美国潜艇在苏联的内河或港湾里被对方抓住，那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会比1968年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在离北朝鲜海岸13海里处被抓住的事件要

严重得多。

我说，国家安全局显然还窃听苏联以外的世界各国的海底电缆通讯，因为美国参与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大部分的大电缆网。也许这是有意义的，也许是没有意义的。另外，许多人都担忧，美国竟然允许苏联从遍布华盛顿的微波塔上窃听人们的电话，这是大规模侵犯美国公民的个人自由。据我分析，似乎有这么一种默契，那就是美国也可以在对等的基础上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用电子设备收集情报。

布雷德利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绝对的把握说，我们登这条消息不会越过合法的界限，不会影响国家安全。于是，我们同意由布雷德利去找提供这个消息的人之一，他也是过去的高级情报官员，但和现在政府里的官员知道的事情一样多。他应当能够告诉我们，登有关“常春铃”的消息，会不会使俄国人知道一些他们本来不知道的事。

4月份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报道轰炸利比亚的消息，因此布雷德利一直到4月底才有时间去会晤那位前高级情报官员，谈“常春铃”的事。那位官员对他说，放心好了，你们现在这篇稿子如果登出来，不会使俄国人知道比他们原来已知的情况更多的东西。因此，4月25日星期五下午3点左右，布雷德利指示我打电话给白宫，告诉他们这条消息将在两天后登出来。

白宫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发言人说，他们坚决反对，因为“整个”报道一登出来，苏联就会知道一些他们本来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布雷德利讲过要打电话同奥多姆商量，但至今还没有去商量。

第二天上午，奥多姆主动打电话给布雷德利，说他仍然

反对刊登这条消息。原因倒不是怕苏联知道更多的情况，而是怕别的国家也知道这事，因为他们本来也不知道美国有窃听海底电缆通讯的能力。

5月1日，布雷德利和奥多姆一起吃早餐。奥多姆还是坚持说原因就是怕别的国家知道。他还威胁说，他们正在研究援引1950年的一条法律，向法院控诉敢于刊登有关机密通讯情报的人。布雷德利说，他不管，还是要登。

5月2日，星期五，凯西去找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洛厄尔·詹森，建议司法部考虑根据1950年的那条法律，控诉五家新闻单位：《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他说，《华盛顿邮报》也违犯了这条法律，因为它刊登了我写的一篇关于美国窃听到卡扎菲电报的报道，就是讲卡扎菲同柏林"美女"舞厅爆炸案有关的那篇。

詹森对凯西要求他控诉报刊不大感兴趣，他不想触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那里面对新闻自由给予了保障。凯西却说，"你对这批杂种要强硬点才行。"他还要求詹森请法院下道指令，不许《华盛顿邮报》刊登"常春铃"消息。詹森说，他认为这可办不到。从前"五角大楼文件案"时，政府曾提出事先禁止报刊刊登消息的论点，结果输了，最高法院否定了政府的论点。

当天下午，凯西又找布雷德利和唐尼到《华盛顿邮报》后面的"大学俱乐部"去喝酒和谈话。凯西要求我们等一个星期再说，因为总统不在，他到日本出席七国首脑会议去了；等总统回来请示后再说。事后，布雷德利和唐尼决定暂时先不刊登这条消息，但准备先把这个问题摆出来给读者知道。

5月7日，《华盛顿邮报》头版登了一条消息，说是凯西准备控告五家报刊，而且因为受到这种威胁，本报还有另一篇关于美国收集情报的能力的报道，也只好暂时不登了。

5月8日，凯西和《华盛顿邮报》的律师爱德华·威廉斯一起吃早餐，扬言政府准备控告我们。但威廉斯认为，凯西只是说说而已，不会真干，他们一贯是“嘴硬骨头酥”，威廉斯领教过多次了。

5月9日，《纽约时报》登了一条消息，说中央情报局不许《华盛顿邮报》刊登一篇关于佩尔顿案的报道。这等于是告诉克格勃，要重新看一遍佩尔顿对他们讲过的东西。

5月10日，星期六，《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接到里根总统打给她的电话。总统说，他和凯西谈过话，如果《邮报》把关于佩尔顿的那条消息登出来，会有害处。总统说，这件案子很重要；他的意思是说这牵涉到无价之宝的机密。他还说，去年一年，因为有良好的情报，防止了125起恐怖事件。这个数字是里根不久前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的，但这次给人的印象是这和“常春铃”多少有关。

格雷厄姆对总统说，布雷德利一直很谨慎。她作为《邮报》的老板当然可以说不要登这条消息，她的儿子唐纳德·格雷厄姆，作为《邮报》的发行人，也可以说不要登。但他们母子二人都没有这样说，她认为还是让布雷德利去决定，这对大家都比较好。

里根似乎明白了，说声再见便把电话挂上了。

格雷厄姆对布雷德利说，她感到总统的论点有道理，她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写这篇报道。如果情报部门想推翻外国政府，那我们也许应当登条消息揭露，但美国多收集点情报，多窃听一点，有什么不可以？苏联不是也窃听我们吗？

尽管我们在技术上领先，但也不应当等待苏联赶上我们呀。

布雷德利解释说，我们写的报道是关于“常春铃”行动的，那个行动已经在五年前被佩尔顿破坏了。格雷厄姆说，总统担忧的比这个行动本身多得多，她希望布雷德利格外小心。

凯西认为，现在好了，他有两张大牌了，一张是里根总统，一张是格雷厄姆董事长。

可是5月19日早上，当审判佩尔顿间谍案准备开始选择陪审员时，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詹姆斯·波尔克在“今日新闻”节目里报告说，“佩尔顿显然出卖了国家安全局的一项十分敏感的机密——一个代号叫‘常春铃’的计划，据说美国潜艇在苏联港湾内进行绝密的水下窃听活动。”

布雷德利马上打电话给凯西，问他看到了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没有，凯西说他没有看到。布雷德利便质问他道，“好，你一直叫我们别登这条消息，现在你准备怎么办？”当天下午，凯西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已经把全国广播公司的这条消息告诉司法部了，请他们控诉该公司。

现在事情很清楚了，我们必须把原来写好的那条消息也登出去。5月21日，这条消息见了报，标题是“窃听系统被出卖，苏联人得到佩尔顿泄露的高级技术装置。”消息说，佩尔顿破坏了“一项耗费巨大、长期经营和十分成功的美国工程，该工程使用尖端技术窃听苏联通讯。”消息还说，这项工程是使用潜水艇施工的，装置已被苏联人取得。

凯西发表了一项温和的声明，说正在审查我们刊登的这条消息，看看是否需要提出诉讼。

第二天，开始审判佩尔顿。泰勒和我开始写含有更多细节的关于“常春铃”的一些消息。我们指出，“常春铃”的

地点在鄂霍次克海。

五天后，凯西和奥多姆发表了一个联合公开声明，说："我们警告不要猜测和报道超出审判时说出的细节。若妄加猜测和添油加醋，当视为未经许可的泄密，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相当损失。"报界马上对这个声明普遍表示不满，政府反对人们"猜测"的作法是十分荒谬的。

5月29日，凯西企图缓和气氛。他对美联社记者说，"我想报界对这件事是歇斯底里大发作，硬说我们要撕毁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践踏新闻自由。我们并不想做这种事。"至于他原来警告人们不要"猜测"，凯西又解释说，"如果要我重新说一遍，那么我也许不会用这个字眼，我可能要用'推断'。"

凯西还打了个电话给布雷德利。这差不多是1986年他们之间的第20次谈话了。他说，"我并不想搞互相指责的竞赛。"

6月5日，陪审团判定佩尔顿犯有间谍罪，后来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

第二十四章

从公开方面来看，1985年冬和1986年春里根政府忙的是利比亚问题。但是，从幕后活动来看，在白宫和中央情报局的外交政策日程上占优先地位的是伊朗问题。

3月10日晚上9点多，麦克法兰坐在华盛顿郊外他的住宅里的办公桌边。他打开通向白宫的电脑，打了一个密码，指示灯亮了，表示有一条机密电讯正要传过来。他想，大概是诺思打来的。他按了一下电钮，荧光屏上就出现了几行字，说的是："星期六在巴黎会晤了你的老朋友戈尔巴尼法尔，他提出了要求。他先讲了一大通，说我们想甩掉他，但他对于这项工作又是如何重要，如何能够使人质获释，只要我们给点小小的甜头，例如再给些武器等。"

诺思还提出一项个人要求，他想回海军陆战队去，现在是时候了。

麦克法兰赋闲在家，也真想念白宫。"在野"究竟还是不太有意思啊。他离开白宫才三个月，现在却已十分渴望找个工作做。他开始打一个回电给诺思。他说，是的，咱俩应当讨论一下你的前途。"坦率地说，我估计到夏天的时候，国会对你的压力会十分巨大。因此，我认为聪明的办法是你离开白宫。同时，你所做的一切，找不到任何别人来代替（连一小部分也代替不了）。而如果你不去把这事做完，那么过去五年所干的一切几乎都将付之东流。是否可以设想，

你在5月中离开白宫，休息30天，然后参加我的思想库，和我一起继续处理伊朗问题，同时建立其他秘密工作，各方面都很需要搞秘密工作。”

诺思知道，伊朗问题远未结束。他不想现在就离开他的权力基地，他已经用一台个人使用的通讯系统把这个权力基地扩大了。1986年初，他从国家安全局得到15台KL—43型密码机，用来和那些协助他搞恐怖行动和争取释放人质工作的人进行密码通讯联系。他也用这些机器为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事进行联系。一台给了西科德将军，另一台给了驻哥斯达黎加的中央情报局分站站长，他的化名叫托马斯·卡斯蒂罗，对支援反政府武装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3月底，为了表示总统亲自支持反政府武装，里根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卡斯蒂罗、诺思、哥斯达黎加的公安部长和波因德克斯特，并一起合影留念。

4月间，诺思已经把出售武器给伊朗和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工作完全联系在一起了。4月7日，他对麦克法兰说，“遵照波因德克斯特的要求，已为领导起草一项文件，说明下次运武器给伊朗的安排。”他起草的这个文件标题是“争取释放在贝鲁特的美国人质”，内中说伊朗为购买武器将付给美国1500万美元，大部分可以用来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波因德克斯特批准了转拨这笔款项的作法。政府和凯西都又在设法争取国会批准给反政府武装一些武器和直接军事援助，但进度很慢，立法部门的混乱常是如此。因此，在国会批准给予军事援助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将从伊朗付来的款项中拨1200万美元购买急需的供应，运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诺思还建议总统批准这个办法。

4月8日，情报监督委员会写了一个法律分析报告给波因德克斯特。说委员会是70年代情报部门滥用职权后设立的内部监督机构，委员由总统任命，专门监督情报部门的工作是否合法和正当。委员会的报告说，根据提供“通讯”和“咨询”这两条理由，美国机构可以向反政府武装“提供基本军事训练。”唯一的限制是这种训练不得包括“参与策划或执行”军事行动。

西科德通过个人通讯专线打了几个电报给诺思，讲空投弹药之事。4月12日，中央情报局驻哥斯达黎加分站站长卡斯蒂罗通知诺思说，对反政府武装的一次空投获得成功，他今后几周的计划是建立一支有2500人的军队，可以向西北方面进攻，并与其他部队联合，在南方形成巩固的力量。同时，他还估计在大西洋海岸一带会遇到强大的抵抗，因为那里的政府军能得到从海路运来的补给。他还说，如你们给予帮助，他们可以把政府军的这股抵抗力量拔掉，尽管这也许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诺思通过电脑线路对麦克法兰说：“我们正设法弄到10台发射器和20枚导弹……西科德已付款10%。”出口许可证也弄到了。

麦克法兰答复说：“你是否可询问中央情报局，英国曾把这些武器卖给哪些国家。我得至少和其中的一个国家取得联系。你在转运物资方面情况如何？是否需要我做点什么？如果你认为需要弄到一些迫击炮或其他大炮，请让我知道。”

在老行政大楼里，从302号房间走到拐角上的345号房间，还用不了一分钟的时间。诺思中校最近越来越多地从他的办公室走这么一小段路，去到凯西局长的办公室。凯西并

不是诺思的上级，但两人情投意合，可以互相倾吐衷肠。局长大人在中校的面前逐渐变成了父亲、密友和导师。他对诺思给予指导，有时几乎是替他办案。1984年，当诺思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安排秘密供应行动时，是凯西帮他制订计划，指导他成立一个私人基金会，由不在政府任职的在野人士领导。这是为秘密行动罩上一层非官方的掩护，使这个行动尽量离开中央情报局远些。凯西后来推荐西科德将军担任这项职务，并且向诺思解释说，西科德可以设立一个"行动帐户"，以便为在马那瓜活动的人支付小额现金、旅行费用和特殊的反桑解阵活动的费用，而不必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开支。

诺思的活动越来越危险和机密，只有少数人知道，凯西便是其中之一。诺思发现凯西的指导非常宝贵，他懂得如何办成一件事，而且毫不犹豫。他警告诺思说，你使用普通电话和在中美洲的人通话，很可能已经被设在古巴的克格勃窃听站偷听到了。因此诺思从国家安全局要来那15台KL—43型密码机。凯西还向诺思提供关于为反政府武装购买武器的中间商的情报，建议甩掉其中的两人，因为他们的活动和社会关系可疑，有一人则被怀疑向苏联集团转让技术。

诺思向局长大人解释说，把出售武器给伊朗赚得的钱用来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个移花接木的妙计是他和以色列人一起想出来的。凯西听了十分感动，马上就明白了此中妙处，真可令人拍案叫绝。原来，早些时候伊朗曾运送了一些武器给桑地诺分子，而且向他们提供石油贷款，几年来价值达一亿美元，如今，诺思却能叫宗教领袖霍梅尼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就是说，叫敌人去资助朋友，如此高明的绝招，真是神机妙算，非常人所能设想。所以，局长大人

称这着妙计为“登峰造极的秘密行动”。

诺思的世界越来越缩小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文件，最机密的级别是“四号系统”，现在也认为不够安全了；因此，他写的文稿改列为“不编级”的，他处理的文件属于“系统以外”的。但是他可以和凯西局长自由交谈，因为对出售武器给伊朗的行动和供应军需给反政府武装的行动来说，局长都是教父。

凯西警告诺思说，戈尔巴尼法尔几乎可以肯定是以色列的情报间谍。这就是说，他们得格外小心，而不是说要停止使用他。凯西训导说，要明白你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当看来诺思准备试探性地秘密访问德黑兰时，凯西对他说你自己也可能变成人质，你得准备可能受虐待。凯西说，对策只有一个，那就是带上自杀的工具。

不久，诺思这个人似乎是完全失踪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在哪儿，连波因德克斯特的副手也蒙在鼓里。凯西说过，总得找个人做挡箭牌，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搞的秘密行动被揭露，这个人就得挺身而出，做承受攻击的靶子。诺思说，他明白自己的任务，愿意让人们用梭标刺向他的胸膛。

在诺思的心目中，凯西简直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很有吸引力。这位局长大人真是个多才多艺的大知识分子。他可以在坐飞机旅行途中看完一本书。凡是有重要成就的人，他似乎都认识。他是支持世界各地反共运动的总后台。他具有世界眼光，知道如何改造世界，使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而服务。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是个谋略之士。

而且，诺思看到，在政府里目光最远大的就是凯西。局长相当自信地说过，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自筹资金的机构，国会管不着，也不要国会拨款。这个机构将完全秘密地

活动，或者独自单干，或者联合外国友好情报部门一起干。他心里想着的显然是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一旦出事，就彼此推得干干净净。按照资本主义的优良传统，这个机构还要创造财富。凯西说，这是一个“一应俱全的秘密行动”。

是的，这个机构不光是付赎金营救人质，不光是反恐怖主义，而且还要搞其他行动。诺思已经给它们起好了代号：TH—1，TH—2，TH—3，等等。凯西和诺思根据他们的经验，知道他们应当具备随时行动的能力。正如凯西所说的，“得做到通知一旦一下达，马上拔枪，立即动手。”

波因德克斯特清楚地知道诺思在各条战线上继续努力，怕他出事，故而在5月15日通过个人电脑打了一个秘密电讯给他，叫他“小心。”波因德克斯特警告说，“我担心你把自己在行动中的作用暴露得太公开了。从现在起，我要你除了我以外不再同任何人谈到你在行动中的作用，对凯西也不能谈。实际上，你要悄悄地散布一条掩护消息，说我坚持要你停止。”

诺思报告波因德克斯特说，他手里有600多万美元，马上就可拨给反政府武装。他说这样就不一定要去找第三国帮助，但并不是说中央情报局不必急于再来管理这项计划。

诺思建议让中央情报局也分担一部分工作，以减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担。他还说，他倒不在乎国会里那些反对支援反政府武装的民主党人骂他，但那会对总统和波因德克斯特造成政治上的麻烦。

几天后，诺思又向波因德克斯特建议说，应当召开一次不作记录的会议，请总统、麦克法兰、凯西、舒尔茨和温伯格参加。因为麦克法兰和他将押运武器到德黑兰去。5月19

日，波因德克斯特答复说，他不愿意和总统、舒尔茨和温伯格一起开会讨论这事。

这时，西科德去找凯西，向他施加压力。西科德说，新成立的机构需要支持，需要情报、情况和指导，但是都没有得到，相反，却不断有人来打听这个机构的性质、组织情况、老板是谁、西科德担任什么职务等。西科德说，我不需要他们来调查，我需要的是支持。

凯西答允过问一下这事。不久，凯西就在老行政大楼的办公室里打电话给诺思，请他过来谈谈。诺思来时，把西科德也带来了。

凯西说，“将军，再次见到你很高兴。”

诺思对凯西说，给反政府武装的捐助越来越少了，现在又很缺钱用。

凯西说，政府里有些人很乐观，认为到夏天时可能从国会得到新的拨款，在军事上直接资助反政府武装。但是他承认，他并不这样估计，他感到悲观。

诺思请西科德作个估计。西科德说，他手里缺钱，并且需要昂贵的、先进的导航系统和气象雷达。

凯西问，“需要多少钱？”

西科德说，那取决于什么时候给这些东西，如果美国政府重新给予支持，那么大约需要1000万美元。

凯西不断重复说，“1000万美元”，也许只好找沙特阿拉伯了，但我不便找他们。他朝西科德说，“但是你可以找他们。”

西科德说，他不是美国政府官员，恐怕沙特对私人去找他们不会太感兴趣。

诺思插话说，管他是谁，反正得有人出来管这件事，情

况已经很紧急了。

凯西说，舒尔茨可以出面去找沙特，按照新通过的法律，国务院可以为人道主义目的替反政府武装寻求支援。凯西说，他要找国务卿谈这件事。

国务院没有去找沙特。他们后来找了文莱的首脑，得到对方秘密捐助1000万美元。这还是舒尔茨亲自同对方谈了三小时后的结果。上一年，中央情报局曾向文莱的领导人提供安全保卫方面的协助。

诺思提供了那家瑞士银行的帐号，让文莱把钱存入这个帐号。但是，诺思的秘书芳茵·霍尔搞错了帐号的两个数字，结果使这1000万美元存入了别人的帐号，反政府武装没有得到。

5月底，麦克法兰、诺思和另外几个人，包括过去曾任驻德黑兰分站站长的乔治·凯夫，秘密押运武器潜往德黑兰，希望人质能够全部释放。但麦克法兰和诺思此行一无所获，空手而归。凯夫写给凯西的报告中说，戈尔巴尼法尔建议用这次售武器给伊朗得来的钱去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和阿富汗的抵抗力量。

6月10日，麦克法兰向波因德克斯特表示，他担心诺思出事。他说，“看来越来越清楚，民主党左派准备整他，以便在选举年进行报复，他们最后会抓住他的把柄的。”麦克法兰建议把诺思送到在贝塞斯达的海军医院去检查，叫那里给他开个残废证明，好让他从海军陆战队退伍。麦克法兰说，这当然会对工作造成损失，但相信能够找到办法继续干这件事。

国会那边，又忽然有很多人反对起桑解阵来了。6月25

日，众院以221票对209票通过了一项法案，拨款一亿美元支援反政府武装，参院已先通过了这个法案。这样，等10月间这笔援款开始动用时，中央情报局又可以重新回来干这事了。

但国会果然不放过诺思。夏天，众院情报委员会就找诺思去谈话，他否认曾向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咨询意见，也不知道有什么关于反政府武装的专门军事行动。波因德克斯特看到诺思否认以上情况的记录后，传了一个"干得好"的信息给他。

国会既已通过给反政府武装一亿美元的援助，诺思知道他不久就要失业了。7月24日，他写信给波因德克斯特说，他搞的行动计划还剩下一批物资，现在应当由中央情报局出钱把它们买过去。他估计，这批物资总计价值450万美元以上，包括：六架飞机、仓库、供应品、维修设备、船舶、小艇、出租房屋、车辆、军械、弹药、通讯设备，以及在哥斯达黎加的一条长6520英尺的飞行跑道。所有这些物资和人员都是由海外的公司所有并付帐的，与美国无关。如果中央情报局不要这些东西，将来再另外花800万到1000万美元去另外买，那未免太浪费了。

波因德克斯特同意，指示诺思去找凯西谈，但凯西却要中央情报局别牵连进去。

戈尔巴尼法尔得知，他要被美国甩掉了，因为美国已经通过伊朗议长的侄子找到另外一条秘密渠道。于是，戈尔巴尼法尔拼命向伊朗方面施加压力。7月26日，美国人质劳伦斯·詹可神父被释放，他已被拘押达18个月之久。凯西为此写了一张绝密的小条给波因德克斯特，说道："无可争辩，这次伊朗的关系户真正起了作用，尽管前几次失败了……总

的来说，根据我掌握的情报，我认为我们应当继续干下去……我深信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因为伊朗内部各派实力对比比较复杂微妙。”

凯西和舒尔茨决定完成在利比亚问题上已开始做的事。中央情报局广事散发关于卡扎菲使用的七处主要住宅的情报，目的也许是希望消息走漏出去，使这位上校知道他已经被监视。但结果消息并未走漏。据秘密的情报来源说，卡扎菲和也门官员们会谈时，表现十分古怪，说明他也许已经处于发神经病的边缘了。凯西感到这下可好，总算治住了卡扎菲，美国得保持压力，刺激他，让他丧失自信心，制造一种离心力，使他的政府分崩瓦解，他也随之消逝。国防部可以派飞机到利比亚海岸去制造声震，进行扰乱。凯西说，“侮辱他。”9月1日将是卡扎菲革命胜利17周年纪念，通常卡扎菲要在这天讲话。如果美国能够吓得他不敢露面，那可是太好了。他已经把军事总部从海岸边搬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内地，远离美国轰炸机的航程。这不就是害怕美国的明证吗？

凯西派遣主管情报分析的副局长理查德·克尔和汤姆·特威坦到白宫去汇报，陈述中央情报局能够做些什么事来对卡扎菲施加心理上的压力。特威坦是在行动处干过25年的老手，60年代曾在利比亚的班加西搞过情报工作。他说，中央情报局有办法在国外的报刊上登载一些假消息来吓唬卡扎菲。重创敌人的手段俯拾皆是。

这时正是盛夏，可做的事不多。可以选中卡扎菲作为打击目标，使里根取得一个胜利。虽然这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危机，却于8月7日下午在形势室成立了一个“危机预先计划小组”，低于内阁级，由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

派员组成。国务院送来一份绝密形势分析报告，提出不少设想。

国务院说，总的目标是要采取密切配合的秘密外交、军事和宣传行动，旨在促进利比亚内部的力量起来推翻卡扎菲。

今后可以采取的步骤包括：造谣生事，挑拨离间，搞假动作，虚张声势，派官员到英、法、意三国去进行游说，要求他们一起对卡扎菲施加压力。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治军事处处长霍华德·泰奇尔建议政府通过军事部门同法国军方联系，要求他们说服法国领导人，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把在乍得的利比亚军队赶出去。

波因德克斯特自己也写了一个报告给总统，建议对利比亚政府加强压力，使之孤立，促进利比亚内部力量起来推翻卡扎菲。他说，各方一致认为，无论谁上台接替，都比卡扎菲好，对美国有利。

8月14日上午11点，里根召集舒尔茨、温伯格、凯西、波因德克斯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在白宫开会。波因德克斯特在会上大事吹捧军方，说4月14日的袭击十分成功，打击了恐怖主义，削弱了卡扎菲，有助于提高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现在需要采取大规模的造谣和虚张声势的活动，制造一系列事件，导致卡扎菲垮台。

克劳提出一系列问题，中心思想是这种假动作结果恐会适得其反，不但达不到什么目的，而且反会减弱上次袭击所取得的效果。

但是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都愿意干，认为这种办法不必花多少钱。总统也感到这办法不错，还说笑道，可以请卡扎菲来旧金山玩玩嘛，他不是喜欢打扮，出风头吗？舒尔茨开

玩笑说，让他传染上爱滋病多好。最后，同意采取各种捣乱办法。

8月16日，里根签署了一个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起草的国家安全决定指示，目的是："阻止卡扎菲进行恐怖活动，促使利比亚改换领导人，减少苏联在利比亚得到好处的可能性。"这个指示的代号是："面纱"。

九天后，《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登了一条假消息，说卡扎菲又在策划新的恐怖行动，因此美国准备再次进行袭击。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竟然在第二天说，这条消息是"权威性的"。

其他报刊，包括《华盛顿邮报》，也纷纷制造谣言，说什么政府准备搞新的对抗行动。

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的一些利比亚问题专家却很担忧，这样搞下去恐怕反会激发卡扎菲搞新的行动。不出所料，9月5日，四名暴徒在卡拉奇机场袭击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民航机，打死21人。除四名凶手外，还抓获一个持利比亚护照的阿拉伯人，他在打给利比亚人民代表处的电话中自称是奉利比亚情报局的指示，来卡拉奇执行"特殊任务"的。

10月2日，我们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揭露政府对卡扎菲搞假动作，造谣生事。里根和波因德克斯特马上在当天对记者们说，我们写的这篇报道是不真实的。晚上，舒尔茨采取另一种态度，他说，对卡扎菲搞点心理战是可以的，还引用丘吉尔在二次大战中说过的一句话："战争时期，真话是如此宝贵，因此必须用一堆谎话来陪衬保护。"

10月3日，《纽约时报》登了五条消息，说政府如何对利比亚搞假动作的经过，还提出这样干对政府的信用有害。

10月4日，波因德克斯特的副手奥尔顿·基尔把我找去，对我说政府无意制造谣言欺骗美国新闻界。他还说，国务院的那个形势分析报告里提到“暗杀”（卡扎菲）一事，是“用词不当”，但是其所以出现这个名词是因为不能排除利比亚国内有人可能暗杀卡扎菲。

这一年的秋天，凯西遇到来自国会方面的更大麻烦。参院情报委员会一年多来一直在调查近年发生的几起间谍案。人们称1986年为“间谍年”。情报委员会正好在这年秋天搞了一个调查结果报告，主要是分析四起大案：

- 罗纳德·佩尔顿案。早在空军工作时，佩尔顿就违犯过纪律，后来在国家安全局又宣告自己破产，这两件事均未引起上级警惕。还有迹象表明，他1979年离开国家安全局是被迫的。他曾数次去维也纳，他打给苏联使馆的电话也被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但最令人吃惊的是，1982年海军就对“常春铃”被破坏之事写了一份绝密报告，其结论说苏联在1981年发现了海底电缆被窃听，必然是因为他们有个间谍提供了内情。报告说，不是由于巧合，也不是由于运气，而是苏联知道这个窃听架在何处。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都没有看到这份报告，更不知道有间谍出卖情报，因为海军和国家安全局显然不愿意被这两个委员会叫去回答质询，免得国会停止给潜艇侦察活动拨款。
- 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霍华德人品不好，行为不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1984年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分站站长曾打电报回来说，情报来源和活动被破坏，只可能是因为内部有间谍，这个电报并未引起领导注意。两个委员会曾找这位分站站长谈话，他说莫斯科工作环境很艰苦，一切活动，包括出动人员和使用技术方法去收集情报，都很危险，出事的可能在50%左右。而中央情报局的人都怕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以间谍罪被驱逐出境。对

从事秘密工作的人来说，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等于和坐监牢差不多，丢脸，倒霉。所以，大家宁愿看到国内出事，也不愿自己去冒风险。

• 乔纳森·波拉德案。此人是海军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员，非军人，是研究恐怖行动的专家。1985年被捕，罪状是为以色列充当间谍，拿走公家几箱子的内部文件。几年前，波拉德就对熟人说过，他为以色列情报局工作，连对海军情报局的副局长也说过这话，但无人信以为真，也没有人提出疑问。以色列对美国情报文件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竟向波拉德提供“国家情报分析”的目录清单，要求他提供更新的文件。波拉德则向以色列吹牛说，他几乎能接触海军所有的电脑，其实这不见得是真的。但是，他接触过的电脑的储存内容显然可能已出卖给以色列。

• 海军人员约翰·沃克和杰里·惠特沃思案。从对美国造成的损失来说，这两个人充当间谍的破坏作用也许与佩尔顿是相等的。惠特沃思是一名高级的首席无线电报务员，他于1976到1985年间每年向苏联提供二到四次情报，每次约25到50卷胶卷。苏联付给他30万美元。惠特沃思一度租有一辆乳白色的罗尔斯·罗伊斯牌英国高级轿车。尤尔钦科曾说过，克格勃认为，沃克和惠特沃思两人的间谍活动是克格勃历史上最重要的。指挥这项活动的克格勃官员都得了勋章，一个得到的是“苏联英雄”勋章，另外两个得到的是“红旗勋章”。尤尔钦科说，如果是在战时，苏方从这两个间谍那里得到的情报会对美国产生“毁灭性”的作用，可以使苏联在战争中打赢。惠特沃思曾在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上当过机要军官，掌管一切最机密的密码文件，包括修理手册、线路图和密码机每天的密码调整表册。他当间谍后，使苏联得以破译“企业号”上来往的无线电通讯，达一年之久。苏联共破译了100多万条电报，得知了美国其他兵种和情报部门使用的先进密码设备情况。

• 早在70年代末，美国大西洋舰队总司令艾萨克·基德海军上将就知道苏联潜艇竟然可以对美国海军演习作出很好的反应，好象是已经掌握了美舰的通讯似的。基德马上叫情报官员写了份报告，其结论

说有人泄密，可能是个掌握大量密码材料的报务员。国家安全局审阅了这份报告，但未跟踪追查。直到七年后，也就是1985年，沃克的妻子向联邦调查局告发，沃克和惠特沃思才被破获。

委员会的报告还详述了美国驻苏使馆的安全问题。新的使馆建筑里装有各种各样的窃听装置，连打字机里也发现了窃听器。提到莫斯科那边的许多情况都被凯西删掉了，因为他不愿意让苏方知道美国了解些什么。报告的其他部分可以公开，但几乎所有的细节都删掉了。

凯西仍然不大高兴。他写了一封信给杜伦伯格参议员，说他同意报告里面没有什么机密，但整个来说这份报告仍然是机密的。两人争吵了起来。提到霍华德和佩尔顿的地方缩短为只有两句话，都是公开讲过的。凯西还是不同意，他弄不懂为什么非要让公众知道这两个人的事。杜伦伯格说，有问题就得正视，如果凯西还希望参院批准中央情报局的预算，就该让这份报告公开出版。结果，1986年10月，这份报告出版了。但内容很一般，没有透露什么新东西。标题叫“审议美国反间谍和安全计划，迎接间谍的挑战”，长达156页。

凯西仍然决定要在伊朗问题上实现某种突破。这不光是通过卖武器打开通向霍梅尼的大门，或者是不让苏联享有独占的影响，甚至不只是使美国人质获释。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在搞一些雄心勃勃的秘密行动，支持推翻霍梅尼的运动，并利用伊拉克击败伊朗。

自1982年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支持伊朗主要的反霍梅尼运动——流亡在巴黎的“争取伊朗解放阵线”，每月付给10

万美元的津贴。凯西并不指望这个阵线能发动政变，但和他们保持联系可以得到一些粗略的情报。

另外，每月花两万到三万美元支持“解放广播电台”，它从埃及播送反霍梅尼的节目，每天四小时。

两个月前，也就是8月间，中央情报局和巴格达建立了直接的绝密联系，向伊拉克提供从美国卫星上收集到的更好和更快的情报。凯西亲自会见了伊拉克高级官员，以保证这条新开辟的渠道畅通，并鼓励伊拉克更多地袭击伊朗，特别是袭击经济目标。8月中，伊拉克突然对西里岛上的伊朗油库进行轰炸。由于距离较远，过去伊朗一直认为伊拉克无法轰炸这个地方。

9月间，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台小型电视发射机，让已故伊朗国王的儿子礼萨·巴列维向伊朗作了11分钟的秘密广播。这位“小国王”宣布说，“我会回来的。”

关于提供给伊朗的情报，凯西认为可以有真有假，互相掺和。提供情报是武器换人质交易的一部分内容。

凯西很高兴看到同伊朗那边建立了新的秘密渠道。一条渠道是同议长拉夫桑贾尼的侄子，另一条是同总理办公室的情报处长。拉夫桑贾尼的侄子秘密访问华盛顿时，和诺思见了面，谈话全部用窃听器录了音。诺思事后向波因德克斯特报告说，谈话十分成功。他认为这个侄子可以在促成两伊停战方面起作用，如同老罗斯福促成1904年日俄停战一样。有没有人会让里根也得到这样的奖赏啊？

第二十五章

美国和伊朗做的武器交易渐渐控制不住了，中央情报局主管跟踪此事的高级分析员和反恐怖行动专家查利·艾伦为此感到很烦恼。国家安全局的窃听工作十分完善，戈尔巴尼法尔、以色列人和其他中间人有什么动静，都会被国家安全局窃听到。艾伦开始注意到，美方从伊朗武器交易中得到的利润越来越大，简直不可思议。而且总有千百万美元不知去向，或者没有记帐。例如：1985年第一次出售所得余款350万美元；1985年12月瑞士银行帐户上有2400万美元；还有一次是30天的利息就达300万美元。在正常情况下，秘密行动的款项都是控制得很紧的，不可能有多少现金结余。但这次行动中却有大量的现金利润储存，令人难以理解。艾伦仔细审阅窃听记录，发现伊朗人和某些贷款人如卡索吉有很多意见。看来，西科德将军等人在搞两边运武器，一面供应伊朗，一面供应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艾伦于是去找盖茨报告这情况。

他对这位副局长说，“我十分担心，债主们要求还钱。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事要暴露了。也许这笔钱是转给反政府武装了，但我没有证据。”

盖茨说，他不愿意再听下去了。他不想知道关于资助反政府武装的事。中央情报局按法律不能参与这件事，所以他宁愿知道得越少越好。

艾伦说，这可不是谣言，而是根据窃听材料得出的分析判断。

盖茨听了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说还是把这个情况报告凯西吧。但实际上过了六天才去报告。

10月7日，艾伦对凯西说，出售武器给伊朗得到的钱可能转拨给反政府武装了。凯西说，他刚和一位老朋友和老主顾罗伊·弗马克谈过话。弗马克在纽约做生意，也是卡索吉的律师。弗马克对凯西说，那些帮助卡索吉募集到1000万美元"救急"贷款的投资者非常不高兴。他们感到被欺骗了，威胁说要提出法律诉讼并向报界公布真相。这样，就会把美国政府也牵连进去。

艾伦同意把他担忧的事全部写成报告。

10月9日，诺思自己开车来到中央情报局总部，同凯西和盖茨一起吃午饭。在七楼那个沉闷、拘束的环境气氛下，他概述了近来和新认识的伊朗人会晤的情况。他和通常一样兴高采烈，充满乐观，认为至少可以再释放一名人质。遗憾的是，无法弄到据信已死亡的贝鲁特分站站长威廉·巴克利的遗体。伊朗方面的人说，巴克利在受刑时供出了长达400页的口供，也许可以弄到一份记录副本。

凯西对行动的安全表示担心，因为那个老关系戈尔巴尼法尔显然很不高兴，快要爆炸了。

盖茨说，也许自己看小说太多了，但有件事情使他感到很不放心，那就是1月17日关于用武器交换人质的报告据说只有一份，而且是存放在波因德克斯特的保险柜里。如果这个经总统批准的报告丢失，许多人——包括他们三人——都会遇到麻烦。

凯西同意盖茨的话，他坚持要求波因德克斯特复制一份

那个报告给他。诺思说，好，他去想办法。

话题又转到中美洲问题。四天前，一架运物资给反政府武装的飞机在尼加拉瓜被击落，机上管货物的尤金·哈森弗斯被桑地诺分子俘获。9日上午，他在记者招待会上露面，供认他认为自己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

盖茨问，那个私人机构在资助和供应反政府武装的活动中，是否有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物资等直接或间接地牵连在内。

诺思说，“干干净净，没有。”他说，他一直努力注意把售武器给伊朗和支援反政府武装这两件事分开。

最后，诺思谈到瑞士银行的存款和反政府武装。他没有细讲，凯西和盖茨也没有追问。饭后，盖茨又回去问凯西，究竟听懂了诺思讲的话没有。凯西说，听不懂。盖茨问，我们是否还需要担心这事。凯西摇手说，不必。

两小时后，凯西和盖茨到国会去，向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保证，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哈森弗斯那架飞机的行动，也没有参与任何其他供应武器给反政府武装的行动。

诺思回到白宫，便坐在电脑旁边，打了一个电讯给麦克法兰说：“我们急切需要找一位高级律师去为哈森弗斯辩护……为了防止事情漏馅，这点非常重要。”诺思还说，他已从一个私人处弄到10万美元，以便为哈森弗斯聘请律师。“不幸的是，已经报告里根说准备这样做。”

然后诺思又和凯西通话。凯西对他说，“快收摊，清理一切。”于是诺思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工作，企图藏匿凡是提到转帐拨款给反政府武装的一切文件。凯西还说，出事

之后，总得有个人出来承担责任，诺思也许地位还不够高，不能做人们听了会相信的牺牲品。也许得叫波因德克斯特出来做牺牲品。

10月14日，查利·艾伦提出了一个七页长的备忘录，其中包括三点建议。第一，他敦促马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成立一个计划小组，请基辛格或理查德·赫尔姆斯参加，从局外人的立场搞点艰苦的、过得硬的研究审议，对这个秘密行动提出一些真正的问题，如：当事人真正的目的、方案和动机是什么？

第二，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得准备好这事公开暴露。戈尔巴尼法尔已经准备向新闻界或者到法庭去谈这事。他这个前任间谍的心里充满不快，认为美国政府没有遵守许多诺言。

第三，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得决定如何有秩序地和系统地关闭戈尔巴尼法尔这条渠道。艾伦在第六页上写道："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一起从这些交易中得到相当数量的利润，其中有些利润又转用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其他活动。"

盖茨看过这个备忘录后，马上跑到隔壁凯西的办公室。他说，看看这个。凯西接过去看后说道，啊，这真是炸弹。他于是打电话给波因德克斯特，要求马上召开会议。结果不行，等到第二天，10月15日，才开会。地点是在白宫隔壁老行政大楼凯西的办公室里，波因德克斯特总算挤出了半个小时同凯西和盖茨一起开会。凯西把艾伦写的备忘录交给波因德克斯特看，并且说，"马上叫白宫的法律顾问参加处理这事。"他说，事情不妙，东窗事发，人们要纷纷指责我们渎职、行为不端。波因德克斯特应当考虑请总统在这事点点滴滴地泄露出去之前，向美国人民痛痛快快地讲清楚。波因德克斯特没有理会。

凯西和盖茨回到总部后，马上把艾伦找来。凯西要艾伦立刻去找弗马克谈，把所有的细节都集中在一起，写一份全面报告。那天，弗马克曾找过凯西，强调迫切需要满足他的主顾的索债要求。

第二天，艾伦会见了弗马克，然后写了个报告说，弗马克建议再运一批武器给伊朗，以便取信于他们，同时拨一笔钱给戈尔巴尼法尔，以便他偿还一部分给投资者，这样他才能再借到钱去购买更多的武器运给伊朗。弗马克认为，这样可以导致更多的人质获得释放。戈尔巴尼法尔曾对他说，诺思已表示可以从美国国会批准的一亿美元援助反政府武装拨款中，拨出1000万美元偿还购武器给伊朗的债款。

10月22日，艾伦到纽约去再次会见弗马克。对方告诉他，戈尔巴尼法尔一口咬定说，5月间出售武器给伊朗所得的1500万美元，大部分转拨给反政府武装了。

10月23日上午9点，艾伦把情况向凯西汇报了。凯西命令写个报告给波因德克斯特，反映这个情况，由他签名发出。

这时，诺思还在继续出售武器给伊朗。伊朗通过拉夫桑贾尼议长的侄子这个新渠道，在约定的瑞士银行里存了700万美元，其中200万美元已用于支付10月底运到的500枚"陶"式导弹。因此，还有500万美元的武器未交货。诺思报告波因德克斯特说，对方保证"在最近几天内"再释放两名人质。

11月2日，戴维·雅各布森获释。3日，黎巴嫩杂志《阿尔一希拉》报道说，美国秘密供应武器给伊朗，麦克法兰曾秘密访问德黑兰。这个消息登出来时，舒尔茨正在赴维也

纳与苏联人举行裁军谈判的途中。他打了个电报给波因德克斯特，建议干脆公开这事，进行解释。波因德克斯特复电说，布什、温伯格和凯西都同意仍有必要"绝对闭口不谈。"

11月7日，总统在白宫接见雅各布森，并对在场的记者们说，贝鲁特传出来的那条消息"没有根据"。

雅各布森是被关了17个月后才获释放的。他不肯回答自己是如何得释的问题。他举起手臂，请求记者们要审慎。他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们负点责任，不要再追问了。"

尽管事情尚未完全暴露，弗马克这天却又对艾伦说，他的主顾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要揭露美国用出售武器给伊朗得到的钱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凯西和盖茨又去看波因德克斯特。凯西建议由白宫法律顾问彼得·沃利森来处理整个案子。

波因德克斯特回答说，"我不相信沃利森会守口如瓶。"

凯西感到绝望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捂住盖子，政府领导层又不团结，使形势更加严重。政府内部，个人之间，明争暗斗，积怨多年，如今已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了。舒尔茨早就反对和伊朗做交易，而且事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办的，这使他更讨厌。现在他已开始公开暗示他是不同意这么干的。国防部则故意放空气说，温伯格认为出售武器给伊朗是"荒谬的"。里甘和波因德克斯特当着总统的面激烈争吵，一个主张作点公开解释，一个反对。总统赞成波因德克斯特的意见，这位国家安全顾问认为如果严守这件机密大事，他们还能使更多的人质获释。

11月10日，凯西到白宫去和总统、布什、舒尔茨、温伯格、米斯和波因德克斯特一起开会。总统对他们说，谣言四起，消息乱登，对政府正在做的事情有危害。他感到自己不是在对付伊朗的恐怖分子，而是在对付国内的那些温和派。而且，要讲清楚，卖武器给伊朗并不是付赎金。总统说，因此需要发表一个基本声明，其中不必谈细节和专门问题。这时，舒尔茨才第一次知道总统签署了1月17日批准卖武器给伊朗的报告。尽管有些勉强，最后还是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所有的高级顾问都"一致"支持总统，谴责那些"妄加猜测的消息"，声称"美国政府的政策未变，不向恐怖分子作出让步"。

美国情报部门内部传说纷纭，有人说，在出售武器给伊朗所得的钱的问题上闹出了大事情。11月12日，参院情报委员会派调查人员去中央情报局，企图得到国家安全局窃听售武器给伊朗案的记录材料。凯西拒绝给他们，说这个行动仍是保密的。

白宫知道，要找个最好的形象出来解释伊朗问题，还得请总统自己出马，向公众讲话 因此，预定于11月13日晚上请里根发表电视讲话。事先，国会两院领袖和情报委员会的领导人都被邀请到白宫来，听波因德克斯特和凯西汇报情况。波因德克斯特一开始就念1月17日的报告，其中命令凯西不要把这个行动告诉两院情报委员会。国会领袖们听了又生气又感到令人难以置信。

散会后，凯西问莱希参议员是否愿意搭车同行。莱希说，好，我正要去乔治城，和家人一起吃晚饭。他们两人搞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一年多了。早在1985年10月，当"阿基莱·劳罗"号游船被劫持后，莱希就曾到电视上讲话说，美

国情报部门知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说谎。莱希说，“昨天穆巴拉克对新闻界说，劫持者已经离开埃及，当时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事实。我们的情报很准，很准。”这句话的含义是穆巴拉克的电话被窃听了。凯西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给这位参议员，指责他乱说乱道，泄露了国家安全机密，几乎等于是犯了叛国罪。实际上，莱希讲的并没有超出政府发言人所已经讲过的，但凯西硬说，参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讲话份量更重。

他们上车后，莱希说，中央情报局局长不应该参预政治，更不该企图击败不友好的参议员。他说，但是这个伊朗问题会闹翻天，参院情报委员会将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要下令传人到会宣誓作证，不再搞什么非正式的、友好的谈话了。政府竟敢不事先通知本委员会并与之商量，这可是言而无信，破坏默契。

民主党在上周的中期选举中获胜，莱希也以优势选票获得连任。他说，自己有可能仍在情报委员会任职，甚至当主席。凯西听了忙说，我们要继续合作共事。这时，车已开到乔治城，莱希跳了下来，凯西也下了车，握着参议员的手表示亲热。凯西拍拍他的肩说，我们的信念和理想是共同的；并暗示中央情报局想颁赠一枚勋章给莱希，表彰他的功绩。

一小时后，总统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没有为营救人质付出“赎金”，只是企图在伊朗打开关系和取得影响。出售给伊朗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他还把这次对伊朗的行动比作尼克松和基辛格1971年打开和中国关系一样。

他说，“我们没有用武器或任何其他东西去换取人质。我们今后也不会这样做。”

他说这一切都是合法的，“正在把全部情况告诉国会的

有关委员会，今后还要继续通知他们。”

波因德克斯特把1月17日的报告从保险柜里拿出来，复制了一份，送交参院情报委员会。现在可是白纸黑字，有真凭实据了。但是杜伦伯格参议员和莱希参议员仍然认为真是不可思议，总统竟会命令凯西“不必将此事报告国会”。这自然是10个月前的事。但凯西是比较干净的，他只是执行命令，尽管国会方面也知道他参与了政策和命令的制订。政府如此胆大妄为，擅自越权，破坏国会进行监督的原则，简直是回到了十几年前的状况，使杜伦伯格和莱希惊异不止。总统说得好干脆，他可以任意对付国会。最突出的是报告里有句话说，不通知国会是因为此事“非常敏感和安全上有风险。”

11月14日，波因德克斯特来《华盛顿邮报》吃午饭。他说，这个行动是一个合理的冒险。总统在外交事务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由他自己决定，不受传统观念的限制。两天后，他又到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讲话，说因为有种种猜测，同时也有人泄露机密，政府才公布伊朗问题。他还说，这个行动“基本上是情报行动”，因此将由凯西而不是他去把情况告诉国会。

同一天，凯西出国到中美洲去了。国会既然已批准了给一亿美元支援反政府武装，其中7000万归中央情报局支配，他当然要去监督布置一番。他刚走了一天，盖茨就在17日打长途电话给他，要他赶紧回来，因为周末情报委员会要开听证会，请凯西到场作证。18日，波因德克斯特又亲自打长途保密电话给他，要他回来一起商量，到国会作证时怎么讲，还说米斯也来帮助准备，但不要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来。

凯西和舒尔茨的关系终于破裂了。11月16日，舒尔茨也在电视里讲话，毫不掩饰地说，他也反对出售武器给伊朗这一政策。他说 在这个行动中，波因德克斯特是“指定的击球手”。记者问他是否在这问题上代表政府讲话，他坚定地回答说，不是。

舒尔茨越来越讨厌凯西。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显然是在另搞一套外交政策，不光是在伊朗搞交易而已。他的影响太大了。首先，他使用他的分析员和其他官员在首都收集情报，想了解华盛顿有什么动静。其次，他利用中央情报局这个机构为他制订政策。最后，中央情报局通过它的官员或白宫官员，成为执行政策的机构。最好的例子就是1985年，凯西把格雷厄姆·富勒写的关于伊朗问题的第一个材料拿到各单位去推销，在被国务院和国防部拒绝后，他竟把它卖给了白宫。

舒尔茨也知道，凯西多年来不断破坏裁军协议，颇有成效。凯西和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结成秘密联盟，珀尔也是个强硬派。中央情报局不断写报告，用巧妙的手法破坏裁军。凯西还迎合总统的成见，说裁军谈判无非是苏联的另一个工具。苏联的立场是根据两点盘算制订的：（一）他们已经想好制造什么新武器；（二）他们已经知道美国想制造的哪些武器对他们的威胁最大。当然，这也很自然，别的国家包括美国也是这样考虑的。但凯西提出的“证据”是要表明苏联并不真想裁军，只是利用谈判玩弄策略而已。

舒尔茨认为，白宫本来在裁军问题上就是犹豫不决，凯西搞这些名堂 更是火上加油，大大助长了白宫的犹豫。看来，这位局长管得太宽了吧。他那个情报局的钱也太多了。关于制造价值千百亿美元的卫星武器的决定，他也插手。他

控制着调查研究和分析形势，他控制着秘密行动和反间谍活动。凯西如此积极，所以在制订政策上也有他一份。舒尔茨感到，凯西担负的责任未免太大了，也许需要分散一点为好。

凯西年纪也太大，这或许是他最后的一个职务了。他反正家资富有，卸去官职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舒尔茨感到，凯西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已经使人们对中央情报局普遍不信任，认为它不够客观；不仅国会方面，而且政府内部也这样看。从某种意义上说，凯西已经失掉他的品德，他越权过甚，成了"影子国务卿。"

11月18日傍晚约6点钟时，我到白宫去会见波因德克斯特的副手艾尔·基尔。他说我们的报纸不可以刊登关于美国秘密支持反霍梅尼的流亡分子的消息，同时又联系到美国卖武器给霍梅尼政府。基尔说，卖武器给伊朗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在中东武器才是主要的货币，美国别无选择。美国并不信任伊朗，伊朗也不信任美国。美国为了表示诚意，只好卖武器，别的东西例如奶粉、绷带等，人家不稀罕，到处可以买到。

他说，如果报上登消息说，美国不仅和伊朗的温和派打交道，而且和伊朗流亡分子打交道，那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德黑兰不会不知道。

我回到《华盛顿邮报》后，报馆决定还是要登那条消息。白宫说的话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份量了。总统第二天就要出席记者招待会。我们认为，登一条消息说美国既卖武器给霍梅尼，中央情报局又支持拥护小国王的流亡分子，这样的事白宫心里其实是欢迎的。

当天晚上，诺思、麦克法兰和其他几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正在拼命工作，设法搞出一份大事记，把总统和这件事拉开距离，掩盖他可起的作用。

第二天，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为伊朗问题辩护说："我不认为犯了错误……我不认为发生了什么惨败或重大失败。"他四次否认他"容许"售武器给伊朗，而且没有别的任何国家参与此事。但记者招待会后25分钟，里根马上又发表了一个不寻常的更正，说他实际上容许了另一个国家运送武器给伊朗。

第二天，凯西和盖茨跑到白宫去，企图弄清一桩与诺思的争议。因为诺思说，1985年11月时，要中央情报局帮助搞由以色列运武器给伊朗的事，这个要求不是他提出来的。后来，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又同意说，是诺思提出来的。晚上，凯西又来到白宫，准备完成他第二天要在情报委员会上讲的证词。他和波因德克斯特、舒尔茨和米斯一起商量。他准备在证词中说，中央情报局当时以为，1985年以色列运给伊朗的是"石油钻探设备"，而不是武器。

商量好后，舒尔茨又到白宫总统的卧室去见总统。谈话时气氛很紧张。国务卿对总统说，中央情报局局长竟准备对国会的情报委员会说谎，得赶快制止他这么干，他这种说法经不起人们简单的推敲。舒尔茨简直是火冒三丈。他自已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对总统说话，几乎是教训起总统来了。但是，他还是对里根说，得正视事实，任何人一查记录，便会看到政府是用武器换人质。

此时，凯西正在总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一批知情官员一起开会。他和诺思谈话后，删掉了当时以为以色列1985年运给伊朗的是石油钻探设备这句话，改为干脆不提此事。

第二天，他起床很早，继续修改证词。调子降低了，使证词更符合已经泄露出去的情况和估计已不能保密的事实。上午9点30分，凯西出现在众院情报委员会15位委员面前。这次是绝密听证会，禁止别人旁听。大家都绷着脸，一肚子不高兴。凯西花了10分钟，念完他的综合汇报后，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毫不客气地驳斥凯西的话说，把这项秘密行动通知情报委员会竟可拖延10个月左右，真是岂有此理。凯西镇定自若，冷冷地说，“我们讲的是总统按照宪法规定享有此种特权。”他说，当时需要小心谨慎，不能泄露此事，而伊朗设法施加有限的影响让那些在黎巴嫩扣押美国人质的人释放人质，也“花了不少时间”。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诚实的尝试，我们花的代价相当小，与我们想要取得的成果肯定是相称的；卖出的那点武器是微不足道的。”

他还说，“要办成这事，就得冒点风险，否则干脆坐在家里，听任事态发展。我个人是赞成小心谨慎地冒点风险。如果让我重新干一回，我想说我还是愿意冒这个风险的。”

一些共和党人跳起来，为总统的决定辩护，而且说，情报委员会泄露了机密。俄克拉何马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戴夫·麦克迪问道，“凯西先生，这个行动是谁主管的？”

凯西说，“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份，是集体负责的。”

麦克迪又问，“谁是集体的头？谁拍板？是波因德克斯特还是你凯西？”

凯西回答说，“我想是总统。”

上午11点，凯西还要去参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所以告辞了，临走时说他下午1点30分再回众院这边来。

他跑到参院情报委员会的保密听证室，坐在证人席上，面前长桌上放着一具特制的话筒，样子象只螳螂，冲向凯西

的脸。这具特制话筒是用来帮助参议员听清楚这位局长的模糊发音。克莱尔·乔治坐在局长旁边。六年来，凯西一直是躲躲闪闪，回避正面答复，今天可不行了，得准备打硬仗，真正较量一番。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到齐了，坐在马蹄形的桌子旁边。参院民主党领袖、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罗伯特·伯德，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也到场了。

伯德问道，“对不起，主席先生，证人宣誓了没有？”

这话一问，使大家顷刻之间都感到尴尬。杜伦伯格回答说，除了批准人事任命的听证会外，情报委员会并不要求证人宣誓。他说，这样可以促进“自由对话”的气氛。但是，如果有任何参议员要求证人宣誓，当然也可以照办。但是，包括伯德在内，没有人要求。

凯西安静地坐着，然后开始朗读他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他企图把这个行动说成是常规的秘密行动。他没有提到中央情报局帮助1985年以色列运武器给伊朗之前没有打正式报告；也没有提到事后斯波金才起草了报告，请总统追认批准中央情报局的这次支援行动。他没有提到伊朗中间人戈尔巴尼法尔的名字，只说他是一位“伊朗代表”。

有几位参议员要求凯西讲清楚这位“代表”是谁，以及他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凯西回避了这个问题，但人们又问乔治，乔治只好说此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关系，不能讲出他的姓名。

一位参议员忽然脱口而出，问道“是不是叫戈尔巴尼法尔？”

乔治说，“参议员，是的，但如果把他的姓名讲出去，我们非常担心会危及他的生命。”

戈尔巴尼法尔未能通过几次说谎测验的事，也没有向议

员们透露。

有人问，西科德将军是否也参与了运武器给伊朗的事。凯西说，他只是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如此而已。但参议员不满意，又进一步追问他。

凯西只好瞎编说，“我们知道西科德先生的活动，但我们并不赞成这些活动。”

有人问道，是谁去和伊朗人会晤的？凯西说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对方又追问究竟是谁。局长说，“我搞不清楚，请乔治回答。”乔治说，他也搞不清楚，然后转过头去问坐在背后的行政助理，行政助理说他更不清楚了。

因此，诺思中校的名字始终没有提到。

凯西的证词经过他自己修饰加工，伸出了橄榄枝，向议员们表示善意，却没有讲什么新情况。他没有提到引起麻烦的款项问题，没有提到1000万美元如何不翼而飞，更没有提到出售武器得到的一部分钱已转用于支援反政府武装。

1点50分，凯西又回到众院情报委员会，说他并不认为让国家安全委员会掌管行动是好主意。他说，第一次让该委员会这么干是在中美洲问题上。他说，由于国会限制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问题上采取行动，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接过去管这事了。这是政府过去否认的，凯西这时却承认了。凯西还主动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在指导和积极帮助私人募集经费购买武器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细节我不知道，因为不许我参与任何事情，我只知道别人在干这事。”

当有人问到那个“无名姓的前爱国主义者（戈尔巴尼法尔）时，凯西说这个人靠不住，“是个暧昧的家伙”。人们又追问，凯西只好说，“在这种事情上，不可能找到最干净

的人来干你要他干的事，通常只能找到一些经历复杂或干过形形色色工作的人来干。”

一位民主党议员问道，“就是说，全是流氓，无非程度上有差异而已，对吗？”

凯西说，“是的，这样说是公平的。”

碰到困难问题，凯西就说，“这个问题很难说具体，”或者“我手边没有材料答复这个问题，”或者“我的级别不够，答复不了这个问题。”这些倒都是真的。但凯西躲闪问题时，并没有哪个议员真正追问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众议员们互相争论上面去了。在这种时候，记录表明凯西从未插一句嘴。凯西倒是提醒他们说，搞出售武器给伊朗的行动，使三名人质获得释放。

汉密尔顿众议员说，“我认为，这下你们解释对付恐怖主义的政策可要遇到一大堆麻烦了。”

凯西回答说，“是的，不用大预言家也能估计到这点。”下午3点5分，他总算答完了，如释重负。

那天早晨，司法部长米斯去看总统，对他说，没有谁能把这事讲清楚。自相矛盾之处太多了，不知道的事太多了，漏洞太多了，不一致的回忆也太多了。他说，等国会认真调查时，我们大家都会一个个变成傻瓜似的，要出洋相了。总统授权司法部长开始进行调查。

米斯去找波因德克斯特，请他收集所有的有关文件。波因德克斯特在白宫西厢房叫他的军事助理保罗·汤普森海军中校从保险柜里把关于对伊朗秘密行动的报告拿出来。第一个报告的日期是1985年12月5日，里面说得一清二楚，用武器换人质，而这正是里根所否认的。汤普森还是一位律师，他对波因德克斯特说，“他们拿到这个报告，可就热闹了。”

波因德克斯特知道，这会造成政治上很大的难堪。他此刻好象是站在驱逐舰舰桥上的舰长似的，决定采取断然行动。他先把报告撕碎，然后转身把碎纸片扔进他办公桌后的废纸袋。这种纸袋是用来装那些准备销毁的机密文件的，定期烧毁。波因德克斯特还找到其他的记录和未完成的文件，他把这些也撕碎后塞进废纸袋里。

当天下午，米斯打电话到麦克法兰家里。他说，“总统要我整理一份关于这件事的准确记录，我想找你谈谈。”

麦克法兰当即前往司法部，花了一个钟头讲述他能回忆的事。

米斯问到总统参与的情况和其他内阁成员所起的作用。这又花了半小时。米斯的助手离开了房间，米斯也跟着要走。麦克法兰叫住他说，“埃德，等一等，我还有一句话要讲。你也许已经从今天早晨的报上看到，我昨天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我承担对此事的一切责任，而且将继续这样做。”

米斯说，“我注意到了。”

麦克法兰又说，“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总统从一开始就完全支持这事，以色列要求我们做的一切，总统从来没有丝毫保留就批准了。”

米斯说，“这个我知道，也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实际上，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点，因为总统越是早作决定，他在法律上的处境就越好。”他还说，如果总统当初批准的是“口头报告”或“设想”，而不是正常的书面报告，那么大家的日子都更好过了，因为总统有权下令采取秘密行动。他还说，“不管你怎么去讲这事，请别掩盖事实，或者替自己或总统设想怎样讲才最有利。你就老老实实讲真话，不必考虑是否会对总统有利或不利。”

米斯又找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谈话，后者表示愿帮助部长调查。米斯却说无此必要，没有什么人犯罪，而且让联邦调查局参加，人们会批评说政府利用该局达到政治目的，那可不好。

当晚6点30分，诺思去到他的办公室。他已经基本上下定决心，准备牺牲，让那些人来消灭他。他指示追随左右四年之久的女秘书芳茵·霍尔，帮他收拾东西，从保险柜和档案夹里找出文件、备忘录、来往函件等。他把这些东西扎成一大捆，虽然感到疲倦，但仍很冷静沉着。整整花了一个小时，一切都得掩盖住。他还要求霍尔帮助涂改了四份备忘录，把可能引起麻烦的地方全涂掉了。

11月22日，星期六，天气暖和。下星期可要热闹了。米斯带了司法部两名助理部长，来到白宫。他先会见舒尔茨，然后又和斯波金谈话。他的助手们则去翻阅档案。他们在诺思的办公室找到一份关于伊朗问题的备忘录，上面没有日期，也没有写明是给谁的。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将动用1200万美元，为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购买急需的供应。"

后来，米斯带他的助手们到离白宫两条街的"老埃比特烤肉居"去吃午饭。他们谈到在诺思办公室找到的那份备忘录。米斯惊叹了一下，但认为这可能是合法的，而且也许这只是诺思自己的胡思乱想。

这时，凯西在老行政大楼他的办公室里。他打电话给波因德克斯特说，"我想过来，我们俩一起吃点三明治，你看怎样？"波因德克斯特当然同意，于是这两个知道事情最多的人单独在一起，边吃边谈，差不多有两个小时。最后，诺思也来参加。他们谈的问题中包括和伊朗联系的第二个渠道。

他们居然还想再干，认为这可以带来希望。凯西一向认为，用明显的成就掩盖正在出现的问题，乃是最好的策略。现在他们用不着找那个暧昧的戈尔巴尼法尔了，他们可以直接找伊朗议长的侄子阿里·哈希米·巴拉马尼和总理办公室的情报处长萨马伊。这两个人用以色列制造的保密通讯设备和诺思通电报已经有好一阵了。但是上星期巴拉马尼说，他感到有危险，也许已受到监视，因此通过他的警卫打电报来。

这顿午饭吃到下午3点20分才结束。3点40分，诺思打电话要求米斯在第二天安排一次会晤。3点46分，凯西打电话给米斯，说有些事情要告诉他。米斯说，“我今天晚上回家时到你那里去一趟，好吗？”

米斯来了后，凯西对他说，他的老朋友罗伊·弗马克传话说，那些为出售武器给伊朗垫了钱的人要求还钱，否则他们就不客气了。米斯和凯西这两个律师出身的大官都认为，这是敲诈勒索。但是，双方都没有提到最麻烦的事。凯西没有讲弗马克说钱到了反政府武装手中，米斯也没有讲他们在诺思的办公室里找到了那份备忘录，说明钱确是转手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但米斯还是约好了诺思下午两点来谈话。诺思先在12点30分到老行政大楼同麦克法兰谈了15分钟。诺思说，他准备告诉米斯，出售武器给伊朗所得的钱，确实转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麦克法兰知道，诺思从来不会自作主张做什么事，在这件事上，是波因德克斯特要诺思去干的。

两点钟，米斯带着两名助手来了。

诺思对他们说，是的，钱转移了；在瑞士银行开了三个帐户，号码告诉了以色列人。钱就存在这三个帐户里，反政府武装表示很感谢。有一次出售武器得到的三四百万美元

就存在那里。但备忘录里说的那1200万美元却不是美国的钱，而是以色列的钱。

与此同时，凯西写了一封密信给总统，建议撤换舒尔茨。上星期，舒尔茨借用棒球术语，说波因德克斯特是“指定的击球手”。这次，凯西也借用棒球术语，在信中说总统在国务院需要一个新的“投球手。”

星期一上午11点，米斯对总统和里甘说，他发现美国把钱转给了反政府武装。米斯然后去到波因德克斯特的办公室，对他说，“我估计你知道我们在诺思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份备忘录。”波因德克斯特说，他知道这事，而且认识到自己该辞职了。

午餐前，波因德克斯特看到诺思用电脑打来的一张短简，上面说，“听说按老规矩您不能解雇我，因此我愿自动辞职……我准备在您和总统决定的时候离开……我们差点成功了。永远忠于您的诺思。”

波因德克斯特也在电脑上打了一封回信说，“谢谢你。我今天两次和米斯谈到此事，他仍在考虑如何处理。我告诉他我准备辞职，我说我明白他的暗示。他是总统以外我可以信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如果我们不离开政府的话，你是否愿意到中央情报局去当凯西的特别助理？这样可以使你能够正式参加他们的行动。先别对凯西提这点，我只是想先知道你的想法。”

在白宫与客人一起照相时，记者们问总统，他是否应该承认在出售武器给伊朗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总统回答说，“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说谎，我没有犯错误。”当记者追问别人是否犯了错误时，总统说，“我不想撤换任何人。”

凯西把弗马克请到中央情报局总部，想了解伊朗行动中

的花钱情况。然后他打电话给诺思说，“我这里来了个人，他说你欠他1000万美元。”

诺思说，“瑞士银行里现在只剩下三万美元了，请你对他说，欠他钱的是伊朗人、以色列人。”

凯西打电话找米斯，但没有找到。他又打电话给里甘，留话说他有急事要和主任谈。里甘答允回家时顺路到中央情报局弯一下。里甘来后，凯西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然后问，总统准备怎么办。

里甘说，转移钱给反政府武装的事被发现了。

凯西说，“那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里甘说，他本来一直认为这件事无利可图，现在事已如此，只好准备明天公开宣布。

凯西问，“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吗？”然后他自己回答说，“这样会把整个伊朗问题破坏了，可能还会葬送掉那些人质的性命。”他说，伊朗会恼怒，国会也可能把援助反政府武装的款项取消。

里甘说，“那就让他们这样干吧，我们怎么还能安坐不动呢？我的意思是这事真是丢人……我们这事可能是犯罪的。”

凯西说，“我希望你明白，这会引起不少挫折，而且会成为一项大新闻。”

里甘表示，已经作出了无法改变的决定，现在是“义无反顾，别无选择。”

11月25日，星期二，清晨6点30分，凯西打电话给米斯，要他上班时顺便到凯西家来一下。7点正，司法部长的轿车到达凯西住宅门口。

凯西问，现在情况如何。米斯说，波因德克斯特要走了，所有的一切就要公布出来。

凯西说，他准备把所有的有关文件收集起来，送给米斯。

然后米斯打电话到波因德克斯特的轿车上，要求他到司法部来谈谈。波因德克斯特到达后，米斯对他说，只有一句话，你今天就辞职。米斯还说，他认为诺思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

波因德克斯特回到白宫西厢房自己的办公室后，要随从给他端来早点，就在盘子里吃起来。然后他坐在会议桌的一端，镇定地告诉他的军事助理汤普森说，他今天要向海军提出辞呈。波因德克斯特既不紧张，也不激动，更不迟疑；他十分安详。

八个月后，波因德克斯特到国会作证说，他认为诺思的主意不错，因此批准了，但从未报告总统。波因德克斯特认为他有权批准把卖武器给伊朗的钱转用于支援反政府武装。他认为，"如果报告总统"，他也会批准的。诺思的女秘书霍尔作证说，米斯的助手在诺思办公室发现的那份备忘录，是经过波因德克斯特修改的，准备上报总统。诺思说，他一共起草过五个备忘录，准备通过波因德克斯特上报总统，但后来都藏起来了。波因德克斯特则说，他记不得有这些备忘录了。后来查帐表明，从卖武器给伊朗所得的钱中，只拨了300万美元给反政府武装，还有800万存在瑞士银行各帐户里。

25日上午，总统对国会领袖们讲了转移款项给反政府武装的事，并说波因德克斯特"并未参与此事"，但他已按海军传统提出辞职，因为按海军传统，一旦出了事，负责指挥

的舰长就得辞职。总统还夸奖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干得很好，转移款项之事也"与政策不冲突。"

中午，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念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然后介绍米斯同记者们见面。米斯宣布说，大约转移了1000万到3000万美元给反政府武装。总统听到这里，大为震惊，马上说他可不知道有这么多。总统随即宣布，波因德克斯特辞职，诺思被撤职。

当天下午，诺思的女秘书芳茵·霍尔从诺思的办公室偷偷拿走一小捆文件，约有半英寸厚，藏在她的衣服里和长统皮靴里，送到诺思家中。两个人对好口径，商量好如果被问到就说，"我们每天都藏匿一些文件。"晚上，一名保安人员把诺思的门封上了。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凯西，问他政府是如何陷入卖武器给伊朗的勾当的。

凯西说，"1981年，以色列劝我们和伊朗打交道，目的是接近伊朗军方。从霍梅尼死后的远景来看，我们认为这个主意似乎很有道理。"

我问，为什么会有利润？

他说，"伊朗愿意多付点钱。"

我问，你事先知道转移款项的事吗？

他说，"法律规定我不得参与。"然后又说，米斯已经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了，中央情报局包括局长在内都不知道这事。

几天后，特纳过去的副手弗兰克·卡卢奇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同时宣布正寻找一位中立的律师来调查出售武器给伊朗案的刑事问题。总统还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来调查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领头的是前参议员约翰 托尔。同时，参院情报委员会开始进行全面调查。波因德克斯特此时只同凯西谈过一次话，是就聘请谁当他的辩护律师问题征求凯西的意见。

12月3日下午1点左右，我再次打电话给凯西。有许多政府官员和国会领袖说，凯西在中央情报局也呆不下去了。我打过去时，他正在吃中饭。

他边吃边在电话中说，“参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说，事情会搞清楚的，我们会象玫瑰花一样香喷喷地重新出来的。法律禁止我们支持反政府武装，我们没有参与这事。”

他说，中央情报局在卖武器给伊朗问题上只犯了两个小小的错误。一个是1985年11月未经里根批准就帮助白宫让以色列卖武器给伊朗。另一个是中央情报局有几个“胡里胡涂”的低级职员在美国和沙特联合秘密支援阿富汗抵抗力量时，竟使用了储存售武器给伊朗所得款项的那个瑞士银行帐户，因此把从伊朗得到的钱同拨给阿富汗的钱混在一起了。

我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但凯西不耐烦了 不肯再回答。

中央情报局的法律处想搞清楚该局的官员在支援反政府武装问题上可以和私人捐款者及空运人员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因为该处的职责是要使中央情报局的一切活动都符合法律规定。12月5日 一位副法律顾问写了一份意见给克莱尔·乔治，说“同捐款者来往，尽管违反政策，却并不违犯法律。”

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都去职了 只剩下凯西一人独自料理快要失败的伊朗行动，看看还有什么可做的。原定12月13

日在西德法兰克福和伊朗的第二条渠道会晤，舒尔茨已取得白宫同意，不再卖武器给伊朗，中央情报局去参加会晤的代表也不要再谈什么政策问题。但凯西打了电话给里甘，要他劝总统改变自己原来的决定，总统同意了，于是打了绝密电报到法兰克福，授权国务院的代表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和对方进行“政策和情报讨论”。

法兰克福的会谈结束后，舒尔茨接到国务院的代表打来的保密长途电话。国务卿听完对方的汇报后，大吃一惊，赶忙打电话给总统说，有事需要马上报告。总统请他第二天早晨到白宫来。

14日早晨，星期日，舒尔茨来到白宫对总统说，法兰克福的会谈表明，样样事情都无法控制了。波因德克斯特、诺思、凯西和中央情报局同对方谈判的事，简直把美方搞得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伊朗的代表在法兰克福提出一项包含九点的议程，说是过去和诺思及中央情报局谈妥的。九点中有一点要求美国作出努力，争取使1983年用满载炸弹的卡车袭击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而被判刑的17名罪犯获释。多年来，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美国一直强烈支持科威特拒绝释放这17名罪犯。他们都是“号召”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是一个激进的、狂热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集团，与1983年在贝鲁特杀害241名美国军人事件和其他恐怖行动都有关。但这次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却在会上说什么这个问题可以商量。这简直是和总统的原则和主张开玩笑，破坏总统亲自说过的誓言，即法网恢恢，恐怖分子纵使逃逸也无法藏身。造成目前这次混乱的根源，正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态度。舒尔茨说，他真感到恶心。

总统拉长了脸，眼中闪耀着怒火。自1985年夏天以来，

舒尔茨一直在反对搞这个伊朗行动，但总是斗不过那几位。今天，他终于赢了。

第二天上午，12月15日，星期一，凯西正在总部七楼的办公室为再次到参院情报委员会去作证进行准备时突然抽风。马上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乔治城医院。在那里他又第二次抽风，但说话和动作都正常。星期四上午7点40分，他被送进手术室，一个由三位医生组成的小组给他做手术，一直到下午1点，摘除了一个柔软的癌肿瘤，称作淋巴瘤。这个肿瘤是从左脑内侧取出来的，左脑控制身体右侧的活动。医生们在诊断书中写道，他们估计73岁的凯西能够恢复正常活动。

局长职务暂时由盖茨代理。他在1月份花了许多时间去抵制白宫要求另外派人接替凯西的压力。这时凯西已经病得很重，几乎不能说话了。白宫还是强迫他提出一些可胜任局长职务的人名，结果他只好提议前参议员约翰·托尔、前参议员保罗·拉克索特和前参议员霍华德·贝克。他希望这三位大人物都不会来屈就，免得把中央情报局弄得支离破碎。

六个星期后，凯西居然恢复多了，真是奇迹似的。1月28日，星期三，医生允许盖茨到医院去探视他。

盖茨去时，凯西正坐在窗旁。他本来没有多少头发，因此由于用辐射和药物治疗而掉头发的情况不大看得出来。盖茨有许多问题要谈，所以就讲开了。凯西头脑仍清楚，在盖茨谈话时他还不时作简短的评论，有时则咕哝一声表示烦恼。

最后，凯西说，“是我走开的时候了，”然后挥动左手说，“让位。”

第二天，盖茨又通知里甘和米斯去医院探视。凯西已经

不能写字了，因此由索菲娅代他在辞职信上签字。凯西一共当了六年零一天的局长。

我带着一张问题单去到乔治城医院，有些问题是前几年积存的。因为1月底连下了两次大雪，路上车辆很少。我在医院的大厅里没有停留多久，就看见中央情报局的一名警卫，头上戴着对讲机的耳机走来走去。他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往左转入新盖的侧楼，坐上电梯，在六楼停下。我跟着上去，看见四名中央情报局的警卫在一间小屋里看下午的电视节目。

凯西住在C6316号病房，登记的化名是“莱西”。门关着，我拿出身份证，但门口那名警卫不许我进去。我只好回来。

回想三年来，我每次去采访凯西，总要事先把问题写在黄色的律师用纸上。这些纸我全留着，因次现在有厚厚的一叠了。有些问题尽管已经问过，得到凯西的回答并且在别处得到了印证，现在却仍会引起新的好奇心。我花了许多时间考虑应当问些什么问题，然后压缩成一页纸，标题是：“凯西尚未回答的重要问题。”现在看得更清楚，这个人对里根政府的雄心壮志和艰难险阻是多么有关系。对于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与伊朗进行交易，以及其他各种秘密活动和联系，凯西的信念、无限忠诚和执着追求一点也不比别人差，甚至不比总统差。他对法律的态度是最低限度的遵守和最少的透露。这种态度也贯穿渗透了里根的外交事业。如同他有一次告诉我的，他的志向就是要证明美国能够做“这些事情，”他指的是那些真正保密、永久保密的秘密行动。这一部分是一种怀旧心情，一部分是坚强意志的表现。

有一次，他带着渴望的神情对他的一名高级助手说，"我们能够赢的。"他认为他的一大成就是防止了中美洲变成共产党的天下，正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成就是防止了西欧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一样。索菲娅有一次在电话中对我说，"比尔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天生的爱国者。"

是这样吗？这就是他的目的吗？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他的祖国吗？付出了什么代价？现在这出戏快要结束了，我不禁感到自己有责任作出判断。自我认识他三年半以来，我一直有意避免这点。那样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和比较稳当。由于某种原因，我和他在对待机密的看法上已结成伙伴。我们两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执着地追求着机密。在这出戏中，机密是我们对话的媒介。机密是什么？价值如何？用处如何？

1986年，凯西曾对我说，他看过我写的一篇书评，题为"评约翰·卡里著《完美无缺的间谍》一书"。凯西说，他同意我对卡里对间谍的看法的解释，那就是间谍的技巧越高，欺骗的手腕也越高。我曾对他说，书中有两句话我十分欣赏，那就是："在每一个行动中，都有线上和线下的事情。线上的是照章办理的事，线下的是如何做好工作的办法。"凯西听了不置可否，什么反应也没有。有时候，他真是莫测高深。

凯西之所以吸引住我是因为他对我有用，而且从不回避交锋。他也许会叫嚷、挑战，甚至威胁，但他从来不断绝对话和关系。1985年，本报揭露了用来准备反击恐怖分子的先发制人秘密小组。凯西对我说，"你们手上会沾满鲜血的。"后来我才知道，他说这话时，已经和沙特情报局和沙特驻美大使秘密约好，要暗杀超级恐怖分子法德拉拉。结果，法德拉拉没有死，却至少死了80个无辜的人。

我不知道凯西内心的反应是什么，他很聪明，不会看不到他和白宫都犯了规，也许应该说是犯了法。手上沾满鲜血的是凯西。

关于白宫、中央情报局和国会的制度问题，秘密行动的政治诱惑力，战争权力问题，以及“似乎可以否认”问题等，都自会在调查时提出。我所想到的是个人责任问题，凯西的责任问题。事态的发展和人们的揭露不会让他滑过去，只会使他被紧紧地钩住。我倒希望他自己脱钩，唯一的办法是作出某种承认，或者向同事道歉，或者表示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问题单上最后添上：“你现在是否感到错了？”

若干天后，我又去医院探视凯西。这次门是开着的。脑手术留下的伤疤尚在愈合中。我问他情况如何。他的眼中闪耀着希望和现实感的交织，说道，“行……好点……不好。”我和他握手，表示问候。他抓住我的手，紧紧握住。这一刹那，室中似乎充满了和平和阳光。

他问我，“书写完了吗？”我说，永远写不完，还有好多问题哩，我永远也搞不清楚他干的那些事。

他嘴的左角弯开，形成微笑，然后又咕哝不清了。

我说，瞧你惹的这些麻烦，使整个政府都在受调查了。

他好象没有听见，因此我又重复了一遍。顷刻之间，他显得很自豪，扬起了头。然后，他又说，“痛苦啊。”我以为他指生理上的痛苦，便问道，“先生，哪儿疼？”

他说了一声“噢”，便停住了。我想，他好象是说，退出了行动，好痛苦啊。但他忽然又说话了，显然还是讲痛苦问题。他说，“不知道的事情。”

我终于明白了，隐藏着的事更重要，更使他痛苦。他现

在已经十分虚弱，生命危在旦夕，他自已也知道，于是又说到死的问题。他说，“我要去了。”我说，不会的。

我又问，你知道内幕的，对吗？把钱转拨给反政府武装的事，你是一直知道的，对吗？

他的头一阵痉挛，显得十分痛苦。他瞪眼看我，最后点头说，是的。

我问，为什么要干？

他说，“我信仰。”

我又问，什么？

他仍说，“我信仰。”

然后他就睡着了。我再也没有机会问别的问题。

几星期后，索菲娅把他接回家去，但不久他又返院。最后，她把他带回纽约梅诺尔老家等死。他在那里感染上了肺炎，住进长岛的一家医院。在那里，5月6日上午，即国会开始公开听证售伊朗武器得款转用于支援反政府武装问题后第二天．凯西去世了。